

透视诡把戏 揭诡亦有术

诡谋论

刘水清 著

所谓诡谋即邪恶计谋是由恶欲导引用黯慧运作的争利避害的计策简而言之即阴谋诡计暗算之法

群众出版社

权术

——暗藏在政治生活中的诡谋

奸计

——兜售于经济生活中的诡谋

鬼点子

——融化到日常生活中的诡谋



ISBN 978-7-5014-4426-7



9 787501 444267 >

定价：23.00元

诡谋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诡谋论 / 刘水清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014-4426-7

I. 诡… II. 刘… III. 谋略-研究 IV. C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7003 号

诡谋论

刘水清 著

责任编辑 / 刘一民

封面设计 / 张雪梅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 [www. qzcbbs. com](http://www.qzcbbs.com)

信 箱 / [qzs@ qzcbbs. com](mailto:qzs@qzcbb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890×1240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268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426-7 / D · 2122 定价: 23.00 元

自序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小胜大，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运用谋略。假如当初相对弱小的刘邦不“宁斗智，不斗力”地运用谋略，他恐怕老早就成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的刀下鬼了；假如诸葛亮不设空城计，两千五百名老弱残兵能够抵挡得住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谁也不能否认，谋略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奇效，能够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但是，谋略有一最怕：最怕道德的管束。因为谋略是正人君子的智慧游戏，如果运用谋略时悖逆道德，那么，他们的智慧游戏里就有了人格瑕疵，因而要被世人谴责。世上有没有不受道德约束而又有谋略之功效的办法呢？有，这就是诡谋。

诡谋也是谋，只不过它是邪谋，是谋氏家族中的孽种。谋“作为一种文化样态，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极为深远而痛彻的影响。它的影响之全面、深邃表现在：从文化精神到社会结构、正义原则，从基本智慧形态到人人关系乃至国民的基本生存样态，无不打上它的深重烙印”。^①作为谋氏家族中一员的诡谋，最拿手的看家本领就是采用阴险、刻毒、无耻、说谎、伪装、欺诈、算计、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方式，游走于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非分利益或好处，以最便捷的途径办成害他利己的事情，从而给社会带来更为“痛彻的影响”，给人心打上更为“深重的烙印”，给谋文化增加更为明显的负面效应。这就是诡谋的实质。说得简单一点，诡谋就是由恶欲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40页。

诡 谋 论

2

导引而用黠慧运思出的争利避害的计策；再简单一点就是：谋为诡所使谓之诡谋。因此，凡挖陷阱于道德、设圈套于正义、布骗局于诚信者必然是诡谋。

诡谋是被道德法律排斥在外的智狐，生性狡猾，精于算计，凭着自己的野性和灵性想算计谁就算计谁，不论是天上的飞鸟（如算计乌鸦夺其嘴中之肉）、地上的走兽（如算计老虎假其威），还是水中的游鱼（如算计海鱼保己命^①），都可以作为算计的对象。人呢，人能幸免于诡谋的算计吗？不能！诡谋不算计人不成其诡谋。古往今来，无数人因被算计而受害于诡谋，也因此激活了诡谋，原因不在于他们愿受其害，而在于他们一万个不愿意的时候仍受其害。诡谋就是在这种“一万个不愿意”的对抗中，不断地战胜对方，使自己得以发展壮大，久盛而不衰，尽管四周有无数敌视的眼光、无数讨伐的声音、无数扑灭的行动。然而，追捧诡谋者仍然众多，运用诡谋者照样难以计数。有的人因追捧成癖，运用成瘾，从而积淀成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心理状态即诡谋人格。这种诡谋人格者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追求私利上贪得无厌，永远都没有满足感，其基本心态是能占有有什么就占有有什么、能占有多少就占有多少。他们占有王权不怕大，占有一篇“豆腐块”文章的署名权不嫌小；占有国库里的全部黄金不怕多，占有同伴手中的一枚硬币不嫌少；占有乞丐的饭碗不怕丑，占有妓女的裤衩不嫌脏。为了占有方便，他们习惯于撒谎，一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无论其问题大小难易，皆考虑用撒谎的办法去解决。当问题中的事实比较完美的时候，他们用谎言让其锦上添花；当事实有所欠缺的时候，他们用谎言将欠缺填补；当事实糟糕透了的时候，他们用谎言让糟糕消失得

① 在犹太人讲的故事中，有这样一则故事：狐狸来到大海边，鱼儿们对它说，海王利维坦病重，要请聪明无比的它去继承王位。狐狸非常高兴，马上骑到鱼儿们的背上进入了大海。当它得知鱼儿们是奉命要把它拖进深海将其心献给海王、让海王吃了变得聪明时，即刻对鱼儿们说，自己的心丢在家里没有带在身上，让它回去把心带上后再来，否则将一个无心的狐狸送给海王的鱼儿会遭责罚的。鱼儿们信以为真，马上把狐狸送到原来的地方，狐狸即刻跳上了岸。海王得不到狐狸之心而将受骗的鱼儿们统统吞噬。

无影无踪；当事实根本不存在的时候，他们用谎言魔术似的变出一个；当事实确确实实存在的时候，他们根据需要用谎言将方说成圆、圆说成方，或指鹿为马、李代桃僵。甚而极者，撒谎成其本能，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没有谎言，他们无法活，即使活着也倍感生活单调苍白。因此，哪怕是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也一样撒谎不误。当撒谎还不能解决问题时，他们便采取阴险毒辣、卑鄙无耻的诡谋技法对付所有自认为有碍他们占有的人。他们不讲信用，即使刚刚表态承诺的事，也像得了健忘症一样转身不予承认，特别是涉及有损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你若要他们兑现承诺，他们不仅不承认自己表态承诺过什么，反而会说你是在胡说八道、栽赃陷害。他们最善于拨弄是非、借力打力，哪里有乱，他们便通过扇阴风、点鬼火让这里更乱；哪里无乱，他们便通过拉帮结派、造谣中伤给这里添乱；当鹬蚌相争、你死我活时，他们当得利的渔翁，若无利可得，就让鹬蚌同时死亡或者一死一伤，以减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如果谁影响他们往上爬或者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绝不轻饶，非处心积虑、想方设法把你整垮不可，即使你曾有恩于他，他也会毫不留情，能够一棍子把你打死的，绝不分作两棍子。这就是诡谋人格者的性情。

实践表明，诡谋坏，诡谋人格者更坏，坏就坏在世人因它流下无数的血和泪，社会因它没有一天的轻松与安闲。但奇怪的是：对于诡谋，糊涂的人容易落入其陷阱，聪明人照样不能幸免；很多人即使受过其害，但恨它之后却又爱它；奸佞小人喜欢用它做武器，正人君子也愿意拿它来为自己服务。按理，诡谋人格者应该是出现一个就被人们谴责的唾沫淹死一个，殊不知他们大多活得非常滋润——在仕途上的官运亨通，在商途上的财源滚滚，在日常生活中的吃香喝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此及其相关问题给予了一一的解读，虽然不能说这种解读对社会具有不一般的意义，但对识别、防范、打击、消灭诡谋却有文本价值，毕竟据作者所知，目前还没有一本专门系统研究诡谋现象的著作。

诡谋论

本书在写法上力求融学术性、真实性、知识性、警示性和可读性于一体，以期赢得更多的读者从中得到鼓励和慰藉。

最后，需要旗帜鲜明地强调：笔者反对诡谋。本书扫描诡谋现象、透视诡谋问题，为的是揭露诡谋真相，使人们更清晰地识别诡谋，更有效地防范和反击诡谋。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谋与诡谋	1
一、谋是什么	1
二、诡谋的实质	4
三、诡谋的构成	9
(一) 诡谋主体	10
(二) 诡谋对象	11
(三) 诡谋目的	14
(四) 诡谋技法	16
(五) 诡谋场	18
(六) 诡谋德性	20
第二章 诡谋与智慧及思维	24
一、源于智慧，成于思维	24
二、诡谋智慧	26
三、诡谋思维	30
(一) 诡谋思维所处的层次	30
(二) 诡谋思维的品质	31
(三) 诡谋思维样态	31
(四) 诡谋思维的价值取向	34
第三章 诡谋的类型	36

谋 论 诡

2

一、损人利己型诡谋	38
二、利己以害他型诡谋	42
三、利他以害他型诡谋	46
四、害己以害他型诡谋	50
五、完全害他型诡谋	53
 第四章 诡谋的特征	58
一、动态特征	58
(一) 从立足点上看,以利害关系为根本	58
(二) 从效益上看,追求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	64
(三) 从方法上看,选择手段可以无所顾忌	67
二、静态特征	71
(一) 变化无方的奇巧性	71
(二) 藏而不露的隐秘性	75
(三) 纵横交织的层次性	79
 第五章 诡谋不衰之因	85
一、自身因素	85
(一) 具有四两拨千斤之奇效	85
(二) 适用于任何领域	87
二、人性因素	89
三、社会因素	94
(一) 邪恶存在,诡谋有了滋生土壤	94
(二) 诚信缺失,彼此应对以诡谋	95
(三) 法治稚弱,诡谋借人治而流行	97
 第六章 诡谋人格	100
一、人格与诡谋人格	100
二、诡谋人格的特点	105
(一) 撒起谎来习以为常	105

(二) 弄虚作假得心应手	109
(三) 自私自利无以复加	112
(四) 贪得无厌不知收敛	114
(五) 阴险毒辣贯穿始终	119
三、诡谋人格的形成	121
(一) 诡谋人格形成过程	122
(二) 诡谋人格形成动力	124
 第七章 诡谋的政治化——权术（上）	129
一、权术和权力	129
二、权术的基本特征	134
(一) 对象上的明确性	134
(二) 手法上的多样性	137
(三) 观念上的必要性	139
(四) 影响上的深广性	141
三、权术运用的基本原则	144
(一) 因人而异的原则	144
(二) 随机应变的原则	147
(三) 功利至上的原则	150
 第八章 诡谋的政治化——权术（下）	153
一、权术应用于官场	154
(一) 主动出击之招	154
(二) 防守蛰伏之招	160
二、权术应用于宫廷	162
(一) 宫廷对权术的作用	163
(二) 君臣权术应对	170
三、权术应用于办公室	173
(一) 办公室权术的一般特点	174
(二) 办公室小人及其行时原因	179

谋 论 诡

第九章 诡谋的经济化——奸计	188
一、奸计的通常技法	189
(一) 以消费者为客体的通常技法	190
(二) 以竞争对手为客体的通常技法	196
(三) 以合作伙伴为客体的通常技法	199
(四) 以利益相关者为客体的通常技法	207
二、奸计的类型	211
(一) 被迫型奸计和自愿型奸计	211
(二) 偶尔型奸计和经常型奸计	213
(三) 重创型奸计和轻害型奸计	214
三、奸计的根源	215
(一) 商品经济蕴含着奸计	215
(二) 博弈心理助长奸计	220
第十章 诡谋的生活化——鬼点子	225
一、鬼点子释义	225
二、鬼点子发生的原因	229
(一) 因玩笑而发生	229
(二) 因恨人而发生	232
(三) 因好处而发生	239
三、鬼点子的特点	244
(一) 主体上的不限性	245
(二) 对象上的广泛性	245
(三) 目的上的多样性	246
(四) 运用上的灵便性	247
四、鬼点子与处世哲学	248
第十一章 诡谋的危害	256
一、杀人不见血	256
二、侵犯生活公理错位应世	259

(一) 用虚假代替真实	259
(二) 用伪善代替诚信	260
(三) 用淫巧代替规则	261
三、拉大旗做虎皮连累谋略	262
 第十二章 对付诡谋	267
一、辩证思维，变废为宝	267
(一) 让诡谋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	267
(二) 有条件地使用诡谋	271
二、练就慧眼，择机反击	278
(一) 纯洁心灵，明亮双眼	278
(二) 看穿人心，识破机关	281
(三) 把握时机，奋起反击	288
 主要参考书目	306
后记	309

第一章 谋与诡谋



绝不是思维开小差才有的结果，诡谋恰恰是从思维里冲出了一头魔兽，辗转腾跃，千变万化，于无形之中吞噬所有规则，于有形之中践踏任何良善。世人的想象一而再地被其奇幻的动作惊破，道德者的目光再而三地被其阴险的笑声淫猥。于是，本来就不平静的历史和社会更是如鲠在喉、如芒在背，更是没有了一刻的轻松与安闲。

一、谋是什么

研究诡谋，不可不认识谋，因为诡谋是谋之子，谋是诡谋之父。虽然我们不认为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是真理，但我们认为诡谋绝对继承了谋之精华。

谋是什么？《说文解字》吝啬地用两个字作了“说解”：“虑难。”（思虑所办之事的难易）虽然简单，但道出了谋之根本，“谋”字很早就出现在各种史籍中，《尚书·大禹谟》中有“弗询之谋勿庸”；《诗经·小雅·皇皇者华》中有“载驰载驰，周爰咨谋”；《论语·卫灵公》中有“君子谋道不谋食”；《老子》七十三章中有“歜然而善谋”；《鬼谷子·谋篇》中有“为人凡谋有道”；《孙子·谋攻篇》中有“故上兵伐谋”；《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兵，止也 防敌之萌，皆在谋略”……。这些史籍中的

谋 诡 论

“谋”，尽管依《说文大字典》注释为“计也议也图也谟也”，“计，筹策也；议，谋也；图，谋划也；谟，议谋也”等意思，但从根本上讲，仍是在思虑所办之事的难易。经过几千年的演变，时至今日，“谋”所含之义更加丰富，《汉语大辞典》给出的解释就有九种之多，其中图谋、算计最与诡谋接近。

谋，在现时的语汇里多以计谋、权谋、图谋、阴谋、智谋、谋略、谋诈、谋划等面目出现。这些语词的核心是谋，都有策划、算计、运筹、拿主意、想办法之意，只是其表述不同、侧重点不同、用的场合不同、涉及的对象不同罢了。

谋是思维的产物、智慧的结晶，它伴随着人类“经历了一个由自发用谋到自觉用谋的漫长过程，它概括和吸取了人类几千年来的思想精华，充分反映了一个民族认识的转变和思想的进化。因此，谋略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思想史，一部文化史”¹。我们从这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看到了“皇帝有治国安邦、驭臣牧民之术，文臣有上言进谏、辅佐王权之谋，武将有兵家用兵的韬略，官场有骇人听闻的权谋法术，文人学士有修身养性进阶退隐之途，老百姓有交友处世谋财治家之方，纵横家有捭阖游说之法，道士阴阳家有驱妖逐魔观阴阳风水以谋人事之道，如此等等”²。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云谲波诡的政治舞台，还是在刀光剑影的沙场；无论是在神秘莫测的外交战线，还是在由那‘看不见的手’所差遣的经济王国，乃至日常人际交往之间，几乎每一处都留有它的踪迹。谋略已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³这是因为，“谋之则兴，不谋则衰；谋之则有所成，不谋无所成，或饱尝失败的痛苦”⁴。对此，三千多年前的东方谋略始祖姜尚就认识到了，他说：“先谋后事者

1 许国民、陈阳平著：《谋略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2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4页。

3 李大根等主编：《中国谋略事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1页。

4 张建明著：《清代韬略》，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昌，先事后谋者亡。”^①

谋之发达，在于谋是人治社会不可或缺的现象，是竞争与对抗造就的制胜法宝，是强者不显山不露水的操控良方，是弱者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所以它具有工具性、经验性、奇特性、隐蔽性、灵活性等特点，并以千姿百态展示自己的才艺，而这种才艺绝对是技压群芳。从性质上讲，谋有奇正之分，“奇，即变幻莫测；或使对手狐疑不定，进退维谷；或使对手判断失措，误入歧途。正，即光明正大，大智若愚，韬光养晦，往往以常人所不具备的恢弘和大度来对待自己的敌手。”^②从时空上讲，谋有深谋远虑、权宜之计与随机应变之别，“在谋略宝库之中，有许多深谋远虑的妙计，像伊尹辅佐成汤灭夏策，姜尚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奠定西周基业之谋，孔明‘未出隆中，先知三分天下’的战略，都在较长的时期中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相对于深谋远虑来说，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应付某种情况而采用的谋略，通常称之为权宜之计；而在应急情况下采用的对策，人们多叫它随机应变。随时应变的谋略相对于权宜之计，时间意义上更为短暂，有时甚至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③从规模上讲，谋有大谋、中谋、小谋三个层次。“刘向说的君子之谋，是战略上的谋略；孙子说的诡道，是战术上的谋略；而反道德的计谋，至多是智巧。战略性谋略，我们称之为大谋；战术性谋略，称之为中谋；智巧性谋略，称之为小谋”^④。谋的模样是千变万化的，没有定数，就像万花筒里的景象，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到底有多少种、多少类。

千姿百态、千变万化之谋被人们钟爱有加、津津乐道之时，对它不屑一顾的却大有人在，谴责诅咒之声也不绝于耳。用谋鼎盛时期的荀子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谋，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汉代王充质问用谋者：“以权诈卓谲，能将

① 《古今图书集成·兵略部》。

② 刘国建：《谋略初探》，载《河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③ 柴守球编著：《谋略论》，蓝天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

④ 吴稼祥著：《神奇的加与减》，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

谋 诡 论

兵御众为贤乎？”宋代徐谊非常崇尚尧、舜、禹有诚无谋，他指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谋；至诚不息，则可以达于天德矣。”明代宋濂像对待蛇鼠一样对待谋，他大声斥责被人们誉为谋之经典的《鬼谷子》：“捭阖、钩钳、揣摩等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债，天下用之则失天下。”

谋的确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造就经天纬地、雄才大略之人才，又可成全窃国大盗和奸佞小人。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从国民的一般生存状态看，由于过分倚重谋略必然养成一种狡黠自私甚至是畸形状态的文化心理。人人都在谈谋，大家都有谋略，在共同的谋略对付圈中，人人之间便被谋所阻隔开来，人对人便有所谓‘心机’和‘算计’，人与人之间便很难坦荡相处。互相猜疑、互相提防、互相谋算上升为一种旋绕于人人关系之上的基本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之下可以想见人们的心理状态。如果在军事对垒中谋略的运用尚保持着极大的合理性，那么在人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上过分地倚重权谋就更多的是糟粕。它的消极影响可以说极为惨痛。人人之间关系的算计化和谋略化进而导致人的自私和虚伪，它的文化扩张甚至可以把基本的道德原则、信仰、社会规则等变为谋略。在此种情况下，就很难有正义之声的高扬和对社会公平原则的维护。”^①

作为谋之孽子的诡谋，以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加入到谋之消极影响中，挖陷阱于道德，设圈套于正义，布骗局于诚信，成为社会肌体中的毒瘤，危害匪浅。

二、诡谋的实质

诡谋是谋，是谋中之邪谋，与正谋或谋略（我们硬性规定谋略不包括邪谋）相对。其邪就邪在“诡”字上。“诡”有多种含义，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41~42页。

可解释为欺诈、虚假，可解释为假装、冒充，可解释为差别、不同，可解释为怪异、奇特，等等。《吕氏春秋·勿躬》：“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利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这里的“诡”便是欺诈、虚假之意。清朝周亮工《书影》卷九：“此质儿者，诡不义以行义，厚矣。”其“诡”便是假装、冒充之意。《淮南子》：“尺寸虽齐必有诡。”此处之“诡”便是差别、不同之意。《庄子·齐物论》：“是其言也，其名为弔诡。”郭庆藩《庄子集释》引卢文绍曰：“诡，九委反，异也。”很显然，“诡”在这里被庄子以怪异、奇特之意而用。我们所说的诡谋之“诡”，上述四种含义兼而有之。因为诡谋有欺诈、虚假的本质，有假装、冒充的手段，有差别、不同的个性，有怪异、奇特的表征，任何只作一个方面的理解，都不符合本书之“诡”义。

“诡”与“谋”联合起来使用，很多人感到陌生。王兴亚、程爱勤任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诡谋》一书的前言说：“‘诡谋’一词是我们在这里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和标新立异，而是希望由此概括出我们所选列的介绍‘谋术’的每篇文章的独特性。”其实，诡谋一词并非他们的创造，发明权还得让给前人，因为历史上使用此词者大有人在。《三国志·魏光·陈泰传》记述：“诚非轻军远入，维之诡谋仓卒所办。”元朝欧阳玄《分宜县学复田记》载：“直至刘自昭盗卖砧基之后，始生诡谋，则其枉直较然易知也。”史学家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八章第九节中有：“‘不为遥制’，‘即画押勿误’是西太后、李鸿章的真意，‘全权定计’、‘酌量’是日后推却责任的诡谋。”（参见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在长达一千几百年的时间跨度里，诡谋一词常出现在各种文献中，有人还直接以其为题，记述了一个未能成功但可谓惊天动地的诡谋。20世纪80年代，有个叫汤志钧的中国学者在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发现了一份极具史料价值的资料，这份资料记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密谋“兵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经过，其题目就叫做《诡谋直记》。

谋诡论

诡谋一词虽然被频繁使用，但却不被今人所熟识，原因恐怕在于它被具有同等意义的“阴谋”或“诡计”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讲，阴谋诡计就是诡谋。“阴谋”和“诡计”是两个贬义词，但二者合一形成一个成语并没发生负负得正的效果，反而更加贬义了。由此可见，诡谋是一只绿头大苍蝇，只能逐臭于不道德的人、不道德的事。

有人说诡谋是一个中性词，原因在于诡谋之诡“表示一种正邪不分的‘奇异’概念”。^① 作者认为，谋之本身就有“奇异”的因子，谋是中性的，不分正邪。谋，“从它的本质属性而言，只是人类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只是一种工具，本身并不具备任何道德色彩。”^② 而“诡”则不同，“诡”本身既有道德色彩，也没有道德色彩。欺诈、虚假的本质和假装、冒充的手段是其有道德色彩的一面；差别、不同的个性和怪异、奇特的表征是其没有道德色彩的一面。恰似一个人，他的思想意识、他的为人处世，是有道德性的；而他或急或慢的性子、或白或黑的皮肤是没有道德性的。故从根本性上讲，诡谋之“诡”不是一个中性词，而是一个具有浓郁道德色彩、凸显邪恶的贬义词。诡是贬义的，中性的谋与诡结合，产生近墨者黑的效果，诡谋也就具有道德色彩，与阴谋诡计等量齐观了。

诡谋是主观意识的产物。诡出自于主观意识中的潜意识，是潜意识中的恶欲造就；谋出自于主观意识中的显意识，是显意识中的理性使然。诡谋就是在恶欲的支配下，通过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形式完成的计谋。它的目的在于争利和避害，不争利益、不避损害则没有运思诡谋之必要。

诡谋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始终作为谋的一种形式存在和发展，但并不与谋共始终。它后于谋产生，先于谋消亡。原因在于：谋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比如原始人挖造陷阱捕捉野兽），但这

^① 王兴业、程爱勤主编：《诡谋》，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页。

^② 邓建华编著：《谋略经纬》，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8页。

时的人类主观意识里还没有道德意义上的邪恶；邪恶产生于有了劳动剩余，有了社会分工，有了私有制，人类共同享有的经济关系不复存在之时，这个时候，诡谋便应运而生。当私有制寿终正寝，国家不知为何物，政治、军事、法律、宗教对人类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邪恶将会知趣地销声匿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以邪恶为载体的诡谋自然如毛发般地被历史之风吹得无影无踪。但谋还会以它特有的形式（如用谋战胜自然）继续存在下去。

谋，“作为一种文化样态，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极为深远而痛彻的影响。它的影响之全面、深邃表现在：从文化精神到社会结构、正义原则，从基本智慧形态到人人关系乃至国民的基本生存样态，无不打上它的深重烙印。”¹ 作为谋氏家族中一员的诡谋，采用阴险、刻毒、无耻、说谎、伪装、欺诈、算计、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方式，游走于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非分利益或好处，以最便捷的途径办成害他利己的事情，从而给社会带来更为“痛彻的影响”，给人心打上更为“深重的烙印”，给谋文化增加更为明显的负面效应。这就是诡谋的实质。说得简单一点，诡谋就是由恶欲导引而用黠慧运思出的争利避害的计策；再简单一点就是：谋为诡所使谓之诡谋。

既然最大的非分利益或好处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害他利己的事情可以以最便捷的途径办成，那些行恶凌善、虚伪狡诈、见利忘义的无德之徒，还会不将诡谋视为法宝而奉若神明、为我所用？智谋文化最活跃时期的春秋战国，创立法家学说的李悝、申不害、管仲、商鞅、韩非、李斯等人，就毫不掩饰地主张，帝王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任何诡谋皆可使用，从而为中国的智谋史留下最黑暗、最刻毒的一页；创立纵横学说的鬼谷子、苏秦、苏代、张仪等人，虽然极其缺乏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但却有用不完的

1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40页。

谋 论 诡

“反应”、“揣摩”、“捭阖”等诡谋之术，他们在推销这些诡谋之术的时候，信手在中国智谋史册上写下了最狡诈、最无耻的一页。往后的乱臣贼子们没有一个不用诡谋，像赵高、李林甫、秦桧之流更是把诡谋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无数良臣贤士被他们算计暗害，成为诡谋的牺牲品。



无德之人青睐诡谋，有德之人会对其不屑一顾吗？当然不会！当他们在不用谋达不到目的，用正谋也收效甚微的时候，也会借助诡谋。唐太宗李世民被视为一代明君，且不说他用诡谋杀兄戮弟夺得太子之位，单说他垂垂暮年、行将就木之时，还设计了一个可称为大手笔的诡谋。太子李治若继位，能够担当辅佐大任的非重臣李勣莫属，李世民玩了个花招，不是给李勣加官晋爵以托孤，而是一反常规将其贬斥到边远地区做了地方官。李治不解，李世民道出其中奥妙：“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①显然，李世民是利用恩恩仇仇常理，揽仇于己，留恩于李治，让李勣重新得到重用后，感恩于新君，“致死力”效忠于李治。李治继位后，重用李勣，授其尚书左仆射，后拜为司空。李勣则以无比的效忠、勤勉感恩于李治。因此，李治由衷地佩服他那个会用诡谋的老爸李世民。不过，后人对李世民这一招还是有非议的，认为他做得不光彩，有损明君形象。

上行下效，诡谋并非只是豢养在宫廷里的宠物，它如狐狸般更多地出现在乡野村湾。明人冯梦龙所著《智囊》中载有一则故事，颇显诡谋之“精妙”：“谢某嗜酒如命，一日赴友宴会。友因家贫而不能多沽美酒者，预戒斟酒之童子，每客只斟半杯。谢苦不耐畅，因出席小遗，纸封土块，招童子密授之，谓：‘我因脏病，不能多饮，今以数文钱劳汝，求汝浅斟我酒也。’童子发封，得上块，恨甚，斟酒时独加满之。谢是日因得畅饮。”一个小小的诡谋就能让自己如愿以偿。民间为什么有数不清的诡谋，正是因为有太多谢某这样具有黠慧头脑的人。

^① 《新唐书·李勣传》。

诡谋不对伦理道德、公平正义的有无进行选择，不管人之高低贵贱、男女老少，谁需要，谁有能力驾驭，它就听命于谁。诡谋是聪明人放逐了道德、正义、公平、原则之后，用智慧打造的金色圈套，既套糊涂者，也套聪明者。古往今来，无数人受害于诡谋，也因此激活了诡谋，原因不在于他们愿受其害，而在于他们一万个不愿意的时候仍受其害。诡谋就是在这种“不愿意”的对抗中，不断地战胜对方，使自己得以发展壮大，久盛而不衰，尽管四周有无数敌视的眼光、无数讨伐的声音、无数扑灭的行动。

三、诡谋的构成

诡谋是一种客观存在，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结构形式。作者认为，诡谋的结构由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组成：主体、对象、目的、技法、场、德性。为了便于感性地理解，我们先举一例，在此基础上，再作理性的解读。

此例大家比较熟悉，是关于四大祸水红颜之一的郑袖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楚怀王的王后郑袖非常阴险狡诈，当魏国送来的美女魏姝受到怀王的百般宠幸时，郑袖独宠不再。害怕失去王后地位的她欲除之心安，于是心生一计，终使魏姝顷刻失宠而遭毁容。她先是以极为友善的态度对待魏姝，让魏姝感动得像对待亲姐姐一样对她无话不说，怀王见之无不赞赏郑袖的豁达胸怀。这时，她非常“疼爱”地对魏姝说：“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子为见王，则必掩子鼻。”魏姝十分感谢王后的关心，后每见怀王，必以衣袖遮掩鼻子。怀王好生奇怪，问魏姝，魏姝笑而不答，转而问郑袖，郑袖故作欲说又止状，怀王追问不舍，郑袖才以怕犯欺君之罪而“迫不得已”地说出：“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怀王本有口臭的毛病，虽常含香料但也难完全消除，因而最忌讳别人说他口臭，一听此话，恼羞成怒，即刻令人割去魏姝的鼻子。郑袖目的达到，独宠恢复，王后地位巩固。

诡谋论

（一）诡谋主体

诡谋是由人设计和实施的，因而设计和实施诡谋的人就是诡谋主体。诡谋的主体是人，而人不仅仅指单个的个人，单个的个人可以成为诡谋的主体，如上述案例中的郑袖，多个人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可以成为诡谋的主体，当这样的主体出现时，常常是以团队、群体或者组织的名义。不过，无论主体人数多少，他必须是诡谋的组织者、设计者或者是施行者，否则就不是诡谋的主体。当然，如果诡谋主体非单个人，那么这样的主体常常有主次之分，凡为实现自我目的而起策划（包括设计）、组织、指挥等核心作用的就是主要者，凡只是负责设计或只是负责执行的人就是次要者。如封建社会谋士为主人设计诡谋再由仆人去执行，这之中，主人是主要者，谋士和仆人则是次要者。倘若既不是设计者又不是施行（组织、指挥也是施行行为）者，无论这个人在诡谋成功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也不是诡谋主体，如楚怀王，虽然在郑袖诡谋的成功中作用不一般，但他不是诡谋主体，因为他不是郑袖的合谋者，既没有参与策划、组织、设计，也没有听从郑袖指挥执行，他完全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所起的作用是工具的作用，即他被郑袖作为工具而利用。诡谋主体虽然有主次之分，但绝对不存在没有主体的诡谋，即使这个诡谋再小。如上述纸封土块做谢礼的诡谋，该诡谋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插曲，但其主体非常明确，集设计与施行于一体的谢某便是。

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可以成为诡谋的主体，但真正成为诡谋主体的总是少数人，为什么？原因在于，要想成为诡谋的主体，必须具备这样四个条件：诡谋意图、聪慧头脑、冒险心理、行动能力。诡谋意图是一个人为实现某种目的是否打算设计、暗算他人的主观愿望；聪慧头脑是一个人能否把诡谋意图变成诡谋方案和诡谋行为的思维能力；冒险心理是一个人是否敢于承担被人指责直至付出生命代价之风险的意志状态；行动能力是一个人有无将暗算他人的打算变成现实的操作本领。一般来讲，可作肯定回答的，这个人的

必然是诡谋的主体；而作否定回答的，这个人较难成为诡谋的主体。所以，要想成为诡谋的主体，四个条件皆需具备。郑袖能够成为诡谋的主体，在于她四个条件不缺一个。打算暗算魏姝是她的诡谋意图；在此基础上思谋出一套先拉拢后使坏的诡谋方案在于她有点慧头脑；实施这套方案大有被楚怀王戳穿而被打入冷宫甚或杀头的风险，但她具有冒险一搏的心理而照样付诸行动；其行动能力更是非同一般，她欺骗魏姝、对付楚怀王的语言、行为都恰到好处，没有露出一丝破绽。阴险狡诈的郑袖不愧为女中诡谋高手。

（二）诡谋对象

诡谋所指向的作为目标的人和事物谓之诡谋对象。依此定义，诡谋对象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人，一类是事物。人作为诡谋对象，这个好理解，因为人们习惯认为谋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智力较量，所以只要诡谋主体将自己的同类确定为暗算的目标，这个同类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诡谋对象。比如魏姝成为郑袖的诡谋对象应该是大家的共识，谁也不会提出异议。而事物作为诡谋对象，似乎不大好理解。辞典解释的“事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据此解释，人包含在“一切物体”之中，亦即人也是事物，但由于我们已经将人作为诡谋的对象了，因而“一切物体”是把人排除之后的所有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无机物等。这些物体也可以成为诡谋的对象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只要诡谋主体为了达到诡谋目的而需要将这些物体中的任何一种作为目标对待时，那么其所对待的任何一种物体就成为了诡谋对象。比如，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动物的熊猫，不法分子在捕获、运输、出卖上都会大用心计，这里的“心计”就是诡谋，这里的“不法分子”就是诡谋主体，而熊猫则是不折不扣的诡谋对象。

物体可以成为诡谋对象业已证明，那么现象能不能成为诡谋对象呢？我们首先说说现象是什么。辞典解释，“现象”是指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形态和联系。现象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分。自然界中发生的一些奇异现象，如日月食、流星雨、冬

诡 谋 论

天雷、夏天雪、牛长三只角、鸡生四条腿等，当人们一时解释不了的这些现象时，诡谋主体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利用人们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观念，将其作为对象，生发出许多故事来。只要自然界发生了大灾害，马上有人认为这是上天对人类某种不当行为的惩罚。《淮南子》就有一年十二个月天人对应失衡的记载：一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声不止；三月失政——九月不下寒霜；四月失政——十月不结冰冻；五月失政——十一月动物不眠；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凋落；七月失政——一月大地不解冻；八月失政——二月不闻雷声；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至；十月失政——四月草木无实；十一月失政——五月天落冰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不收。失政是指政令的失误，对于这样的失误，老天报复很及时，仅隔半年时间。显然，这是唯心主义的因果报应论。但在诡谋主体看来，唯心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好，只要能为我所用，任何东西都是宝贝。刘邦就是这样一个品质的人，他斩了一条人们不常见、白化了的蛇，便以此为对象，大做文章，生发出白蛇是白帝之子，他是赤帝之子，赤帝之子斩杀了白帝之子，其用意非常明显，这是告诉大家，他的天命是当皇帝。但他不明说，却以诡谋的形式表现，其目的在于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诡谋之精妙。

自然现象可以成为诡谋对象，社会现象行不行呢？同样可以。最易成为诡谋对象的是社会现象中的负面现象，比如当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欺上瞒下、嫉贤妒能、阳奉阴违、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挑拨离间、弄虚作假、见风使舵、背信弃义、投机取巧等风气盛行的时候，诡谋主体打心眼里欢呼，欢呼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能够充分施展诡才诡智的机会。谣讖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上的谣讖往往成为权力斗争中的异类武器：有鼓动造反的，有鼓舞士气的，有涣散人心的，有陷害政敌的，有警示权贵的，等等。战国时期，赵国发生饥荒，民间随之出现一则童谣：“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上生毛。”意思是说赵国人将要号啕大哭，而秦国人则会幸灾乐祸。如果你认为这话不可信，那就请看地上是不

是长了毛。^①秦国上层听到这首童谣后，兴奋不已，马上将其作为目标，派遣一些人到赵国推波助澜，使其广泛流传，以涣散该国的人心、军心，等到某个地方出现“生毛”（“地上生毛”应该指的是一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估计所生之毛是石棉之类的矿物质）现象时，便组织军队大举进攻，将赵国灭亡。所以，谣讖等社会现象是可作为诡谋对象的。

需要指出的是，事物作为诡谋对象的时候，由于其没有思维能力，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怎样操控，完全由诡谋主体决定。作为诡谋对象的人就不一样了，由于其有思维能力，若是他的思维暗合诡谋主体的思维，那么他就跟事物一样，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听凭发落；若是他的思维与诡谋主体思维不一致，特别是对诡谋主体的言行怀疑的时候，那么，他有可能由被动变主动，让诡谋无法进行下去，甚至让诡谋主体变成被他操控的对象。试想，假如魏姝识破了郑袖的技法，来一个将计就计，让楚怀王看穿郑袖的人面兽心，恐怕最终结果不是魏姝被割鼻子，而是郑袖被剜心、废后。所以，诡谋对象的不同，反作用于诡谋主体的有无和力度是不一样的。故本书对诡谋的研究涉及对象时，其对象大多指的是人。这就告诉我们，只有人作为对象时，诡谋中的主体和对象才可以互相转化，即主体变成对象，对象变成主体。将计就计的诡谋是对这种转化的最好说明。如果魏姝察觉郑袖设计暗害自己，马上依其诡谋设计一个诡谋反击，那么，郑袖攻击魏姝的诡谋中，主体是郑袖，对象是魏姝；魏姝反击郑袖的诡谋中，则正好相反，主体是魏姝，对象是郑袖。两者相互转化还有其他形式，这里不一一说明。

为了认识 and 理解的方便，我们将诡谋对象分为两种：对付对象和利用对象。对付对象是指需要采取一定方法、手段对付的目标，对付的方式有攻击、保护、蒙蔽等。魏姝作为诡谋对象就是一个被攻击的诡谋对象；熊罴作为诡谋对象却是受保护（诡谋者怕其受伤或死亡卖不出高价）的诡谋对象；被谢某耍弄的童子作为诡谋对象

^① 桑保群著：《历史上的谣与讖》，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 页。

诡 谋 论

则是被蒙蔽的诡谋对象。利用对象是指能够用来为自己服务的目标，服务的性质有利己和害他两种。刘邦所斩白蛇作为诡谋对象是为了利己的诡谋对象；“赵为号，秦为笑”童谣作为诡谋对象则是为了害他的诡谋对象。一般情况下，人作为诡谋对象时多半是对付对象，事物作为诡谋对象时则多半是利用对象。凡诡谋都有对象，但诡谋不同，对象的种类则不同，有的是对付对象，有的是利用对象，还有的是两种对象齐全。郑袖暗害魏姝的诡谋则属于后一种情况，魏姝是对付对象，楚怀王是利用对象。对付对象和利用对象的最大区别在于“体”与“用”，“体”是对付对象，“用”是利用对象。有“体”时不一定有“用”，有“用”时一定会有“体”。两者同时存在时，由于着力点不同，“体”、“用”的主次有可能被颠倒：着力点主要放在“体”上，“体”为主、“用”为次，如郑袖把着力点主要放在魏姝身上，作为“体”的魏姝则为主，作为“用”的楚怀王则为次；着力点主要放在“用”上，“用”为主、“体”为次，如秦国把着力点主要放在童谣上，作为“用”的童谣则为主，作为“体”的赵国则为次。着力点是放在“体”上还是放在“用”上，由诡谋的需要决定。

（三）诡谋目的

在这世界上，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策划、设计并实施诡谋，即使是生活中被认为是最无聊的诡谋——如悄然拿走坐凳，让刚起身就坐下的人摔个四脚朝天——也有目的，其目的有可能就是为了取乐。所以，世上没有无目的的诡谋。所谓诡谋目的，指的是诡谋主体运作诡谋所企求的结果。无疑，诡谋目的是诡谋主体而不是诡谋对象（当诡谋对象是人时）的主观愿望，诡谋对象在与诡谋主体“友好合作”时，也要追求某种结果，但这不是诡谋目的，因为他没有运用诡谋去实现自己的追求，诡谋目的一定是通过运用诡谋技法而要实现的结果。郑袖加害魏姝，企求的结果是魏姝失宠，这种结果如愿发生，而发生这样的结果关键在于她运用了诡谋技法，如果她不运用诡谋技法，这样的结果就不会发生。所以，郑袖加害魏

姝的目的是诡谋目的。魏姝在“配合”郑袖实施诡谋时也有自己的目的，她的目的就是让楚怀王尽量不看到她的“丑”鼻子而继续对她宠幸。为达到这种目的她所使用的手段则是手捂鼻子，手捂鼻子在这里绝不是诡谋手段，恰恰是进入诡谋圈套而自害自的行为。因此，魏姝的目的不是诡谋目的。由是观之，诡谋目的只能是组织、设计、实施诡谋的主体的目的，对象的目的永远成为不了诡谋目的。一般来讲，对象的目的实现不了的，如果能够实现则是诡谋的失败。若魏姝手捂鼻子遮“丑”能够得到楚怀王更大的宠幸，那么郑袖运作的诡谋绝对是失败的诡谋。

诡谋目的不同于诡谋目标，诡谋目标既可与目的一致，又可与对象一致。当诡谋主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寻找和选定某个对象时，这时的对象就是目标。前面提到的熊猫，在被偷猎分子寻找时，既是对象也是目标。魏姝是郑袖加害的对象，同样也是加害的目标。这里的目标与目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的目的是将熊猫变卖而获得金钱；后者的目的是让魏姝失宠从而保住自己的后位。什么情况下目的、目标是一致的呢？当诡谋主体寻找和选定的目标就是其所企求的结果时，目的、目标则达到一致。比如骗婚诡谋中的女子，她被诡谋主体寻找到并被选定时，是目标；她被诡谋主体意欲整个占有时，则为目的。目的与目标一致的诡谋不是很多，数量上远远低于两者不一致的诡谋。诡谋目的与诡谋目标不一样还表现在：其一，目的同一但目标不同，即目的是确定不变的，而目标却是不确定的、可变的。如放飞鸽诡谋，敲诈色鬼钱财是目的，这是确定不变的，但目标却是甲也行、乙也行，丙同样行，只要是好色之徒，谁都可以成为目标。其二，目标同一但目的不同，即选定的目标是确定的，但从其身上获取什么则是可以变化的。如成为诡谋目标的某女子，既可被诡谋主体“谋”去贞操，又可被“谋”去钱财，还可被“谋”去良知（如帮助诡谋主体陷害另外女子）。

诡谋目的是选择对象和技法的前提，目的不同，选择的对象和技法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好色之徒为了满足性欲，他所选定的对象往往是年轻漂亮的女性，使用的手段往往是冒充大款、高知、

诡谋论

军官、警官或高干子弟，极尽花言巧语之能事，骗取其信任。再比如，一个官瘾十足的人，为了谋得更高的职位，所选定的对象常常是大权在握之官员，常用的技法是谄媚、行贿、卖身投靠等。

诡谋目的具有利己性、多样性、具体性等特点，而本质的特点则是隐秘性。这一特点决定了诡谋的隐秘性特点。也就是说，诡谋自身所具有的隐秘性是由其目的的隐秘性来体现的，因为在诡谋的实施过程中，根据运作的需要可以把诡谋主体的各种情况告诉对象，而唯一一点不可告诉的就是目的，如果连目的都告诉给对象了，那么损害对象的手段不能称之为诡谋。郑袖加害魏姝的目的绝对是隐秘的，试想，她要是把加害魏姝的目的告诉给魏姝，这样的加害能够称得上诡谋吗？

（四）诡谋技法

技法，《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是“技巧和方法”。诡谋技法的技法，除了这一层意思外，我们赋予它一层新的含义，即技巧性的方法。用技巧性的方法定义诡谋的技法，用意在于区别非技巧性的方法。方法或者手段，若用二分法，可分为智慧型手段和非智慧型手段。智慧型手段是靠智慧运作具有四两拨千斤之效果的手段；非智慧型手段是以力量为主、靠力量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恐吓、威胁、劫持、刑罚等。智慧型手段等同于技巧性方法，非智慧型手段等同于非技巧性方法。诡谋是一种谋，谋是靠智慧支持的，因而要求实现诡谋的手段必须是智慧的手段，否则无以担当起重任。技法就是智慧的手段，完全有能力扛起诡谋之大梁。

技法在诡谋的构成中，是一个无比重要、不可或缺的要素，它贯穿诡谋始终，与诡谋共存亡。技法不存在，诡谋则不存在；技法在哪儿展开，哪儿就有诡谋；有什么样的技法就有什么样的诡谋，有什么样的诡谋就必然有与之相匹配的技法；技法是把诡谋主体与诡谋对象联系起来的桥梁，是将诡谋主体的诡谋目的变成现实的途径。

诡谋技法同诡谋目的一样，完全出自于诡谋主体，但不像诡谋

目的一样依附于主体。诡谋目的、诡谋对象只能依附于诡谋主体而存在，离开了诡谋主体，目的不成其为诡谋目的，对象不成其为诡谋对象。郑袖加害魏姝，企求的结果是魏姝失宠。楚怀王让她如愿以偿，她所运作的诡谋也因完成使命而不再存在。在这个诡谋中，魏姝成为诡谋对象，完全是因为有了郑袖这个诡谋主体；郑袖目的达到就不再是诡谋主体了，魏姝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再是她的诡谋的对象。郑袖企求魏姝失宠的诡谋目的随着她成为诡谋主体而产生，当魏姝失宠被割鼻使她企求的结果实现之后，她的诡谋主体身份也因其目的达到而不再存在。很显然，诡谋目的、诡谋对象是随着诡谋主体的产生而产生、消亡而消亡的。但是技法却不同，它不因主体的不存在而不存在，仍可作为“技艺”借助口头传授、文献记载等形式独立存在下去，也就是说，郑袖加害魏姝的方式方法仍可独自存在并被后来的诡谋主体照搬或者变通使用。为什么一些技法如“丢包”、“仙人跳”、“易拉罐中奖”、“消灾”等在现实生活中一而再地上演，其逻辑原因就在这里。

诡谋技法虽然可以独自存在地被其他主体使用，但任何技法的使用价值都是有限的，一种技法不可能对所有对象发挥作用，再多的技法也满足不了众多诡谋主体的需要，所以，旧的诡谋技法不断被翻新，新的诡谋技法不断被创造。在翻新、创造的过程中，诡谋主体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这样一些原则：心理征服的原则、巧用真假的原则、掌握时机的原则和因人而异的原则。

诡谋者运用技法的好坏，检验的基本标准就是对象的心理是否被征服。心理征服关键在于征，不征不会服，征了才有可能服，服的表现就是自觉自愿地配合诡谋者完成诡谋的全套动作。

巧用真假关键在于巧，巧是衡量诡谋者智能的标准，真假运用得越巧其智能越高，运用得越拙其智能越低。巧用就在于该用真时用真，该用假时用假；真假混用时，该多用真就多用真，该多用假就多用假，把握真假程度时，需要真到除了布局目的隐瞒外其他都可如实告诉时就真到这么个程度，需要假到连容貌都需要改变时就假到这么个程度。

诡谋

论



闻风而动、应付自如 是诡谋者把握局势时所显现的突出特点。根据这一特点，诡谋者在技法运用时对时机的掌握非常看重，因为能否掌握时机关系到诡谋的成败，所以掌握时机成为技法运用的一大原则。时机是时间性很强的客观条件，相对技法来讲，有一种是环境本身就有的时机，有一种是诡谋者创造的时机。对于前者，掌握的关键是合理运用，不可错过。比如借高级领导人、知名学者或影视明星出场的机会，自己壮着胆子上去套近乎，以证明给诡谋对象看，自己确实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对于后者，掌握的关键是有效控制，充分表演。比如请来高级领导人、知名学者或影视明星，给自己有名无实的公司造势，为防露馅，为让他人相信他鼓吹的一切是真，他一方面假戏真演，一方面让请来的人士在他的掌控下，为他的表演服务。凡诡谋，无论大小、简单还是复杂，都有个时机问题，掌握时机就是掌握了施谋的主动权，对于这一点，任何诡谋者都是心知肚明，并且作为法则而认真遵循的。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更如此。由于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道德水准、知识技能、心理气质、兴趣爱好等的不同，一个技法只可能把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引入圈套，但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引入圈套，如果所有的人都进了圈套，那绝对不是一个技法而是无数个技法发挥了作用。所以，诡谋者使用技法很讲究针对性，特别是对付特定对象，一般来讲，爱财的以财引诱，爱色的以色引诱，爱权的以权引诱，喜欢舞文弄墨的以文墨迷惑，信奉鬼神的以鬼神迷惑，爱好虚荣的以虚荣迷惑……投其所好，各给所需，以将对方圈进圈套里为原则。这是技法本质之所在。

（五）诡谋场

“场”是个物理学的概念，指的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现代汉语辞典》对“场”的解释）。“场”被借用到各个领域，诡谋场的“场”自然也是一种不付租金的借用。众所周知，具有社会意义的“场”构成于环境之中，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天地自然环境。所以，刘国建先生在

定义谋略场时就认为：“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可称之为谋略场。”^① 谋略场可以如此定义，诡谋场是不是与其一样呢？

诡谋既是观念的产物，又是实践的产物。作为观念的产物，诡谋只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设想、方案，这时的诡谋虽然不在实际的“场”中，但必须让实际的“场”出现在设想和方案中，否则就是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的、永远都不会成功的诡谋。一旦将其设想、方案付诸实施，这时诡谋便在“场”之中，同时“场”也在诡谋之中（诡谋主体要根据实施状况，随时调整诡谋方案，以便让“场”更好地为其所用）。所以，“场”是诡谋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物理学中的“场”，如电场、磁场、引力场，常常是无形的，而社会意义上的“场”则是无形与有形的融合。无形的东西如人们受教育多少、对宗教信仰与否、人际关系和谐与否等状况，有形的东西如一辆汽车、一个房间、一座公园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无论是由什么样的有形的、无形的东西所构成的“场”，绝不是某个物体、某种情况、某一条件的孤立表现，而是那个场所、那个地方、那个区域的包括所有有形、无形的物质以及人文氛围在内的整个客观存在。当这一“整个客观存在”如果能够被诡谋主体利用来为诡谋的展开服务，那么这样的“场”就是诡谋场。

社会意义上的“场”有个奇特的现象，在确定一个范围之后，无论怎样增加或者减少里面的物质，它始终是一个“场”。比如一个居民小区是一个“场”，你在里面不断增加居民、公共设施、交通工具，只要不超出其范围，它仍然是一个“场”。假如这个小区遭遇一次地震而变成了废墟，它还是一个“场”，只不过性质上发生了改变。一个“场”里可以分出若干个小“场”，但无论怎样小，必须有活动的空间（包括所有相应的有形与无形的物质），若没有活动的空间，这样的环境是不能称之为“场”的。比如某逃犯为逃避打击而挖一地窖在里面生活，这个地窖虽小，但有活动空间，仍可以叫“场”；后来他准备外逃，将地窖填上，填上了的地窖没有了活动空

^① 刘国建：《谋略初探》，载《河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诡谋论

间，因而再不能称其为“场”。诡谋实施不能没有活动空间，它所需要的活动空间大则全世界，小则一个藏身的地窖。一个活动空间可以是一个“场”，诡谋主体要完成一个诡谋，哪怕再简单，也至少需要一个“场”。越是宏观、复杂的诡谋，越是需要庞大的“场”、量多的“场”，所以，“场”是诡谋必需的要件。



综上，我们给诡谋场下一个简单的定义：诡谋场是指实施诡谋的过程中可资利用的活动空间。一个活动空间是一个“场”，但不为诡谋主体所利用则不是诡谋场，所以“可资利用”是定义诡谋场的关键。这就是说，一个活动空间不因诡谋场的存在而存在，但诡谋场必须以活动空间的存在而存在；没有诡谋介入的活动空间不能称之为诡谋场，称之为诡谋场的活动空间必然有诡谋的幽灵在徘徊。

宫廷是君臣和皇亲国戚活动的空间，就其整体来讲是一个“场”，这个“场”的“场主”是君王。君王若好色，再多美女也不嫌多，所以楚怀王身边多了一个美女魏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对于郑袖来讲，却非同小可，她立马感觉到后位的摇晃，于是设计诡谋暗害魏姝。其所用之“场”就是宫廷，并且被最大利用的是宫廷这个“场”的“场主”楚怀王。在施行诡谋阶段，宫廷变成了诡谋场，其“场主”是诡谋主体郑袖而不是楚怀王，楚怀王在这个时候只是诡谋“场主”郑袖手中的一枚棋子。因此，诡谋场中的“场主”始终是诡谋主体，任何人都无法担当。当诡谋实施完毕，郑袖的“场主”身份不再存在，宫廷这个活动空间也随之不再是诡谋场。当然，若有其他的诡谋介入，宫廷便又成为诡谋场了。倘若宫廷里的诡谋层出不穷，那么，宫廷始终是诡谋场，只是诡谋主体不断更换、诡谋内容各不相同而已。

（六）诡谋德性

德性指的是道德品质，诡谋德性就是诡谋的道德品质。有人会问，诡谋也有道德品质吗？有！因为“德性不仅有个人的德性，而且也包括社会的德性”。就社会的德性而言，通常将公正、平等、正

义等指称为善德，而偏私、剥夺、不公等则被称为恶德”¹，诡谋是社会中的一种现象，自然也有德性，且属于恶的德性。

诡谋有无德性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德性是否可以成为诡谋的构成要件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就谋略或正谋而言，由于它本身合道德性，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手段，有其主体、对象、目的、手段和场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就可以了，不把德性作为它的构成要素完全说得过去。但诡谋就不同，诡谋是邪谋，是一种特殊的谋，除了具有谋的基本构成要素外，还必须有一种与之相区别的要素加入到基本要素中来。最能划清两者界限的一个要素就是德性，所以我们把德性列为了诡谋的基本构成要素。由于诡谋属于恶德的范畴，我们谈诡谋德性实际上说的是诡谋的恶德性或缺德性。

诡谋的恶德性源于诡谋主体，体现在诡谋目的和诡谋技法上。从德性上看目的和技法（手段），目的和技法都可作善恶之分，当两者结合时，便有四种情形出现：目的善技法善、目的善技法恶、目的恶技法恶、目的恶技法善。四种情形都属于诡谋吗？第一种情形，目的技法都善，所产生的行为是善，这样的善行为绝对不能称之为诡谋，因为它与诡谋恶的属性不符。第二种情形，是否属于诡谋，争议很大。孔子认为“上德不德”、“上仁不仁”；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有句名言叫做“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²。在他们看来，只要目的是善的，手段再恶的行为也是道德的行为。用此观点看待计谋中的目的善技法恶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就不属于诡谋行为。假如孔子、马丁的观点完全正确，那么我国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像西方一样开设妓院、赌场完全应该。所以，作者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仍然认为目的善、技法恶的行为属于诡谋。原因在于，手段恶也是恶，同样是不道德的行为，只不过这种行为与目的恶的行为比较起来，缺德性要小，有的接近于无（只是接近于无而不能等同于无，如若等同就没有了缺德性，没有缺德性的行为则不

1 倪德襄著：《伦理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2 丁鸿君著：《经济学视角下的思维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谋诡论

能称之为诡谋)，所谓的好人用诡谋就是这种情形，如孙中山用美人计赶走朱庆澜；第三种情形，目的技法都恶，这是最纯粹的诡谋，谁也不会对此产生异议；第四种情形也属于诡谋，且是最狡猾的诡谋，技法善时，迷惑性更大，对象往往是在不知不觉甚或在甜蜜、期望、感激中受到损害，可怜的魏姝就是这样一个单纯而让人同情的对象。

准此观之，无论是诡谋目的还是诡谋技法只要有一个方面是恶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诡谋，只是我们对其所持的态度要有所区别：对待目的恶技法恶的诡谋，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见之就要揭露与打击，任何时候不能以任何借口拿来为我所用。对于目的恶技法善的诡谋，我们要根据恶的程度区别对待：恶大者，如郑袖暗害魏姝的诡谋，应与对待目的恶技法恶之诡谋的态度一样；恶小者，特别是非常轻微者，如谢某骗童子的诡谋，我们的态度是不支持、保持警惕，谁若想用也要应尽量少用或者不用，用多了免不了被人称为骗子或者伪君子。对待目的善技法恶的诡谋，我们既不反对也不提倡，要想代价最小利益最大地解决问题最好选择谋略的方法，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此种诡谋，因为用得过多就难洗刷“手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之嫌疑，毕竟谋略与诡谋就隔着一道坎，这道坎就是道德，若不受限制地任意跨越，必然遭到非议。

四种情形，后三种属于诡谋，本书研究论证的基点则放在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形上。原因不说也明：一是这两种发生的数量在诡谋总数中占大多数，二是其所产生的行为是货真价实、没什么争议的诡谋。

主体、对象、目的、技法、场、德性是构成诡谋的六个要素，无论什么情况下，只要六个要素全部具备并有机统一的行为便可认为是诡谋，即使每一个要素都很简单平常。上述某逃犯为逃避打击挖地窖躲藏，虽然非常简单平常，但仍然不失为一个诡谋：其主体是某逃犯；其对象是捉拿他的人；其目的是逃避打击地自保；其技法是挖地窖躲藏（挖地窖躲藏不失为一种黠慧的自保方法，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圈死自己的“笨”办法，谁也不会采用，该逃犯采取

逆向思维法，恰恰这样做了，（一藏八年而未被发现）；其场我们在上面已作分析，是一个自创的非常简单的活动空间；其德性是犯了罪而不愿接受惩罚的恶。判断一个方法、手段或措施是不是诡谋，用上述六个要素一衡量就可见分晓。由此，我们平常所说的骗局、圈套、阴谋、权术、奸计、鬼点子还有智能犯罪等常常是诡谋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是诡谋的代名词。





第二章 诡谋与智慧及思维

诡谋是打上恶的烙印的谋，形成于人的意识活动，与智慧和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智慧，诡谋不存在；没有思维，诡谋更不存在。

一、源于智慧，成于思维

众所周知，智慧是“能够迅速、深刻、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①；思维则是“具有意识的人脑对于客观现实的本质属性、内部规律性的自觉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②。智慧通过实践和思维两种运动形式形成，思维由人脑、信息、意识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思维与智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社会实践是智慧的根本源泉，人的思维是智慧形成的主要工序；智慧源于实践，成于思维。社会实践给人们提供了数量众多的知识和信息，丰富了人们的意识，使人们的意识变得高明起来，这是产生智慧的根本条件。但仅仅到此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把这些变成现实的智慧，还需要对实践提供给人脑的这许多知识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把这些知识和信息转变成为导引人们行动的思想，并且把这个思想转变成为行动。这种把知识信息加工处理、变成思想、变成行动的意识活

① 田运著：《开发智慧的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页。

② 田运著：《智慧与思维》，宇航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8 页。

第二章 诡谋与智慧及思维

动，就是思维。没有思维这种意识活动，智慧就不可能产生”^①。

诡谋的核心是谋，谋的前提是智，“智足以造谋”^②。“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③“智慧是产生计谋的根源，计谋是运用智慧的手段。没有智慧而大讲计谋，好像木偶演戏，仅供人娱乐而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没有计谋而空谈智慧，就好比一个船夫驾船知识满肚子，而一旦船遇风浪就束手无策。所以智慧与计谋如影随形，不能分离；智慧是源，计谋是流，源远则流长，流短则源近。”^④显然，相对诡谋讲，智慧是根本，是源泉，是原材料；相对智慧讲，诡谋是树干，是流水，是产品。没有智慧便没有诡谋，没有诡谋不一定没有智慧；有智慧不一定有诡谋，有诡谋必定有智慧。诡谋是智慧结出的怪果、苦果、毒果。智慧可以在不生长诡谋的地方，生长出各种有益于社会、人类的甜津津、香飘飘的谋果来。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智慧属于认知能力，“只有认知能力才有智慧与愚昧之分”^⑤。而诡谋属于意志行动，只有意志行动才涉及谋与非谋。就心理活动发生、发展的过程讲，认知过程是最基本的心理过程，意志过程是最重要的心理过程，意志过程的发生总是随着认知过程的发生而发生。所以，诡谋源于智慧完全符合心理活动发生、发展的逻辑。

诡谋源于智慧，但智慧转化为诡谋并非自然而然。如果没有潜意识中的恶的作用，它不会转化；如果仅有恶的作用，它也不会转化。它要转化，必须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介入，这就是思维。思维是认知的高级阶段，没有这个阶段的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哪怕恶的作用再大，智慧永远只能停留在认知过程里，而不会向前迈进，进入意志过程而成为诡谋。因此，诡谋由思维促成，离

① 田运著：《开发智慧的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

②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49页。

③ 邓拓语，见《慧语大全》，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42页。

④ 车明正、薛佩玉编著：《用计与防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3页。

⑤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36页

谋 诡 论

开思维，就像没有智慧一样，诡谋则不存在，更谈不上发展。“由于（只有）通过思维才能揭示适合于客观世界真实情况的谋略思想，思维的进步推动了谋略的发展，而谋略的发展，又对人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¹“谋略的实质乃是主体思维活动的结果，谋略内容的丰富，要靠主体思维的创造性劳动。”²准此观之，作为谋略之异类的诡谋，同谋略一样，由思维来揭示自己的真谛，由思维来推动自己的发展，由思维来决定自己的表现形式。

二、诡谋智慧

我们说诡谋源于智慧，恐怕有伤智慧崇拜者的感情，其原因在于，智慧历来为人们所尊崇，无论东方西方，均是如此。古希腊的“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和我国古代的“三达德”（智、仁、勇），都把智慧列为各种美德之首便是明证。而诡谋总被道德人所不耻，其原因在于，诡谋无论大小，都具有暗害性，暗害的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公正、道义、规则和秩序。其实，大可不必感情用事，智慧孕育诡谋，就像一对贤惠夫妻生养了一个不肖之子，过错不在智慧而在诡谋，何况直接为诡谋提供生存条件的智慧是诡谋智慧。

由于诡谋直接涉及道德问题，所以，有必要先对智慧作一下道德上的考察。“《智慧书》说，罪人、恶人没有智慧。其实，罪人、恶人只是没有道德智慧，却可能具有其他智慧，如发明某种器械的智慧，等等。以智慧这种客观心理内容的性质为依据，可以划分智慧为道德智慧与非道德智慧。”³“智慧是相对完善的认知能力。”⁴因此，所谓道德智慧，是指对道德相对完善的认知能力；所谓非道德智慧，是指对道德之外的政治、军事、经济、天文地理、动物植

1 柴宇球编著：《谋略论》，蓝天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2 许国民、陈阳平著：《谋略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3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37页。

4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36页。

物等方面的相对完善的认知能力。与道德智慧和非道德智慧貌似的还有两个概念：道德的智慧和非道德的智慧。道德的智慧与道德智慧、非道德的智慧与非道德智慧的意思区别明显（很多人包括学者并没将这两对概念加以区分，认为道德的智慧就是道德智慧，非道德的智慧就是非道德智慧），道德的智慧和非道德的智慧是从道德与否上评价智慧，智慧有益无害于他人和社会谓之道德的智慧，无益有害于他人和社会谓之非道德的智慧，即缺德的智慧。当这种缺德的智慧直接造就诡谋的时候，我们将其称之为诡谋智慧，简称诡智。



显然，诡谋智慧不属于道德智慧和道德的智慧，也不属于非道德智慧，只能属于非道德的智慧即缺德的智慧。也就是说，诡谋智慧是无益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智慧。

诡智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扬恶抑善却不露神色的阴险性，这是诡谋智慧的本质特征。其阴险就阴险在对善的抑制、对恶的张扬时，让你丝毫感觉不到它抑制了善、张扬了恶，亦即包藏祸心随时准备助纣为虐地危害他人与社会，但却一点儿也不显山露水，仿佛是一只混在羊群里的披着羊皮的狼。2008年5月17日的《武汉晚报》刊登过这样一个域外案例：2006年9月，13岁少女梅甘·迈尔结识了网友——英俊男孩乔希·埃文斯。几天时间，埃文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丰富的知识阅历让迈尔深深感动，她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埃文斯了。一个月后的10月7日，埃文斯告诉迈尔他要搬到别的地方去，暂不上网。迈尔知道后仿佛失落了什么似的难受。过了一星期，埃文斯又出现在网上，谈到兴头上时还提出要与迈尔见面，而这正是迈尔企求的，幸福感不禁油然而生，随之写下：“我是如此地爱你！”“我等待这一刻快点到来！”不料，六个星期之后，埃文斯再次在网上出现时，却提出与迈尔绝交，绝交的原因是他听说迈尔是个“荡妇”、“肥猪”，“对朋友虚情假意、阴险歹毒”。迈尔有口难辩，一下像掉进冰窖里，神情立刻恍惚起来。过了两天，她实在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精神打击，自缢身亡。迈尔的父母调查女儿的死因时发

诡 谋 论

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迈尔是被人害死的。乔希·埃文斯并非英俊少年，而是与迈尔发生口角的同学的母亲洛丽·德鲁。德鲁为替女儿出气，报复迈尔，利用迈尔喜恋男生的特点，冒充英俊男孩乔希·埃文斯与之热恋，然后将其抛弃，目的是要让迈尔痛苦不堪、感到生不如死。只是谁也不会料到，迈尔如此痴情，竟然为此而轻生。这是典型的精神谋害。德鲁这一招的确灵验，而灵验的这一招完全得益于她的诡谋智慧，其诡谋智慧的阴险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乔装打扮并以道德的智慧面目出现的欺骗性，这是诡谋智慧的形式特征。诡智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能够智慧性地实现缺德的行为目的的能力。之所以能够智慧性地实现缺德的行为目的，就在于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常常是以道德的智慧面目出现。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欺骗世人，为使用诡谋者提供智力支持而又暂时不被世人识得真面目。比如伪君子在伪装自己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智慧，在世人看来都具有善意性、利他性。

第三，越用越精直至可以心想事成因而让人向往的诱惑性，这是诡谋智慧的功能特征。对于智慧，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拥有。当诡谋智慧以道德的智慧面目出现、助你心想事成时，它所具有的强大的诱惑力，直让你一见倾心，继而神魂颠倒，尔后便无法割舍；并且，它被运用时，是越运用越精妙，越精妙越受人青睐。无论何时何地，诡谋总有自己的市场，其重要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实际上，不论是道德的智慧还是非道德的智慧，我们是直接看不到的，它们藏于认知领域，只有通过语言和行为才能显现出来。假如没有语言和行为，一个人的智慧再大，他人也是无法看到。牛顿有道德的大智慧，我们是通过他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看到的；牛顿有非道德的大智慧，我们是通过历史学家理查德·S. 韦斯特福揭露出来的牛顿弄虚作假的事实——他在写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时用了大量的虚假数据——才知道的。假如没有万有引力定律和臆造得几乎天衣无缝的虚假数据这样的行为表现，我们能了解到牛顿既是一个有道德的大智慧之人，也是一个有非道德的大智慧之人吗？诡智以诡谋为载体，我们看到实施了的诡谋，也就看到

了诡智。但也不尽然，我们看不到实施了诡谋的时候也能看到诡智，也就是说，诡智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如艺术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用文过身的犹太人的皮做工艺灯罩，这样的灯罩，显然不是诡谋的产物，而是诡智的结晶。做人皮灯罩，没有智慧做不出来；有了智慧又不缺德，能做也不会去做，当然，强迫去做就另当别论了。



综上所述，诡谋与诡智的关系是：有诡谋必有诡智，有诡智不一定有诡谋；诡谋由诡智孕育，诡智以诡谋为载体。

正因为两者的关系紧密，世人往往诡智、诡谋不分，对同类的事情，有的人叫诡智，有的人叫诡谋。中国人事出版社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出版了两本书：《诡智》与《诡谋》。《诡智》收录“诡智”80例，《诡谋》收录“诡谋”321例。看完两本书，实在分辨不出《诡智》中的事例与《诡谋》中的事例在智与谋上有什么区别，倒是《诡智》前言中的一段文字印证了本人的看法。这段文字是这样的：“通常人们总是只把那些用于正道的或者是‘正人君子’所采用的谋略才叫做智，……而对那些用于邪道的或者是‘卑劣小人’采用的伎俩，则不将其列入‘智’的范畴，……其实，所谓正、反是相对的，即使是公认的‘正人君子’，他们用的‘智’也未必都是堂堂正正的。在人们需要运用‘智力’这个天赋素质部分的时候，都不得不采用隐蔽、阴谋的手法。”显然，作者是把“采用隐蔽、阴谋的手法”“运用‘智力’”看做诡智。其实，稍加辨析即可看出，这种“运用‘智力’”而“采用隐蔽、阴谋的手法”恰恰是诡谋的表现。诡谋就是运用诡智打造成的缺德的谋。

诡谋智慧在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过程中也会形成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诡智越大，危害越大；诡智越小，危害越小。赵高诡谋智慧奇高，与胡亥、李斯合谋，秦始皇死后秘不发丧，伪造遗诏，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次子胡亥为太子，结果断送秦王朝。秦桧的诡谋智慧不比赵高差，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忠良，结果让后人为冤死的民族英雄岳飞慨叹千百年。

诡谋智慧总是受人青睐，青睐之人时刻希望取得，取得的条件

诡 谋 论

有两个：天资和欲求。一个人的天资越高，越容易取得诡谋智慧，所取得的诡谋智慧越大；天资越低，便越难取得诡谋智慧，所取得的诡谋智慧也越小；弱智者，不可能取得诡谋智慧。欲求是后天追逐的事情，一个天资正常的人，是否追逐诡谋智慧，由其主观善恶决定，善则不追逐，恶则愿而追逐，不愿而不追逐。对于一个愿意追逐诡谋智慧之人来讲，其追逐的劲头越足，便越易于取得诡谋智慧，所取得的诡谋智慧越大；追逐的劲头越小；便越难得取得诡谋智慧，所取得的诡谋智慧越小；追逐的劲头没有，即使天资极高、愿望极强，也取得不了诡谋智慧。现实生活中，专门追逐诡谋智慧的人恐怕少得可怜，一些人的诡谋智慧大多数是由道德的智慧转化而来。道德的智慧转化为诡谋智慧并非难事，用恶的本质替下善的本质即可，并且常常是一念之间的事情，是那些本质上并不坏的人所干的事情。牛顿为了战胜以杰门·莱布尼茨为代表的一个个智慧超群的对手，不惜以恶换善，让道德的智慧转化为诡谋智慧，使用虚构的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尽管当时无人知晓，但如今被揭露，实在让人为之叹惋！牛顿如果地下有灵，在今天也会因后悔而控诉诡谋智慧。

三、诡谋思维

诡谋成于思维，是思维活动的结果。思维在活动的过程中，以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久而久之，形成各种不同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就是思维方式。诡谋思维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既具有思维方式的共性，也具有自己的个性。

（一）诡谋思维所处的层次

从思维主体的多寡看，思维方式由个体思维、群体思维和社会思维构成。个体思维是指一个人的单独思维，群体思维是指一部分人的共同思维，社会思维是指一个社会中所有的整体思维。诡谋思维只发生在个体思维和群众思维中，以个体思维为主。社会思维中

之所以没有诡谋思维的席位，是因为诡谋只能隐蔽不能公开的特性使然，它无法让自己的思维加入到人人知晓而无秘密可言的社会思维的行列。诡谋思维始终是个别人或某一群人的大脑对客观现实的狡黠性反映。

（二）诡谋思维的品质

从思维的品质看，思维有广阔性与狭隘性、系统性与凌乱性、创造性与再造性、敏捷性与迟钝性、精确性与模糊性、真实性与虚假性、善良性与邪恶性、美好性与丑陋性等之分，而诡谋思维的品质使主要是狭隘性、系统性、创造性、敏捷性、模糊性、虚假性、邪恶性、丑陋性。说其狭隘，它只对个别人和一伙人的利益有所反映；说其系统，它必须把所谋之事考虑得全面周到、合乎情理，否则不能成功；说其创造，它总是在思谋的方法上做出别出心裁、不落俗套的文章；说其敏捷，它以快速、灵活、多变地算计诡谋对象为其突出特点；说其虚假，它考虑的基点任何时候都是如何实为思维主体而虚为诡谋对象；说其邪恶，它的本质就是用计谋危害他人和社会；说其丑陋，它由思维主体的不良、畸形情感推动而展开思维。

（三）诡谋思维样态

从思维方式的种类看，在不同的标准指导下，思维方式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型。《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的作者为了在比较中认识谋略思维方式，他从观念文化样态上考察，认同了人们将思维方式划分为科学、道德、艺术、宗教、教育等类型的分类法。由此他说：“谋略的筹谋运思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它既不同于纯粹理性思辨的逻辑推导，科学思维的逻辑实证，也不同于宗教艺术思维的感悟体会和神圣超越，而是自始至终以利害关系的推导为运思的基本原则和逻辑展开。”^①接着，他开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6页。

谋 诡 论

列了谋略思维与科学思维、宗教艺术思维不同的具体表现：“①目标的区别。科学思维的目的在于求知（追求知识的进步和智力的增长），宗教和艺术思维的目的在于求善求美（追求体验、感悟与精神超越的自我感受），谋略思维的目的在于把智慧的运作紧扣在权谋运筹之上以求取实用功利价值，让实用功利价值获得智慧的增生。”“②功能的区别。除思维目标的差别而外，所谓功能的区别主要是指发挥功能的途径和方式上的差别。科学以追求真理为天职，其发挥功能的手段是实事求是，以理（事实和逻辑）服人。宗教、艺术以追求美善为天职，其发挥功能的途径是体验感悟，以情动人，以悟启人。谋略以追求实用功利价值为目标，其发挥功能的途径是以利诱人，以害慑人，以效率性和可操作性使人信服。”“③主客关系的区别。此所谓主客关系是指思维主体和思维对象之间精神联系的关系样态。在科学思维中，主客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之间的物我分离关系；在宗教与审美思维中，主客关系是体验与体验对象之间的物我同一关系；在谋略思维中，主客关系处于一种居间状态，……既物我分离又内在关联，成为融知、情、意于一体的独特智慧。”①

诡谋是另类谋路，谋略思维所具有的样态，诡谋思维同样具有，并且表现得更实用、更突出、更特别。在实现目标上，诡谋思维在“求取实用功利价值”时，可以不受道德、良知、正义、原则等的羁绊，而放心大胆、毫无顾忌地“权谋运筹”。而谋略思维就不能这么自由，在实现目标时，常常受到道德、良知、正义、原则等的限制，为避“手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之嫌，不可以不作选择地什么“权谋运筹”管用就进行什么“权谋运筹”。比如，在获取敌方情报问题上，无论正义一方还是非正义的一方都要用谋，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因受道德、原则的限制，一般不能使用美人计、嫁祸于人等计谋，尽管这些计谋十分管用。因此，他们的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7~9页。

谋略思维就不能围绕此等计谋展开。国民党的间谍人员则不同，他们为获得情报，什么手段都可使用，哪管什么道德、良知、正义。因此，他们的谋略思维完全可以不受限制地围绕美人计、嫁祸于人等计谋展开。而这美人计、嫁祸于人恰恰是诡谋的经典。

在发挥功能的途径和方式上，谋略发挥功能的途径是以利诱人、以害慑人。为实现功利价值目标，谋略主体用谋时将会围绕以利诱人、以害慑人展开思维。诡谋思维在围绕以利诱人、以害慑人的途径展开时，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哪怕施谋时让对象遭受不白之冤，让无辜者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沉重代价。曹操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不知使用了多少谋略，也不知使用了多少诡谋。他的诡谋毫不逊色他的谋略。为了防止别人暗算，他设谋梦中杀人，让一个忠心耿耿于他的贴身侍卫在为他盖被子时白白地做了他的刀下之鬼。这还不算，他又处心积虑地让一个亲信侍卫用生命证明他有防刺客的“特异功能”。有一天他对一个信得过的侍卫说：“你藏一把刀来到我身边，我就说我的心在颤动，已感知到了你身上有刀，当我叫其他侍卫把你绑赴刑场时，你什么也不要说，我不仅保证你不会出问题，而且还会重重地谢你。”侍卫心甘情愿地按其所说做了，直到自己的头被砍下，恐怕也未明白这是曹操布设的诡谋杰作。世人说曹操奸诈，这奸诈就在于他的思维诡谋化，时刻想到的是如何用计保全自己，即使导致的后果是“我负天下人”。

在心理活动能力上，谋略思维以科学的物我分离思维和宗教艺术的物我同一思维为基础，反映与感悟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体现在诡谋思维的反映和感悟上，诡谋认识没有谋略认识的宏观、全面、正确；诡谋情感没有谋略情感的坦然、大气、高尚；诡谋意志没有谋略意志的厚实、持续、恒久。因此，诡谋思维的结果付诸行动时，作为这种行动心理指导的认识，这种行动心理动因的情感，这种行动心理调节的意志，只能是诡谋的，不可能是谋略的，更不可能是非谋略的。曹操设圈套于亲信侍卫，与他的雄图大略比起来，其认识是错误的——只要能保全自己可以不择手段；其情感是刻毒的——玩弄小技巧而

诡谋论

无视他人的生命；其意志是顽固的——坚持错误做法，直到亲信侍卫人头落地也没改变初衷。难怪时人与后人都说他是乱臣贼子，骂他是奸猾狡诈之徒。这样的评价，归因到思维上，无疑是他的诡谋思维所带来的效应。所以，诡谋思维永远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提倡，除非这个社会整体上崇尚邪恶。



（四）诡谋思维的价值取向

从思维的目的看，除梦幻思维外，其他思维都有自己的目的。目的的根本依据是人的需要，思维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围绕不同的需要展开，也可以围绕同一需要展开。人“在需要的推动下，展开满足需要的行为。在行为之前，首先建构行为目的。需要就是建构行为目的的根本依据”。^①目的从人与人的关系上分，可以分为利他型和利己型。一般思维方式（包括谋略思维方式）的目的既可以是利己的，也可以是利他的。而诡谋思维的目的只有利己的没有利他的。王海明在他所著《新伦理学》中把目的利己的伦理行为根据手段的不同分为四种类型：完全利己、为己利他、害己以利己和损人利己。“‘完全利己’，即目的利己、手段利己的行为，也就是目的与手段都不利人又不损人而仅仅利己的行为。”“‘为己利他’，即目的利己、手段利他的行为，也就是以造福社会和他人为手段而求得自己利益的行为。”“‘害己以利己’，即目的利己、手段害己的行为，也就是通过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以求得自己另一部分利益的行为。”“‘损人利己’，即通过损人手段以达到利己目的的行为，如偷盗、贪污、敲诈勒索、施虐狂等”。^②四种类型中，以利己为目的的诡谋思维又是围绕哪一种展开的呢？显然，不是第一种，第一种“不损人”的手段是没有恶性的，没有恶性不适合诡谋的恶性本质；更不是第二种，第二种“造福社会 and 他人”的手段不仅没有恶性而且具有很

① 苏富忠著：《思维科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②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6~187页。

第二章 诡谋与智慧及思维

大的善性；也不是第二种，第三种以“牺牲自己一部分利益”为手段，是自觉自愿的自我作为，任何时候都不需要用谋去“牺牲”，谋之不存，诡谋之诡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前三种都不是，只能是第四种，第四种利己的目的、损人的手段符合诡谋条件，诡谋思维为此而展开在情理之中。据此，诡谋思维的价值取向就是以损人的手段达到利己的目的。即使是最简单的诡谋行为，也能反映诡谋思维的这种价值取向。

有则简单的美国笑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您认得银行老板杜朗先生吗？”“认得，听说他很不地道。”“何止不地道，同他打交道，哪怕只握一次手，您也得提防，回头数数手指头有没有少了一根！”

这则笑话至少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说明银行老板杜朗先生的本性贪婪。即使是同朋友握手，也要趁机从朋友那里捞上一把。二是表明杜朗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善于耍阴谋诡计。握手虽然是一种简单、短暂的表示友好的动作，但杜朗先生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简单、短暂的表示“友好”的过程中，轻而易举地“友好”到对方的利益——手指头。可见，杜朗先生是个诡谋高手，其行为是对诡谋思维价值取向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第三章 诡谋的类型

诡谋的核心是利害。利害于他人，就是利他、害他；利害于自己，就是利己、害己。利己、利他、害己、害他既可以作为行为的目的，又可以作为行为的手段，两者相结合，便形成十六种伦理行为：完全利己、为己利他、害己以利己、损人利己、为他利己、完全利他、自我牺牲、害他以利他、利己以害己、利他以害己、完全害己、害人以害己、利己以害他、利他以害他、害己以害他、完全害他。

“1. ‘完全利己’，即目的利己、手段利己的行为，也就是目的与手段都既不利人又不损人而仅仅利己的行为。……2. ‘为己利他’，即目的利己、手段利他的行为，也就是以造福社会和他人为手段而求得自己利益的行为。……3. ‘害己以利己’，即目的利己、手段害己的行为，也就是通过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以求得自己另一部分利益的行为。……4. ‘损人利己’，即通过损人手段以达到利己目的的行为，如偷盗、贪污、敲诈勒索、施虐狂等。……5. ‘为他利己’，即目的利他、手段利己的行为，如我们常说的为革命而读书、为祖国而夺魁、为人民而做官等。……6. ‘完全利他’，即目的利他、手段也是利他的行为，如孟子所说的出于怜悯之心而救孺子于深井的行为¹便是一种完全利他的行为。……

1. 见《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编者注。

7. ‘自我牺牲’，即目的利他、手段害己的行为，也就是在自我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不能两全时，不得不牺牲自我利益以保全他人利益的行为。……8. ‘害他以利他’，即目的利他、手段害他的行为，如父母为了改掉儿子偷盗恶习而痛打儿子、医生为确诊治病而给患者做胃镜等令患者十分痛苦的检查。……9. ‘利己以害己’，即目的害己、手段利己的行为，也就是以快乐较多或痛苦较少的手段来达到害己目的的行为。……10. ‘利他以害己’，即目的害己、手段利他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受内疚感驱使而让医生在自己身上进行新针灸疗法试验，从而实现其折磨自己的渴望，便是利他以害己。……11. ‘完全害己’，即目的害己、手段也害己的行为。例如，一个印第安人酒后杀母因而内疚，于是不论冬夏都不着衣物，严冬时露宿雪地。……12. ‘害人以害己’，即目的害己、手段害人的行为。……13. ‘利己以害他’，即目的害他、手段利己的行为，如为了杀死仇人而锻炼身体、练功习武等。14. ‘利他以害他’，即目的害他、手段利他的行为，如西施委身吴王以求灭吴等。……15. ‘害己以害他’，即目的害他、手段害己的行为，如一个女大学生因妒嫉而宁愿犯法服刑而砍毁另一女同学的美丽容貌便属于害己以害人的行为。……16. ‘完全害他’，即目的害人、手段也害人的行为。”^①

利害是关系到善恶的利害，善恶是伦理的基本概念，诡谋的本性尽管是恶不是善，但所有因其发生的行为都是伦理行为。上述十六种伦理行为是伦理的全部行为，能让诡谋在其中大量滋生繁衍的有五种，即第四种损人利己、第十三种利己以害他、第十四种利他以害他、第十五种害己以害他、第十六种完全害他。这五种行为都是无利他人的缺德行为，只要因其用谋，此谋便是诡谋，因为诡谋就是缺德的谋。

据此分析，我们对诡谋的类型划分有了一个标准，这就是以无利他人的缺德行为为尺度来划分诡谋的类型。这样划分得出的类型

① 上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6~189页。

谋 论

诡

就是损人利己型、利己以害他型、利他以害他型、害己以害他型、完全害他型。

一、损人利己型诡谋

008

所谓损人利己型诡谋是指通过损害他人的手段从而达到有利于自己目的的诡谋。在社会生活中，达到利己目的的手段并非只有损人，它还可以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手段（即完全利己行为）、有利于他人的手段（即为己利他行为）、有害于自己的手段（即害己以利己行为）。当然，在通过这三种手段达到利己目的的行为中，通过前两种手段达到利己目的的行为既不能称之为恶更不能称之为缺德，而通过有害于自己的手段达到利己目的的行为则只能称之为恶而不能称之为缺德（如锯腿保全性命，锯腿是必要的恶，但不缺德），只有损人利己才既可称之为恶又可称之为缺德。之所以将其称之为恶，“是因其损人，而不是因其利己；仅就利己来说，并不是恶，而是善”^①。之所以将其称之为缺德，是因为“道德之为道德，就在于反对损人利己，从而才能保障社会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利益”^②。

就损人而言，既可以通过智力方式来实现，又可以通过非智力方式来实现。非智力方式实现者，如以“力”为主导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智力方式实现者，如以“智”为主导的诈骗、伪造、贪污、洗钱等犯罪。在智力方式里，无论哪一种，其中必有诡谋发挥作用。在非智力方式里，其中有无诡谋发挥作用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杀人，若是由激情引起，则无诡谋可言，因为这种杀人不需要诡智，而诡谋则是须臾离不开诡智的；若是处心积虑而为，必有诡谋的介入，因为处心积虑就是诡谋的内在反映。

①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2页。

②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8页。



就利己而言，诡谋中的利己与其他手段中的利己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所有的利己都是让自己获得利益或好处；不同点在于人们对不同利己有不同的评价及其态度。“完全利己”的利己，人们给予的评价是自私，所对应的态度是不屑；“为己利他”的利己，人们给予的评价是应该，所对应的态度是赞同；“害己以利己”的利己，人们给予的评价是值得，所对应的态度是尊重；“损人利己”中的非诡谋利己，人们给予的评价是可恶，所对应的态度是憎恨；而“损人利己”中的诡谋利己，人们给予的评价是可耻，所对应的态度是鄙弃。

诡谋中的损人利己，若从你、我、他三方上谈利害，利始终只对一方——“我”。害针对的可能只有一方——“你”，也可能是两方——“你”和“他”，其中的“你”是诡谋主体谋算的直接对象，即第二方；“他”是间接对象，即第三方。一箭双雕的诡谋便是既害“他”又害“你”的诡谋。这是从谋算上谈利害。若从落实上谈利害，利己的落实可能由一方——“你”担当，也可能由两方——“你”和“他”共同担当。当然，这样的“担当”都是被动的担当，因为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诡谋主体“我”的手中。害人的落实，可能由“我”一方直接担当，也可能由“他”一方直接担当。由“我”一方担当是普遍现象；由“他”一方担当是特殊现象，借刀杀人便是如此，前举郑袖暗害魏姝例，害人的落实便是由楚怀王担当的。

先来看“一箭双雕”的例子：

宋太宗赵匡义继位之初的京城，社会秩序混乱，坏人耀武扬威，好人低声下气，官吏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特别是京城府尹，为官无能，赵匡义总想找个机会让他“下课”。时过不久，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一名乞丐在一店家久讨不着时，大骂店主不仁。店主以生意为重，息事宁人地连忙拿了点东西给他，让他快点离开。得寸进尺的乞丐嫌东西太少，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泼来，无论谁劝也无济于事。这时，装扮成一名军校私访的赵匡义恰好路过此处，见状，心中大喜，觉得“修理”府尹的机会来了。他不管

谋 论 诡

七十二，抽刀上前将乞丐刺死后，弃刀离去。

凶案发生，官府派人查办，但收效甚微。第二天，有人向赵匡义奏明此事，赵不动声色地降旨京城府尹半月之内必须破案。京城府尹不敢违抗圣旨，不得不亲自挂帅查办这起在他看来是杀鸡用宰牛刀的案件。

过了几天，府尹等人奏明太宗此案已破：杀死乞丐者，乃遭其骂的店主，店主已缉拿归案。

赵匡义本想当即指斥他们办了冤案，但为显示自己审慎，忍而不发地叫府尹等人重审再奏。府尹等人遵旨把案件又过了一道，没发现新的线索，在破案期限已到的前一天，携带案卷、证物等来到宫廷。

赵匡义翻了翻案卷，问府尹：“乞丐的确是店主杀死的吗？”府尹磕头称是。赵拿起那把作为证据的杀人刀，又问：“这是店主所用的杀人刀吗？”府尹再次磕头称是。这时，赵拿出自己的刀鞘，把杀人刀放了进去，让众臣特别是府尹仔细瞧一瞧：此刀是不是出自此鞘。众臣看到两者严丝合缝，大致明白此案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不用说，府尹等人办了一起大冤案！赵匡义当即令人摘去了府尹等办案官员的乌纱帽。从此，赵匡义有了明君的口碑。

殊不知，赵匡义的明君口碑是以损人的手段换来的。乞丐撒泼，本不该杀（若该杀，就不会是缉查凶手，而应是悬赏让杀人者前来领赏），他却毫不犹豫地杀了，其直接目的是整治无能的府尹，其根本目的是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府尹无能，自然查不到真凶，可职责所在又不能不查，为了交差，他只能想当然地把店主当凶手，冤案发生也就顺理成章。这是赵匡义早就料到的，他的狡猾之处就在于损人不露声色，并且损得被损之人口服心服，旁观者也无话可说，包括他杀死那名讨人嫌的乞丐，因为这里面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内涵。由此观之，赵匡义不能不算运用损人利己诡谋的高手。

再来看“借刀杀人”的例子：

封建王朝的皇帝，不曾运思过诡谋的恐怕没有，运思得非常巧

妙又非常多的也许不多，朱元璋恐怕是这不多中的一个。他小时候就有把牛尾巴塞进山缝哄骗东家其牛钻进山里的诡谋杰作。后追随郭子兴反元。初露锋芒时，他借助神灵设诡谋避免了一场被舅兄设毒酒宴暗害的灾难。郭子兴死后，功劳最大的他却只当了个左副元帅。为独掌军权，他又运思了一个大的诡谋，这就是“借刀杀人”。

凭实力朱元璋完全可以除掉位居第一的元帅郭天叙和位居第二的右副元帅张天佑，但慑于人心他没有公然这么做，因为郭天叙是他的舅兄、张天佑是他的舅丈人。他时刻等待着借第三方之力除掉两位“顶头上司”的机会。这一天终于被他等到。一次，红巾军与元军恶战，元军陆军统帅陈也先诈降，朱元璋明知其是诈降，但仍建议两位“顶头上司”对其予以重用。后来一次战役，陈也先主动提出担任攻打集庆的先锋官，朱元璋巧妙运作，硬是让右副元帅张天佑靠前指挥、元帅郭天叙前去接应。

攻城开始，事先与城里元军串通好的陈也先从三面佯攻，让仍然蒙在鼓里的张天佑独攻一面。元军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张天佑，张天佑败退四十里扎营，等待郭天叙率兵前来接应。陈也先完成佯攻之后，以保护的名义带着队伍来与张天佑部会合，实际上他是要把郭、张诱进自己布置的圈套。率部前来接应的郭天叙一到，陈也先立即邀请郭、张二人到自己的帐下饮酒论事。丝毫不怀疑陈也先有诈的郭、张欣然应允前往，结果被埋伏在帐下的刀斧手冲出拿下，捆了个结结实实。显露真面目的陈也先恶狠狠地告诉他们二人，若要保住性命，就下令让红巾军投降。让陈也先没有料到的是，此时的红巾军已被一个叫郭胜的红巾军头领带出了危险地带，即使郭、张二人下令，也无人听令了。知道此情之后，恼羞成怒的陈也先立马下令将郭、张斩首。这还不解恨，他又率部追杀逃离危险地带的红巾军。让他更没料到的是，自己却中了埋伏，且丧命于乱刀之下。郭、张、陈三人先后送命，红巾军免遭覆灭，是谁周密谋划部署了这一切？没有别人，正是足智多谋的朱元璋。

朱元璋损人损到了家，他硬是借陈也先之手，“顺理成章”地除掉了政敌。这之中，他不仅不负任何责任，相反还可以在与郭、

诡谋论



张愚钝死不足惜的对比中，赢得运筹帷幄的美誉。此等“借刀杀人”的诡谋，真可谓杀人不见血，比起其他损人利己的诡谋来，更加阴险，更具迷惑性。当然，此等诡谋必须有与“你”一方敌对的且可被“我”一方利用的“他”一方，缺乏“他”一方，根本无法运思此等诡谋；有了“他”一方，却不能被“我”利用，也难运思此等诡谋。所以，此等诡谋虽然作用大、效果佳，但用起来并不方便，不能想用则用，故所用者不多。

有一种诡谋与此等诡谋很相似，就是“我”、“他”双方合谋的诡谋。从参与方来讲，前种诡谋和后种诡谋中都有“你”、“我”、“他”三方参与，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是“我”、“他”相互知情、相互利用，“我”即“他”，“他”即“我”；前者是“我”、“他”相互不知情，只有“我”利用“他”，而没有“他”利用“我”。“我”、“他”合谋的诡谋是常见的诡谋，比“我”、“他”无合谋的诡谋多得多。当然，无论怎样多，也多不过“我”一方而谋的诡谋，因为“我”一方而谋，可以想谋就谋，想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谋就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而谋，不受“他”一方制约，只要有用诡谋去损人利己的必要就行。

二、利己以害他型诡谋

以有利于自己的手段达到损害他人目的的诡谋谓之利己以害他型诡谋。利己作为一般目的和一般手段，在伦理行为相对数量规律中，表现恰恰相反，这就是：“每个人的行为目的必定是恒久利己，而只能偶尔利他、害他、害己。换言之，每个人目的利己的行为必定是恒久的，必定多于他全部行为之一半；而他目的利他、害他、害己的行为之和必定是偶尔的，必定少于他全部行为之一半。”^①“每个人以依靠自己为手段的行为只能是偶尔的、极少数的，……”

①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7页。



每个人的利他手段或害他手段是恒久的、绝大多数的。”¹ 这两段文字告诉我们：作为目的利己的行为恒久且多，作为手段利己的行为偶尔且少；而作为目的害他的行为偶尔且少，作为手段害他的行为恒久且多。显然，当作为手段害他的行为与作为目的利己的行为相结合时，其表现则是恒久且多；当作为手段利己的行为与作为目的害他的行为相结合时，其表现则是偶尔且少。损人利己的行为属于前者，利己以害他的行为属于后者。所以，从数量上讲，损人利己型诡谋大大多于利己以害他型诡谋；从生命力来讲，损人利己型诡谋大大旺盛于利己以害他型诡谋。也正因如此，生活中，损人利己的诡谋随处可见，利己以害他的诡谋少得可怜。不过，无论怎样少，利己以害他的诡谋绝不会不存在，它始终以自己独特的形式成为诡谋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利己作为害他目的的手段，与后面要论述到的、其他作为害他目的的手段利他、害己、害他比较起来，同少异多。同少：都只是担当手段、工具的角色，悉为同一目的——害他服务。异多：一是选择的范围不同。“利己”是在有利于自己的范围里选择相应的手段，“利他”是在有利于受害对象的范围里选择相应的手段，“害己”是在自己损害自己的范围里选择相应的手段，“害他”是在被损害对象的范围里选择相应的手段。四者选择时不能混淆，混淆了，自己就不是自己了。二是得到的回报不同。在害他目的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利己手段使用之后，所得到的回报是益不是害，即使害他目的没有达到，自己也能受益；害己手段使用之后，所得到的回报是害不是益，若害他目的达不到时，自己也白白受害；利他手段、害他手段使用之后，对谋算者自身而言，既不受益也不受害，害他目的达不到时也是如此。三是公开与否的不同。作为手段使用，“利己”既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原因在于“利己”既有合乎情理的一面，也有不合情理的一面。合乎情理的一面因合情理即使公开也不会引起诡谋所涉对象的警觉；不合乎情理的一面因

1.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9页。

诡谋论



其不合情理，公开就有可能引起诡谋所涉对象的警觉，所以不公开为妙。作为手段使用，“害己”、“利他”可以公开，因为“害己”损害的是诡谋者自身，在诡谋所涉对象看来，这种损害与己无关，由于因与己无关也就不会怀疑这种损害的目的是要损害自己，所以害己手段可以公开。同理反证，“利他”也可以公开，因为“利他”是有利于诡谋所涉对象的“利他”按常规思维，有利自己不会害自己，所以对于“利他”手段的公开，诡谋所涉对象一般乐于接受，乐于接受后就不会怀疑这种“利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害他”。两者不同的是：害己手段公开的只是结果，不是过程，且结果的公开是以他害不是以自害的形式出现，不公开过程的原因就在于掩盖自害让人误认为是他害；利他手段是既可以公开结果又可以公开过程，原因是让对象相信这种手段是在利他。作为手段使用，“害他”不能公开。人对降临的伤害都有一种本能的抗拒，诡谋者若公开“害他”的手段，自然遭到对象的抗拒，遭到抗拒时，“害他”的目的无法达到，所以“害他”的手段不能公开。

利己以害他，害他是诡谋的目的，那么，害他又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为害他而害他？显然不是！害他绝不是害他的原因，任何害他都与己相关，撇开具体原因不谈，害他的根本的、终级的、抽象的、潜在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所以，为了自己是诡谋者害他目的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利己以害他的害他目的相对于利己手段，害他只是一时一事的、直接的、具体的、显在的目的。

在利己以害他的诡谋行为中，利己手段使用时具有典型的双重性，即一方面利己、一方面害他，只不过利己是显性的、害他是隐性的。若光利己而不害他是达不到害他目的的，除非行为者不是故意的。比如，挖井取水有利于自己生活，邻家小孩掉进井里淹死，这是一种“利己”与“害他”的行为，但不是“利己以害他”的行为，因为挖井者挖井的目的不是害他而是利己。假如挖井者的目的就是要让邻家小孩掉进井里淹死，那么挖井者挖井的手段既有害他的一面，也有方便自己取水的一面，在挖井者看来，即使害他不了也可利己。此种假设若为某人所用就是诡谋，并且是一种非常狡

诈的诡谋。原因在于其“利己”更能掩人耳目。

我们举一个此等诡谋的真实事例：

唐美菊与何小玲是师徒关系，何小玲系江苏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肺科副主任医师。1995年4月8日，具有高中学历的唐美菊住进何家学医。何与老婆闹矛盾早已分居，女儿上大学一年只有寒暑假回家，空荡的房间正好被师徒二人用来建立情感的反应堆。二年之后的“五一”节前夕，唐美菊得了一种怪病：青丝般的头发一缕一缕地脱去，正处青春年华的人却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徒弟得了病，自然是师傅治疗。何小玲十分尽心地把唐美菊留在自家诊治，每天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何都亲自操办，不让任何人插手。唐美菊及其家人十分感激。然而，唐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转，相反越来越严重。1998年4月23日凌晨，何小玲便与唐美菊家人一起，将唐送往何所在的医院治疗。当晚，26岁的唐美菊走完短暂的人生之旅，死在了医院，正常病故的结论写进了病历。假如不是一个陪丈夫住院的厂医对此提出疑义，一宗谋杀案将会不被任何人知晓而沉于历史。

厂医马某觉得唐美菊的病情与癌症化疗者相似，但其死亡诊断却是严重感冒而导致的“感染性休克合并DIC（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急性粒细胞缺乏症”。马某把自己的怀疑报告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尸检和血液检测结果表明：唐美菊并非死于感染性休克，而是中毒休克，所中之毒是常用的抗肿瘤药物“氟”，即氟尿嘧啶。此药少用可抗癌，多用能致死人命。

得重感冒的唐美菊体内为什么含有大量的“氟”？谜底由公安机关揭开：她体内的“氟”全由她的师傅何小玲所为。何小玲为什么要给徒弟服用、注射“氟”？答案是：唐美菊的姑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1998年3月20日，她与对象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准备“五一”举行婚礼。何小玲意欲长期占有唐美菊，见其马上就要离己而去，遂生“我得不到的也不让别人得到”的恶意，除掉唐美菊。为了逃脱罪责，让唐美菊及其家人在唐死之前仍然认为他是个好人，何小玲思谋了一个又一个的谋杀方式，最后选定用“氟”慢

诡谋论

性毒杀。4月初，他开始让唐美菊服用“氟”；中旬，唐美菊患了感冒，他把“氟”与抗感冒药一起放进葡萄糖里为唐美菊打点滴。“氟”在体内大剂量蓄积，唐美菊终于带着对师傅的感激撒手人寰。

1998年11月24日的《云南公安报》以《奇特的谋杀——一起罕见的高智能犯罪案》为题，报道了这个案件。的确，何小玲以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巧妙地使用抗癌药物杀人，并且杀得让被杀者及其家属感激不已，叫医院作出了正常病故的结论，这没有高智能的诡谋办不到。从此例可以看出，诡谋者何小玲所使用的利己手段，其利是两个方面：做好人与逃避罪责。而在做好人的表象下面，却是地地道道的害他手段：以“氟”毒杀。既利己又害他，其手段的双重性体现了利己以害他型诡谋中的“利己”的独特性，是其他类型的诡谋所不具备的。

三、利他以害他型诡谋

以有利于对方的手段达到损害对方的目的的诡谋谓之利他以害他型诡谋。“每个人，不管他多么善良，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目的害人的行为。这是因为，每个人，不管多么善良，都或多或少会从他人那里受到痛苦和伤害，从而必然或多或少有恨人之心；而恨人之心这种对于成为自己痛苦之因的他人的心理反应，显然便会驱使自己相应地为了使他人痛苦而活动：恨人之心会导致目的害人的行为。”¹ 目的害人由心理恨人引起，斯宾诺莎说过：“假如一个人恨另一个人，他将努力设法损害他。”² 这里的“设法损害”主要就是用诡谋损害，其中包括“利他”的“设法损害”。“利他”作为手段，可实现的目的包括“利己”、“利他”、“害己”和“害他”。相对于利己目的，利他手段既可以是真实的“利他”（如为了荣华富贵而努力工作，工作的成果对他人也是有利的），也可以是虚假

1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3~204页。

② [荷兰]斯宾诺莎著：《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0页。

的“利他”（如以帮人做好事而骗取钱财）；相对于利他目的，利他手段完全是真实的“利他”，没有虚假的“利他”；相对于害己目的，利他手段也是真实的“利他”，没有虚假的“利他”；相对于害他目的，利他手段不是真实的“利他”，只是虚假的“利他”。虚假“利他”，无论目的是害他还是利己，其本身就具有了诡谋的特质，因为诡谋的一大特质就是虚假。



利他以害他的“利他”是虚假的、表面的、暂时的、形式上的，极富欺骗性，与利己以害他中的“利己”比较起来，似乎是一回事，没有多大区别，特别是看了我们所举“师害徒”的案例后，更有此感。的确，“利他”与“利己”可以统一于一件事情上，其一面是“利己”，一面是“利他”。“师害徒”案件，师傅何小玲为徒弟唐美菊“治病”，其“利己”的一面是做好人与逃避罪责；其“利他”的一面是对方的病得到治疗。两者的区别在于出发点放在哪里，放在有利于自己上，是利己手段；放在有利于他人上，是利他手段。师傅何小玲毒害徒弟唐美菊，其出发点主要放在有利于自己上，所以此诡谋是利己以害他的诡谋。刘邦为了让一个骂他而为他所痛恨的小孩养成骂人恶习，不仅不责罚反而送给小孩钱的诡谋，就是利他以害他的诡谋，因为刘邦的出发点放在了“有利于”小孩上。

在一般情况下，利他手段与目的“害他”成正比，即“利他”越大“害他”越大，“利他”越小“害他”越小。在这种关系中，有一点非常肯定：“利他”始终小于“害他”，大于或等于都不符合利他以害他的宗旨。诡谋中的利他以害他，更是恪守这一宗旨，如果不是“利他”小于“害他”，则不是成功的诡谋，凡成功的诡谋，一定是“利他”小于“害他”。

前面已经说明，诡谋者为了达到害他目的，其利他手段是可以公开的，进一步说来，利他手段不仅可以公开，而且必须公开。只有公开，才能让诡谋所涉对象产生你是在为他着想的错觉，从而做出表面看来有利于自己而实际有害于自己的决定。否则，就没有使用利他手段的意义。

谋 诡 论

让我们通过“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故事来看郑庄公的诡谋：

据史书记载，春秋初年，郑国的国君郑武公的夫人姜氏先后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寤生，小的叫叔段。姜氏喜欢长得漂亮的叔段，不喜欢逆生（倒着出生，即脚先出）的寤生（也因而取名为“寤生”）。这种心态驱使她多次向武公提出废长立幼，但被拒绝。

后来武公病逝，13岁的寤生继承君位，是为郑庄公。庄公继位后，把河南京邑封给了已有共这块封地的弟弟共叔段。郑国大夫祭仲（一说祭仲）说：“京邑的土地大于郑国都城，且是军事重镇，这样封赐，实有不妥。”庄公回答说：“母后武姜要我这样封他，我不敢违背母后的意思。”祭仲提醒庄公要设法阻止共叔段的势力再发展蔓延，否则就难以对付了。庄公则说：“不合礼义的事做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你就等着这一天吧。”（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隐公元年》）其实，这是庄公欲擒故纵的诡谋。

共叔段到了京邑后，在母亲武姜的暗中支持下，拼命扩军备战，并以狩猎为名，攻占了郑国的鄆和廩延两座小城。两座小城的官员跑到首都向郑庄公告状，郑庄公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地敷衍一番了事。有个叫公子吕的大臣申明大义地对庄公说：“叔段是个野心家，迟早要造反，不如早点铲除他，以免后患。”庄公却说：“我母亲非常喜欢我这个弟弟，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能因为他练兵屯粮，强占了两个城池，就对他不义，伤害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公子吕还想辩解，庄公以退朝为名不给他机会。从大殿出来，公子吕愤愤不平，同朝大臣祭足告诉他：“这是庄公的良苦用心，庄公不是不想除掉叔段，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略有所悟的公子吕暗中去见郑庄公，庄公对他说：“你的一片忠心我很清楚，只是现在证明共叔段造反的证据还不充分，我若现在杀掉他，人们会说我不讲仁义，在母后那里我也不好交代。等他无所顾忌地干下去，真要造反时除掉他也不迟。”

共叔段见君兄庄公对自己没什么提防，放心大胆地准备造反事宜，武姜也积极为做好小儿的内应而忙碌。

过了若干年，公子吕认为铲除叔段的时机到了，他献计于庄公：庄公以到洛阳去朝见周天子的名义离开首都新郑，叔段知道后必然以为这是篡位的最好机会，会派兵攻打新郑。他公子吕则事先率军埋伏在京邑附近，待共叔段起兵离开京邑后，他便攻入京邑，断其后路，这时，庄公再从半路杀回来，围剿叔段。

郑庄公认为此计可行，便择时行动。武姜得知庄公要朝拜周天子的消息后，马上密信告知叔段，并约定五月初其领兵攻打新郑时，她做好内应。此信被庄公手下人截获，庄公将计就计，让自己心腹把信送给叔段，叔段回信：约定五月初五为期，要求母亲在城上竖起一面白旗，作为内应的暗号。证据在手，庄公向母亲辞行离开新郑，公子吕也把军队悄悄带到了京邑附近。

叔段对此丝毫没有察觉，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起兵去攻打新郑。就在叔段的军队开出不久，公子吕率军占领了京邑，庄公马上回师对叔段进行围剿，后叔段逃到原来的封地共城自刎，而武姜则被庄公送到城颍软禁起来，庄公还发誓说：“不到黄泉，绝不相见。”

可以说，郑庄公把利他以害他的诡谋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依着母亲、纵容弟弟，由着他们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并且对有异议者的上奏一概不予理采，“利他”绝对是“利”到了家。作为一国之君，他完全可以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但他为了让其暴露充分，把大逆不道的行为全部表现出来，然后一举铲除，他没有阻止，害他目的在利他手段的运作和遮掩下，顺利实现。假如庄公一开始就采取限制、阻止的措施，害他目的实现恐怕要困难得多，因为不让其母、其弟的篡位逆行无所遮挡地彻底暴露，就得不到道义的支持，而道义支持是一支无形的、巨大的、可以决定胜负的力量。当然，庄公利他手段的运用，不是对母亲和弟弟逆行的不管不问，尽管在行动上他没作什么大的防范，但在思想上时刻没有放松。这种内紧外松的对策，是庄公纵亲诡谋的精髓，也是利他以害他型诡谋的一大特点。

谋 诡

论

四、害己以害他型诡谋

为了损害他人和社会而不惜损害自己的诡谋谓之害己以害他型诡谋。害他是目的，害己是手段。在人性中，利己是天然的，害己却是不得已，即无可奈何地对己实行强制性损害。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实现目的的时候，如果能够通过利己手段达到，那他绝不会选择害己手段，选择害己手段必然是觉得通过利己手段无法达到或者难以达到。对于诡谋者来讲，他们更是希望通过利己手段去实现目的，但当他们选择害己手段时，则更是不得已的事情。因为任何诡谋者没有一个不是希望把天地日月谋划到任由自己摆布而自己却不损一根毫毛的。

同样是害己，利他的害己是良善（从实质上讲这里的害己是必要的恶，正因为是必要的恶，人们将其作为善对待），是社会提倡、人们敬重的行为；害他的害己是邪恶，是社会反对、人们鄙弃的行为。如此评价，是以目的为基准的，利他的目的是善的，则认为害己的手段也是善的；害他的目的是恶的，则认为害己的手段也是恶的。运用恶的手段实现恶的目的，是诡谋者的惯用招数，并且每一宗害己都带有阴谋性，否则不能称之为诡谋。武则天为陷害王皇后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其阴谋性不言而喻。就其害他目的讲显然是恶的——她陷害王皇后寄希望高宗李治废掉皇后；就其害己手段讲似乎更恶——亲手掐死亲生女。虎毒不食子，何况具有感情的人！料想武则天不是不知道这种人性的东西，她在使用此种害己手段的时候，一定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一定是在考虑使用其他手段特别是利己手段收不到奇效的情况下才出此毒招。实际上，武则天使用此毒招，正是利用了“虎毒不食子”的常理常情，掩护了自己（自己残害自己的女儿情理不通），陷害了皇后（皇后与武则天素有嫌隙，暗害武则天之女情理可通）。武则天用“害己”制造的重磅炸弹，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炸得高宗由此下定了废后的决心。假如不使用此种害己手段，会收到如此效果吗？答案是否定的，不

然，聪明绝顶、智慧超常的武则天是绝不会为达到害他目的而付出如此“害己”之代价的。

从得失关系上看害己手段和害他目的，“害己”是一种失，“害他”也是一种失。“害己”之失是害他者本人所失，“害他”之失是受害者因受害所失。两“失”比较，于诡谋者：从量上看，“害己”之失一定要小于“害他”之失，如果前者大于后者，是失败的诡谋；如果前者等于后者则是不太成功的诡谋；若不是如此，谁还愿意使用害己以害他型的诡谋呢？武则天掐死女儿，是很大的“害己”之失，但与王皇后失去皇后位的“害他”之失比较，仍然是小失。从质上看，“害己”之失是主动的、自愿的失，没有外力的强迫；而“害他”之失是被动的、不自愿的失，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害他”失什么决定着“害己”失什么，“害己”失什么总是围绕着“害他”失什么展开；“害己”失什么可以选择，“害他”失什么不可以选择，因为所有害己以害他的诡谋都是在诡谋者明确了“害他”失什么后，才对“害己”失什么进行选择的。从内容上看，“害己”之失有钱财之失、地位之失、声誉之失和节操之失等；而“害他”之失多半是地位之失、声誉之失以至生命之失，总是唱主角的钱财之失往往成为配角。从对应关系上看，并非“害己”失什么而“害他”一定失什么，它们之间能对应的是少数，不能对应的是多数。武则天以“害己”的生命之失，对应的并非是“害他”的生命之失，而是王皇后声誉地位之失。从次序上看，“害己”之失在先，“害他”之失在后，这是实际上的；但在意识里，两者的先后则刚好倒了个个儿，“害己”之失总是被决定在“害他”之失之后。有失就有得，得在诡谋者一方，即害他目的达到，精神得到快慰。

让我们通过1991年6月21日《民主与法制画报》刊登的一个案例，对此进行剖析：

1970年7月9日上午，浙江遂昌县琴淤乡芡埠洋村村民周德洪9岁的女儿周香珠失踪。第二天早晨人们找到她时，其形状惨不忍睹：两眼圆睁地躺在一个小山坑中，头发蓬乱，衣衫褴褛，胸腹部

谋 诡 论

有一道一尺来长的刀口，内脏被挖出体外，上有乱刀捅过的痕迹。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公安机关瘫痪，把持县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头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阶级报复谋杀害命的反革命事件”。于是，五十人的破案专班成立。根据周德洪提供的“凶手就是本村村民周樟良、周小根兄弟俩”的线索，专班浩浩荡荡地开进苕埠洋村，对周家兄弟实行“群众专政”。屈打成招之后，周家老四周绍清也成为了杀人凶手。周家三兄弟被关进监狱，周家被抄，全家十多口人生活无着，乞讨他乡；周绍清15岁的女儿周香媚活活饿死在乞讨途中；老大周绍根的3岁女儿周玉凤无钱就医，早早地离开了人间……

周家的悲惨遭遇，让一个人奸笑不已，这个人就是周德洪。他奸笑了二十年，直到1990年，遂昌县公安机关在苕埠洋村查办另一起凶杀案时，才让周家冤案得以纠正。原来，周德洪的女儿小香珠死于山洪，周德洪发现女儿尸体后，引发了他借此报复周樟良的念头。因为周樟良曾经揭发过周德洪解放前当过土匪，周德洪对周樟良一直怀恨在心。还有一个人恨周樟良，这个人就是原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汤其炎。汤其炎恨周樟良，是因为他认为他的书记被免与周樟良有关，不然周樟良就当不上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于是，周德洪便拉上汤其炎合谋陷害周樟良。当日深夜，两人来到小香珠尸体旁，周德洪扒开其衣裤，操起一把锋利的鞋底刀，使劲地在尸体的胸腹部切开一条长口；汤其炎犹嫌不足，伸手把内脏挖出来后，用刀将尸体乱戳了一通。然后，两人用石头将尸体埋入一山坑内，伪造成杀人现场。第二天一早，周德洪巧妙地把埋尸地点告诉了他人。破案专班找他了解情况时，他一口咬定是与他一向有矛盾的周樟良及其兄弟周小根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女儿。1991年3月12日，周德洪自食其果，被遂昌县法院以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在上述案例中，周香珠意外死亡，作为父亲的周德洪本应悲痛万分，即刻做好善后事，然而，他却在邪念的驱使之下，要借此做一篇害他而让仇人遭受牢狱之灾的文章。此种害他目的确定之后，

他选择的害己手段就是把女儿的尸体开膛破肚，伪造成杀人现场，使本来就死于非命的女儿不得安息；他的“害己”之失很小——残忍地对待女儿之尸，比武则要女儿的性命之失小得多，而“害他”之失很大——仇人周家三兄弟饱受牢狱之苦；他“害己”绝对是主动而自愿，没有谁强迫，而周樟良兄弟受害也绝对是被动的、不自愿的，是周德洪这个外力作用的结果；他的“害己”之失是在他看来无关紧要的慈爱之失，而“害他”之失则是在周家兄弟和他本人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人身自由之失。周德洪以“害己”之手段实现了“害他”之目的，精神上得到报复成功的快慰，奸笑了二十年。



害己以害他型诡谋还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第三方实现害他目的。武则天掐死女儿诬陷皇后，若得不到高宗皇帝这个第三方的认可，她将是白白地送掉了女儿的性命；周德洪在女儿身上开膛破肚陷害周樟良兄弟成功，完全得益于作为第三方的“破案专班”。此种诡谋之所以有如此特点，是因为诡谋者所害作用的是“己”不是“他”，“他”没有受到作用也就没有受到损害。第三方所起的作用就是把诡谋者的己害确认为是诡谋对象所害。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损害诡谋对象的不是诡谋者而是第三方。所以，第三方的作为关系到害己以害他诡谋的成败。正因如此，诡谋者在运思此等诡谋的时候，常常把第三方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忽视这一点，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功败垂成。

综上，害己以害他型诡谋是一种高风险的诡谋，非高诡智者、非胆大妄为者不为。所以，生活中此等诡谋发生不多。

五、完全害他型诡谋

所谓完全害他型诡谋，是指为了达到损害他人的目的而使用损害他人手段的诡谋。在所有类型的诡谋中，只有完全害他型诡谋给诡谋对象所带来的损害是绝对的，即使目的没有达到，其损害手段也让对象受到了损害。

谋诡论

054

手段害他与目的害他虽然都对被谋对象产生损害，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程度不同。一般来讲，手段害他总是轻于目的害他。比如利用迷信害他，其害他目的是谋杀对方的性命，害他手段则是用冰水浇身，意在哄骗对方这样做是为了除妖驱魔。我们知道，冰水浇身即使达不到害死对方之目的，其冰水浇身本身也会造成对对方身体的损害，不过，这种损害与生命的损害比较起来还是要轻。二是表现不同。手段害他总是以现象和形式来表现，目的害他总是以本质和内容来表现，害他手段用什么形式，由害他目的的内容决定，害他目的确定之后，害他手段不仅可以反复使用一种形式去实现，而且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形式去实现。如目的在于败坏一个人的名誉，既可以反复不断地采用散布流言的手段，又可以采取除此之外的向其组织写诬告信或者借文学创作贬损等手段。三是完成差异。害他目的只能由诡谋者一方确认完成；而害他手段的完成，由诡谋者一方可以，由非诡谋者一方也可以（如雇凶杀人中的杀手、借刀杀人中的被借之“刀”），由诡谋者和非诡谋者合作更可以。

完全害他的背后是利己，利己是害他目的的目的，是害他手段的动机。动机是人活动的内驱力，目的是人希望达到的结果。一个人有了内驱力就要行动，有了希望就要奋斗，当两者统一到“害他”之上时，“害他”就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只要发生，只要希望达到的结果出现，谋算者淤积在内心的仇恨、愤懑便会得到发泄，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的畅快与慰藉，这种畅快与慰藉就是利己。

在所有以害他为目的的诡谋中，“害他”均出自敌视心理，即诡谋者损害诡谋对象皆因仇恨、激愤、恼怒、讨厌或忌妒使然，这是区别于以利己为目的的诡谋的本质所在。在以利己为目的的诡谋中，“利己”往往出自求利、求名、享乐、占有、贪婪等心理。心理基础不同，对害他还是利己的目的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手段为目的服务。在害他目的确定之后，是采取利己、利他手段，还是采取害己、害他手段，由诡谋者根据主客观案件而定。事情往往是这样：诡谋者首选的总是害他手段，因为即使达不到害他

目的，害他手段也已让诡谋对象受到了损害。

让我们通过《南疆警事》2003年第11期刊登的一个案例，对此进行剖析：

蓝梓像只活泼的小鸟，与单位同事一起在鸟语花香的郊外玩得特别痛快。谁知老天嫉妒了，一场大雨不由分说地向她泼来，落汤鸡似的她正想找个躲雨的地方，恰巧一辆小轿车停在了她的身旁。“如果你们不介意，就上我的车吧，我们一起回市内。”年轻的司机探出头向蓝梓及好友朱丽萍发出邀请。蓝梓和朱丽萍相互望了望，感激不已地上了车。上车后，年轻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叫高潭，是南昌某广告公司的老总。蓝梓和朱丽萍也作了自我介绍。回到市内下车时高潭与她们交换了名片。



回到家，蓝梓感冒了，而且很厉害，她不得不住进医院。第二天一早，高潭给她打电话，关心地询问她昨天被雨淋后有没有不适，她无意间说出自己住进了医院。过了一个时辰，高潭手捧一束康乃馨来到了她的病床旁……他们相爱了。一年之后的2002年4月28日，他们各自成为对方的新郎新娘。

蜜月度完之后，高潭要到外地考察，为期三个月。难舍难分地送走丈夫后，蓝梓回娘家同孤身一人的母亲居住，寂寞时就到好友朱丽萍家玩玩。朱丽萍是个不幸的人，结婚不久，丈夫患上严重的癫痫病，不仅六年的婚姻有名无实，而且欠下一屁股债，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用电器都没有。蓝梓来了，朱丽萍没什么好招待的，就陪她去游泳，泳衣则由朱丽萍提供。这样做了四五次后，蓝梓感到下身奇痒难忍，还长了些异物。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得了性病！她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没跟丈夫以外的任何男人睡觉，怎么会得性病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得通，即丈夫在外寻花问柳，把性病带给了她。由此她断定，这次丈夫到外地出差时间要三个月，一定是治性病去了。为此，她痛楚万分。

女人解决心痛的办法是找人倾诉。蓝梓找人倾诉的最佳对象当然是好友朱丽萍。可没想到的是朱丽萍上班途中遭遇到车祸住进了医院。作为好友，她急忙请假到医院照看朱丽萍，这一照看就是一

谋 诡 论

个来月。

三个月终于在煎熬中过去了，丈夫高潭考察完毕回到了家。蓝梓本想当即质问丈夫到底出差干什么，但还是忍住了。她并没有拿到丈夫的把柄，若被反咬一口，自己的名声也就完了。她佯装热情地迎接出差归来的丈夫。当得知妻子好友朱丽萍还躺在医院时，高潭立即携妻带物到医院看望朱丽萍



到了朱丽萍的病房，朱丽萍独留高潭，让其他人暂且离开。不一会儿，高潭满脸愠色地从病房出来，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蓝梓非常纳闷，急忙走进病房问朱丽萍是怎么回事。朱丽萍含泪对蓝梓说：“你对我真心实意的好，我不能再瞒你了，其实你的病是我害的，指使我害你的是你的丈夫高潭！”蓝梓绝不相信深爱自己的丈夫会干出这等事来，但听朱丽萍讲了事情的经过后，信了。

“他为什么要害我？”蓝梓问朱丽萍，朱丽萍回答不出。她气冲冲地跑回家，质问丈夫高潭。高潭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家与你家有深仇大恨，我3岁时死了父亲，母亲把我拉扯到15岁时，你爸强暴了我母亲，我母亲含恨自尽。我一直想为母亲报仇，但苦于没有机会，等有了机会，你父亲却死了，我只好把仇恨转嫁到你的身上，让你替你父亲还债——让你生不如死。我想方设法接近你，合法地占有你，然后一脚把你蹬掉。蹬掉你的理由就是你不守妇道，得了性病。为此我花5万元买通了急着要给丈夫治病的朱丽萍，让朱丽萍花钱找卖淫女把性病病毒涂在泳装上，让你穿着去游泳。我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没想到的是，朱丽萍在医院把5万块钱还给了我，把真相告诉了你。不过，你的名声是无法换回了，你活一天就要与羞耻做伴一天，一直到死……”

两人很快办理了离婚手续。上班后，大家都用异样的目光看蓝梓，不少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事后得知，人们对她指指点点不是因为她离婚，而是因为她与男人睡在一起的裸体照和在医院检查出性病的化验单复印件。她明白，这些都是高潭所为，裸体照是她与高潭的，只是高潭的头部加了马赛克；性病化验单是高潭从她病历里偷走的。蓝梓要找高潭算账，而高潭已离开南昌不知去向。她在

南昌也待不下去了，带着破碎的心远走他乡。

在上述案例中，蓝梓是完全害他型诡谋的牺牲品。高潭出于报复的动机，以让对象一生都感到羞耻为目的，采取先娶对象为妻后让对象患上性病、曝光对象隐私的手段，精心设计和实施了一个精巧的诡谋。蓝梓在这个诡谋里，始终是被动的，她成为高潭的诡谋对象，就注定要受到伤害，并且既有生理的又有心理的，其心理伤害更大。她生理的伤害是性病的折磨，她心理的伤害是不敢启齿的病情和一丝不挂的躯体被曝光后带来的羞耻感的折磨。前者可以治好，“折磨”从此消失，后者却很难“治”好，并且即使治好了也易复发。由此可见，完全害他型诡谋的杀伤力是其他类型诡谋的杀伤力不可比拟的，受害者只要进入诡谋者的圈套，受害必定无疑，并且往往是身心俱损。

上述诡谋类型，我们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划分的。这样划分的主要目的，在于与谋略类型完全区分开来，因为论述谋略类型是不便从这个角度着手的。诡谋是缺德的谋，用伦理道德作标准剖析，可把诡谋的真面目完全撕开给人看，从而让大家看到诡谋真的不是一个好东西。

当然，划分诡谋类型还可从其他的角度，比如：从规模的角度，可把诡谋划分为大诡谋、中诡谋、小诡谋；从应用领域的角度，可把诡谋划分为政治诡谋、经济诡谋、文化诡谋、宗教诡谋、生活诡谋；从危害程度的角度，可把诡谋划分为重大危害诡谋、中等危害诡谋、轻微危害诡谋；从设谋人员的角度，可把诡谋划分为自设诡谋和他设诡谋；从攻防的角度，可把诡谋划分为进攻性诡谋和防御性诡谋；等等。怎样划分恰当，完全根据研究需要，不必喜欢某种就一成不变。

第四章 诡谋的特征

诡谋按照自我的性格逻辑发展，不自我标榜，不耀武扬威，不胡搅蛮缠，一如原子核裂变，在静悄悄中进行，一旦聚合完成，所释放的能量足以摧毁所希望摧毁的一切，能够留给受害者的，只有惊叹、伤害、缺失和悔恨。恰“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①。在“人不知”、“人不畏”中实现目的，这就是诡谋的基本特性。

一、动态特征

诡谋都有一个从立谋、虑谋到施谋的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但无论长短，都是变化发展着的，在这个变化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征，我们称之为动态特征。这种特征揭示的是诡谋的本质，反映的是诡谋的内容。

（一）从立足点上看，以利害关系为根本

“细究起来，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具有利害人己的效用，无不是利害人己的行为。”^②利己、害己、利人、害人，一个行为的发生，总与其中一个方面或几个方

①《鬼谷子·摩篇第八》。

②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2页。

面相关，或利己，或害己，或利人，或害人，或利己害人，或利人害己。“由此推演开去，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其实就是利害关系。”^① 诡谋不是单方面的行为，以有对立面参与才能发生。所以，一旦实施诡谋行为，其动机不可能只是利己，或只是害他，只能是利己害人或两败俱伤。由于参与的对立面是遭侵害的，故在诡谋中绝没有利人的动机。准此观之，诡谋行为是利与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行为，也就是说，只有利与害相互发生关系时，才可称其为诡谋，否则，只有利或者只有害，就无所谓诡谋。吃饭做事、看书学习，对己有利，何需诡谋；灾害降临、疾病缠身，于己有害，更不需诡谋。这里还需要明确的是，即使利与害相互发生了关系，也并非都是诡谋行为。比如强奸，与己有利，与人有害，尽管利与害相互发生了关系，但并不是诡谋行为，因为其中没有计谋的介入。是不是计谋介入了的利害关系就是诡谋了呢？也不是。智取威虎山，其中利害发生了关系，也有计谋的介入，但它是正义的行为，不能称之为诡谋，理由如前所述：诡谋必须是非正义、不道德的行为。

利害关系虽然要有非正义、不道德的计谋介入才能构成诡谋行为，但从根本上讲，它仍然是诡谋的基础。无论什么样的主体，只要打算运用诡谋，起因必定缘自利害，或为牟取私利而害他，或害他以满足自己的报复欲望，或为保护自己而趋利避害。没有这样的利害关系，诡谋就是海市蜃楼、水中明月；离开这样的利害关系，诡谋就是断线风筝、离水鱼虾。既不能没有这样的利害关系，又不能离开这样的利害关系，所以，诡谋“自始至终以利害关系的推导为运思的基本原则和逻辑展开”^②。也就是说，只要进行诡谋，其主体思维就好比坐上了火车，只能在利害关系的轨道上驰行，不达目的不罢休。

1.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244页。

2.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6页。

诡 谋 论

思维如此，实现的途径更是依赖于利害关系。自有诡谋以来，对于诡谋对象，以利诱之、以害慑之就是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最恒久的取胜方法。诱之以利，害藏之，此害是对诡谋对象之害；慑之以害，利藏之，此利是对诡谋主体之利。操作之中，是利大害小，还是害大利小；是利大害大，还是害小利小，全由诡谋主体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手段来掌控。

诡谋围绕利害关系展开思维，把利害关系作为实现目的的途径，这还不够，其成败的评价也要以此为尺度。让对象无利有害、见害失利谓之成功，对象开始以为有利无害，结果落得无利有害，这个过程转换得越迅速、越彻底越意味着成功。丢包骗局就是典型的此等诡谋。对象慑于诡谋主体所说之害，结果为避害而失利，其实，所谓的害根本就不存在。能够让对象感受“害”的压力越大、交出的利益越多越成功。这方面的诡谋，典型如消灾骗局。假如对象得利而不失利、见害而不受害，其诡谋就是失败的诡谋。得利而不失利、见害而不受害也是利。这就是说，诡谋的成败以对象的利害大小而论，对象害大利小，其诡谋谓之成功；对象利大害小，其诡谋谓之失败。好似一幅太极图，阳鱼是利，阴鱼是害，阳鱼之尾与阴鱼之头的相接处是诡谋的最大成功；阳鱼之头与阴鱼之尾的相接处是诡谋的最大失败；利害各半，即处在阳鱼与阴鱼中间处，诡谋既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两败俱伤的诡谋即是此等诡谋。（如图4.1）当防身自保而使用诡谋趋利避害时，评价成败之标准正好与上相反，害无而利（这里的利是防身自保成功之利）大则为成功，反之则为失败。用太极图表示就是，阳鱼头与阴鱼尾相接处为最大成功，阳鱼尾与阴鱼头相接处为最大失败。（如图4.2）

拥抱利害关系而思维、而动作、而论成败，利害关系永远是诡谋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利害关系，不光是指大家认为的诡谋主体与诡谋对象之间的利害关系，还包括另外两对利害关系：一对是诡谋对主体产生的利与害从而构成的利害关系；一对是诡谋对对象产生的利与害从而形成的利害关系。这两对利害关系由前对利害关系派生，从属于前对利害关系，在某种情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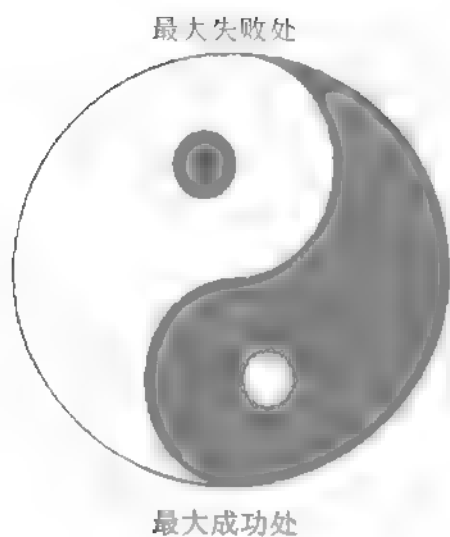


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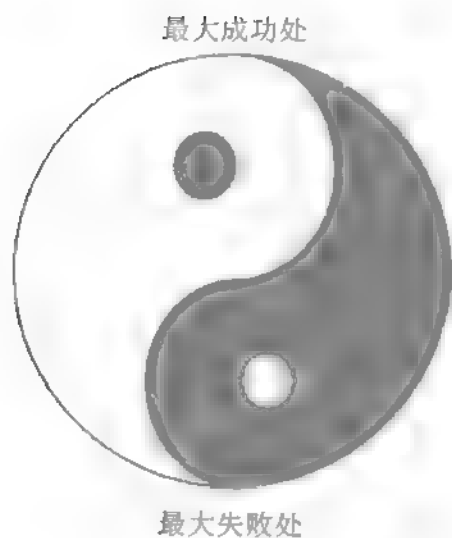


图 4.2

当其中的一对的利害发生转换时，直接影响前对利害的转化，影响诡谋的成败。所以，研究诡谋特点，不可忽视这两对利害关系。

2004 年 8 月 7 日的《楚天金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高智商”歹徒设套劫杀富婆》。设套是诡谋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设套诡谋中，歹徒与富婆之间的利害冲突达到极至，最后以诡谋对象——富婆的生命完结而结束。

歹徒有两个，一个叫于端沐，48 岁，曾因雇凶伤害他人被判刑；另一个叫韩东胜，39 岁，曾因故意杀人被判刑。两人是狱友，出狱后，于端沐利用自己的“聪明”很快成为了陕西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把韩东胜安排进公司，担任下属厂厂长。富婆即是某公司的女经理张某。由于业务关系，于、韩知道张某腰缠万贯。为了快速发财，于、韩打起了张某的主意。两人一番密谋，设计了一个套牢张某的圈套：新疆油田有一个“西气东输”的大工程，工程造价 8000 万元，于端沐认识该工程项目经理“韩总”，他可以通过“韩总”将该工程介绍给张某。“韩总”是陕西蒲城人，目前正在老家探亲，定于 2004 年 6 月 24 日返回新疆，如果张某有意做这笔生意，可以随同“韩总”一起赴新疆考察。

诡谋论



如此大的工程，利润一定丰厚，见利忘害是生意人的共同特点，张某也不例外，马上答应随同“韩总”前往。没曾想，她前往的是一条死亡之路。6月24日，于端沐乘出租车来到张某面前，说是先到蒲城接“韩总”，再同赴新疆。张某想都没想就上了车。当他们踏进蒲城县坡头乡的一户农家大院时，张某发现，接待她的“韩总”（即韩东胜）一下由人变成了豺，陪伴她到此地的于端沐刹那由人变成了狼，而她自己则变成了一只任由豺狼撕咬的羊羔。于、韩二人将张某绑在椅子上，拳脚相加，百般凌辱，迫使张某说出内存6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的密码，并写下数封家信和西安某高档住宅区一套价值60余万元的房屋转让协议。如果说张某开始走进“工程”骗局只知有利不知有害的话，而此时则利害全知，她说密码、写家信、签协议都是对自己的害，而利都在于、韩一方。她唯一希望能对自己有利的一点，就是按歹徒的要求做了之后，保全自己的性命。然而这一点“利”的希望也即刻破灭——她被于、韩当场勒死。

于端沐在学校读书时学的是生物，深知DNA对人体的作用，为逃避法律制裁之害，不让得到的利失去，遂心生一计，将张某尸体肢解，丢进大锅熬煮，后捞出连同张某的衣物和随身携带品一起焚烧，让死者的DNA彻底消失，使警方无从获取证据。

但于端沐的如意算盘终究未能拨出如意来，时隔一个多月后的7月28日、29日，他们二人先后被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警方抓获。以害人始以害己终的作恶的定律又一次在他们身上应验。

此案例中，利害关系贯穿始终。

首先是诡谋主体歹徒与诡谋对象富婆之间，其利害关系非常明显：歹徒为了得到富婆的利益，设下圈套损害富婆的财产直至生命。在这对利害关系中，利始终在歹徒一方，害始终在富婆一方，整个诡谋的实施从始到终，没有一点点的改变。

其次是诡谋于主体的利害关系。下套富婆的诡谋是两个歹徒设计的，利于歹徒这是肯定的，由于该诡谋设计得还比较周密，害于歹徒的情况则没有发生。不过，从技巧性上讲，该诡谋还不是绝妙

的诡谋，如果是绝妙的诡谋，该诡谋应该是诡谋主体实现诡谋目的——取得富婆的钱财时，既不以剥夺富婆生命为手段，又能“合法”占有富婆的钱财并可规避法律的制裁。所以，该诡谋尽管实施成功，但没能让设计者规避法律制裁，除不能给予“绝妙”的评价之外，还可以认为由于它存在天然的缺陷（俩歹徒受智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设计出这种不能称之为绝妙的诡谋来），所以于主体存在着不由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害



再次是诡谋于对象富婆的利害关系。凡诡谋对于诡谋对象来讲，都是害，无利可言，这是从诡谋的本质性上讲的，但若从技巧性上看，诡谋设计之优劣于诡谋对象是可言利害的，并且其利害大小与诡谋优劣成反比：诡谋越优对诡谋对象利越小害越大，诡谋越劣对诡谋对象利越大害越小。这里所说的利，指的是对诡谋对象识破诡谋、反击诡谋者有用的破绽、时机、环境等；这里所说的害，指的是对诡谋对象的蒙蔽、诈骗、陷害以及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的损伤。本案中的富婆进入俩歹徒设计的诡谋笼子之后，似乎完全处于受害之中，根本没有于她有利的条件。但就作者看来，有利条件还是有一点的。

比如，于端木是邀请而不是逼迫张某到偏远的乡村去见所谓的“韩总”的，去与不去由张某决定。这对张某来讲是个有利条件，张某决定去之后，应该考虑到一个身带巨额银行卡的弱女子跟随一个大男人到偏远的地方去是有危险的，因而有必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如邀约好友一同前往，或者只能一人独往时，则告知亲朋好友自己跟谁要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若在什么时间没有联系就采取什么样的营救措施。可是这些都被张某忽略了，当害加于己身时，张某毫无摆脱困境的办法，只能任人宰割。即使事前没有这样做，事中也可以撒谎说本人事前已将自己要去哪儿、跟谁一起的行踪告诉了家人，迫使于端木考虑是否继续作案，因为张某家人知道张某是与他一起出来的，张某若出事，他想摆脱干系的侥幸心理也无法存在了。当然，撒这个谎不一定改变于端木继续作案的主意，但也不排除他放弃继续作案或不将其勒死的可能。为挽救自己，各种方

诡 谋 论

法都可以一试。

再比如，俩歹徒逼迫张某说出银行卡密码。这对张某来讲是个利好，即有了保全性命的机会。因为歹徒的真正目的是要她的钱而不是她的命，只要她不说出真实的银行卡密码，歹徒就取不到钱，歹徒取不到钱就不会马上要她的命。她不说出真实的银行卡密码，歹徒会从肉体上折磨她，但她完全可以以记不太清楚为名求得歹徒的“理解”，为让其相信，还可以告知歹徒密码写在家里的某个地方，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让歹徒去查找密码时给自己提供摆脱困境的机会。

（二）从效益上看，追求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

追求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是谋略的基本特征，诡谋在这方面的表现与其相同。

一方面，从技术层面上讲，两者本质相同。诡谋是不道德的谋略，谋略的本质就是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诡谋的本质，可从两个方面看，若从社会层面看，它不能与谋略的社会本质等量齐观，因为谋略的社会本质是运用智慧实现道德的目的，而诡谋的社会本质却是如前所述的欺骗与虚假，具有明显的不道德性。若从技术层面看，诡谋的本质与谋略的本质完全相同，即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所谓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是指诡谋主体运用诡谋将所要追求的利益或好处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的同时，所付出的代价或成本最好是小得不可再小。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① 谋略者与诡谋者都不能例外，只不过他们在争取利益的时候，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不是用力而是用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用的是正智，后者用的是诡智。通过诡智思索诡谋，通过诡谋实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愿望，凡诡谋者皆如此，不然，谁愿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设计诡谋呢？所以，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成为诡谋的根本属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另一方面，谋略与诡谋都以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为基本原则。诡谋以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为基本原则是从谋略以其为基本原则那里承袭过来的。“原则不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起点，而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进行抽象的结果。”^① 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成为诡谋的基本原则，尽管有对谋略的承袭性，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们对诡谋及其规律认识之后抽象的结果。虽然这一“结果”并非被每个诡谋者所认知，但他们在筹划诡谋时却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作为了出发点，在实施诡谋中又自觉不自觉地依据这一“结果”对所施之诡谋进行检验和调整。人们在从成本学的角度评价诡谋时，也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一“结果”作为标准，认为：利益最大代价最小者是上等诡谋，利益高于代价者是中等诡谋，利益代价各半者是下等诡谋，利益小于代价者则为不成功诡谋。

诡谋以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为其本质、为其基本原则，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无疑成为诡谋者运用诡谋时所追求的最佳效果。追求的过程是特征形成的过程，追求得越激烈，特征反映得越明显。一个诡谋不可能没有这样的追求，也不可能没有这样的特征。当这样的特征反映得尤为突出的时候，其诡谋必定是一个特别狡猾、特别阴险、特别难以识破的诡谋。我们以林冲“误入白虎堂”为例，看看陆谦所设诡谋是如何让追求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的。

《水浒传》第七回所写的“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事情起因由高俅干儿高衙内引发，他在岳庙里看中林冲妻子，两次勾引都未能得手，遂得了相思病，并且病得不轻。高俅急于挽救干儿性命，采纳了曾是林冲好友的陆虞侯陆谦之计，“害了林冲性命，勾得他老婆和衙内在一处”。

诡谋的第一步是卖刀，诱引林冲买刀；诡谋的第二步是比刀，诱使林冲入白虎堂；诡谋的第三步是借故治罪，“合理合法”地将

① 《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89 页

谋 诡 论

林冲擒拿——此诡谋绝对是一个对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追求得以实现的典型。

第一步是卖刀。刀绝对是上等的好刀，不然，作为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林冲是绝然看不上的，更不会去买，不买，后面的情节就无法进行了，诡谋者的目的也不能达到。刀是好刀，卖刀者索价三千贯，而林冲却只用一千贯买回。这一步乍看起来，林冲捡了个便宜，高俅们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而实际上是林冲吞食了一只诱饵，到时，不但诱饵要吐出，而且自身也成为高俅的钩上鱼。

第二步是比刀。买了好刀爱不释手，“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喝彩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凡英雄都有逞强性格。买下一把好刀就要与有好刀的高俅比试，林冲的这种逞强性格注定了他必然落入陷阱而且只会越陷越深的命运。陆谦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设计该诡谋时予以了充分的利用。这不，第二天两个承局奉“太尉钧旨”叫他到太尉府里比刀，他不作任何思索地马上前往，结果忘乎所以地走入了太尉府中的禁地“白虎节堂”，待醒悟过来时已经晚了。在这一步中，高俅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把林冲哄骗到了预设的地点，为下一步行动打下了基础。

第三步是借故治罪。作为教头，林冲明白“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他正要回身退出时，高俅出现了：“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下官？有人对我说，你两三日，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解释，高俅哪里会听，呼唤左右将林冲拿下，送往开封府“依法”治罪。按当时法律，“手执利刃，故入节堂，这是该死的罪犯”。林冲明知是高俅陷害，但有口难辩。好在开封府里有个叫孙定的当案孔目，为人耿直，说通府尹把“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改为“腰悬利刃，误入节堂”，才免去死罪，定了个“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这一步，高俅们也没付出什么代价，

唯一的代价是叫下人捆绑林冲押解到开封府，审讯、定罪量刑由开封府办理，高俅落得个清闲不说，还可堵住好事者的嘴——说他不公事公办。

整个诡谋，高俅们所付出的代价小之又小，唯一大一点的就是把“胡乱不肯教人看”的好刀作为证据交给了开封府（之后高俅完全可以以其权势借什么“合理”名义将刀索回），而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却是陷害阴谋得逞，将一个好端端的八十万禁军教头陷害成囚徒，双方所付出的代价真可谓天壤之别。说此诡谋特别狡猾、特别阴险、特别难以识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难怪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卖刀人的款下批道：“陆谦畜生，以情理论之，一刀岂足惜哉！若以才情论之，真堪引而与之痛饮。”能够让一个大文学家发出值得与之把盏痛饮的感叹，非陆谦所设圈套之精妙令其拍案叫绝，料想他是不会情动于衷的。

（三）从方法上看，选择手段可以无所顾忌

对君权研究得透之又透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在他的《罗马史论》一书中写道：“不要暴露自己的本心，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不择手段。”此话仿佛专门针对诡谋所说的。诡谋正是这样，诡谋者设计诡谋，其本心绝对不愿暴露，而且隐藏得愈深对己愈有利；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去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哪怕这种手段再卑鄙、再齷齪、再毒辣，完全不必顾忌。

诡谋的这一动态特征是谋略所不具备的。谋略受正义、道德、法律等限制，在使用手段上有所选择，与正义、道德、法律等相违背的，即使其招数很管用，也可能弃之不用。诡谋则不同，什么手段管用就用什么手段，全然不考虑是否正义、道德、合法，即只要想到、只要管用，任何手段都可不受任何约束地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诡谋运用起手段来比谋略自由得多，选择的余地也大得多。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二章“诡谋思维”中已经论述过。

而在不受任何约束地使用诡谋手段中，有一种特别受诡谋者青睐的一般的、常用不衰的手段——诱惑。诱惑是专门对付人的带有

诡 谋 论

一定根本性的诡谋手段。诱惑是诱与感的统一，诱即引诱，感即迷惑。引诱的关键是吸引、招引，迷惑的关键是辨不清、摸不着。

吸引是诡谋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将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他们或是以除恶扬善、一身正气的形象出现，从而使对方上当并产生敬爱感；或是以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形象出现，从而使对方上当并产生敬佩感；或是以智慧超群、无所不能的形象出现，从而使对方上当并产生信赖感；或是以善解人意、谦和恭顺的形象出现，从而使对方上当并产生亲切感；或是以风流倜傥、美丽贤淑的形象出现，从而使对方上当并一见钟情。

招引是诡谋者挂出经过特制的利益或好处引诱人求索、争取，好似捕捉老鼠时在暗藏机关的笼子里放上香饵。如果说吸引是在形象上做引诱文章，调动的是对方的情感；那么，招引是在利益或好处上做引诱文章，调动的是对方的欲望。比如：他造出馅饼已掉到地上的情势，你见了，会不会产生不捡白不捡的占有欲？他设下乍看必输无疑的赌局，你见了，会不会产生此时不博更待何时的好胜欲？他以十倍、百倍于银行的利息“抬会”，你见了，会不会产生赶快抓住机会多捞一把的贪欲？他托着一顶乌纱帽皮笑肉不笑地对你说“你戴最合适”，你听了，会不会产生只要戴上就可以做人上人的官欲？她暗藏心机眉来眼去、勾魂摄魄地瞧着你，你见了，会不会产生恨不得马上将其抱过来颠鸾倒凤一番的性欲？对此，不产生欲望另当别论，只要产生了欲望，你成为诡谋者的俘虏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辨不清、摸不着是迷惑的关键。辨不清、摸不着不是诡谋者辨不清、摸不着，而是诡谋对象辨不清、摸不着，是诡谋者使招用术让对象辨不清、摸不着。这里的辨不清是对是非、曲直、爱恨、真假、善恶、美丑的辨不清；这里的摸不着是对某种问题、某个现象、某些事情的头绪摸不着。迷惑就是要让对象把是当做非、非当做是，或者是非不分；把曲当做直、直当做曲，或者曲直不识；把爱变做恨、恨变做爱，或者爱恨不明；把真当做假、假当做真，或者真假不辨；把善当做恶、恶当做善，或者善恶不清；把美当做

丑、丑当做美，或者美丑不知。总而言之，一句话：让其对事物的认识要么颠倒、要么混淆，在颠倒、混淆中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定。如果说辨不清是认识上的哈哈镜，那么，摸不着则是认知上的弱智儿。迷惑就是让对象应该发现的问题却发现不了，应该看到的现象却看不到，应该理清的头绪却理不清；或者使其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复杂的问题弄得更复杂；把不神秘的现象搞得神秘，神秘的现象搞得更神秘；把清晰的事情弄得不清晰，不清晰的事情弄得更不清晰。越复杂、越神秘、越不清晰、越是摸不着头脑，就越容易丧失自我、以他人意志为意志，作出有利于对方的决定。很多人吃亏上当，都是由于被诡谋者的手段伎俩弄得摸不着头脑，自以为清醒，实则让局外人看来是相当的迷糊。



引诱与迷惑是诡谋者得以飞翔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引诱利用的是诡谋对象的情感和欲望，迷惑利用的是诡谋对象的认知与意志；引诱是让诡谋对象清醒地直接进入圈套，迷惑是让诡谋对象迷惑之后间接地进入圈套；引诱重在包装“实体”（诡谋者本身和诱饵），从而实现诱惑，迷惑重在畅通“过程”（让诡谋对象改变认识和意志），从而实现诱惑。诱惑的方式无穷无尽，供诡谋者选择的手段随之也会无穷无尽。手段是实现目的的唯一途径，手段越多，目的实现的可能性越大；手段越不受限制，目的越容易实现。世上没有无目的的诡谋，诡谋目的的达到只能通过手段，而世上有无穷无尽的手段可被诡谋者选择且不受限制。所以，社会生活中，往往发生通过正常手段办不了的事情，只要诡谋手段出场，问题马上迎刃而解。这也是诡谋被一些人奉若至宝的原因之所在。

战国时的齐相邹忌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大臣，他讽谏齐王进贤纳谏，整顿军容政纪，厉行法治，得到人民的拥护。但在对待政敌上，却不那么光明正大，一而再地不择手段玩弄阴谋诡计，欲除之而后快。他的政敌是时任将军的田忌。《战国策》记载，邹忌与田忌不和，为此邹忌寝食难安，不知如何处置。门客公孙闰献计说：“您不如向大王建议攻打魏国，让田忌将军率兵出战，如果胜了，是您建议得好，可以立功受奖；如果败了，即使他田忌不战死沙

谋 诡 论

场，也难逃战败之罪而被处死。”此计非常高明，只要齐王同意由田忌率军征战魏国，无论胜败，邹忌都是赢家。当然他希望田忌战败，这样可以除却心头之患。此计虽毒，但还不卑鄙。邹忌的建议很快得到齐王的认可。只是有一点他没料到，田忌有大军事家孙臆的辅佐，三战皆胜，名声迅速鹊起，声望超过了他。他更恨田忌了，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不仅毒辣而且卑鄙的诡谋出笼了，献此诡谋的仍然是门客公孙闾。此诡谋是：他派人冒犯田忌将军部下的人，在集市上找一位算命先生算卦说：“我家主人攻魏，三战皆捷，声威震天下，但还想干一件大事。你给算算是吉是凶。”算命先生一听，浑身一激灵，心想：田忌已是名扬天下的大将军，再干大事就是起兵谋反了，这卦看来是不能给算的了。正在这时，受公孙闾指使的人将求卦之人抓了起来，并带上算命先生一起来到齐王面前，让他们证明田忌要谋反。

田忌闻知此事后，知道有人在陷害自己。他想到齐王面前辩解，但过细一想作用也不大。为保全性命，田忌便一走了之，逃到了楚国。

诬陷总有澄清之日。田忌逃到楚国之后，邹忌时时担心田忌借助楚国势力返回齐国，到那时，假如诬陷澄清，自己的日子恐怕就难过了一害人害到底，让楚国除掉田忌，但楚国不会这么办。邹忌正愁没有办法时，说客杜赫给他出了个点子，让田忌留在了楚国。此点子看起来很温和，不毒辣、不卑鄙，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诡谋，只是使用的手段不同罢了。根据自己的计谋，杜赫代邹忌对楚王说：“邹忌之所以与楚国不友好，是因为他担心田忌借楚国之力返回齐国，大王如封田忌以江南之地，以表明田忌不会返回齐国，邹忌将用齐国来向楚王示好。田忌是个逃亡在外的人，得到封地，一定会感激大王。”楚王觉得这办法好，双方都不得罪，双方都可以接受，于是在江南选了一片领地封给了田忌。

邹忌三次用计对付政敌田忌，为达目的使用了不同的手段，既迷惑了齐王、楚王，又迷惑了田忌。他们在迷惑中成全了邹忌，尽

管第一次邹忌适得其反，但第二次、第三次改变手段后他如愿以偿。假如邹忌不用诡谋，担心别人从道德上谴责他，说他对付政敌不择手段，那么，离开齐国的恐怕不一定是田忌而是他邹忌。一个被后人评价并不坏的宰相尚且如此，那些奸佞小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为达目的还会害怕别人指斥他们使用卑鄙、齷齪、毒辣的手段吗？

二、静态特征

绝对的静止是没有的，静态是动态中的静态。诡谋的静态特征，是对进行中的诡谋作静止的考察，或者是对完工了的诡谋作直观性观察，从而发现其所独自具有的征象。相对动态特征，静态特征反映的是诡谋的表象，体现的是诡谋的形式。

（一）变化无方的奇巧性

什么手段管用就用什么手段，完全不考虑是否正义、道德、合法。这种彻底的自由选择，使诡谋呈现出变化无方、千奇百怪的形态，仿佛万花筒里的世界，要什么有什么，不可捉摸、不会穷尽。

奇巧是谋略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典型特征，诡谋的奇巧比谋略的奇巧更胜一筹。奇巧是奇法与巧干的有机结合。当解决问题按常规思维方式无法解决或者解决得异常艰难时，用创造性思维方式想出的办法则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而且解决起来相当容易，这种办法就是奇法；当实实在在地干事费时费力且难显成效时，而换一种干法却省时省力且成效明显，这种干法就是巧干。此等奇法和巧干是谋略的奇巧，诡谋的奇巧在于：为实现目的，用谋略的奇巧无法实现或者实现起来异常艰难，而用诡谋的别致手段去实现时，不仅非常容易而且效果特佳。说诡谋的奇巧比谋略的奇巧更胜一筹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具体说来，诡谋的奇巧表现在三个方面：运思巧妙、样态新奇和色彩怪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诡谋是不是科学的科学、不是艺术的艺术

诡 谋 论

科学需要思辨，艺术需要构思。诡谋的思辨与构思实际上是诡谋的策划，即诡谋者运思诡谋时，对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针对什么样的人、事、物，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利用什么样的条件环境，通过什么样的程序等要作全盘的考虑。考虑出来的东西常常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让对象在密切配合中完成。当对象配合完成之后恍然大悟之时为时已晚。我们说诡谋运思巧妙，妙就妙在这种不显山不露水之中。

由于运思巧妙，诡谋呈现的样态就像商店里的工艺品一样，千姿百态，既新颖又奇特。定眼看去，大多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或者虽见不常见、虽闻不常闻。它是特殊方法的聚合、别样手段的浇铸。巧夺天工之中，假如你不幸被诡谋者看中，你会因其新奇而被吸引，任由诡谋者摆布；假如你有幸不被诡谋者看中，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你也会像金圣叹一样，对制造这样诡谋的诡谋者发出“若以才情论之，真堪引而与之痛饮”的慨叹，当然，这里的“之”，不光指“陆谦斋生”，而是指所有创造经典诡谋的诡谋者。不信，你细品前面介绍的大多数诡谋，哪一个不是因新奇而让你倾心注目？

运思巧妙、样态新奇，再配之以怪异的色彩，诡谋变化无方的奇巧性特点就更加鲜明了。这里所说的色彩，不是自然的色彩，而是社会的色彩，具体说来是思想意识的色彩、道德情感的色彩。思想意识的反动、不健康，道德情感的卑下、狠毒，是诡谋主体筹划诡谋时的前提条件。当这种前提条件通过诡谋表现出来的时候，绝对不是一种让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的色彩。此种色彩，有时艳丽，让你看得眼花缭乱；有时淡雅，让你看得爽心悦目；有时漆黑，让你看得一切皆无；有时粉红，让你看得想入非非；有时刀光闪闪，让你看得风声鹤唳；有时鬼火点点，让你看得心惊胆战。色彩的多种多样就已经奇巧了，而更奇巧的是，你所看到的色彩以为是真的，但它却是假的，而你怀疑它是假的时候，它偏偏是真的。真假难以判断，也就对某个行为难以辨别它是否为谋，若是又难辨其到底是正谋还是邪谋。等弄清之时，早已受其所害。

第四章 诡谋的特征

让我们从一则外国故事入手，看看诡谋变化无方的奇巧性：

1964年2月23日下午的巴黎，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家珠宝店，来了一位贵客，这位贵客是乘坐象征高贵身份的劳斯莱斯轿车来的。贵客40岁左右，古铜色的皮肤，左手拎着公文包，右手臂打着石膏吊在胸前。

贵客进店后，粗略地扫描了一遍橱窗里的各种珍珠宝石，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一颗镶有红宝石和金叶子的玛格丽特珍珠上。店主心领神会地从橱窗里拿出这颗珍珠让贵客仔细观看。贵客将珍珠拿在手中，一边观看一边赞叹：“好珠好珠，买回家我夫人一定会喜欢。只是价格……”店主接过话头：“25万新法郎。”贵客嫌贵，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20万成交。

贵客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大沓现金数了数，很为难地对店主说：“我只带了10万现金，还差10万。”一笔赚钱的大买卖眼看就要泡汤，店主刚才还是春风荡漾的脸上此刻挂上了沮丧。不过这种沮丧很快消失，消失在贵客的一个好主意中。

贵客让店主拿过纸笔，他要给妻子写张字条，让其从家里的保险柜里拿10万现金过来。

纸笔放在了柜台上，右手臂绑着石膏的贵客只能用左手写字。他吃力地写了半天，也没写好，而且所写之字让在场的人都不认识。“看来我是买不成这颗珍珠了。”贵客泄气地把笔放在了纸上。“这不会成为问题。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代劳。”店主主动地替贵客排忧解难。贵客不好意思地口述起来，店主手中的笔随之在纸上飞舞。不一会儿，纸条上有了这样一段文字：“亲爱的，你能不能把10万法郎装在一个信封里让司机给我送来？先别问干什么用，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时刻爱着你的夫：乔治。”

字条交给贵客的司机之后，店主套近乎地问贵客：“先生，我刚才没有写错什么吧？真有意思，你我二人的名字居然相同！”贵客听了之后，很是惊讶地谈起自己取此名字的来历。反正是等司机拿钱来，他们天南海北地一阵神侃。

诡 论

半个小时之后，司机将10万元钱取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店主将20万元放进保险柜，然后出门送贵客坐上劳斯莱斯。

晚上商店打烊回家，珠宝商兴奋地告诉妻子：“我今天做了笔大买卖，那颗玛格丽特珍珠终于卖掉了。”妻子见丈夫如此高兴，便问：“你不是给我一个惊喜吗？什么惊喜，让我看看。要知道我们家保险箱里就那么10万法郎，给你就没了，我没想到你还雇了个司机……”珠宝商霎时间像掉进冰窖里，冷得发起抖来。“骗子，可恶的骗子……”珠宝商瘫坐在沙发上，嘴里不停地骂着那个“大买主”。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量身定做的诡谋。骗子是在对珠宝商的商店和家庭作过认真调查之后，有针对性地布局，不然，他不会在纸条上用“乔治”这个名字，不会那么准确地找到珠宝商的家，不可能知道他在行骗这个时间段里珠宝商的老婆在家，更不可能知道珠宝商家里至少有10万法郎的现金。

说这个诡谋奇巧，从构思上看，奇巧在于它一环扣一环，顺理成章，无一破绽。乘坐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到珠宝店，将绑着石膏的右手吊在胸前，买珠宝只差一半的钱、口述纸条上的内容等，都是经过周密策划、精心构思的结果。不坐高级轿车显示不出大买主的气派，无法让珠宝商产生逢迎、恭顺、依从之心理；不把右手绑上石膏吊在胸前，就难以在后来顺理成章地用左手拿笔写字，也就无法让珠宝商在他用左手写不成字的时候代写，没有代写就不可能有珠宝商之妻见夫字而给款；不在买珠宝时交付一半的钱也不行，因为差太多势必引起珠宝商的怀疑，而差太少则骗不到珠宝商多少钱，划不来，差一半“恰到好处”；不精心设计口述的内容，要么从珠宝商妻子那里拿不到钱，要么被其盘问10万法郎的用处而露馅。正是这种合情合理而不露破绽的构思，才保证了诡谋一举成功。

从样态上看，该诡谋的奇巧在于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作者研究诡谋二十多年，收集的诡谋事例很多，但上述诡谋仅此一例。也许是作者孤陋寡闻，在此诡谋发生之前之后都有类似的案

例，只是作者没有看到而已。也许是施此诡谋的骗子是个诡谋天才，他创造了前人没有创造、后人仿效也难的奇特诡谋，故仅此一例。一般来讲，凡首创的诡谋都是新奇的，后来屡试不爽的诡谋是奇特的。比如“丢包”诡谋，明代一个叫张应俞的人编写了一本叫《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其中就记载了这种诡谋，一千多年过去了，这种诡谋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愈演愈烈，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都能比较容易地觅到它的踪迹。显然，此种诡谋创造出来时肯定是新奇的，而历经千年用而不衰，其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从色彩上看，该诡谋的奇巧在于祸心由淡雅清新包藏，看上去虽然爽心悦目，但却是陷阱上面铺盖的兰草。从买珠人进入视线到买珠人消失在视线之外，珠宝商都处于兴奋状态，并且余兴一直延续到回家见到妻子之时；他的情绪一直被买珠人的所作所为牵引；交易过程中，只出现一点小波折，即买珠人差一半钱不打算买玛格丽特之珠时，其神情立即显示出沮丧；当买珠人有了解决办法时，其精神马上振奋起来，于是有了代劳写便条、凑近套近乎的主动。正是这种主动，使珠宝商在掉进陷阱时，没有丁点的不安、丝毫的痛苦，只有心灵的放松、成功的喜悦。这就是诡谋之奇巧、之精妙。

与前面所举的“工程”诡谋相比，两者虽然都是为了钱，但此“珠宝”诡谋的设计要奇巧得多，并且非常“文明”，没有一点血腥，称其绝妙应不为过。

（二）藏而不露的隐秘性

诡谋是见不得人的，见得人的谋绝不是诡谋。没有人会傻到如此程度，把自己筹划的阴谋诡计告诉给对方，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不良用心。如果有人这样做了，并且做时表现出一副忏悔的神情，那么，此人要么是真正的良心发现——真诚悔过，要么是隐藏着更大的阴谋而为了麻痹对方。

诡谋之所以要藏而不露，并且是越隐秘越好，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斗智不斗力。斗力可以公开，不需隐瞒，谁力大谁胜。斗智则不

诡 谋 论

能公开，公开了，对方就会针锋相对，取胜就没有指望了。诡谋之所以要藏而不露，其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反道德性。谁施诡谋谁不道德，如果将其公开，就等于向道德宣战，就会马上遭到世人的唾弃，在一片谴责声讨声中，公开了的诡谋还能成功吗？显然不能！因此，保密对诡谋来讲万分重要，如果泄密就意味着失败。所以韩非子说：“事以密成，语以泄败。”^① 所以苏辙也说：“谋未发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② 尽管他们不是专门针对诡谋说的，但诡谋更是如此，因为所有诡谋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隐秘性是诡谋的一大特点，但这一特点并不表示诡谋从立谋、虑谋到施谋整个过程旁人都不知道。因此，我们所说的隐秘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完全隐秘，即目的与手段全部不让人知道；二是非完全隐秘，即目的不让人知道，但手段让人知道。前者除了诡谋者自身以外，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他在使用诡谋，包括行动，最典型的方面是谋物中的盗窃。比如盗窃金库，诡谋者盗窃金库的意向、谋划盗窃金库的方案、实施盗窃金库方案的行动，都是不愿让人知道的，旁人知道哪一点，都有可能造成诡谋的失败。后者就不同了，除了诡谋的动机目的不让人知道外，实施诡谋的行动不仅要让人知道，而且还需对象的积极配合。比如“抬会”诈骗，诡谋者的真实目的是通过“抬会”手段，为自己聚敛更多的钱财。此种目的是要绝对保密的，如果泄露出去，让人知道了，谁也不会把自己腰包里的钱掏出来给他，即使其许诺利息是百分之一百或百分之一千，假如有人偏要拿钱给他，那么这个人就要送到精神病院了。“抬会”的目的要隐秘，“抬会”的行动则不能隐秘，知道此事的人是越多越好，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只有让更多的人参与，才能将“抬会”维持下去。所以，一个“抬会”诈骗出现，受骗的绝不是一人两人、十人八人，而是成千上万；其范围，往往以一个地方为中心，向周边辐射，有的是整个地区，有

① 《韩非子·说难》。

② 苏辙：《陈蕃》。

第四章 诡谋的特征

的是全省，还有的波及全国；其金额，动辄百万千万元，超过亿元也不是什么稀奇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乐清县的“抬会”诈骗，的确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其参与人员20多万；其范围是整个温州地区，影响遍及全国；其被骗款的发生总额超过10亿元。尽管如此，此等诡谋藏而不露的隐秘性特点仍然存在，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可告知他人的诡谋目的起决定作用的结果。

在诡谋中，手段完全公开的很少，完全隐秘的也不多，绝大多数是既有公开的也有隐秘的，只是两者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谁多谁少没有人为规定，完全根据诡谋之需自然选择。楚成王用诡谋当上诸侯盟主就是这样，所使用的手段，公开的有，隐秘的也有。

春秋初期，宋国的宋襄公想当诸侯的盟主，他怕诸侯们不服，遂邀请齐国的齐孝公、楚国的楚成王在齐国的鹿上召开一次预备会，其目的就是以二国的名义向各国发出邀请书，约请各国首脑到宋国孟地举行盟会，让大家推举自己当盟主。宋襄公之所以邀请齐孝公，原因在于，齐孝公昭当太子的时候，由于兄弟之间争夺君位，逃难到宋国，得到宋襄公的礼遇，并由宋襄公出兵将其送回国内做了君主。宋襄公自认为有恩于齐孝公，齐孝公一定会感恩投报，支持他当盟主。宋襄公之所以邀请楚成王，是因为楚国强大，他要利用楚国的强大迫使诸侯们推举自己做盟主。为此，他用珍玩珠宝和美女贿赂楚成王，使其欣然与会。

会议的重要内容是在准备发往各国的邀请书上签名，宋襄公以准盟主的身份首先签了名，轮到齐孝公签名时，他却这原因那原因地没有签署。楚成王则不同，不但没讲什么条件，反而高兴地将自己的名字一挥而就。

楚成王这样做并非是抬宋襄公的庄，而是利用宋襄公组织盟会的机会，自己当上盟主。为此，他回国后马上与大臣们策划怎样当上盟主的方案。经过一番讨论，一个既简便易行又扬威施仁的诡谋出台：在盟会上逮捕宋襄公，迫使诸侯推举自己当盟主，然后释放宋襄公，显示楚君的宽容仁慈。

有楚成王的签名支持，宋襄公乐颠颠地筹备在孟地举行的盟

谋 论 诡

会。一切准备就绪，宋襄公准备从国都出发前往孟地主持盟会时，其弟公子目夷对他说：楚国是一个不讲信义的国家，楚成王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兄长前去最好带上军队，或者事先在盟坛周围三里外的地方设下埋伏，以防万一。但宋襄公自以为自己以诚信待人，别人不会欺骗自己，没有采纳其弟的建议，只带随从前往。

宋襄公到孟地不久，各国诸侯陆续到来，楚成王也到了，他也只带随从，没带兵车、军队，宋襄公既高兴又放心。

当结盟大会进行到推举盟主的议程时，满以为楚成王会带头投自己一票的宋襄公不时用眼看楚成王，而楚成王就是低头不语。楚成王不发言，平时就惧怕楚国的陈、蔡等小国诸侯谁也不敢先开口。宋襄公忍耐不住，霍地站起来为自己评功摆好，希望大家拥戴他做盟主。楚成王不再沉默，大声对诸侯们说：“有资格做盟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宋襄公。不信，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正在这时，侍立在楚成王身旁的楚臣脱下礼服，露出铠甲兵刃。刹那间，台下一千人也跟着脱去礼服，露出铠甲兵刃，随之冲到台上，劫持了宋襄公。其他诸侯见势不妙，马上齐声拥戴楚成王当盟主。楚成王目的达到，经鲁僖公说情，释放了宋襄公。

宋襄公被楚成王玩弄于股掌之间，楚成王除了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外，靠的是诡谋。其诡谋能够成功，自然得益于目的的隐秘而没有暴露，更为重要的是其手段的或明或暗，让宋襄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圈套。迎合宋襄公在邀请书上签名是楚成王诡谋中的明手段，这一明手段把宋襄公导入了圈套之中。假如他不用此手段，跟齐孝公一样不在邀请书上签名，那么，宋襄公会觉得得不到楚成王的支持，从而放弃组织主持盟会的想法，楚成王想当盟主的目的也难快速达到。再假如楚成王不采取这样的明手段，而是采取明里支持暗中拆台等暗手段，那么，就难以利用宋国的力量将诸侯招集来，而他楚成王若要召集这样的盟会，得付出比这大得多的代价，才能实现当盟主的梦想。

在孟地参加盟会时，楚成王是明暗手段兼用。明，他没公开带兵车、军队，只带随从。这一招对稳住宋襄公、让会议顺利召开很

有必要，如果他直接公开带兵车、军队，宋襄公发现后很可能马上离开孟地，其他诸侯必将作鸟兽散，即使都不走，会议也难开下去，会议开不下去，推举他做盟主也就不现实了。暗，他带去的随从都是全副武装的武士，只是外面罩上会议礼服没让其他人事先发现而已。这一招既阴险又管用，没有这一招，就不可能在他与宋襄公争执不下的时候，以武力将宋襄公制伏，也不可能对其他诸侯形成威慑力，迫使诸侯们齐声拥戴。

只可惜宋襄公挖灶烧饭，做熟后，却被楚成王抢去吃了，自己白忙乎一场。虽然楚成王将诡谋目的隐藏得很深，明暗手段兼用，如愿坐上了盟主之位，但其低下的人格，既不为当世信服，又难让后世称颂。

（三）纵横交织的层次性

层次体现事物结构内部的不同等级，诡谋也不例外，在其内部结构上，同样存在不同的等级。若从水平方向上看其不同等级，所看到的是诡谋的横向层次；若从垂直方向上看其不同等级，所看到的是诡谋的纵向层次。

将诡谋的横向层次作结构性划分，可以分为里层、中层和表层。里层是事物的本质之所在，“它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决定中层、表层的功能性质和发展方向，要求中层、表层从属于、服务于它。”^① 中层是实现事物本质属性的方法措施，“相对于里层的本质，它具有现象性；相对于表层的现象，它又具有本质性，它是本质与现象的具体的统一。”^② 表层是事物外在表现形式，“它既不像里层那样内隐于横向层次系统的深处，也不像中层那样处于该系统中的缓冲区，它抛头露面在外。”^③ 就诡谋来说，其里层是欺骗与虚假，欺骗与虚假是诡谋的本质。在里层层面上往往存在着核心，诡谋里层的核心就是私利。私利是欺骗、虚假的源头动力，欺骗与

1 谢平仄等著：《社会结构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 谢平仄等著：《社会结构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3 谢平仄等著：《社会结构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谋 诡 论



虚假来自于自利、归因于私利，以私利为轴心而存在、而运动。诡谋的中层是为保证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而使用的奇巧技法。用欺骗与虚假包裹的私利要实现，只能用奇巧技法，只有奇巧技法能满足欺骗与虚假的要求，真心实意、真做实干永远被排斥在欺骗、虚假之外。诡谋的表层是实现欺骗、虚假所带来的结果，即诡谋给诡谋者带来的利益或好处和给诡谋对象带来的损害或坏处。利益和损害往往是物质的，看得见摸得着；好处和坏处往往是精神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体会到。

诡谋主体与诡谋对象对诡谋横向层次把握的次序是完全相反的，诡谋主体是先里层、后中层、再表层，诡谋对象是先表层、后中层、再里层。这种相反的次序，给诡谋对象识别诡谋带来很大难度。要通过表层看中层，再通过中层看里层，没有相当的洞察力，是很难见现象就知本质的。诡谋为什么一而再地得逞，从层次上找原因，原因就在这里。

再看诡谋的纵向层次。如果从规模上入手，我们可以把诡谋分为大诡谋、中诡谋和小诡谋。大诡谋是关乎全局性质、方向、前途、命运的诡谋，如阴谋窃国篡权、破坏经济秩序、改变信念信仰等方面的诡谋。此等诡谋非一般人能为、非一个人能为、非临时动议能为、非间接能为。中诡谋是影响一个人或部分人生长和发展的诡谋，如用诡谋雇凶杀人、大量走私贩私、骗取银行亿万贷款，等等。此等诡谋既有经年累月而成的，也有一时半会而就的；它对对方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但没有大诡谋的特别严重；其结果不仅违背道德，而且大都触犯法律。小诡谋是针对个别小事情而使用的诡谋，如为得到一顿饭、一幅画、一定数量的金钱、一个少女的贞操而采用诡谋手段。具体性、直接性、现实性、及时性、单一性、灵活性和隐蔽性是此等诡谋的一般特征。它给施谋对象的损害虽然不是致命的、伤筋动骨的，但是足以让其心烦意乱、恼火万分。

大诡谋、中诡谋、小诡谋，就数量多少论，呈金字塔形，上层是大诡谋，数量不多；中层是中诡谋，数量要比大诡谋多；下层是小诡谋，数量最多。就相互关系论，三者自成体系、各自为用，可

以互不打扰，但在某些情况下，大诡谋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中诡谋和小诡谋，而中诡谋则不能包含大诡谋，小诡谋不能包含中诡谋，更不能包含大诡谋。大小虽然不能逆向包含，但可以逆向演变，只要主客观条件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小诡谋可以演变成中诡谋甚至大诡谋。同理，若主客观条件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大诡谋也可以演变成中诡谋甚至小诡谋。本来，诡谋的大、中、小只是人为的粗略划分，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有些诡谋说它是大可以，说它是中也可以；有些诡谋说它是中可以，说它是小也可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其演变的结果，而是其处在两者的临界点上。对于这样一些诡谋，实在要划分大、中、小时，可以参考其他因素，如重要性、危害程度等。

以单个诡谋为研究对象，我们发现了诡谋同其他事物一样有里层、中层、表层的特点；以整个诡谋为研究对象，我们有了诡谋存在着大、中、小等级的认识。把两者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有诡谋中，无论是大诡谋、中诡谋还是小诡谋，没有一个不显现出里层、中层和表层的层次性特点；而任何一个具有里层、中层、表层的诡谋一般只能在纵向层次里的某个层次安家落户，没有想在哪个层次居住就在哪个层次居住的自由，除非它在两个层次的接壤处，除非它已具备了迁徙的条件。

还是让我们通过明成祖的故事来解构分析一下诡谋的层次吧：

明成祖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在夺取皇位的过程中，大、中、小诡谋用得游刃有余，当朝的皇帝及大臣们都曾中其埋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朱棣本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觊觎侄儿朱允炆的帝位日盛，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所采取的大诡谋至少有两个：一是清君侧，二是再三推让登基。清君侧本不是朱棣的发明，但他拿来用之仍具有迷惑性。朱允炆当上皇帝后，采用齐泰、黄子澄等大臣之谋削藩，以巩固皇位。周、湘、代、齐、岷诸王被削之后，眼看就要轮到燕王朱棣了，朱棣便与僧道衍、张玉、朱能等密谋，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指斥齐泰、黄子澄等为奸臣，并且“传檄天下，自

谋 论 诡

比周公”，“名正言顺”地发动了“靖难”之战，从而攻克南京，朱允炆自焚身死。

皇帝死了，朱棣本可以马上登基即位，但他又要了一个诡谋，目的在于欺骗世人：他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登上皇位的，要怪就怪三番五次推举他当皇帝的文武百官



攻入皇宫后，朱棣对着朱允炆的尸体声泪俱下，嗔怪朱允炆不该自焚，他只是清除奸臣而对皇帝却是一片忠心的。这时，以兵部尚书茹瑺为首的大臣们跪在他面前叩拜，请他登基，而他假惺惺地说“自己浅陋，难负重任”，没有同意。第二天，一批大臣劝进，他仍然没有同意。第三天，以废为庶人的周王朱橚为首的朱家二十六名兄弟一起劝进，认为老大朱标、老二朱棣和老三朱橞都已死亡，最有资格当皇帝的是他老四朱棣，但还是被拒绝了。

自己不肯当皇帝，又不提出其他人选，朱棣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翰林院有个叫杨荣的编修揣摩到其中之意，遂联络所有文武官员和亲王们来到朱棣面前跪下，叩头恳请，若不同意，大家永跪不起。到了这个份儿上，再不同意就要弄巧成拙了，于是，“本无当皇帝之心”的朱棣才不得已地坐到了龙椅上。

清君侧，再三推让登基，都是表面上不要皇位而实际上直奔皇位的大诡谋。在实现皇帝梦的过程中，朱棣也使用了很多相应的中诡谋。如：装疯、借兵、反间。

装疯是朱棣起兵举事的缓兵之计。建文帝知道朱棣私练兵马、图谋不轨后，设计杀了朱棣的得力干将于谅、周鋒两人。朱棣眼看祸及本人，可起事的准备又未就绪，为了赢得时间，他开始装疯。每天，朱棣披头散发在大街上狂呼乱叫，抢夺小孩食物，或者昏沉沉地躺在街边的沟渠里数日不起，等醒来之时，就跑到墙角捡狗屎吃。建文帝不相信朱棣真的疯了，就派大臣张昂、谢贵二人借探望之名查看究竟。当时正值盛夏，人们热得恨不得去一层皮，而张、谢来到燕王府时，只见朱棣身穿皮袄坐在火炉边，浑身打着哆嗦，嘴里在不停地叫“好冷，好冷”。这一招瞒过了张、谢，连接到密报的建文帝也相信了。其实，朱棣所吃的狗屎是佣人用蜂蜜和米粉

精心调制后做上了暗记的，而他穿皮袄烤火时，里面穿着专做的皮囊衣，皮囊衣里放满了冰块。

装疯赢得了起事时间。起事之后，建文帝派五十万大军直奔北京平叛，朱棣自感兵力不足，便到大宁（内蒙古宁城县西）向十七弟宁王朱权“借”兵。朱权见四哥到来，倍感惊讶。朱棣一见宁王就放声大哭，诉说自己从北京而来，哀求宁王相救。朱权看到一副惨样的朱棣，动了恻隐之心，问四哥如何相救，朱棣请求朱权向皇上上表，代为求情，请皇上放他一码。朱权没有推辞，马上照办。朱棣感激万分。几天之后朱棣告辞准备回北京，朱权相送到郊外。等他再回到宁王府时，情况发生巨变，他的八万军队消失殆尽（被朱棣买通的将领带到了城外）。正在困惑之际，朱棣带着众多武士回来了。此时的朱棣换了一副模样，脸露凶相，强迫朱权交出兵权。军队都没有了，兵权留着也没用，朱权乖乖地下达命令，宁国的所有部队听从燕王朱棣指挥。朱棣得到指挥权，马上出城整编朱权的部队，这支部队随之成为他谋反的重要力量。

装疯达到目的，借兵取得成功，反间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且看朱棣如何运作：朱棣起兵占领了遵化，朝廷派都督刘贞、都督佥事陈亨、都指挥卜万率十万大军前来攻打。诡谋多多的朱棣没有马上出城以力相拼，而是采取了智斗。经过分析，他认为，都督刘贞年老体弱，既无斗志，又无谋略，且疑心很重；都督佥事陈亨与自己旧交颇深，必然不愿与自己直接作战，此二人尚不足虑。只有都指挥卜万有勇有谋，对自己的威胁最大，如能除掉，则敌军必败。怎样除掉卜万呢？利用刘贞疑心重的特点，离间他与卜万的关系，借其手而杀之。根据这一思路，朱棣筹划了这样一个诡谋：首先，他给卜万写了一封内容虚构的信，其内容是与卜万叙旧，赞誉卜万讲仁义、是一条好汉，并请卜万作好内应，尽早约定出击时间。其次是以审讯为名找来两名俘虏，一个放在里间，一个放在外间，对里间一个特别优待，重金赏赐，之后便把写给卜万的信缝在了这名俘虏的衣领里，嘱咐其一定要亲自将信送给卜将军。这一切

谋 诡 论

故意让关在外间的俘虏窥知。再次是制造一起火灾，让两名俘虏趁机逃走。未得赏赐的一位逃回刘贞的军营后，马上告发了此事。刘贞即命将得到赏赐的一位抓获。看完信，刘贞不辨信的内容真假，以“通燕”罪逮捕了卜万。卜万被送往京师问斩。这时，朱棣率军出击，很快打败了刘贞、陈亨的部队。



朱棣的一生到底用了多少诡谋，恐怕谁也说不清，我们一口气举了他大、中诡谋五例，以证明他诡计多端，不需要再举他为其大、中诡谋的实现而运用各种各样的小诡谋之例了。

第五章 诡谋不衰之因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诡谋也不会因为自己“诡”而“谋”吃到什么长生不老之药而成为例外。但是，从其诞生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诡谋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我们还看不出它有衰老的迹象。它正像一名诡计多端而且精力旺盛的家奴，在其主人的指使下，骄横恣肆，胡作非为。

探索诡谋长盛不衰的原因，我们拟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自身因素

诡谋长盛不衰，首要原因在于诡谋自身，即诡谋具备了经久耐用且越用越活泛管用的使用价值，就像砍柴人手中的柴刀、军人手中的枪支、球员手中的球拍、画家手中的画笔，它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并且不论主体是谁，只要这个主体愿意使用它。假如没有这一点，它不仅不能长盛不衰，而且连生存也会发生困难。

（一）具有四两拨千斤之奇效

诡谋好似一根杠杆，恶欲便是它的支点，人可以通过它以最小代价“撬拨”到最大的利益。就笔者看来，世上非分获取利益或好处的手段千千万万，而真正能发挥四两拨千斤之奇效的非诡谋莫属。首先，诡谋用的是智而不是力，用“力”只能千斤拨千斤，无法用四两拨千斤，用四两拨千斤，是智慧发挥作用的结果。一般动

谋 诡

论



物没有智慧，自然不会使用杠杆获取食物，它们获取食物的有效手段是力取，谁力大谁就可以任意地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美餐。狮子老虎的力量最大，所以它们成了兽中之王。人类既有动物具有的力，也有动物不具有的智，当获取利益或好处的时候，既可用力取也可用智取，但其结果不是谁力大谁就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或好处。只有力与力较量时，才是如此结果。若是力与智较量，则智者胜。刘邦与项羽，论力，前者不如后者；论智，后者不如前者，两者较量的结果世人皆知，智大的刘邦胜了力大的项羽。所以他对项羽说过一句最有名的大实话：“吾宁斗智，不斗力。”

其次，诡谋用的是邪智而不是正智。世上获取利益或好处而用智的手段很多，如搞科研、搞艺术、搞法律，等等，都要用智，但这些用的是正智。用正智也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奇效，但所受限制要比用邪智而谋的多。诡谋用的是邪智，不受道德、法律、情义等方面的限制，只要能够达到目的的，且花费的代价最小，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丝毫不需考虑这种手段有多么卑鄙、多么恶毒。一般来讲，在取得同样效果的情况下，用谋越是不受限制，所支付的成本就越小。拨千斤如用正谋，需“四两”力，而用诡谋可能只需“二两”、“三两”力。朱元璋除掉舅兄郭天叙和舅丈人张天佑，没费一兵一卒，假如他不用“借刀杀人”之诡谋，恐怕不会有如此小的成本，毕竟借刀所杀之人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右副元帅，都是他的“顶头上司”。

最后，诡谋存在以四两拨千斤为前提。正义战胜邪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功劳应属于正义而不是邪恶。虽然邪恶能够得逞于一时一事，但不能得逞于永远。面对正义，邪恶总是气短心虚。从总量上讲，正义大大多于邪恶；从实力上讲，正义大大强于邪恶。邪恶与正义较量，在明知不是对方对手的情况下，并非都是不计后果、不惜血本、无所顾忌地硬拼，它往往为积蓄力量保存实力，以弱制胜而智斗，智斗就是以小的代价谋取大的利益，用低的成本谋求高的产出。这种邪恶智斗正义的原始基因，给每个诡谋注定了以四两拨千斤的本性。若没有这种本性就不是诡

谋。就像猫生就会捉老鼠一样，不会捉老鼠不能称之为猫。前面所举朱棣使用大、中诡谋五例，每例诡谋都收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若不是如此，别说做皇帝，他的性命早就不保了。

（二）适用于任何领域

诡谋具有四两拨千斤之奇效，这种奇效不仅在一个方面、一个领域发生，在任何方面、任何领域都可以产生如此效果，因此，“无论是在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还是在刀光剑影的沙场；无论是在神秘莫测的外交战线，还是在那‘看不见的手’所差遣的经济王国，乃至日常人际交往之间，几乎每一处都留有它的踪迹。”^①诡谋能够自由行走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宗教、法制和生活等各个领域，除了它四两拨千斤的特殊使用价值外，还在于其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可虚可实、可雅可俗、可攻可守。

可大可小。诡谋有大诡谋、中诡谋、小诡谋之分，论大，它可以消灭一个国家，假途灭虢就是如此；论小，它可以让人饱一次口福或眼福，如前举谢某为多喝几口酒而使用鬼点子。即使在同一个领域，也一样既可以用大诡谋也可以用小诡谋，只要能达到目的，大小不受限制。

可多可少。多，是指为实现同一目的，运用多个诡谋，多少不受限制，并且既可以同时并用多个诡谋，也可以不同时地串用多个诡谋，还可以并串连用。朱棣是用谋高手，他为登上皇位，到底并串用了多少诡谋谁也说不清，我们前举的五个可见一斑。少，是指用很少的诡谋实现一个目的。当然，再少也不能少于一个。综观诡谋使用情况，用多个诡谋实现同一目的的少，用一个诡谋实现一个目的的多。为实现某个目的到底是用一个诡谋还是用多个诡谋完全根据需要而定，没有条条框框的羁绊。

可虚可实。虚实是一对矛盾，诡谋充分利用这一矛盾为己服务。虚是虚假，“虚假教人们瞎说、杜撰、虚伪、欺骗，教人们隐

^① 李大根等主编：《中国谋略事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1页。

诡 谋 论

瞒事实、夸大事实、颠倒事实、混淆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①对此，诡谋用起来得心应手。离开虚假，诡谋不仅谈不上盛行不衰，连生存都成问题。但是，诡谋绝不是一味只利用虚假而不利用真实。利用真实是把真实当做手段，让真实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起到比虚假更有杀伤力的作用。二桃杀三士中的三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都是为齐景公立过奇功的勇士，为除掉这三名勇士，齐相晏子充分利用他们所建奇功的事实，设计让齐景公送给他们两个桃子，要他们依据功劳大小取桃子，公孙接、田开疆各表功劳后取得一个，古冶子认为自己功劳最大却取不到桃子，很没面子，遂拔剑自杀。公孙接、田开疆觉得功劳最大的古冶子拔剑自杀了，自己的功劳还不如古冶子却取到了桃子，一时羞愧难当，亦拔剑自杀。虚可用、实可用，关键不在虚实本身，而在于“用”，只要运用得当，虚可以达到目的，实也可以达到目的。

可雅可俗。雅与俗，是诡谋手段的高雅与低俗。一般认为，在高雅的地方用高雅的手段，在低俗的地方用低俗的手段。这种观点不适合诡谋。诡谋就是不守常规，什么手段管用就用什么手段，在高雅的地方，既可以用高雅的手段，也可以用低俗的手段；在低俗的地方，既可以用低俗的手段，也可以用高雅的手段。二桃杀三士，三士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武士，是比较低俗的人群，晏子除掉他们完全可以用低俗的手段对付，比如欺骗他们喝下毒药而死亡，但晏子却用高雅的手段，调度起他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感，让他们为羞耻而自杀。朱棣本是皇叔，非常高贵之人，但为了保全自己，赢得举兵的时间，也用上让自己蓬头垢面、将屎尿拉在裤子里的低俗手段。雅手段可以单用，俗手段也可以单用，雅俗手段也可以共用，共用者更是司空见惯，这是诡谋不择手段特点的具体体现。

可攻可守。攻是进攻，守是防御。诡谋是一种神奇的武器，既可用进攻，也可用防御。进攻时，它几乎是无坚不摧；防御时，它几乎可以躲避任何“武器”的攻击。朱棣“清君侧”、“借兵”、

^① 高帆著：《虚假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反间”等都是进攻性的诡谋，所进攻的目标都被其摧毁；而他的“装疯”则是防御性诡谋，朱允炆及他的大臣们都想揭穿，可还是无功而返。当然，诡谋攻防的超级效果，不是就它所攻击的目标或者防御者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言的，而是就其目标是否实现而讲的。只要一个人想用诡谋去进攻或者来防御，无论进攻的目标或者防御的对象是大是小、是重是轻、是贵是贱，在用其他手段办不到的情况下，用此手段能够取得成功，就意味着进攻时是无坚不摧、防御时是再坚难摧。这种可攻可守的特点，促使诡谋盛行，故而不是为怪。

二、人性因素

“人性就是一切人都具有的属性，是一切人的共同性。”^① 一切人都具有的属性很多，选择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人从生到死，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与人生存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只要对人发生作用，人就面临着选择，穿什么，吃什么，住在哪儿，走向何方，几乎每天都要对其作出取舍。选择总是根据需要的选择，没有需要不存在选择。人需要衣食住行，才在衣食住行上作选择，假如某个人不需要衣食住行了，选择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某些时候，有需要并且能够得到满足也不存在选择，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的东西是唯一的，比如需要吃，只有一种菜；需要穿，只有一套衣服；需要住，只有一间房子；需要行，只有一条道路。选择是在至少有两种以上可供选择的東西存在时才显示价值。还有一种时候，选择也无意义，即主体不选择，尽管可供选择的客体很多。但是，一个主体的一生绝对不会没有选择，哪怕是看淡了一切，什么都顺其自然的出家之人，其出家的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诡谋在社会上盛行，从人性上找原因，毫无疑问，是人对其选择的结果。正常情况下，诡谋总是人实现目的的手段，但不是唯一

^① 上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0页。

谋 论 诡

的手段。一个人实现目的的手段很多。那他为什么要选择诡谋手段呢？关键在于这个人将各种手段作了必要的比较。如前所述，诡谋与力的手段或正谋的手段比较起来，不仅成本低廉，而且不受法律、道德的羁绊。追求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自由是人的天性，以小博大即以最小代价谋求最大利益也是人的天性，诡谋正可以满足这两种天性，所以它总被某些人选择为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就非常正常了。

曹操是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也是个大阴谋家。在讨伐袁术的寿春之战中，由于双方旷日持久的对峙，军中粮食将尽，而到兖州催运的粮食因路途遥远一时难以运到。军中无粮，士气必然大伤，士气大伤，打起仗来必败无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一般人会想到这一招，即将实情告诉士兵，鼓励将士以破釜沉舟的心态猛攻寿春，拿下寿春，粮食的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作为军事家的曹操，难道就没想到这一点？他肯定想到了，只是权衡良久觉得胜算不大，或者觉得即使胜了所花的代价太大。此等办法不行，还可以另想其他正当之法，料想曹操都想过了，估计是没有什么办法比他所运思的诡谋更能稳定军心且“成本”不大。于是他实施了这一诡谋：当时负责军粮发放的典仓吏叫王垕，曹操把王垕叫到跟前对他说：“现在军中粮食短缺，请你用小斗付军粮，以解燃眉之急。”丞相的命令哪敢不听，王垕立马执行。没过几天，粮食虽然节约了，但士兵吃不饱肚子的怨恨情绪却迅速滋长。此等结果，曹操早就料到，于是他把王垕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现在军心不稳，我想借你一样东西来稳定军心。”王垕想破脑壳也猜不出自己有什么可以稳定军心的重要东西，发愣之际，曹操发话了：“我借的就是你的头。”不等王垕同意与否，挥刀便将其头砍下。随后，他把王垕的头挂在军营中晓示士卒：“王垕贪污腐化故意克扣军粮，害得大家吃不饱肚子，我已将其正法，望全体将士团结一心，共渡难关，不几日，大批军粮就会运到。”不明真相的士卒们不仅因此消除了怨恨情绪，而且对曹操信服有加，认为他公正无私。几天之后，军粮运到，曹操再也不用担心粮食短缺而引起军心不稳的事情了。

以一个无辜者的性命来稳定全军将士之心，按儒家伦理，此等做法绝不可取，但从成本理论看，这是目的达到所付成本最小的买卖，值得肯定和倡导。曹操不懂成本理论，但他深知在取得同样效果的情况下，什么手段简便易行就用什么手段是最好的选择，如果硬攻寿春或者采取其他军事行动，死亡的恐怕绝不是一人之性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诡谋之所以总被一些人选择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完全是因为诡谋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本质特征使然。

选择是比较的结果，与力的手段比较，与正谋的手段比较，诡谋被最终选择是迎合了人们的“追求自由”和“以小博大”的天性。在人的天性中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即尚智胜于尚力。在智胜与力胜中，项羽是力胜的代表，所以后人对他“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赞美，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胜他的是“吾宁斗智，不斗力”的刘邦。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大背景下，他的“宁斗智，不斗力”则备受后人推崇。所以，以智为核心的谋略和诡谋总能受到人们的青睐。其理论原因在于：“力斗是两力相拼，谋斗是以智斗力或以智斗智，斗智所耗者为智，斗力所耗者为力（人力物力），故而唯有斗智方能最大程度地减轻利益的损耗。这样，谋略作为争利之最佳方式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①

智是精神性的，力是物质性的。耗智，看不见摸不着，一个人脑海里到底有多少智慧，谁也说不清，并且耗去之后它似乎能马上再生而且其质地可能更优。耗力则不同，既看得见又摸得着，一个人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在一定的单位时间内可以用完。这就是说，人们之所以选择智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智慧资源丰富，几乎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多；而人力则相对匮乏，越用越少以至近于无。更为重要的是，力小力弱者可以用智战胜力大力强者，而力大力强者则不能用力战胜智大智强者。这些也许就是人们尚智胜于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21页。

谋 论 诡

102

尚力天性形成之原因。文化人更是如此，他们手无缚鸡之力，但常常把智演绎得云谲波诡、惊天动地。以至“从巫祝史官的占卦问卜，提供治乱经验到各派思想家创造、制定、兜售治国方略，从纵横家游说四方、出计献策到宰相辅佐为君王执掌朝纲、制定法纪、帮忙谋军谋政，从一般文臣进谏上言、治理一方或充当军师智囊到文人学士对治国安民处世御边之谋的争执辩论，谋略性活动从来就是文化人安身立命的根据”。^① 诡谋本来就是谋略家族中的一个忤逆者，文人虽然鄙弃它，但又常常悄悄用来为己服务。王莽本是一介书生，但他用诡谋当上了皇帝，其诡谋之大真是无与伦比，以致大诗人白居易为此写下让后人感叹了千百年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文人尚智用诡谋，让诡谋借助文化载体广为流传。我们能从史籍中看到各种各样的诡谋（包括他们自己以身示范的诡谋），记载这些的文人功不可没，无论他们的初衷如何，但诡谋能够盛行显然得益于他们的一臂之力。

在社会生活中，文人的行为方式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他们尚智用诡谋，普通人自然群起效仿，正像南朝梁孟氏在其《孙子》注中所说：“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特别是那些“既没有权力又没有金钱的人要实现自己的意愿或者要在动荡不安的人世间保全自身”，不得不寄希望于权谋术，因为“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能够通过钱与势来实现自己的意愿”。^② 普通人过日子，总想过好一点、过得安稳一些，他们在打工、做买卖、求人办事、解决危难、维护尊严以及吃喝玩乐时，某些脑子好使的，都喜欢琢磨怎样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在用正谋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夹带着鬼点子、馊主意。前举为多喝几杯酒而用诡谋的谢谋就是这种“既没有权力又没有金钱的人”。假如他有钱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29页。

② [日] 村山孚著：《权谋术》，王子今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3页。

有权，何需如此！最直接选用诡谋的还是生活中的一些小骗子，他们每设一个骗局就是一个诡谋，世上到底有多少小骗子，这些小骗子到底布设了多少骗局，谁也说不清，但就目前我国公安部门统计的数据来看，骗案和骗子是逐年增多。何况这些是够立案而被侦破的案件和被抓获的人员，够立案而没被发现和不够立案而没有统计的骗案和骗子又增加了多少呢？所有这些骗子，无疑是赤裸裸的推动诡谋迅猛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诡谋盛行，是在自我选择、自我淘汰的基础上盛行，它把不符合人性的丢给历史，而把符合人性的留给社会。有种大家比较熟悉的诡谋，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诡谋，它萌发于唐代，流行于宋代，到了明代，有人给它取了个杂技的名字：托火圈。也许是因为它久用不衰，诡谋者们将其神化，此种诡谋后来又有了个美丽的新名：仙人跳。明人张应俞在《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中给了它一席之地，清末它又以文学的形式迈进了狎邪小说《花都梦》。前者记述的是佃户一家三口骗主人。因欠主人5两银子，母亲与儿子商量，让儿媳勾引主人，然后捉奸赖账。儿媳顺从地将主人勾引到自己的房间，正做云雨之事时，儿子突然闯入，将主人一阵毒打后，说要报官，母亲进来劝儿子，要求主人免掉5两债银，再给20两赔偿名誉损失。主人无奈，立据照办。后者描写的是苏州田舍翁钱守愚，在上海洋龙会上误入野鸡窝。野鸡窝的妓女王月仙伪装成良家妇女，将钱守愚勾搭进房。钱守愚不知是计，脱衣上床正欲行淫。王月仙灭灯发出信号，等候在外的所谓丈夫破门而入，将钱守愚一顿痛打，威胁将他告入官府说他强奸良家妇女。可怜钱守愚在上海人生地不熟，怕吃官司，只好忍气吞声地以400大洋私了此事。解放前的旧上海，拆白党得心应手地运用此种诡谋，为“冒险家的乐园”增加了一道邪恶的“风景”。如今，此种诡谋又有了一个形象化的名字：放飞鸽。在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种“飞鸽”在飞。

“放飞鸽”为什么不被淘汰，经历漫长的一千多年仍然血气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充分利用了人性的东西。元代戏剧家马致远在《陈抟高卧》剧本中写道：“先生，圣人有云：‘食色性

诡谋论

也。’好色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的好色之心如果不受道德的约束，把人引向寻花问柳之路是必然的事。在这种“必然”之中进入色诱的圈套几乎是不可避免。“放飞鸽”正是利用这一点，把好色之徒圈了进来，而好色之徒在每一个时代都如牛毛一样多，圈进其中一部分并非难事。因此，“放飞鸽”一类的色诱诡谋总是被诡谋者选择，一用再用，用了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并且还将继续用下去。

人性的东西总是成为文学创造的主题，所以文学不衰。人性被用于诡谋，诡谋像服用了兴奋剂，精力总是十分充沛。而社会因之不是这儿起疙瘩，就是那儿长疮疤。

三、社会因素

尽管四周有无数敌视的眼光、无数讨伐的声音，诡谋仍然旁若无人地自我发展壮大，让本可以和谐的社会难以轻松与安闲。原因除其自身因素和其使用者人性因素外，再就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因素

（一）邪恶存在，诡谋有了滋生土壤

如前所述，诡谋是主观意识的产物。诡出自于主观意识中的潜意识，是潜意识中的恶欲造就；谋出自于主观意识中的显意识，是显意识中的理性使然。诡谋就是在恶欲的支配下，通过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形式而完成。没有恶欲，世上可能有谋，但绝对没有诡谋。恶欲来自何方？来自人的内心深处。但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生下来其意识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善恶形成完全是周围环境促使。所以美国学者鲍迈斯特尔说：“恶是社会作用、塑造的产物。它不是偏居于我们的基因或者我们的灵魂中，而是存在于我们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① 如果环境中或者“我们与他人的相互

① [美] 罗伊·F. 鲍迈斯特尔著：《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崔洪建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关系中”只有善而没有恶，那么人的意识的形成，就不会有恶的因子介入。但是，自私有制产生以来，邪恶就伴随着社会存在而存在、发展而发展，五千年的文明史，没有哪一种形态的社会没有邪恶，只是其多少大小不同而已。邪恶存在，不可能不作用于人的内心从而留存其间，一旦有机会，善又无法将其抑制时，它就会借助思想成为人的行动的指导，倘若与思维中的谋相结合，就成为了我们所说的诡谋。

现今社会，邪恶大量存在，即使是今日之中国社会也是如此。诡谋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存在的，并且大量的存在，它并不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而羞于混迹其中，相反，它充分利用这种制度的幼稚而大售其奸。哪里有恶，诡谋就在哪里生长；哪里恶多，诡谋就在哪里蔓延，就像生命力极强的野草，不劳驾人类耕耘播种，有点土壤便可长出茎叶来，假如气候适应，又无天敌，漫山遍野铺开来则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恶的行为、活动和历史事件往往也是促进社会前进的重要杠杆。恩格斯曾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①他还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②由此看来，诡谋是恶欲的表现，它也同其他恶行一样，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文明时代的动力”。因此，本身就是恶的诡谋，受到追捧、得以盛行也就自然而然了。

（二）诚信缺失，彼此应对以诡谋

从古到今，无人不说诚信重要。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现今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谋·诡

论



人，彰显诚信的比比皆是，概括全面者，莫如任仲平先生，他认为：“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诚信是道德范畴和制度范畴的统一，讲诚信有利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加强诚信建设体现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①

但是，这种无价的精神之宝，在不少领域、不少地方，要么不见它的芳踪，要么曾见到它可后来踪影全无，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到它时，它却亭亭玉立于人们美好的愿望中。而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背离它、出卖它、践踏它的背信弃义、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坑蒙拐骗、弄虚作假、食言爽约、装聋作哑。这些诚信的敌人数量越多、力量越强，给社会、给民族、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危害越巨大。所以有识之士疾言：“没有起码的诚信，社会公众就将无道德正义之声，民族社会将丧失凝聚力，而公正的社会价值尺度和社会规则亦将建立不起来，民族亦将无博大奋起之精神。”^②具体到社会交往的价值取舍上，结果便是“我讲信用别人不讲信用，我吃亏；别人讲信用我不讲信用，我受益”^③。

如何对付这种诚信缺失的局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诡谋。因为只有诡谋可以让人在失信的环境里进可取、退可守。进可取的最佳做法是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反正诚信萎缩得看不见身影，要想获得非分利益或好处，能坑害的坑害，能蒙蔽的蒙蔽，能拐卖的拐卖，能欺骗的欺骗，在坑害、蒙蔽、拐卖、欺骗之中，将虚假的仁义、虚假的忠心、虚假的真诚、虚假的同情、虚假的身份、虚假的地位、虚假的组织、虚假的制度、虚假的成绩、虚假的材料、虚假

① 任仲平：《论诚信》，载《人民日报》2003年9月18日。

②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42页。

③ 卢现祥：《信用是一种无形资产》，载《长江日报》2002年3月23日。

的关系、虚假的情趣等用其极。退可守的最好办法便是食言爽约、装聋作哑。反正背信弃义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何必为了诚信而吃亏不讨好地去讲什么公道、主张什么正义、当什么勇士！尽管他人和社会十分需要公道、正义和勇士。假如在给予这种需要时，丝毫无损于我的利益，我的安全可以确保，我可以考虑给予。如果两者发生矛盾，我是绝对为己不为他，哪怕只要我帮一言能让人脱离苦海、伸下手可救人性命。我的处世哲学便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逢人便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此，我不轻易表态、不随便承诺，即使某个时候不得已表态过、承诺过，但要为兑现而付出代价时，我会用个计谋让自己离开兑现的现场，或者再开个空头支票放在那儿。反正诚信对于我来讲没什么意义，要说有意义，那就是我要利用它为自己谋取一定的利益或好处。

我如此受益，你不如此则吃亏，谁愿总是吃亏？久而久之，你也如此，他也如此，于是我们彼此彼此。诚信没有了，大家相互对付以诡谋，就像一个著名小品所反映的那样，甲乙买卖车票，因双方互不信任，乙怀疑甲用假车票骗取他的钱财，甲怀疑乙用假钱骗取他的车票。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警世恒言渗透到了人们的潜意识中，互相提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已成为大家交往的心理面具。如此，诡谋怎不盛行？

（三）法治稚弱，诡谋借人治而流行

法治作为中国的治国理念和方略是近些年的事，由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或者只有人治底下的法制，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法治并未马上成为治国的理念和原则，因而它在今天显得十分幼稚和弱小，远没具备让人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实力。人治的传统还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时常以强势显摆于社会。伴随着人治成长壮大的诡谋，也因此延续着昔日的辉煌。

如果说法治是以制度来管人，那么人治则是用权势来管人、谁

谋 论 诡

的权力最大，谁管的人最多，对人的操控力最强。封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超然凌驾在国家、社会和全体民众之上，从治国安邦的韬略大计到民众的生杀予夺，一切都是君主说了算，“君主出言为法。君主的意志就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就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和行为准则。”¹ 这种“高度集中的君权，必然会对政治权术产生一种不可或缺的依赖。这并非完全是由君主个人的道德素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说，封建统治阶级自私、贪婪、虚伪、阴险的阶级本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采取光明正大的政治态度。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君主专制制度下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客观上要求政治权术作为专制君权的必然伴生物。脱离了诡诈的政治权术，高度集中的君权便不可能得到正常的行使，专制制度便无法得以生存和维持”²。专制君权与政治权术的这种伴生关系，从治国方式上看，无疑是人治造成的。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自私、贪婪、虚伪、阴险的阶级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采取光明正大的政治态度”，所以政治权术是诡谋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对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完全人治环境，大臣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然会用诡谋以而对“苟求免祸”，这样一来，就如唐代政治家魏征所言：“大臣苟免，则谄诈萌生；谄诈萌生，则矫伪成俗。”^③“矫伪成俗”了，谁还忌用权术呢？谁忌用谁将吃亏，谁善用谁将讨好。如此好坏效应，使得封建官僚们自然而然地把权术作为了“谋求政治权力的‘敲门砖’”、“巩固政治权力的‘护官符’”、“处理官际关系的‘润滑剂’”^④。上行下效，这种权术必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矫伪成俗”，互不信任，彼此自然而然地以诡谋相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治便是诚信缺失的政治原因。

相对于人治，法治不仅不会让诡谋成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敲门

1.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46 页。

2.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47 ~ 348 页。

③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

④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5 ~ 369 页。

砖”、“护官符”或“润滑剂”，相反，它对诡谋具有最大的制约和打击作用。法治主张公开，所有对国家的治理活动都以事先公布的法律为依据，无法则不治；诡谋讲究的是隐蔽，在隐蔽中谋取利益或好处，与人治的暗箱操作不谋而合。法治主张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越和凌驾于法律之上，谁违法谁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即使是一国之君；诡谋无平等可言，无德的“巧”取是其本质特征，并以获得与付出的差距越大越好为原则。法治主张公正，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国家权力与法律规范发生矛盾冲突时，是前者服从后者，而不是人治条件下的后者服从前者，因而裁断是非完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诡谋若讲公正则不是诡谋，诡谋与公正毫无关系，若发生关系，一定是诡谋利用公正，把公正作为获取非分利益或好处的工具。诡谋与法治格格不入，为法律所不容，法治越是充分的地方，诡谋越是难以生存。中国的法治建设现还处在起步阶段，人治还有相当的市场，这就使得诡谋就像那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一样，仍然俏销。

留心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人挖空心思钻研谄媚阿谀、巴结投靠之术；有多少人绞尽脑汁用各种卑鄙手段对付竞争对手；有多少人唯恐天下不乱而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地拨弄是非？当你认为这种现象不是个别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时候，你是否感觉到了时下诡谋盛行程度及其原因之所在？是否和《人格与社会》的作者一样，体会出这样的结论——“在人治社会中，权谋、权术和权诈必然大行其道，不仅代代相传，而且愈演愈烈”¹？

1 丁立平著：《人格与社会》，中国铁道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第六章 诡谋人格

社会中有多多种类型的人格，诡谋人格是其中的一种，尽管这种人格不是社会倡导的，往往为人们所不齿，但其仍然独树一帜，负面地影响着社会，影响着这个社会里的文化，影响着这种文化里的人的价值取向。

一、人格与诡谋人格

“人格”一词来自拉丁语 *persona*，其意是指“希腊罗马时代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戴的假面具，它代表剧中人的身份，后来引伸为人物、角色及内心的特征，即心理面貌”^①。后人使用人格一词，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根据本学科、本人的理解，给出不同的定义，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就曾经综述过五十个人格的定义，其中一个就是他本人给出的，即“人格就是一个人真正是什么”^②。我国心理学界认为：“人格是个人相对稳定的比较重要的心理特征的总和。”^③“社会学把人格看成是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的一切特性的综合。”^④伦理学家所理解的人格“是一个人的行为所表现和形成的思想自我，是一个人的长期行为所表现和形成的稳定的、恒久

① 郑敦淳等编著：《经典人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② 陈仲庚、张雨新编著：《人格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③ 许金声著：《走向人格新大陆》，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④ 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

的、整体的心理状态”^① 我们倾向于伦理学家给出的定义，因为本书所论述的诡谋，很大程度上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的。

“人格形成于行为，反过来显然又决定一个人的行为，通过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② “这种表现既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虚幻的，既可能是直接的，也有可能是曲折的。人们总是可以透过诸种表现去洞察其人格的本来面目。”^③ 无疑，一个人的性格如果是诡谋型的，则是由其长期的诡谋行为内化而成，当我们观察到一个人的行为时常带有阴险、狡猾、奸诈等特点时，即使这样的行为以“虚幻的”、“曲折的”形式表现，我们也认定这个人的性格是诡谋性格。准此观之，所谓诡谋性格，就是具体个人的性格的诡谋性规定，是一个人的长期的阴险、狡猾、奸诈等行为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状态。诡谋性格在某些时候也可叫权谋性格和奸佞性格。

性格从伦理上评价，有高尚与卑下之分。高尚性格者以善为原动力，所作所为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卑下性格者以恶为原动力，所作所为有害于社会和他人的。诡谋者实施诡谋，都是恶意的表现，都把阴险、狡猾和奸诈融入到行为之中，都对社会和他人的构成伤害，因此，诡谋者的性格是卑下的性格。历史和现实中，具有如此性格的人绝不是个别，典型代表有赵高、李林甫、秦桧、魏忠贤之流。在我们身边，我们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遇上一个人。而可能遇上的“这一个”，也许是你不认识的但却是来给你下套的骗子，也许是你不仅认识而且天天与你见面的同事或者顶头上司。

卑下性格也有层次之分，以道德丧失多少大小为标准，丧失得少为一般卑下，丧失得多为中等卑下，丧失殆尽为最大卑下。最大卑下者是最无人格之人，我们称这种人为“衣冠禽兽”。诡谋性格者中，也有这样的“衣冠禽兽”。

战国四君子之一春申君黄歇，门下食客三千，正当他为楚考烈王无后而万分担忧时，门客李园从赵国老家把自己的妹妹嫪毐带回

1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01页

2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01页

3 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谋 论 诡

楚国送给春申君为妾。嫣嫣既漂亮又嘴甜，哄得春申君只愿与她同床共枕，不出三个月，她便有了身孕。

春申君非常高兴，嫣嫣却对他说：“你不要光顾眼前高兴，想想楚王无后，一旦驾崩，必然传位给他的兄弟，你当了二十多年的国相，得罪的人不少，到那时，你不但当不了国相，恐怕连性命都难保。”春申君一听，觉得嫣嫣说得很有道理，但不知如何是好。嫣嫣乘势进言：“我倒是有一计，不仅能免祸，还能得福，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春申君迫切想知道其计为何，催促嫣嫣快说。嫣嫣故作羞耻地说道：“我现已怀孕，你把我献给大王，如果运气好，我生下男孩，继承王位绝对没问题。你的骨肉当上了大王，不就可以免祸得福了吗？”

春申君虽然不愿把怀有自己骨肉的心爱女人奉献出去，但一想到自己的将来，也只好昧着良心忍痛割爱了。嫣嫣在楚宫中呆了六七个月后，便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楚王大喜，便册封大儿子为太子。

过了不久，楚王病重，春申君不忧反喜，眼看自己的儿子就要当大王了。门客中有个叫朱英的，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瞅了个机会对春申君说：“天下有意想不到的福气，有意想不到的灾祸，还有意想不到的人。”春申君知道他话中有话，催他快说。朱英便说：“如果大王去世，太子即位，您就是伊尹、周公，这是意想不到的福气；国舅李园表面上对您十分恭顺，背地里却养着武士，为了他妹妹和他自己，他是不会放过您的，这是意想不到的灾祸；我替您去对付李园，免得您落在他手里，我就是意想不到的人了。”春申君不相信李园会丧尽天良对他下手，毕竟是他接纳其妹，让其妹成为太子之母。朱英见春申君固执己见，知道自己大祸即将临头，便脚底摸油，溜到别国躲了起来。

十多天之后，楚考烈王终于死了，春申君奔丧进宫，李园即命武士将其拦截，假传太后懿旨，指斥春申君谋反，理当处死灭族。就这样，春申君不但自己没有好结果，还连累了一族人。

在这个诡谋故事中，春申君、李园、嫣嫣都是缺德之人，但程度有所不同，春申君缺德不多，他只是为将来免祸得福，同意献出

只能属于自己的妻子，其人格是一般卑下；嫣嫣作为妻子，却鲜廉寡耻地主动提出让丈夫把自己献给别的男人，缺德要比春申君大，故其人格是中等卑下；李园忘恩负义，以其极端手段灭其主人之族，道德丧尽，评价其人格，无疑是最大的卑下。当然，这是从一般人伦上讲的，若从封建伦理的君臣关系上看，他们三人都犯有极为恶劣的欺君之罪，虽然不能说道德丧失殆尽，但也所剩无几，由此评价他们的人格，都属于最大的卑下。所以，《中国权智》一书的作者在讲完春申君的故事之后，感叹地写道：“世界上有两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在社会的最下层，唯钱是图，连皮肉都出卖了，还有什么道德可讲；宫廷在社会的最上层，唯权是从，连灵魂都不要了，还有什么道德信义可讲？宫廷与妓院，虽处社会的两极，实有异曲同工之处！”^①

一个人的人格不止一种，具有诡谋人格的人还具有其他的人格，不然，在当今社会，他很难在一个正义诚信占主流的群体里生存。比如，一个诡谋人格的人，还有善于交际的人格、哥们义气的人格、爱好广泛的人格，等等。无人不知的曹操就是一个多重人格之人，说他具有诡谋人格恐怕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他用起诡谋来烂熟于心，大到挟天子以令诸侯，小到“借”人头安定军心、“梦”中杀人防暗算，几乎是无处不用诡谋。而他的政治家人格、诗人人格、枭雄人格恐怕谁也否定不了。客观地讲，凡诡谋者，都智商不低，除了以他们的聪明不断搞阴谋诡计外，还会干一些不违背道德的事情，这些事情通过积淀，形成为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心理状态，从而凝聚成种种让人可以观察到的人格。因此，具有诡谋人格者同时具有其他人格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多重人格里有主有次，什么人格占主导，这个人就是什么人格之人，若诡谋人格占主导，那么这个人就是诡谋人格之人。

诡谋人格来自于诡谋行为，由此是否可以这样说：有诡谋行为就具有诡谋人格？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有诡谋行为，只是偶尔为

^① 冷成金著：《中国权智》，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106页。

谋 诡 论

之，我们不能将这个偶尔为诡谋行为的人称为诡谋人格者，但可以称之为诡谋者。就像一个人偶尔酗酒，我们不能说他是酒鬼，只能说他是酗酒者一样。只有经常用诡谋并形成稳定的、恒久的心理状态，我们才能将其称为诡谋人格。诡谋行为偶尔为之，最容易发生在谋略人格者中，因为谋略与诡谋之间就隔着一张纸，这张纸就是道德，倘若谋略人格者不自我控制，将“纸”捅破，谋略就变成诡谋了。其他人格者，也会偶尔为诡谋行为，即使是被社会所尊崇的名人同样免不了如此，当然，有的是迫不得已。

孙中山是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从人格上讲，他无疑是革命的人格，绝不是诡谋的人格。但他在革命生涯中，有时因形势所迫，也不得不用上诡谋。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决定成立军政府，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讨逆。段祺瑞的爪牙朱庆澜赖在广东省长的位子上就是不走，这对北伐讨逆十分不利。他想免去朱的省长职务，苦于找不到理由；说朱是段祺瑞安插在广东的间谍，又无确凿证据。无奈之下，孙中山想到了美人计。根据朱庆澜好色，常借到女子学校“视察”之机奸污女学生的情况，密令部下从香港请来名妓小金铃。小金铃到广州后，按照安排，以学生身份来到某女子学校学习。这天，朱庆澜兴高采烈地又到该校演讲，小金铃坐在头排，装着脉脉含情的样子听其演讲。朱庆澜嘴上讲着，眼睛却在搜索目标，当他看到小金铃时，心旌骤动。演讲一完，他便悄悄带上小金铃走了。数日之后，珠江长堤西濠酒店舞厅，朱庆澜与小金铃情意绵绵地翩翩起舞之时，被孙中山部下特地请到现场的记者突然惊叫起来：“特大新闻，省长与名妓共度良宵！”这一喊，心虚的朱庆澜马上过来拉着记者走出舞厅，以3000大洋贿赂记者不要张扬。谁知第二天的报纸上仍载有以《伤风败俗之省长》为题的新闻报道。广东省议会看到报道，决定弹劾朱庆澜。朱庆澜自知遭弹劾的结果是“下课”，为不致颜面丧失殆尽，干脆主动地向议会递了个不继续担任省长的辞呈，带着家眷离开了广东。

孙中山的美人计获得成功。说实在的，这种为抓把柄而请妓女勾引官员的做法属于下三流的手段，上海滩的拆白党常用这样的手

段，将其归于诡谋之列不会错。但是，孙中山迫不得已用之，并非他的人格使然，况且他用之并非出自自私，而是为了革命。这就是被儒家所肯定的上仁不仁、上德不德。

二、诡谋人格的特点

诡谋人格是诡谋行为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阴险、狡猾、奸诈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所显示的独特之处在于：撒起谎来习以为常，弄虚作假得心应手，自私自利陷入极度，贪得无厌不知收敛，阴险毒辣贯穿始终。

（一）撒起谎来习以为常

世上不撒谎的人几乎没有。“据美国一位心理学家估计，美国人平均每天要说两百句谎言。”^①何谓撒谎，有意不说真话谓之撒谎。而王海明先生认为：“撒谎是传达与自己思想不一致、不相符的信息的行为，其主要表现是‘心口不一’。”^②心里想的是一套，嘴上说的是一套，目的在于欺骗对方，这就是撒谎。当然，这种欺骗有善意和恶意之分。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根据谎言的动机性质把谎言分为八种，大学者阿奎那进而将其归结为四类：

- | | | |
|----|---------|--------------------------|
| 谎言 | A. 恶意谎言 | 1. 针对宗教教义的谎言 |
| | | 2. 于任何人无助反倒有害某人的谎言 |
| | | 3. 在为一方谋利的同时伤害另一方的谎言 |
| | B. 习惯谎言 | 4. 习惯以说谎为乐的谎言 |
| | | C. 玩笑谎言 |
| | D. 正规谎言 | 6. 不伤害任何人而有利于某人省钱的谎言 |
| | | 7. 不伤害任何人而有利于保全某人性命的谎言 |
| | | 8. 不伤害任何人而有利于某人免遭人身侮辱的谎言 |

① 诸葛亮人著：《说谎与反谎术》，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 页

②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522 页

谋 论 诡

106

“所谓恶意谎言是动机有害他人的谎言；而正规谎言和玩笑谎言则都是动机有利于他人的谎言；至于习惯谎言则是动机利己不损人的谎言。于是，正规谎言、玩笑谎言、习惯谎言便都是与恶意谎言对立，是动机无害他人的谎言，因而也就都可以叫做善意谎言”¹。毫无疑问，诡谋性格者为诡谋而撒谎，其动机只能是恶意，绝无善意可言，所以，一切为了实施诡谋而说的谎言都是恶意谎言。

恶意撒谎，哪怕非常轻微，也不逗人喜欢，但奇怪的是，很多人一方面不喜欢，一方面却笑咪咪地将其拿来为我所用。这是为什么呢？有位学者一语中的：“说谎是遮掩任何不良行为的一种极简便的方法”²。正常情况下，不良行为不被人们接受，总会遭到反对和指责，当一个人在已经实施了不良行为之后，或者准备实施不良行为之前，为了不被反对和指责，最简单易行并且屡用不爽的办法就是说谎。小则小到小孩为多吃一口零食如此，大则大到大野心家为谋国篡位也是如此。谎话恶意而损人，可为什么有人相信？原因在于谎话不仅“形”上合乎情理，而且“神”上悦耳动听。“合乎情理”是以真话为参照的。一般来讲，真话都是合乎情理的，所以人们一听到合乎情理的话就认为是真话。谎话经过伪装，以合情合理的面目出现，人们只要不去刻意辨认，自然将其当做真话。“悦耳动听”的话既有可能是真话，也有可能是假话。逆耳忠言虽然是真话，因其逆耳很多人不愿听，所以说逆耳忠言的人不多；甜言蜜语虽然是假话，因其悦耳，很多人愿听，所以说甜言蜜语的人不少。因此，只要有人把谎话说得合乎情理且悦耳动听，不愁没有人不竖起两耳。也正因为如此，现今世界上有撒谎比赛、有撒谎节目（即每年4月1日愚人节），甚至还有人开办撒谎公司，专门销售谎言而渔利。

《世界知识》1988年刊登过一则小“案例”：原西德有个叫布

1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23页。

2 [英]洛克：《有关教育的思想》，转引自华玉红等著：《谎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利斯·波兰德的人在汉堡就创办了这样一家撒谎公司，名曰“借口服务公司”。该公司为形形色色的登门求助者编造各种逻辑严密、滴水不漏的谎言，每次收费10~25马克。公司的全部家当是一部电话机，波兰德整天守候在电话机旁接待顾客。有个汽车装配厂的工人因连续几天上班迟到，便谎称到诊所看牙去了，引起老板的怀疑，于是他求助“借口服务公司”。波兰德收下25马克后立即给厂老板打了个电话，自称是某诊所，说你厂×××在这里治牙，将证件忘在这里了，请他速速前来取走。老板信以为真，以后这个工人再怎么撒谎也不怀疑他了。你看，这个谎言说得多么合情合理，由不得你不信，难怪那个汽车修配厂的老板信以为真，连他以后的谎言也不再怀疑了。

不可否认，诡谋行为是不良行为，而撒谎是遮掩诡谋行为的“一种极简便的方法”。因此，诡谋人格者不但不会弃之不用，相反，会将其作为法宝，随心所欲地想用则用——毕竟它不仅十分管用，而且所付代价小之又小——仅仅上嘴唇与下嘴唇的一番张合而已。这正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诡谋本质的反映。

凡诡谋人格者必然撒谎，凡撒谎者不一定是诡谋人格，不然，每个人都是诡谋人格者了，因为每个人免不了撒谎，并且好多人所撒之谎皆是善意的。从量上说，偶尔撒谎的总是绝大多数，一贯撒谎的总是极少数。属于极少数人之列的诡谋人格者一贯撒谎，久而久之，撒谎成为他的思维习惯，一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潜意识中萌发的解决办法就是撒谎，到了显意识这一环，撒谎办法便有了个雏形。于是有了这样一种现象，当事实比较完美的时候，他用谎言让其锦上添花；当事实有所欠缺的时候，他用谎言将欠缺填补；当事实糟糕透了的时候，他用谎言让糟糕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事实根本不存在的时候，他用谎言魔术似的变出一个；当事实确实确实存在的时候，他根据需要用谎言将方说成圆、圆说成方，或指鹿为马、李代桃僵。甚而极者，撒谎成为其本能，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没有谎言，他无法活，即使活着也倍感生活单调苍白，因此，哪怕是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他也一样撒谎不误。

谋 论 诡

103

曹操就是这么一个对亲人撒谎不误之人。其诡谋人格在他少年时就有所表现，谎骗“二父”便是他这个时期的杰作。曹操不喜欢严格管束他、总在父亲面前说他不是的叔叔，为“离间”父亲和叔叔的关系，他实施了这么个诡计。一天，曹在路上碰见叔叔，马上嘴巴一歪，装出十分痛楚的样子。叔叔问他怎么回事，他撒谎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还是好好的，突然腮帮疼得要命，恐怕是中风了。”叔叔马上将此事告诉给曹父曹嵩。曹嵩心急火燎地赶来看儿子，看到的却是规规矩矩地坐着看书的曹操。“你叔叔不是说你中风了吗？”曹嵩疑惑地问。曹操故意惊讶地回答：“我什么时候中风了？肯定叔叔看我不顺眼，又在您面前瞎说我的不是。”谎言让曹嵩深信不疑，从此他不再相信弟弟对儿子的诉说。曹操更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

曹操实际上是撒了两个谎，前一个谎是对其叔叔撒的，是无中生有之谎；后一个谎是对其父亲撒的，是将有变无之谎。两个谎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没有前一个谎就没有后一个谎，没有后一个谎前一个谎则失去意义。曹操的确是个撒谎天才，前一个谎撒得顺理成章，后一个谎撒得自然而然，两个大人都不知不觉中落进了他的谎言圈套，有所不同的只是，前一个进圈套者最终明白他在撒谎，而后一个进圈套者最终也没有明白他在撒谎。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他们都是谎言的俘虏，都为“培养”和“造就”曹操的诡谋人格作出了“贡献”。不知历史是应该感谢他们，还是应该谴责他们？或许既不应该感谢也不应该谴责，只应该给予对天长叹的理解。

虽然谎言总有被戳破的时候，但诡谋人格者丝毫不怕谎言被戳破，一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羞耻感本来就差，即使戳破也无所谓，他们绝不会为此心慌脸红、羞愧难言，从此不再撒谎；二是因为他们的皮囊里有的是谎言，戳破一个马上可以补上一个，甚至是两个或者更多，除非他们不能张嘴说话，谎言无法从皮囊里取出；三是因为他们活动范围广，谎言在此处戳破，可以换一个地方再撒，谎言被此人戳破，可以换一个人再说，世界之大、人口之多，总会有人

相信，总会有不认为是谎言的地方。

（二）弄虚作假得心应手

弄虚作假有语言上的弄虚作假和行为上的弄虚作假，前面所谈的撒谎是语言上的弄虚作假，下面要谈的是行为上的弄虚作假。语言上的弄虚作假和行为上的弄虚作假联系非常紧密，往往两者同时出现，有前者就有后者，有后者就有前者。但是语言上的弄虚作假还是比行为上的弄虚作假更多更普遍，因为语言上的弄虚作假可以独立完成，不需要行为上弄虚作假的配合，而行为上的弄虚作假独立完成的很少，一般情况下都需要语言上弄虚作假的配合。因此我们把两者分开来谈。对于诡谋人格者来说，光有嘴巴上的撒谎功夫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行为上弄虚作假。

109

诡谋人格者同其他人格者一样，都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只是为实现这种希望所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其他人格者中绝大多数是用正当的手段实现希望，也有极少数用杀人越货、贩毒卖淫、绑架勒索等违法犯罪的不正当手段去实现希望的。诡谋人格者实现希望所使用的手段则是诡谋。诡谋的根本要求就是采用阴险、无耻、撒谎、伪装、欺诈、算计、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方式达到目的。达到目的所采用的这些方式，哪一个不需要弄虚作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弄虚作假就没有诡谋，有诡谋必然有弄虚作假。

一般来讲，弄虚作假以三种形式表现：一是让已有的事实不存在，即隐瞒真相。隐瞒真相是把影响诡谋展开的真相掩盖起来，如对真实的身份地位、真实的物事背景、真实的人格品质、真实的意志情感、真实的动机目的等，进行必要的隐瞒。至于这种隐瞒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是长期的还是一时的，是在所有范围里还是在一定范围里，视诡谋需要而定，不过有一点是需要全部地自始至终地在所有范围里隐瞒的，这就是诡谋的目的动机。这一点若不总是隐瞒，诡谋便不成其为诡谋。二是让没有的事实存在，即虚构事实。虚构的东西本来不是事实，但在诡谋对象看来却是客观存在。这样

诡 谋 论

的“事实”，形式上是真的、内容上是假的，现象上是真的、本质上是假的。因此，诡谋需要什么样的“事实”，无论其是大的小的、新的旧的、方的圆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司空见惯的天方夜谭的，统统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捏造出来，并且能恰到好处地让对方接受。三是让存在的事实换个模样存在，即改变原样。事实原本就存在，根据诡谋需要，不令其以原生态的形式反映，而让其以歪曲了的形式反映。常用的手法有挖补和颠倒。挖补，既可以只挖不补——让事实小化，即挖掉事实的某一部分但不补充新的东西；也可以又挖又补——让事实保持原大，即挖掉其中的一部分后，用另外的东西补充进来；还可以不挖只补——让事实大化，即不用挖除，直接补进另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夸大事实。颠倒，就是将对立的位置互换，反白为黑、倒上为下、以假充真、借虚代实、变是为非等则属于这种情况。颠倒性的互换，换掉的是真实，留下的是虚假。

如果说隐瞒真相是抑制，虚构事实则是张扬；隐瞒真相是防守，虚构事实则是进攻；隐瞒真相是对真的收藏，虚构事实则是对假的叫卖。改变原样之中的改变有隐瞒和虚构的成分，但绝不能等同于隐瞒与虚构。隐瞒真相是不让事实外露，改变原样却是要让对方知道；虚构事实是无中生有，改变原样却是有中生有，只是后来的有与前面的有已不是一个模样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改变原样三者于诡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用途之别。一个诡谋可能用其一，可能用其二，也可能用其三，但绝不可能一个也不用，否则诡谋无招法可用了。前面所举诡谋事例中，没有一个的手段在此三种招法之外。

弄虚作假使诡谋获得成功，诡谋成功依赖于弄虚作假。因此，诡谋人格者“对虚假十分偏爱，百分醉心。他们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虚假，像追求美女一样追求虚假，像鱼离不开水一样离不开虚假。他们站着想虚假，坐着想虚假，吃着想虚假，躺着想虚假，梦中还在构造虚假。他们利用虚假装点门面，满足虚荣，坑蒙拐骗；他们利用虚假谋财谋反，谋名谋利。他们的心思，似乎专门用来制

造虚假的；他们的大脑，似乎专门用来容纳虚假的；他们的人生，似乎专门用来表现虚假的”^①。由此，他们弄虚作假起来，十分得心应手，如同运用真实一样从容自然，就像铁匠打铁，每一锤都可锤在关键部位上；就像工匠吹制玻璃品，无论大小厚薄皆可一气呵成；就像大词人填写小词，合律流畅没有斧凿痕迹。

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秀才篡权的皇帝王莽，在他篡位之前，其谦恭、孝顺、俭朴、好学感动了朝野上下，都认为他有古代大臣之风范，让谁也没想到他后来竟是窃国大盗。可见其弄虚作假水平之高超，让人难以企及，故使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此感叹：“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不是说王莽不是诡谋人格之人，他的篡位是偶尔为之的诡谋行为，所以让大家未能看清？当然不是！一个窃国的阴谋，是突然心血来潮的偶尔之举？没有根深的思想基础，长期的权谋行为是无法做到的，也就是说阴谋窃国是他的人格使然，这种使然的人格当然就是诡谋人格。其实，王莽人格的诡谋性在他担当安汉公的数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时时设谋、处处用计，除把太皇太后王氏哄得团团转外，有碍他夺取政权的人物则一一予以扫除，包括当朝皇帝汉平帝的生母卫氏的家族和他自己的儿子。在做这种剪除异己行为的时候，他都是按照朝规朝制和太皇太后的懿旨在做。所以他不仅没有遭到弹劾，反而被誉为周公。他的儿子王宇看不惯他的弄虚作假，屡劝不听之后，派人洒血王莽门前，欲借迷信对其警戒。王莽知道后，气愤万分，认为其子将是他篡位的心腹大患，于是将其诛杀。诛杀之后，他对外宣布王宇大逆不道，怂恿他坐龙椅穿黄袍。这一招非常高明，他除了心患不说，还落得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准此观之，给王莽封个弄虚作假的“特级大师”称号，恐怕无人反对。

伦理学家王海明说：“人格形成于行为，反过来又决定一个人的行为，通过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人格是个体内部心理物理

① 高帆著：《虚假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诡谋论

系统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一个人行为和思想的独特性。’”^① 王莽的种种弄虚作假行为充分体现了他的诡谋人格，尽管他把自己的诡谋人格掩藏得很深很深，但大家还是通过他的诡谋行为将其观察到。由此观察我们身边的人，判断他是否诡谋人格，最好是从他弄虚作假的行为入手，若是偶尔为之则罢，若经常如此，这个人就有可能是诡谋人格之人了。

（三）自私自利无以复加

撒起谎来习以为常、弄虚作假得心应手是从技术层面上谈诡谋人格的特点，而自私自利无以复加和贪得无厌不知收敛则是从社会层面观其特点。

《新伦理学》的作者对人性作过定量分析，得出的规律是：“每个人的行为目的必定恒久利己，而只能偶尔利他、害他、害己。换言之，每个人目的利己的行为必定是恒久的，必定多于他全部行为之一半；而他目的利他、害他、害己的行为之和必定是偶尔的，必定少于他全部行为之一半。要言之，每个人必定恒久为自己，而只能偶尔为他人。”^② 由此观察，自私自利就人性讲符合人性，因为“每个人必定恒久为自己”。所以在任由人性发展的社会里，自私自利常常是该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什么有的地方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从直接原因讲，就在于自私自利本性没有受到必要的制约。何谓自私自利不受制约，是指其主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考虑自己的私利而不管他人。凡诡谋都是自私自利不受制约的产物，但只有当这种自私自利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其主体才有可能成为诡谋人格者。一般程度的自私自利者，也搞诡谋，但由于程度轻，追求非分利益的欲望不是特别强烈、特别持久，在其看来，没有必要常用诡谋手段。不常用诡谋手段，也就形成不了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阴险、狡猾、奸诈的心理状态。形成不了如此

① 上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01页。

② 上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7页。

的心理状态，诡谋人格的塑造便失去了培育的土壤。因此，凡诡谋人格，必定是自私自利无以复加。

此等人格者的一切行为皆以自私自利为目的，轻则“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你的利益损失再多，哪怕涉及生命之忧，他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或帮助说一句话，或帮助完成一个动作，但这种最小的付出于他本人没有丝毫的好处，他也不会为之。重则为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不惜让他人付出沉重代价。他的利益再小，哪怕是一根针也是他自己的；你的利益再大，哪怕是一条性命也是你个人的。如果需要损害一方另一方才能获得利益，那他绝对是毫不犹豫地损害你的生命而让他得到一根针。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就是这么个人，他为了防止想象中的夜间侵害，不惜借“梦”杀人。如此损人利己的诡谋，只有他这种诡谋人格者才能设计得出来。明代巨奸王振在诡谋人格上，可以与曹操一比。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方蒙古族首领也先联合塞外诸部，入侵明朝边境，王振不顾众臣反对，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明英宗以为打仗如狩猎，亲率五十万大军前往破敌。临近边关大同，看到战争惨状，明英宗一下心里发怵，不敢继续前行，于是命令撤军。这时，王振不是考虑怎样让军队尽快脱离敌军追至的危险，而是心生一计，以撤退安全为由，力劝明英宗绕道而行。实际上，他是要让五十万大军簇拥的皇上路过自己的家乡蔚州，以便他在父老乡亲面前显示自己无上的荣耀。已被王振忽悠得不知东南西北的明英宗爽快答应。结果军队在绕来绕去之中被敌军追上，打得溃不成军，望风而逃，明英宗也成了蒙古军的俘虏。就这样，王振的一己炫耀私心，既葬送了明朝的五十万大军，也断送了明英宗的九五之尊。代价之沉重让人不敢相信，但却是事实。这一事实足以让人明白诡谋人格者自私自利无以复加的特点是多么的可怕！

自私自利无以复加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自私自利非一般的自私自利，是程度极深的自私自利，其他一般人格中的自私自利很难超过诡谋人格中的自私自利；二是指对自私自利极度钟爱，这种钟爱极其典型地反映了诡谋人格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

谋 论 诡

学，非常具体地体现了诡谋人格者的主观恶性。前一层含义是就自私自利本身而言的，后一层含义是针对满脑子自私自利思想的诡谋者说的。由于诡谋者极度钟爱，自私自利就像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一切以我为中心，天马行空，恣意妄为。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因有极度的自私自利，才使诡谋有广阔的市场，才有那么一些人形成了诡谋人格。

自私自利完全只考虑自己的私利，这种私利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还包括精神方面的——自由与安全、归属与爱、权利与自尊、权力与名声等。特别是政治权力，是诡谋人格者的最爱，因为“一定的政治权力，既代表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又意味着一定的名誉地位，象征着一定的人生价值”^①。这就是说，有了政治权力，其他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东西随之派生。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政治权力总是稀缺“物质”，相对于其他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它的资源非常有限，掌握权力者总是极少数，无权力者总是大多数。所以，诡谋人格者无论怎样极度自私，也不会全都来挤这座独木桥，其他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东西，他们也一样追逐，并且各自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的生活环境，有所选择地进行。不然，我们这个社会只有追逐权力而没有追逐其他的诡谋人格者。其实，追逐权力方面的诡谋人格者与追逐其他物质和精神利益方面的诡谋人格者比较起来，也是极少数，只不过他们混迹于官场这个最具社会影响的地方而得以彰显。赵高、李林甫、秦桧、王振、和珅等诡谋人格者之所以家喻户晓，无不与他们混迹于官场，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相关。民间有很多以骗财为生的诡谋人格者，但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史册文献不会记录他们，我们也就不知道他们是谁。历史如此，现实生活同样如此。

（四）贪得无厌不知收敛

如果说自私自利是诡谋人格者使用诡谋手段要达到的人生目

^①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的，那么贪得无厌则是从程度上揭示诡谋人格者追逐目标的不可满足性。

首先，不可满足性表现在诡谋人格者对占有的对象不分档次，能占有什么就占有什么、能占有多少就占有多少是诡谋人格者的基本心态。他们占有王权不怕大、占有了一篇豆腐块文章的署名权不嫌小；占有国库里的全部黄金不怕多、占有同伴手中的一枚硬币不嫌少；占有乞丐的饭碗不怕丑、占有妓女的裤衩不嫌脏。对占有的对象不分档次，不等于诡谋人格者对自己的其他方面不讲档次，特别是对待本不应该讲档次的人格，他却把自己的人格分出了档次，高时高得至高无上，低时低得像个奴才。体现在为官的诡谋者身上最为明显，在部下面前，他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仿佛他就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而大家都是他的臣民；在上司面前，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以奴才的身份，像狗一样舔主人屁股还担心自己的舌头粗糙舔得主人不舒服。诡谋人格者从骨子里讲，是有什么占有什么、有多少占有多少，但在表面上不全是如此，有的作一定的选择，选择的标准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可被占有的东西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符，占有，否则不占有，显然，这种不占有不是思想道德方面的原因，即由于他的品德高尚而不占有，而是认为占有的时机尚不成熟、占有的方法欠稳妥，暂不占有，如果一旦他认为时机成熟，方法稳妥时，再不占有他就会觉得愧对自己的诡谋人格，非占有不可。

其次，不可满足性表现在诡谋人格者对占有的欲望不加限制。不断地占有，占有了再占有，占有再多也不嫌多。诡谋人格者没有最终的欲望，哪怕世界上所有物资都归在了他一人名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他一人役使，他也不会有最终的满足感，因为科学家正在宇宙中搜寻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如果他的占有欲最终满足了，那他还怎么有动力驱使自己到这么个星球上占有那里的一切？

当然，这种贪得无厌的特点每个诡谋人格者都具有，但并非每个诡谋人格者都是把占有世界上的一切作为奋斗目标，绝大多数是把某个方面（如钱）或某几个方面（如钱、权、色）作为不断追

诡 谋 论

逐的对象。如对钱的追逐，有了一万想占有十万，有了十万想占有百万，有了百万想占有千万，有了千万想占有亿万……没有止境，至于其占有的欲望是否能一一满足，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只要满足一个欲望后，新的更大的欲望又会随之产生。其一般规律是，欲望总是在满足与不满足之间，满足是暂时的，不满足是长久的。因此，在欲望似火的诡谋人格者的辞典里，是绝对没有“知足者常乐”这个词汇的，倒是有两个俗语则是绝对不会少的，这就是“人心不满百”、“人心不足蛇吞象”。

古时江南有一首小曲，对人心的不可满足性给予了生动的描述，遂录于下，免费送给诡谋人格者作为自画像：“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室低。盖了高楼与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①

几乎是无处不用诡谋的诡谋人格者曹操，曾写过一篇“自明本志”的文章，谈到他对权欲递升过程。年少时，曹操的欲望是当一名郎官，经“举孝廉”，他的目的达到；随之，他希望“建立名誉”当一名郡守，希望也成为现实；这时，他又希望“讨贼立功”封侯作征西将军，此欲望也心想事成；接着，他有了新的欲望，做“人臣之贵已极”的宰相，天遂人愿，他的欲望又得到满足。这时候的曹操，权力已到巅峰，虽然名义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实际上那个“一人”也不在他之上了——皇帝被他掌控，成为他号令天下的工具。在常人看来，曹操不应该再有更大的权欲了，但结果却并非如此。诡谋人格的逻辑发展是不会让他止欲于一人之下的

^① 冷成金著：《中国权智》，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358页。

——哪怕是名义上的，他要做名义上与实际上相符的天下第一人，即代汉称帝。只是老天没给他更长的寿命（曹操活了65岁），他只好把自己的欲望交给子孙去实现。其子曹丕称帝之后，为让九泉之下的曹操瞑目，追尊其为魏文帝。假如曹操地下有灵，知道自己“一朝南面为天子”了，他会满足于此而不产生新欲望——“东征西讨打蛮夷”？

117

再次，不可满足性表现在诡谋人格者对占有的一切不愿割舍。能占有什么就占有什么，能占有多少就占有多少，占有再多也不嫌多，且不断地去占有，这是由诡谋人格者贪婪本性所决定的。诡谋人格者的贪婪本性是占有，而占有的对立面是割舍，割舍就是把占有的东西让给他人和社会。显然，割舍与诡谋人格者的贪婪本性不符，不符就为其所不容，不容就不能成为诡谋人格者的思想和行为。因而像守财奴一样守着占有的一切是诡谋人格者的本色。

如果现在舍去，何必当初占有。这是诡谋人格者不愿割舍的又一原因。在诡谋人格者看来，他当初占有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冒险，毕竟诡谋人格者在占有权力、名誉、金钱、色相等的时候，所使用的手段是不正当的，因而不能公之于众。这样，他占有时就要冒被揭露、被谴责或者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风险，你要他割舍就等于要一个女人把经过阵痛得来的孩子抛弃，他能做得到吗？

诡谋人格者不愿割舍的第三个原因是其以贪婪占有为乐，舍弃了哪怕很少很小，也会痛苦。通过撒谎、弄虚作假等手段取得官职、头衔、钱财、美女，其动机目的绝不是为了从中体验痛苦，而是从中享受快乐。野心家林彪有一句依恋权力的名言，叫做“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诡谋人格者“幸福”在用诡计获得权力，他会舍弃而甘愿“痛苦”吗？显然不能。于权如此，于钱同样如此。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

谋 论 诡

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①在资产阶级里，有不少人本身就是诡谋人格者，他们的快乐、幸福，除了占有金钱外没有别的什么；他们的悲伤痛苦，除了损失金钱外没有别的什么。为什么快乐、为什么痛苦是如此的明晰，本来就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诡谋人格者还能把不择手段而占有的东西割舍掉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18

不过，诡谋人格者也有割舍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有两个：其一，割舍是为了更多的占有。这里的割舍实际上是希望占有的诱饵，比如行贿，行贿免不了要将已占有的东西割舍，但比起希望占有的利益来却是蝇头小利，所以这种割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割舍，它只是占有的一种手段罢了。其二，危急关头，需要舍弃什么才能保全官位、钱财或者性命之时，诡谋人格者首先想到舍弃的不是已属于自己了的权力或金钱，而是灵魂。灵魂对于一般人来讲，贵重得无价，凡仁人义士都是宁可牺牲生命也绝不将其出卖；但对于诡谋人格者来讲，灵魂轻贱得如发炎了的阑尾，留之无用，弃之有益。因此，称诡谋人格者为无耻之徒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研究了中国历史后指出，中国古代最无耻的时代是五代。这个时期，不仅出了个让世人蒙羞的儿皇帝石敬瑭，而且出了两个官场不倒翁张全义、冯道。张全义历仕三个朝代，奉事八个皇帝，活了75岁；冯道历仕五代，效命十君，屈附契丹，以73岁告终。他们官场不倒的秘诀就是“良心丧尽+善于投机”，是典型的诡谋人格者。他们与赵高、秦桧等诡谋人格者不同的是：后者极为刻毒霸道，他们非常阴险圆滑。

对于张全义、冯道之流的无耻，我们各举一例^②，以窥全豹：

废唐自立，当了后梁皇帝的朱温极其好色，他到了谁家，看见谁家的妻女有些姿色，就硬让这家妻女陪宿，若不从，则翻脸治罪。一次，他来到张全义家里，一住就是数天。在这数天里，他竟让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儿媳轮流陪睡。张全义的儿子气愤之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页。

② 以下两例参见冷成金著：《中国权智》，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章。

发誓杀死朱温，却遭到张全义的反。张全义对儿子说：“他是皇帝，要怎样就让他怎样吧！”舍弃灵魂，保住官位，时人、后人对张全义的评价一个样：恬不知耻。

45岁的“儿皇帝”石敬瑭借契丹之力消灭后唐建立后晋后，为兑现做34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儿子的承诺，派时任宰相的冯道前往契丹办理此事。石敬瑭满以为会遭到冯道的拒绝，因为这种事毕竟是奇耻大辱之事，没想到冯道爽快答应了。他的逻辑是，到契丹笼络好了“爸爸皇帝”，回来对付“儿皇帝”就不成问题了，至于自己的人格、良心，就当喂了狗。所以，他在契丹低三下四把自己当孙子，哄得耶律德光很快催他回国为己办事。回国时，他如英雄凯旋，全然没有一点耻辱感。如此“涵养”，的确非一般诡谋者所能企及。

419

（五）阴险毒辣贯穿始终

前面提到两种类型的诡谋人格，一种是以赵高、秦桧为代表的刻毒霸道型诡谋人格；一种是以张全义、冯道为代表的阴险圆滑型诡谋人格。两种类型凸显一个共同的特点：阴险毒辣。它们的不同在于：前者以毒辣为主、阴险为辅；后者以阴险为主、毒辣为辅；前者主要是害人，后者主要是利己。

所谓以毒辣为主、阴险为辅，是指表现在诡谋人格上，毒辣是主要的、阴险是次要的，毒辣是基本的、阴险是非基本的，毒辣是毕露的、阴险是隐晦的；表现在诡谋人格所使用的手段上，大部分内容是毒辣的、小部分内容是阴险的，主要方面是毒辣的、次要方面是阴险的，全方位看是毒辣的、某个方面看是阴险的。赵高指鹿为马，充分表现出他嚣张猖狂，狠毒之外有阴险。他目中根本就没有皇上和群臣，居然把一只梅花鹿牵到朝堂上，当做骏马献给皇帝秦二世。秦二世再笨也不至于不能区分马和鹿，他以为赵高说错了，要赵高纠正过来。赵高非但不承认自己说错，反而威视群臣地要群臣说出到底是鹿是马。奴颜媚骨者马上附和说是马，良心尚存但畏惧赵高者默不作声，只有少数忠义之士站出来实话实说。赵高

诡谋论

的目的达到了，他以此强权性的诡谋试出了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该诡谋的阴险之处就在这里。那些实话实说是鹿的所谓“敌人”后来都被赵高罗织罪名投进了监狱。仅此一例充分说明，赵高害人之心肠是狠的，害人手段是毒的，其狠毒之中又具有阴险性，只可怜那些忠义之士都成了他狠毒阴险的牺牲品。

所谓以阴险为主、毒辣为辅，是指其诡谋人格、诡谋手段的表现正好与毒辣为主、阴险为辅的特点相反，反映在诡谋人格上，阴险是主要的、毒辣是次要的，阴险是基本的、毒辣是非基本的，阴险是毕露的、毒辣是隐晦的；反映在诡谋人格所使用的手段上，大部分内容是阴险的、小部分内容是毒辣的，主要方面是阴险的、次要方面是毒辣的，全方位看是阴险的、某个方面看是毒辣的。冯道从契丹返回国内时所用诡谋足以说明他的阴险性。冯道奉石敬瑭之命前往契丹，在契丹完成任务之后，耶律德光认为他忠诚可靠，要他即刻回去在石敬瑭身边为自己效劳，没想到冯道就是不走，并多次上表表示自己对耶律德光的忠诚之心，愿永留契丹。越是这样，耶律德光越是要他快走。不得已，冯道才打算启程，磨磨蹭蹭过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他走走停停，凡停下来他都要搞个小仪式为耶律德光祈福，让送行的契丹人感动不已。如此一来，本来十来天就可以走出契丹国境的他硬是走了两个多月。他这样做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耶律德光反悔，派人将他追回或者杀掉；一是让耶律德光更加信任他，以增加他在“儿皇帝”石敬瑭心目中的砝码。冯道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他既保全了自己，得以回国，又在回国后让石敬瑭反过来巴结于他，给他兵权，封他为“鲁国公”，事无巨细，由他说了算。

阴险与毒辣作为诡谋人格的特点，对于一个诡谋人格者来讲，只有侧重，没有只有阴险而无毒辣、只有毒辣而无阴险的。这是因为诡谋人格在形成、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既不能离开阴险也不能离开毒辣。阴险的最大功能是迷惑对方，毒辣的最大功能是震慑对方。迷惑对方的最大好处是能够使对方在不明白真相的情况下利益

受损，或者本人从中获取非分利益或好处；震慑对方的最大好处在于即使对方知道自己用的是诡谋手段，也因惧怕而忍气吞声地屈服顺从。

阴险与毒辣好比狼与狈，阴险毒辣结合等于狼狈为奸。于诡谋人格来说，阴险毒辣主要表现为：他们撒谎成性，即使刚刚表态承诺的事，也像得了健忘症一样转身不予承认，特别是涉及有损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你若要他兑现承诺，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表态承诺过什么，反而会说你是在胡说八道、栽赃陷害。他们虚伪狡诈，最善于拨弄是非、借力打力。哪里有乱，他们通过扇阴风、点鬼火让这里更乱；哪里无乱，他们通过拉帮结派、造谣中伤给这里添乱，当鹬蚌相争得你死我活时，他们当得利的渔翁；若无利可得，就让鹬蚌同时死亡或者一死一伤，以减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们贪得无厌，谁影响他们往上爬或者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绝不轻饶，非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把你整垮不可，即使你曾有恩于他，他也会毫不留情，能够一棍子把你打死的，绝不分为两棍子打。谁若希望诡谋人格者不阴险毒辣，就等于希望老虎不捕食动物。

诡谋人格的阴险毒辣是诡谋人格者习性上的阴险毒辣，一个人只要是诡谋人格，其习性中必然具有阴险毒辣性，并且贯穿于始终。这一点是与诡谋有区别的。诡谋有的阴险毒辣，有的不阴险毒辣（如前举谢某为多喝酒而使用的诡谋）。即使是诡谋人格者，他一生所使用的诡谋中也有阴险毒辣的和不阴险毒辣的。曹操借梦杀人的诡谋非常阴险毒辣，但其装病骗父就算不上阴险毒辣。当然，一个诡谋不阴险毒辣并不是因为它是善的、正义的，而是在于它的手段的危害性还没有达到阴险毒辣的程度。

三、诡谋人格的形成

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格不是先天注定，而是后天习得，是后天里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斗争与统一的结果，是这种斗争与统一所产生的行为直接造就的。因此，诡谋人格是一个人总是以诡谋思维对

诡 谋 论

付客观世界而“形成的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心理状态”

（一）诡谋人格形成过程

“我们说某个人具有某种人格特征，就是说这个人同时具有相应的某种层次的认识、情感、意志、信念和习惯。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五种因素，就不能认为他已经具备这种人格或完全具备这种人格。”^① 以此为据，诡谋人格是由诡谋认识、诡谋情感、诡谋意志、诡谋信念、诡谋习惯有机结合而成的。

在诡谋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诡谋认识是基础，诡谋情感是动因，诡谋意志是关键，诡谋信念是核心，诡谋习惯是标志。五种要素先后有序，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诡谋认识是诡谋人格形成的基础、首要环节。诡谋认识是指个人对诡谋的认识，亦即对诡谋是什么，于己有无用处，如有其用处有多大，与其他手段比较起来诡谋是否更能实现目的，经过感觉、知觉、分析、综合、比较、鉴别，作出相应的判断，如果认为它是一个可以用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方法，于己有用并且有很大的用处时，则付诸实施。实施是一种行为，若这样的行为很多，累积为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心理状态，诡谋人格则随之形成。诡谋人格形成由诡谋认识始，没有这个首要环节，其他如诡谋情感、诡谋意志等环节无从产生。

诡谋情感是诡谋人格形成的动因，是在诡谋认识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得”，即个人所得到的与自己的诡谋行为相关的情感。“感情（即情感）是直接引发行为的根本的非目的原因、原动力”^②，诡谋行为的发生直接由诡谋情感引发。诡谋于整个社会，人们对它持否定性态度，接触时所产生的情感是鄙夷、厌恶的，但某些人由于思想意识的不道德性，对诡谋所持态度是肯定性的，接触时所产生的情感是赞赏、喜欢，一旦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思量通过正常途径

① 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

②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2页

无法如愿时，则寻求非正当手段，而对诡谋赞赏、喜欢的情感常常驱使他们首选诡谋。选择运用诡谋手段愈多，愈能促进诡谋人格的形成。

诡谋意志是诡谋人格形成的关键。诡谋情感是引发诡谋行为的动力，有了动力，是否意味着行为按照设想的状态自然而然地发生呢？不是的。要想行为按照设想的状态发生，必须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从中进行调节，这个关键因素就是意志。诡谋意志调节支配诡谋行为按照设想的状态发生，既要抑制同设想相抵触的因素，以积极的行为来实现目的，又要克服达到目的的各种困难，以增强对影响诡谋行为顺利进行的诸种外在因素的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同设想相抵触的因素有：信心渐失导致完成诡谋设想的内驱动力不够，冒险意识弱化到不敢去实施诡谋设想，良心发挥作用要中止实施诡谋设想，等等。诡谋意志抑制这些因素，就是要阻止信心渐失，不让冒险意识弱化，命令良心靠边站，从而保持诡谋心理的相对稳定。达到目的的各种困难有：天气突然变化、交通信息工具发生故障、配合自己行动的合适人选突然发生意外、相关行动已经引起对方怀疑等。诡谋意志要克服这些困难，就是要在这些困难面前随机应变，直至各种障碍排除、目的达到为止。这是针对个别诡谋而言的。而诡谋人格的形成不仅需要在运用个别诡谋中有诡谋意志的支撑，而且需要在长期运用诡谋中更要有诡谋意志的支撑。要做到这一点，不可缺少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精心运思诡谋，用则必胜，即使万一失败，也不气馁，更不从此金盆洗手；二是我行我素，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口诛笔伐、孤立排斥。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能作如此努力的人并不多，所以诡谋人格者虽有，但毕竟是极少数。当然，就感情而言，我们是希望越少越好，因为多一个诡谋人格者，社会便多一份危害。

诡谋信念是诡谋人格形成的核心。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谓之信念，诡谋信念是诡谋者对自己的诡谋活动的价值确信不疑的看

诡谋论

1224

法，“是对‘将来能做成、能成功’的信”^①。在诡谋者看来，诡谋活动对自己是绝对有价值的，并且是“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极重价值，这是就诡谋活动于己有无用处、用处有多大上讲的。从诡谋活动的成功与否上讲，诡谋者确信只要他使用诡谋，该诡谋一定能成功。有了这种有用、有很大用处、用则必成的确信看法，诡谋遂成为持此种信念者的常用手段，久而久之，造就出此种人的诡谋人格。之所以说诡谋信念是诡谋人格形成的核心，原因在于无诡谋信念只能偶尔地运用诡谋，有诡谋信念必然恒久地运用诡谋。如前所述，偶尔运用诡谋形成不了诡谋人格，只有恒久地运用诡谋才能形成诡谋人格。诡谋认识、诡谋情感、诡谋意志则不同，如果没有，偶尔的诡谋也不能为之，有了也不能必然地形成诡谋人格。下面要谈的诡谋习惯是在诡谋信念基础上形成的，诡谋信念没有了，诡谋习惯将会树倒猢猻散，尽管它的散去是缓慢的而不是疾速的。

诡谋习惯是诡谋人格形成的标志。信念的外化、有形化就是习惯，正如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所说：“信念就是在我们的本性中建立的一种行动的习惯。”^② 诡谋习惯在诡谋信念基础上产生，经过无数次的诡谋运用，使诡谋成为自身需要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似乎是不经思索的本能表现。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一个人是在为人处世中，一旦需要，便自然而然地运用诡谋。诡谋人格总是寓于诡谋习惯之中，根据一个人的诡谋习惯，即可确认其诡谋人格。因此，诡谋人格的最后完成是以诡谋习惯的形成为标志的。

（二）诡谋人格形成动力

诡谋人格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斗争与统一的结果。诡谋人格形成，主要靠内力的推动，内力来自于情感，情感是引发诡谋行为的原动力。一个人最主要的情感是爱与恨。斯宾诺莎说：“爱不是别的，乃是为一个外在的原因观念所伴随着的快乐。恨不是别的，

^① 刘永富著：《论真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45 页。

^② 《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09 页。

乃是对一个外在原因的观念所伴随着的痛苦。”^① 卢梭说：“谁喜欢帮助我们，我们就爱他……谁企图损害我们，我们就恨他。”^② 因此，我们对爱与恨可以这样认识：“爱是自我对其快乐之因的心理反应，是对给予自己利益和快乐的东西的心理反应；恨是自我对其痛苦之因的心理反应，是对给予自己损害和痛苦的东西的心理反应。”^③ 爱与恨是情感的主要方面，情感是引发诡谋行为的原动力，诡谋行为是诡谋人格形成的必要条件，因此，诡谋人格形成的动力是爱与恨。

“爱与恨便分为爱人之心与自爱心以及恨人之心与自恨心：爱人之心是对于成为自己快乐之因的他人的心理反应；恨人之心是对于成为自己痛苦之因的他人的心理反应；自爱心是对于成为自己快乐之因的自己本身的心理反应；自恨心是对于成为自己痛苦之因的自己本身的心理反应。”^④ 这是一般情况下的爱与恨。作为诡谋人格形成动力的爱与恨，与之比较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有自爱心而没有爱人之心，只有恨人之心而没有自恨心。

1. 因“爱”而形成诡谋人格

自爱心体现在对权、名、财、色等物质和精神的东西的喜爱上。喜爱是动力，有了这种动力便会驱使自己追求，但是在通过正常渠道不能满足所爱的情况下，若借助诡谋能够很快满足自己所爱，那么，他在得到所爱东西而快乐的同时，诡谋手段本身也因其功效神奇而被其所爱。这样一来，前一个诡谋手段的运用便成为后一个诡谋手段筹划运用的动力。假如一个人对权、名、财、色等物质和精神的東西不爱，视这些东西如粪土，那么他还有对这些东西追求的动力吗？没有动力，则不追求，不追求他就根本不需考虑用什么手段的问题，因此，诡谋的用处再怎么大，对于他来讲实在是粪土不如。不爱不用，也就形成不了诡谋人格。

① [荷兰] 斯宾诺莎著：《伦理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02 页。

②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20 页。

③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93 页。

④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96 页。

诡谋论

爱是动力，爱得越深，动力越大。深爱着权、名、财、色等而采取诡谋方式获得者，都是一些极端自私、贪得无厌之人，也就是说凡极端自私、贪得无厌之人都是诡谋人格者的最佳人选，只要他们深爱着权、名、财、色等，又深爱着诡谋，诡谋人格则非他们莫属。

历史证明，现实仍在证明，对如下东西喜爱有加并意欲用黠慧达到目的者，比较容易形成诡谋人格：结党营私、栽赃陷害、谄媚阿谀、卖身投靠、吹牛撒谎、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寡廉鲜耻、见利忘义、见财起心、嗜财如命、见钱眼开、沉湎女色、淫荡放纵，等等。

爱己之所爱，因所爱形成诡谋人格后，更加爱己之所爱，当然，也有扩展，也有转移，但很难有根本变化，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唐代奸相李林甫是个典型的诡谋人格者，他任宰辅二十年，不知用过多少诡谋害过多少人。其子李岫担心老子不得善终，有点点化老子，曾指着正在劳作的役夫劝告：“大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李林甫明知儿子说得有理，但一生爱恋权力的他已无法改变自己的权谋人格了，所以给予儿子的回答便是：“势已如此，将若之何！”^①他是骑上虎背之人，要下来比登天还难了。

2. 因恨而形成诡谋人格

“一个人的痛苦和伤害如果是他人造成的，他便必然会恨他人，便必然会产生恨人之心。”^②他人给自己造成痛苦和伤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的，一种是无意的。“如果这种恨是对他人有意给予自己痛苦和损害的心理反应，那么，他便会对他人心怀仇恨、发生复仇心，从而使仇人遭受痛苦和损害；如果造成这种恨的痛苦和损害是他人无意给予的，是他人的优势或劣势的改善的客观结果，那么，他便会对他人心怀嫉妒、与他人发生相反情感，从而使他人

①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

② 上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7页。

遭受痛苦和损害：恨人之心通过衍生嫉妒心和复仇心而导致目的害人之行为。”^① 由于嫉妒心和复仇心而导致目的害人之行为既可以通过力的形式，又可通过智的形式，通过智的形式之中的智，可以是正智，也可以是邪智，以邪智的形式出现就是诡谋。显然，这里的诡谋是以恨为动力的，这样的诡谋用得多了，形成稳定的、恒久的、整体的心理状态便是诡谋人格。

同“爱”一样，恨得越深，动力越大，所使用的诡谋越阴险毒辣。以恨为动力的诡谋与以“爱”为动力的诡谋比较起来，前者对所有对象的损害是必然的，因为因恨而用诡谋去对付对方，目的就是要让对方受到损害而痛苦，只要运用成功，无一对象不受到损害而痛苦。后者对所有对象的损害是非必然的，有的受到损害，如以谋财为目的的诡谋，只要运用成功，对象必然有财物的损害；有的不受到损害，如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诡谋，有的即使运用成功，对象也没有什么损失，相反，还会有钱物进账（诡谋者运用诡谋时使用的钱物诱饵）和党羽增加。因此，前者运用诡谋成功感到快乐时，往往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什么利益或好处，而是因为看到对象利益或身心受损而痛苦；后者正好相反，运用诡谋成功感到快乐时，往往不是因为对象利益或身心受损而痛苦，而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什么利益或好处。

以恨为动力采取诡谋方式达到目的从而形成诡谋人格者，下列人员往往是最佳候选：对他人的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优于自己而怨恨顿生之人；自己无德无能却装模作样、颐指气使之人；心胸狭窄总认为别人跟自己过不去之人；以整人为趣、以算计他人为乐之人；幸灾乐祸巴不得除他之外所有人都痛不欲生之人；口里喊哥哥、腰里摸家伙之人；不以告密为耻、反以打小报告为荣之人；喜欢拨弄是非、造谣生事之人；吃了点亏想报复但又不敢公开叫板之人；一旦有机会出气，便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之人；……

恨己之所恨，因所恨形成诡谋人格后，所恨变本加厉，所使用

①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5~206页

诡 谋 论

428

的手段更加高明。希望诡谋人格者不谋害他人，这无异于寄希望于黄鼠狼不偷鸡，除非他们失去了用诡谋损害他人的条件。赵高与李斯合谋伪造遗诏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扶持胡亥登上皇位。不久，他觉得李斯的才能和权力都超过自己，欲除之后快。于是他设好圈套，胡亥玩得兴趣正浓时，让李斯去劝谏，惹得胡亥大怒，他乘机诬陷李斯父子谋反，导致李斯被腰斩于咸阳而灭三族。大权独揽之后，赵高又嫌胡亥不顺眼，便让亲信率兵冒充农民起义军闯进望夷宫，将胡亥杀死，立胡亥侄儿子婴为秦王。子婴当上秦王后，不甘心自己的傀儡地位，赵高恨其不听话，决定除掉。他做好安排，准备在子婴到宗庙接受王印之时，予以暗害。谁知子婴看出这一点，装病不去，就在赵高来宫中探视时，他命令两个儿子将其砍死，并灭其三族。赵高被谋害对象从根本上剥夺了谋害他人的权利，这不是他的意愿。假如他活着，他必然要实施完他谋害子婴的计划，然后再树一个敌人进行谋害，谋害完毕再树一个再谋害……如此反复，只要他不改变自己的诡谋人格，他就会生命不息谋害不止。

一个人的诡谋人格形成，不会只有“爱”的动力而没有恨的动力，也不会只有恨的动力而没有“爱”的动力，两种动力在你强我弱、我大你小中发挥着作用。当诡谋人格形成之后，要巩固和发展，仍然离不开“爱”与恨的动力，如果离开这两种动力，诡谋人格也就不复存在，就像鸟儿没有了翅膀一样飞不起来。

第七章 诡谋的政治化—— 权术（上）



政治领域，是一个人人都想进入，但并非人人都能进入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需要有相当的智慧、相当的谋略、相当的才能、相当的品德。然而，有了这些，不一定就能进入，进入了不一定日子过得滋润；没有这些，不一定就不能进入，进入了不一定日子过得不滋润。为什么？原因多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诡谋幽灵般地时隐时现于这个领域，把正常的状态搞得不正常，不正常的状态搞得“正常”，严重之时充斥其间的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阿谀逢迎、卖身投靠、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口蜜腹剑、背信弃义……简直就是邪恶与无耻、卑鄙与龌龊在政治领域里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其肮脏、腥臭大大地污染和毒害了社会的血脉——善良与正义。

一、权术和权力

权术，诡谋的政治化。说得通俗一点，权术就是诡谋在政治领域里的化名，故可称为政治权术。在这里，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权术就是谋略，就是抽空了道德与正义的纯技术性的手段和方法。汉代经学家、文学家刘向说：“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

谋 论

100

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许。”^① 据此，我们把权术定位在“小人之权谋”上，也就是把“小人之权谋”叫权术，“君子之权谋”叫谋略。在本书中，凡说到“权术”，“即意味着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口蜜腹剑、背信弃义等丑陋卑劣的勾当”^②。“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必然玩弄各种阴险狡诈、卑劣无耻的权术。政治权术从本质上带有剥削阶级的痕迹。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对政治权术的必然需求，并为政治权术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天然适宜的‘土壤’。”^③

古代中国如此，近代中国也如此吗？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现代中国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复杂。就社会主义社会来讲，它的建设需要的是政治谋略，而不是政治权术，从本质上讲，它是绝对反对政治权术的，因此它永远不会“为政治权术的滋生和发展提供天然适宜的‘土壤’”。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一阶段是从旧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④。所以，权术在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则不足为奇。某些时候、某个局部、某些人利用权术实现政治目的的现象可能十分突出，林彪、“四人帮”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在“文革”期间到底玩弄了多少权术，恐怕谁也说不清。

权术，是政治的权术，政治的最基本范畴就是政治权力。权力只要与政治挂钩，它就不是私有权力，而是公共权力。既然是公共权力，它就能统御公众，要求公众绝对服从，并且谁的这种权力越大，其统御的公众就越多，从中得到的利益或好处越大。所以，权力与利益或好处是成正比的，前者大后者大，前者小后者小，前者无后者无。因此，要想获得利益或好处，最有效的办法是获得权力，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或好处，那就争取获得更大的权力。但

① 刘向：《说苑·权谋》。

②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

③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是，公共权力资源是有限的，权力越大越稀有。在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因而它“稀”有得只有一个，一人占有了，其他人则没有。有意思的是，权力资源虽然很有限，但绝不会枯竭（除非国家和民族都不存在了）；权力始终是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不能拥有。正因为权力稀有而总是有，权力越大越稀有，权力始终只能少数人拥有，权力可以给人带来自己所希望的利益，所以，为拥有权力而争夺、为保住权力而反争夺的现象普遍存在

在一个开明的社会，为了让权力通过拥有者给社会尽可能地创造最大效益，社会的民意代表选举权力拥有者的方式往往是让他们公开竞争，这就给德才兼备者脱颖而出从而拥有权力提供最佳机会，老百姓自然愿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自己心目中认可的德才兼备之人。但是，目前我国民主法制还远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通过竞争的方式让德才兼备者脱颖而出。一个人说了算，或者几个人说了算的暗箱操作法还有广阔的市场，因此，在这个广阔的市场上，专门买卖人类智慧、良知、人格和灵魂的商贩就是权术。

权术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术是手段，权力是力量。作为手段，权术不是一般的手段，是一种以邪恶为本质、以黠慧为前提、以算计为特征的手段；作为力量，权力也不是一般的力量，它是一种要求有服从对象、能够绝对支配对方、具有非凡强制性的力量。权术不需任何部门或个人批准，认为于己有用，拿来使用即可；而权力自我赋予不算数，一般都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的授予或认可。权术不因权力存在与否而存在与否，只要是与政治相关的环境，即使不涉及权力问题，权术一样能存在其中并发挥作用，比如为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等自由而使用权术；权力可以不通过权术达到目的，其他如奖励、惩罚等手段一样能够帮助自己达到目的。权术只有在被包括权力拥有者在内的人运用时才能对对方产生影响力，而权力即使不用也能对对方产生影响力，如权力的威慑性，即使不用也让对方敬畏。权术与权力本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从古到今，还没有哪

谋 论

102

个时代完全把它们分开过。早在夏代，两者就契合得如演双簧一般了。据《左传》记载，后羿灭了国君太康取而代之之后，好似黄雀的奴隶主寒浞觊觎起后羿的江山来，他献媚讨好取得后羿的信任，当上了宰相，紧接着“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用自己的阳刚之躯勾引上后羿的妻妾，用金钱美女收买了后羿的家奴，继而合力怂恿后羿沉湎酒色田猎。后羿陷于政治泥沼而不知，完全丧失了皇宫里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当寒浞认为夺权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后羿灭亡的命运再也无法挽回。让世人不忍卒睹的是，寒浞残忍至极，为斩草除根，竟将后羿“杀而烹之”，并命令后羿之子食其父肉，其子断然拒绝，亦遭惨杀。

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在总结了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国家的统治经验，研究了法家其他学派的学说之后，把权术与权力的关系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他认为，凡聪明的君主，都应该“任法”、“用术”、“重势”。“法”是法令规章，“术”是权术，“势”是权力；只有在“任法”的基础上“用术”、“重势”，才能治国安邦。这是韩非的基本主张。在韩非看来：“术”是“帝王之具”，“君无术，则弊于上”，因此，君主必须用“术”，并为君主用“术”列出了基本的七条：“主之用也七术。”对于权力，韩非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即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一个人能否统治他人，不在于他有无才能，而在于他有无权力，所以韩非说：“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①

韩非的权术理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此话只能在中国说，若放在世界，则错了一半，即“后无来者”是错的，因为并没看到《韩非子》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在一千年后，写出了一本与之媲美的著作——《君王论》。在这本书中他说：“人人知道，为君者能言而

^① 《韩非子》之《定法》、《杨权》、《功名》诸篇。

守信，其行为能完美正直，不事机巧，不要手段，那是多么值得称颂。虽然如此，我们这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那几位十大事成大业的君王却对信字非常轻视，他们能以手腕乱人心智，且终于征服了那些信守诺言的君王们。”^①显然，马基雅维里主张君王为了获取和扩充权力，不必要守什么信用，尽可以耍手腕、使诡计，玩弄权术。

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用文字道明了权力与权术的关系，这并非说明只有他们二人才知道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即使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或者比他们更早的人，已经通过自己的实践明白，要想获得、扩大、巩固一定的权力，在通过正常渠道不能达到目的时，权术能够一遂心愿，只是这些人不知、不愿、不敢或没有能力写出来罢了。

当然，韩非和马基雅维里所论述的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君权，他们都认为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不受任何约束，而君权下的任何权力都不能与君权等量齐观，都必须受制于君权。现代社会则不同，君权也不能例外，同样受到制约，即受到法律的制约。这就是说，在当今社会，任何权力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没有无限的、绝对的权力；任何权力都要依规按律行使，为大众行使，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为个人行使。然而，完全循规蹈矩的人并不多，很多人一旦拥有了权力，要么因权欲膨胀而超越职权范围地行使；要么随心所欲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行使；要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占着茅坑不拉屎地不行使；要么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以权谋私地只为个人行使。对于这样的“行使”与“不行使”，上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权力的丧失甚至牢狱之灾。因此，为了避免劫难，不致权力旁落，他们在“行使”与“不行使”之中、之后，往往借助权术将其“摆平”。这个时候，权术对于权力拥有者来讲，等同于救命的灵丹妙药。最谙此道的应该是齐国相国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他为孟尝君凿下三窟，使其有“难”无“灾”，权力失而复得，权术于他真可谓驾轻就熟。后来

① 意。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惠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谋 论

的权力拥有者极力效仿，政治权术也因此火红而不衰。

二、权术的基本特征

134 在政治生活中，权术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人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述其不可或缺的效用时认为：“权术——谋求政治权力的‘敲门砖’”，“权术——巩固政治权力的‘护官符’”，“权术——处理官际关系的‘润滑剂’”。权术的如此效用，必然受到一些权力拥有者的高度重视，“为了实现个人升官发财的私利，他们在政治活动的实践中，必然会揣摩政治权术，依赖政治权术、发展政治权术”。^①这样一来，政治权术便有了自己鲜明的特征。

（一）对象上的明确性

政治权术，不言而喻是为政治需要而使用的权术。但政治的内涵十分丰富，政治的领域十分广阔，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矛盾）的综合产物”；“是集中表现经济的社会力量，通过争取和运用领导、决策、管理等权力，调节统治利益与全局利益等社会矛盾的过程”^②这是一个形式抽象而内容十分具体的概念。谋划政治权术之人谋划政治权术的目的绝不是追求政治这样一个抽象形式上的东西，而是追求政治内容里具体的东西，而这个具体的东西往往又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即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也是被政治化了，比如使用权术获取用兵令牌。令牌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但获取令牌的真正目的却是对军队的指挥权），而是能够领导、管理和支配一定对象的力量。从政治的权力要素和功能要素上考察，这种力量包括了三个方面：领导权、决策权和控制权。一个政治权术的运用，所指向的目标必然是三种权力中的某一个方面。

领导权，是领导者的权力。领导与权力如刀与锋的关系一样，

1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371页。

2 谢平仄等著：《社会结构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第七章 诡谋的政治化——权术(上)

当上领导就意味着拥有统领、指挥、决策和控制等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的物质承担者是领导。领导的具体称呼皆由各种不同的官职取代，官职实际上是无形的政治权力的有形化。一些人为了谋取官职用权术，为了保住官职也用权术，为了让他人得到或者失去官职照样用权术，权术是这些人的“通灵宝玉”。

决策权，是领导权的派生。一般来讲，决策权与领导权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中，两者常常出现背离，有人有领导权而无决策权，有人有决策权而无领导权。封建时代的垂帘听政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皇帝有名义上的领导权，但无实际上的决策权；决策权掌握在垂帘听政者手中，但垂帘听政者又没有名义上的领导权，被称为傀儡政府或傀儡领导的现象也是领导权和决策权分离的表现。政治决策决定着权力的归宿，关系着社会价值的导向，因此，在其决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交易，会有妥协，更会有针锋相对的冲突，由此显示出错综复杂的复杂性和扑朔迷离的神秘性。为了拥有决策权和在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或者为了让拥有决策权的失去决策权和在决策过程削弱以致消除对方的影响力，“政治家”和政治掮客们惯用的手法就是使用权术。

领导权有了，是否丧失、是否运用得当，关键在于对控制权的把握。控制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调配控制人、财、物的权力；二是对目标制定、组织实施、直到最后完成的全过程的调节控制；三是对领导自身权力的约束控制。控制权是全面有效实现政治目标的保证，第一个方面是从人和物上保证，第二个方面是从执行过程上保证，第三个方面是从内在要求上保证，核心是第一个方面，特别是对人的调配控制。对人的调配控制，说得直露一点，就是当领导的对下属的驾驭。一般说来，驾驭控制之权体现在四个字上：任、免、赏、罚。晋升和奖赏、罢免和惩罚，凡为官者绝对喜欢前者而厌恶后者。有能力的领导，对于什么时候任，什么时候免，什么时候赏，什么时候罚，任、免赏罚各到什么程度，都能根据控制驾驭之需要有理有节，恰到好处地进行。但是官场上，并非所有为官者都能凭借自己的能力进行有效控制，在不能控制的时候运用权术以

谋 诡 论

达到控制之目的的大有人在。也有一些处心积虑者，他们虽然不在领导的职位上，或者不在高于现职的领导职位上，但为了掌握人、财、物的调度权，为了控制某项目标的实施，也会借助和依赖权术。

136

为了什么权力而用权术，用术者是心知肚明的，至于针对什么对象运用权术，用术者更是心知肚明。在政治权术里，几乎是没有不特定的对象，如运用政变之术，对象是君王；运用驭臣之术，对象是臣子；运用谄媚之术，对象是上司；运用诬陷之术，对象是政敌。政治权术的这种对象的明确性，表现在先有用术的对象后有权术，知根知底、对症下药、步步为营是这种权术的特点。没有特定对象的权术（诡谋）在经济等领域中有，其表现是先有权术后有用术对象，张网以待、守株待兔、愿者上钩是这种权术的特点。如丢包诡谋、乞讨诡谋、化缘诡谋、销售诡谋、中奖诡谋等就是没有特定对象的权术在经济领域中的典型反映。

政治权术基本上是对象明确的诡谋。对象明确，除了用术时针对性强之外，再一个好处是，如果一个权术不能达到目的，就用第二个、第三个……直至目的达到为止。

宦官石显要置政敌——汉元帝的老师萧望之于死地，先是联结郑朋等诬告萧望之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离间皇帝与外戚的关系，利用汉元帝年轻，不懂“谒者召致廷尉”之意，故意在奏章上写这六个字，汉元帝马上批准了奏章，结果萧望之被逮捕入狱，实际上“谒者召致廷尉”就是逮捕入狱之意。过了一段时间，汉元帝不见老师上朝，追问怎么回事，当得知萧望之入狱之后，责问石显等人，石显马上拿出了奏章，元帝见是自己的错，不再追究石显等人，但要他们赶快放出萧望之，官复原职。石显一下慌了神，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心生一计，让同是萧望之政敌的车骑将军史高去晋见汉元帝，以维护皇帝威信为由劝说元帝收回成命。元帝年轻识浅，认为史高说得有理，遂改诏只准释放，不予官职。

目的除掉萧望之的权术虽然用后有一定效果，但没有完全达到。就在石显等人寻找机会再用权术的时候，萧望之的儿子萧汲上

书替父喊冤。石显等人欣喜若狂，马上利用其做足文章。他们串通审理萧汲上书案的官员在元帝那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萧汲上书说成是萧望之怨恨皇上，纵子以喊冤为名诽谤皇上。这时元帝又没有了主意，听信谗言地把刚封给萧望之的关内侯之职撤销。

仅撤官职是不够的，因为只要萧望之活着，他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石显于心不甘，想来想去，想到萧望之年近七十，再难忍受牢狱之苦，若让人哄他说皇帝准备将他逮捕下狱，说不定他听后会以死免苦。于是石显让人传话萧望之，萧望之听后果真按他的预想在家服毒自杀。

一计接一计，硬是把萧望之送上了黄泉路。石显既然把萧望之作为特定的权术对象，他的权术都是为萧望之定做，萧望之总是在石显暗箭的射程内，能躲一箭，难躲第二箭，能躲二箭，更难躲第三箭，被射杀是迟早的事，除非石显收起暗箭，或者他萧望之有能力让石显没有了射暗箭的条件。但是，当时的形势没能让这两种情况出现，石显的诡谋人格不可能让他良心发现从而放弃对萧望之的暗箭射杀；而萧望之在“学生”汉元帝那里已没有昔日的尊爱了，他不借助皇帝之力，单凭个人力量是无法与石显党羽抗衡的、被石显害死，是他的必然结局。

(二) 手法上的多样性

政治权术，是围绕政治所要的手腕。有人认为：“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有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权为核心的阶级关系和人民内部的全局性关系。”^①由此看来，政治是一个包罗很广，且涉及根本的、核心的、全局的问题。权术在这里运用，简单化、单色调、花架子、老一套是绝对不行的，它必须五光十色、精妙别致、变化多端、用则必灵，才能与之匹配。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多少“政治家”和政治掮客们创造了多少花样繁多的权术，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但人们已通过

^① F 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 页。

谋 论 诡

史籍、通过报刊、通过现实现象观察和体验到了，它的花色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整体上看如此，从局部看也是如此，仅就权力的一个方面——君权来讲，与其相关联的权术，手法上的五花八门足以让人慨然领略。不谈后世创造了多少，仅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列举了对付君主的“五术”、“八奸”之手法。

438

“五术”，是指蒙蔽君主，削其权力的五种权术。见于《韩非子·主道》。

之一：闭主。“臣闭其主，则主失位。”意思是臣下阻隔在君主的周围，让其闭目塞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权力和威势。

之二：制财。“臣制财利，则主失德。”意思是臣下控制了财权，自己用财收买人心，从而让君主失去对人们的恩德。

之三：擅令。“臣擅行令，则主失制。”意思是臣下擅自发布命令，让君主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之四：行义。“臣得行义，则主失名。”意思是臣下到处表现自己的仁德礼仪，让君主在民众中失去好名声。

之五：树人。“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意思是臣下给人加官晋爵，培植自己的党羽，让君主失去民众的拥戴，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八奸”是指八种危害君主，造成国家走向灭亡的奸邪之术。

其一：同床。意即：君主的妻妾、后宫的美女、善于阿谀奉迎的身边近臣等，都是能让君主迷惑的人员，邪臣用金银珠宝贿赂这些人，通过他们将君主迷惑住。

其二：在旁。意即：戏子、说笑语的人、侏儒、君主身边的近侍，都是一些善于察言观色、揣测君主心思的人，邪臣用金玉财宝玩物买通他们，并以他们的名义在宫外干坏事，使这些人死心塌地地将君主迷惑住。

其三：父兄。意即：叔伯兄弟，姑舅老表等皇亲国戚与君主义事时，君主都能听从，邪臣便对他们花言巧语、侍奉音乐美女，从而让他们借进言献策之机将君主迷惑住。

其四：养殃。意即：君主大都喜欢装饰宫殿居室高台池苑，打

扮美丽的女子和狗马，借以寻欢作乐，邪臣则加重黎民百姓负担，将搜刮来的民财用于其“装饰”、“打扮”，从而让君主沉湎于寻欢作乐中。

其五：民萌。意即：邪臣散发公家的钱财取悦百姓，以小恩小惠讨好民众，使朝野上下都为自己歌功颂德，却让君主无恩于人民，使人民眼中只有邪臣而没有君主。

139

其六：流行。意即：君主在宫中耳目闭塞，听不到各种议论，容易被花言巧语打动，邪臣则搜罗国内外能言善变之士游说君主，使君主在巧言令色、危言耸听中没有了自已的主见。

其七：威强。意即：君主以群臣百姓为强大的威势，邪臣则聚集剑客、豢养亡命之徒显扬自己的威势，并以此威势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使君主的威势不再。

其八：四方。意即：一般君主是以国小顺从大国、兵弱敬畏强兵作为国策，邪臣借此重征赋税，耗尽国财，借以讨好巴结大国强兵，甚者借大国强兵来要挟君主，使君主受制于大国强兵。

秦朝早已作古，但韩非总结的“五术”、“八奸”不仅没有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且被后来的政客们不断改造翻新，既用于“君”也用于“臣”。同时，他们还怕浪费了老天赋予他们的诡智，积极地创造权术，以表示他们对人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今天的人们当看到五光十色的权术时，一方面备感权术种类之繁多，另一方面则慨叹在这种类繁多的权术下，有多少冤魂在诉说历史的诡谲与肮脏！

（三）观念上的必要性

有人认为，政治权术产生于、发展于政治活动经验。“权术不是由圣人贤哲凭空杜撰而来，而是政治活动经验的产物。在长期政治斗争实战过程中，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体味揣摩、提炼总结、

谋 诡 论

归纳升华，逐渐形成了一些熟练的习惯手段。”^① 这是对的。但是，对权术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性的感性认识阶段而不上升到观念性的理性认识阶段。权术能够不管朝代如何更替、社会怎样变迁而始终长盛不衰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作为经验性的东西，权术总是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政治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带有浓郁的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

一旦这个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开始，与旧有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政治活动息息相关的经验性的权术也会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新的经验性的权术又会随着新的时代的开始而开始。以此为出发点，“政治家”和政治掮客们虽然既借鉴又创造权术经验，但这种“借鉴”和“创造”仅仅是从有用与否上考虑的，而不是从必要性上认识的。也就是说，权术对于他们来讲，可用可不用，认为于己有用则用之，认为没用则不用之。

事实上，权术的兴旺发达，主要不是靠经验的流传，而是靠观念的承袭，即从思想上认为搞政治就要搞权术，不搞权术就不要搞政治。（从正面讲，就是从事政治活动就要运用谋略，不运用谋略就不要从事政治活动）《韩非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旗帜鲜明、毫不掩饰地提出了君王要进行有效统治必须运用权术的主张，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一些人看来都是惊世骇俗之说。除此之外，《鬼谷子》、《老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黄老帛书》等，虽然没有《韩非子》直截了当、明目张胆，但对权术于政治之必要也提供了理论支持，尽管反对之声响彻各个时代。如战国时的荀子认为：“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汉代的王充在质问“以权诈卓犖，能将兵御众为贤乎”之后指出：“权诈之臣，高鸟之弓，狡兔之犬也。”明代的宗濂直接斥责《鬼谷子》：“捭阖、钩钳、揣摩等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则家亡，国用则国僨，天下用则失天下。”但是，权术并不以这些反对者的意志为转移，仍以观念形态进入一些从政者的思想阵地，他们

1.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一旦开展政治活动，潜意识的反映就是用权术达到目的。

即使是文化人，受权术政治非常必要的观念的影响，也十分看重权术。“许多文化人为文是在为政为谋之后：或失宠于君，或为政之余。所以，作文为末事，谋政为本业。”^① 因此，“从巫祝史官的占卦问卜、提供治乱经验到各派思想家创造、制定、兜售治国方略，从纵横游说四方、出计献策到宰相辅佐为君王执掌朝纲、制定法纪、帮忙谋军谋政，从一般文臣进谏上言、治理一方或充当军师智囊到文人学士对治国安民处世御边之谋的争势辩论，谋略性活动（包括政治权术活动）从来就是文化人安身立命的根据。”^② 基于这一点，文人一生“最大的悲哀不是在文化事业上的无建树，而是不能见用于明君”^③。秀才王莽该是个文人吧，而他却以天大的政治权术瞒骗住天下人，一举做了皇帝，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博学能文、才思敏捷的东汉末年的文学家杨修在丞相曹操手下任主簿，他明知权术是政治家的工具，特别是像曹操这样的权臣更是视之为法宝，可他自恃才高，屡屡揭穿曹操的权术，结果招致杀身之祸。

“政治家”钟爱权术、依赖权术、运思使用权术，但不希望别人识破他的权术，更不希望别人用权术来对付他的权术，若有识破者、对付者，必然予以报复，甚者除之而后快。在政治旋涡的宫廷，之所以常常危机四伏，让人总是提心吊胆，直接的作怪者恐怕非权术莫属。准此观之，权术，是政治诱发出的、千变万化的妖魔鬼怪。

（四）影响上的深广性

各个领域都有诡谋，诡谋在每个领域里都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29页。

②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29页。

③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31页。

诡 谋 论

就影响力来讲，政治权术的影响力大过任何领域里的诡谋影响力。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权术借助政治而威震四方。

任何诡谋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社会由各种要素组成，就社会的一般结构来讲，它由生产、经济、政治、文化四个要素组成。因此诡谋无论以什么样态发生，总是发生在生产、经济、政治、文化这四个要素的某个要素领域里。从影响力上看，诡谋发生在不同领域，影响力是绝对不同的，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强，有的弱，而影响最深远、最广泛的领域则是政治领域。

发生在政治领域里的诡谋，之所以影响力要比发生在其他领域里强大，并非诡谋自己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而是因为政治所处的地位不同，它好比人的大脑，能够指挥调控好比人的肢体、五脏等器官的其他领域。政治的这种特殊地位，“在于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多样性，特别是存在全面性、全局性的关系和矛盾，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种种可能危及全社会的秩序、安全、稳定的全局性矛盾，这些都不可能只依靠‘生产’、‘经济’或‘文化’的力量、方式、方法所能及时而有效地解决得了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对于非生产技术性的问题，生产是无能为力的；对于非经济性的问题，经济是难以奏效的；对于非文化观念的问题，文化再使劲也无可奈何。何况生产、经济和文化的活动、组织、关系等等，相对于政治说来，普遍具有分散性、局部性（如相关的个体性、地域性、民族性等）和非强制性，因此难以适应解决社会关系（群体之间、政党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中的那些带全局性、集中性和尖锐性的矛盾和问题。而政治却具有集中性、全局性和强制性（特别是它的国家政权），这样，便为调整、处理和解决这类矛盾提供了可能。”^① 在调整、处理和解决那些带全局性、集中性和尖锐性的矛盾中，不乏有人即使是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也会用旁门左道

^① 谢平仄等著：《社会结构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0 页。

的方式，这种旁门左道就包括权术。当权术用于调整、处理和解决那些带全局性、集中性和尖锐性的矛盾之后，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会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从而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使其“名扬”四方。李世民玄武门政变、赵匡胤陈桥兵变、武则天杀女害后、慈禧卸磨杀驴、范蠡献美败吴、张代计赚怀王、司马懿装病、朱棣装疯等政治权术，哪一个不震撼朝野，影响深远？

原因之二：权术借助文献而“名留青史”

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内容，直接记载政治权术的多如牛毛，如《左传》、《战国策》、《吕览》、《史记》等都有大量的记载，而直接记载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诡谋的则是凤毛麟角，虽然也有记载生活中诡谋的专著如明代人张应俞所著《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但因其登不了大雅之堂，而几乎不为人所知。

文献记载的政治权术，每一个都可圈可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诡谋》一书，所辑春秋战国时期的三百二十一个“奇”、“特”、“新”诡谋，绝大多数是政治权术，这些政治权术全都是来自史籍文献，每个诡谋都有自身的特点，都给后世留下印象，有些在当今几乎是家喻户晓，有些被当做权术经典被官场小人不断借用和翻新，如伍子胥的借尸还魂术、公子鲍的恶心行善术、曹景公的假手藏奸术、吕不韦的巧取天下术、勾践的软性杀人术、田骈的两面用计术等。

田骈的两面用计术是《战国策·赵策》中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魏国有个叫翟章的人，游说到赵国，赵王很欣赏他，多次请他出任国相，但被其婉言谢绝。这时有个叫田骈的说客对赵国的柱国（朝廷高级官职）韩向说：“我愿意替您去刺杀翟章。翟章如果死了，君王绝对会发怒，一定认为是国相建信君所为，从而杀掉建信君。建信君死后，最有希望担任国相的就是您了，即使君王不认为是建信君杀死翟章，建信君仍然当他的国相，您也可以因此结交建信君，建信君必然会把您当做至交，由此您会终身受益匪浅，因为您帮他除去了后患，他要感激您。”至于韩向是否采纳此计而付诸

谋 论 诡

实施，书中没有说。但此计的确是一个非常狡诈的权术。陷害对方无论成与不成，自己总能受益，这就避免了失败受损的风险。这样的权术自然受到官场小人青睐，他们把握其原则精神，不断再创造，把政治权术的社会影响一步一步推向极端。

如今，为什么权术仍有广阔市场，为什么玩弄权术者仍然可以吃香喝辣，正是与其影响的深广性分不开的。

三、权术运用的基本原则

权术是“政治家”、政治掮客以及官场小人用来为己服务的工具，这种工具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工具，一般由“政治家”和政治掮客以及官场小人自己设计、自己运用，虽然有些权术的设计、运用借助了他人的智慧，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政治家”和政治掮客以及官场小人自己，他们不认可，如同没有设计和制造。设计、运用权术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权术目的能否实现。凡属好的设计、运用就可实现权术目的，反之，则不能实现。所以“政治家”和政治掮客以及官场小人对设计、运用权术非常认真，总是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进行，这些原则就是因人而异的原则、随机应变的原则、功利至上的原则。

（一）因人而异的原则

因人而异的原则是从设计、制造上讲的，也就是根据不同的权术对象设计不同的权术，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量体裁衣般地为权术对象定做权术。要做到这一点，最起码的要求便是知己知彼。

知己，是权术主体对自身的了解和认识，即在设计权术时，既不能自不量力地不顾自己的实力和性格特点，使设计制定出的权术由于自身原因不能实施或者强行实施而惨遭失败；又不能小瞧自己，使设计和制造出的权术因力度和精度不够而不能对权术对象实行有效打击。司马懿分别装病骗过曹操、曹爽父子，可以说是典型的“知己”。他为不效命曹操而骗曹操时是20多岁的年轻人，所装

之“病”是风痹。曹操是老谋深算之辈，能让他装病骗过？遂派刺客试探。刺客手持利剑潜入司马懿房间，假装向躺在病床上的司马懿刺去，司马懿见有利剑刺来，立即意识到这是曹瞒子派来探察实情的探子，于是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探子由此确认司马懿真的患上了严重的风痹病，由此骗过了曹操。曹爽比起他的老子曹操来，诡智黠慧远远不及，所以在司马懿60多岁装行将就木的衰老之“病”时，更是深信不疑，虽然他派李胜借出任荆州刺史之机试探其病情，而李胜很快被司马懿的手抖嘴歪、把“本州”听成“并州”的假象所迷惑，从而使曹爽认为司马懿“神志不清，只剩下一具躯壳，不足为患了”。司马氏最终把曹氏好不容易夺得的江山弄到手，其老谋深算绝对比曹氏一门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够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司马氏家族对自身的了解和认识，有能力有智慧对曹家天下取而代之，特别是两次装病骗过曹操父子的司马懿，对自己了解之透、认识之深更是无人可比。

知彼，是权术主体对权术客体即权术对象的了解和认识。这一点比“知己”更为重要，因为“知己”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刻意为之，它往往通过权术主体在设计和运用权术中自然而然地得以体现，知彼则不同，不了解和认识对方，权术设计则是无的放矢。当然，也有直接通过权术来了解和认识对方的，但这绝不等于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用术，起码在设计时依据了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一定对象、一定目的等，这里的“依据”实际上是对“彼”的了解和认识，只是不那么全面、深刻而已，用权术直接去了解和认识对方，其目的就在于全面和深刻。对对方的了解和认识，其内容包括个人的基本情况、家庭的基本情况、在官场上的基本情况，如个人的习性、爱好，家庭的经济状况、人员结构，官场上的人际关系、应酬能力等等。了解和认识得越多、越全面、越深刻，设计的权术就越有针对性，运用起来越顺畅。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略人认识到的真理，权术者也会拿来为我所用。权术者为了保证设计的权术逢用必胜，也会做足知己知彼的文章。

谋 论 诡

146

知己知彼的直接目的是保证权术设计运用具有针对性，也就是说针对不同的对象设计运用不同的权术，用四个字概括便是因人而异。政治权术虽然基本上是围绕着权力的有无、大小、虚实、得失展开，但是权力一旦与某个人和某一些人联系在一起，权术运用其中的时候，没有一个权术是万能的——无论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都管用。

政治权术基本上是有特定对象的诡谋，而特定对象的个人情况又是不与他人相同的特定。由于每个官场中人的官职大小、权力轻重、心理气质、兴趣爱好各不相同，权术只能因人而异，否则，对此人管用的权术对彼人失灵，对彼人管用的权术对此人失灵。权术失灵不仅让自己使用权术的目的落空，而且带来的后果，轻则打草惊蛇，重则遭到疯狂的报复。因此，权术者为了——一举成功，往往在充分了解和认识对象的基础上，精心地设计权术。如用谄媚之术对付上级时，根据不同对象使用不同谄媚手段；如用陷害之术对付同级时，根据不同对象选用不同陷害方法；如用蒙骗之术对付下级时，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蒙骗方式。美人计是用于政治领域的常用权术，但是对象不同，方式则大不一样。范蠡、吕不韦、王允都使用美人计，在对象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使用美人计的具体操作方式是有很大大区别的。

范蠡使用美人计的对象是打败了越王而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吕不韦使用美人计的对象是在赵国做人质而处境十分可怜的秦公子异人，王允使用美人计的对象是手握重权、横行霸道的董卓。在具体操作方式上，范蠡采取的是“敬献”，即把从全越国遴选来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恭敬庄严地送给吴王夫差；吕不韦采取的是“割爱”，即在酒宴上，让已怀上自己骨肉的赵姬给异人敬酒，从而使久违女色的异人看到如此美女而怦然心动地要求吕不韦忍痛割爱；王允采取的是“双嫁”，即将府中歌伎貂蝉先许嫁吕布、后送给董卓为妾，以此离间两人的义父子关系。他们为什么要采取各自的方式呢，互换一下行不行？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假如范蠡把“敬献”改成“割爱”或者“双嫁”，吴王会与他国之臣的范蠡同桌饮酒从而要

走他的至爱西施和郑旦吗？吴王的臣子如伍子胥等敢于为了得到西施和郑旦而谋反杀死吴王吗？显然这种假设是非常荒谬的假设，只有“敬献”才是最得体的方式。范蠡的“敬献”改成“割爱”或者“双嫁”不行，那么，吕不韦的“割爱”改成“敬献”或者“双嫁”、王允的“双嫁”改成“敬献”或者“割爱”行吗？同样不行。异人当时的身份不够，若“敬献”会弄巧成拙，若采用“双嫁”则更是不必，因为吕不韦不是要害死异人而是要保护异人，保护则无必要为自己树一个“情敌”。董卓与吕布是义父子关系，若把貂蝉只“敬献”给董卓，吕布的杀父之心就不会产生，若采取“割爱”之法，同样不能让吕布产生杀父之心，除非除掉董卓的任务由貂蝉本人完成，但是貂蝉仅凭一己之力是担任不了这一重任的。

447

三人使用美人计，三人取得成功，这是他们因人而异地采取不同操作方式的结果。所以，因人而异成为政治权术运用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 随机应变的原则

与其他领域比较，政治领域的变数最大，且与人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密切相关。拥有决定他人前途命运的权力者，有时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让跟随者们揣摩半天：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说这样的话，要用这样的眼神，要做这样的动作？是不是有的人要失宠，有的人要得宠？有的利益要重新分配，有的人事要重新安排？有的人错解了他的意识，有的人对他构成了威胁？权术者如果正在对此权力者使用权术，那么遇上这样的情况，更要揣摩，揣摩的目的就是以其心理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权术。假若不调整，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新的对策，权术的实施要么不能顺畅进行，要么前功尽弃。

随机应变，关键在于变。敌变我变是一种变，敌不变我变又是一种变。前者是动态对动态的变，即对方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或者对所用权术引起了怀疑，权术者为了适应新情况或者为了打消其怀疑

谋诡论

148

而调整变换对策；后者是动态对静态的变，即对方的情况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其所用权术却始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而调整变换策略。调整是在坚持原有权术框架的基础上，对不适应或不能发挥作用的部分进行改变；变换是停用原有权术而更换新的权术。根据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在权术运作中，动态对动态的变大大多于动态对静态的变，对权术部分进行改变大大多于对整个权术的改变。

权术者玩弄权术，所针对的对象并非傻瓜、呆子，大多是具有相当辨识能力的聪明人，若在权术的设计上某个方面不严密，在权术的运用上某个地方不妥当，或者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权术设计已不能适应变化的需要，权术对象必然会从中发现问题因而引起警觉，你若不及时调整变换，失败是必然的。所以，随机应变成为权术者用术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贯彻落实这一原则，对于权术者来讲，有三点要求必须满足：

一是洞察力。随机应变的前提是对“机”的捕捉和把握，“机”是机会、时机、事情的变化、变化中的关键，捕捉和把握这样的机会、时间、事情的变化、变化中的关键，第一要务是观察。只有观察得仔细、深入、清楚、透明，才能对“机”进行有效捕捉和把握。所以，一个权术者要想在用术中稳操胜券，洞察能力对于他们来讲至关重要。像赵高、李林甫、秦桧、严嵩等诡谋人格者，哪一个在这方面不显得高超？赵高谋害李斯，在洞察到李斯想见皇上的迫切之心到达极点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予以利用，即在胡亥玩得正起兴的时候让其晋见，使胡亥烦透李斯而为最后害死李斯铺垫基础。严嵩在谋求爬升的阶梯上，通过洞察捕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冀王与兴王谁先进京谁当皇帝的信息。严嵩与兴王朱厚熜并无交往，但他装扮成测字先生达到了接触朱厚熜并献计让朱厚熜当上了皇帝，他也随之时来运转、官运亨通，很快爬升到了丞相的位置上。

二是灵活性。灵活是随机应变的核心，有灵活就有随机应变，无灵活就没有随机应变。应变就是以灵活的方法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这在权术的运作过程中，特别是与对象面对面交锋时显得尤为

重要。权术本来就是见不得人的算计对象的方式，当对象不按你的套路进入圈套，或者进入圈套后对你的算计有所察觉，或者意外情况发生让对象即将脱离圈套，这时的你为了保证权术的成功，必然采取相应措施，或者变换诱饵，增加圈套的迷惑性；或者编造原因，释疑解惑；或者假惺惺自责，以守为攻；或者虚张声势，以攻为守……总而言之，一句话，见风使舵、灵活应对，把站在圈套外的及时诱入圈套，把已在圈套里的牢牢稳住而不让其脱离圈套，把有所察觉而引起怀疑者的怀疑马上消除。大凡权术者，特别是诡谋人格者，都是一些八面玲珑之人，在对付权术对象上都常能做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

449

三是镇定心。权术者用术，心中必定有鬼。按理说，心中有鬼必定心慌意乱，心慌神乱必然导致言行扭曲，言行扭曲的结果就是露出行术破绽，由此导致权术失败。如果所有用之术都按这一逻辑发展，那么权术就没有成功之例了。可为什么成功的权术多如牛毛呢？除了权术对象辨别能力有问题，对行术破绽看不出来而让行术者成功之外，更多的得益于权术者镇定的心态。他们在行术的时候，已经不认为或者不在乎自己的行术是在行恶，因而没有罪恶感的重负，没有如此重负，行术起来自然不会心慌神乱。再者，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对付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这样的变化，再难也可以迎刃而解，再险也能化之为夷，所以他们觉得没有理由心慌意乱。基于这两点，他们以镇定自若的心态对付哪怕是灭顶之灾的突发情况时，往往能够收到化险为夷、起死回生之效。三国时，周瑜、黄盖施苦肉计破曹成功，其中一人功不可没，这个人就是替黄盖献诈降书的阡泽。阡泽面对的是老奸巨滑、极善权术的曹操，非一般心态者不能镇定以对。曹操接过诈降书反复看过之后，突然拍案大怒道：“黄盖用苦肉计，派你来下诈降书，就中取事。你居然敢来欺诈我！”说完便叫左右将阡泽推出斩首。左右遵命簇拥阡泽而下。对于曹操这种突如其来、直指献诈降书是欺诈的架势，阡泽若表现出半点慌乱，他的性命不保不说，黄盖所受的打则是白挨，能否破曹更是一个未知数。这时的阡泽表现出前所没有的镇定，他

谋 诡 论

面不改色，仰天大笑。这一笑让曹操疑惑地发问：“我已识破奸计，你何故大笑？”阚泽镇定自若地一番合情合理的解释让曹操信服，从而使许降书敬献成功。试想，阚泽若是慌乱而不镇定，情况会是怎样？恐怕三国的历史不是现在的样子。

（三）功利至上的原则

150

权术用于政治，谋求的是功利价值。除了功利价值之外，权术者用术再没有别的追求。由于权术者与权术对象之间建立的是直接的利害关系，用术的过程是这种利害关系的对抗与转化过程，在对抗与转化的过程中，功利价值始终处在轴心的位置。围绕着功利价值而展开的权术，用术者已不知情义、廉耻为何物，即使知道，也被其抛到了九霄云外。为了捞取非分的功名利禄，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使阴招，加害于与他一决高下的竞争对手，或者诋毁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僚，甚至是出卖曾经提拔重用过他的老上级。出现此等情况，原因不是用术者的意愿问题，而是权术自身的要求。

权术本来就是一个排斥道义、只讲功利的神物，离开功利，权术不存在；有了道义，权术不成其为权术，世上没有一个不讲功利的权术，因此，功利至上作为权术运用中的一项原则确定下来，符合权术的本质要求。

功利作为一项原则，它除了功名利禄一层意思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功效和利益。“利益”在功名利禄之意中有所包含，但“功效”是功名利禄之意中所没有的。权术者在运作权术中总是把利益放在第一、至上的地位，但同时也讲究功效，即功能和效率。

权术经过设计，方可运作，运作之中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否在预计的时间内达到了设计的效果，这是功能所包含的内容。权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权术者基本上都是在急功近利的定位上运作权术。因为如果在追求成效和利益上不是放在目前而放在长远上，那就很可能因时间长权术的秘密守不住而让对象识破，很可能因外界环境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而让权术无法继续实施，很可能权术主体自我控制力减弱而导致权术流产。像王莽那样将自身伪装几

十年的权术个例实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个例都是在短期内完成的，一眨眼就完成一个权术的例子并非鲜见。比如曹操行刺董卓被其发现，灵机一动说是“献刀”，随之将所谓的宝刀递了过去，由此渡过了危机。

把权术定位在急功近利上，为此，权术者在设计权术的时候，都把简明、捷径、易行、实用作为基本要求。倘若把权术设计得复杂、繁琐、难行、不实用，这样的权术能够达到急功近利的效果吗？一个权术的功能要想得到充分发挥，除了要求设计上简明、捷径、易行、实用外，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求做到干脆果断而不拖泥带水、灵活机敏而不拘泥死板。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功利如愿获得。

权术运作的结果，有成功与失败之分，成功者中有大成功和小成功之分。大成功是代价最小获利最大的成功，小成功是“敌死三千，我损八百”式的成功。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权术运作的效率问题。所谓权术运作效率，是指权术运作所获得的功利与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比率。若用公式表达，就是：权术运作效率 = 功利/消耗 × 100%。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投入或消耗的多少。权术运作取得大成功，则权术运作效率高；小成功则效率低；失败则是负效率，即虽然投入了或者自我消耗了，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取得功利。

权术的运作效率与诡谋的动态特征之一——追求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是相通的。实际上，追求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既是诡谋的特征也是诡谋的原则，说它是特征，是因为它鲜明地反映了诡谋的一个重要征象；说它是原则，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法则在诡谋运用中坚定不移地得以遵循。客观地讲，权术运作效率是对其执行情况的一种评估。当然，权术运作效率在功利至上原则里面的价值不在于评估，而在于通过评估而使运作中的权术获得大成功，即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曹操由行刺变为“献刀”的权术，从行刺上讲，行刺不是权术，且失败了；从“献刀”上讲，献刀是权术，且取得巨大成功，假如他不假以献刀来欺瞒董卓，而直接以壮士的态

谋诡论

度说是来行刺的，那他绝对是性命休矣——杀人如麻的董卓会把一个要自己性命的人留在世上吗？这个献刀权术尽管是急就而成，但十分符合简明、捷径、易行、实用的要求，且付出的代价即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小得几乎不能再小，仅把行刺所用之刀送给了董卓，完全可以称得上权术中的经典。



第八章 诡谋的政治化—— 权术（下）

153

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权术，权术借助政治而发迹。得益于权术的“政治家”和政治掮客们，常常用出卖良知得到的金钱，在谁也看不到的心灵深处摆下盛宴，以酬谢为他们获取政治利益或好处而立下汗马功劳的权术。受损于权术的政治中人，往往把心中的愤懑、怨恨、冤仇集聚于口头、笔端，不断地对影响了他们前途命运的权术口诛笔伐。而权术到底是经过了千百年的修炼，宠辱不惊、贵贱不论地在各种场合我行我素。宫廷因为有它你死我活，官场因为有它你争我夺，办公室因为有它你苦我乐。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论述：权术应用于官场，权术应用于宫廷，权术应用于办公室。

宫廷、官场、办公室，作如此场合性划分并不科学。宫廷、办公室是有形的，官场是无形的，无形的官场指的是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官吏阶层开展活动也会在宫廷或者办公室。即使是有形的宫廷、办公室，也是交叉的，宫廷里有办公室，办公室只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从九五之尊的皇帝到一个吃皇粮的小小办事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明知不科学，明知划分时没有统一的标准，作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划分呢？这是从“说话”方便、突出重点上考虑的。宫廷是政治的中心，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是百官围绕帝王旋转的场所。权术在这个地方如何表现，我们将专门论述。对于办公室，我们作这样的界定：处于最低层吃皇粮的办事人员办理政治事务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权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是全部的作用；权术

谋 论 诡

134

在这个地方既可以围绕权力展开，也可以围绕与权力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是直接围绕权力的如工作权利、工作好坏、工作差别、工作报酬等方面展开。对此，我们也将专门论述。官场则是各种官吏从事政务活动所涉及的范围，这个范围说小只是一个人工作的处所，说大则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在这样的范围里权术怎样表现，我们将综合阐述。这种综合阐述也涉及宫廷、办公室里的权术现象，但只是抽象的、原则的、概括的涉及。因此，我们先探讨这个方面。

一、权术应用于官场

在官场，为官者有正邪，为官者的目的也有正邪，为官者的手段更有正邪。就正邪的比例来看，手段的正邪之比与目的正邪之比和为官者正邪之比是不对应的，邪手段总比邪目的、邪为官者要多得多。因为即使是正直的为官者有时也要用邪手段达到正目的，前面列举的孙中山用美人计赶走朱庆澜的例子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歪门邪道、旁门左道的权术在官场十分盛行，故权术能够存在、能够发展，特别是能够不断翻新，最大的功劳应该记在官场身上，是官场这个把权欲、财欲、色欲、名欲、仇欲等揉杂在一起并让其充分表现的场所，为权术提供了其他场所难以比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文献记载了大量权术应用于官场的事例，很多人包括韩非这样的大家对官场权术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从中看到了权术在官场应用中的作用、特点、原因、招数、危害、对策等。本书仅从招数上对官场权术进行探讨。

权术应用于官场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主动出击可收奇效；二是防守蛰伏可保安全。要想这两个作用得以充分实现，招数的选择、设计、运用意义特别重大。

（一）主动出击之招

主动出击可针对上下左右展开。上，即上司、上级；下，即下

属、下级；左右，即与自己基本上在一个级别上的同僚，也包括敌对一方。

1. 针对“上”

《权术论》的作者对专制集权制度下的“对上”概括了六种招数，即：“一是利用游说之术等手段以‘诱上’，迎合君主或上司的心理，游说鼓吹，狡言诱惑，以口舌取功名。二是利用谄媚之术等手段以‘谀上’，或恭顺卑从，或歌功颂德，或献妻进女，或舔痔吮痈，以图达到‘上不憎而善生，恩泽洋溢过度’的目的。三是利用贿赂之术等手段以‘贿上’，直接用金钱珍玩换取政治权力。四是利用韬晦之术等手段以‘惑上’，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韬光晦迹，矫情诈忠，企图骗取信任和重用。五是利用结党之术等手段‘逼上’，结党以营私，挟党以自重，迫使君主或上司不得不授予其更大的权力。六是利用政变之术等手段以‘反上’，直接从君主或上司手中夺取权力”¹。这六种针对“上”的手段，在今天的官场是否存在呢？一样存在，包括“反上”之术。凡是经历了“文革”的人，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恐怕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其中一大罪行就是意欲谋害毛泽东主席，准备发动政变，只是其阴谋被挫败而已。六种针对“上”的招数中，用得最多的是前四种，它方便个人单独灵活操作；后两种事关重大，非一般权术者能为、敢为，但是若为之而成功，所得到的政治实惠则比前四种招数要大得多，特别是“反上”这一点，其他招数无法企及，因为你无论怎样“诱上”、“谀上”、“贿上”、“惑上”，他不会让你取而代之，而“反上”则可做到这一点。

上述六种招数是针对“上”的基本权术手段，由这些基本权术手段生发开来的是五花八门的具体做法。如“谀上”的具体做法就有：不怕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奉承吹捧，投其所好、博取欢心的取悦讨好，不讲原则是非、一味顺从的迎合驯顺，卑躬屈膝、甘当儿孙的巴结投靠，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一无是处反衬上司英明正确、

¹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谋 论 诡

158

高贵尊荣的自我贬损等。当然，这些具体做法还不是最具体的，最具体的是每个“谀上”者“谀上”时直接采用的行为方式。比如，春秋时的易牙阿谀齐桓公的方式是杀掉自己的儿子做成人肉菜，献给什么都吃过就是没有吃过人肉的齐桓公。再比如，武则天时代的宰相杨再思阿谀武则天的方式是出奇赞美她的男宠张昌宗，在别人都赞美张昌宗美若莲花时，杨再思的赞美则胜人一筹，他说：“人言六郎（即张昌宗）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①又比如，同样是阿谀武则天，有个叫侯祥的官员所用方式则是自称“阳道壮伟”、“专欲自进”，愿听从女皇调遣，随叫随到地供淫乐享用。

2. 针对“下”

有人认为，“上”对“下”不需要采取什么权术手段，原因很简单，“下”是被领导，相对于“下”的“上”是领导，领导对被领导完全可以采取光明正大的包括谋略在内的统御方式，采用什么权术手段岂不多余？其实不然。

对下不用权术的领导有三种：一是这个领导非常有能力且道德品质高尚，他能通过权力影响力和非权力影响力正大光明地达到领导的目的，权术对他来讲，没有必要采用；二是这个领导德高才平，由于才平，本可以借助权术加强领导，但受良心制约，放弃使用权术；三是这个领导德不行才也不行，并且才不行到对权术的运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他不会使用权术，若用，必然会穿帮露馅，比不用更糟，这样的领导是想用而不会用。

什么样的领导对“下”喜使用权术？两种人：其一，能力非常强但道德水准差的领导，这样的领导喜欢用正邪两种方法统御管理，所用邪法中自然有最能体现其智能水平的权术；其二，能力一般、道德品质低下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无德无能，靠正经的方法难以服众，只好用包括权术在内的旁门左道。归纳起来，他们对下使用权术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方式。

欺诈瞒骗。不搞实事求是，不讲公正、公平、公开，采取弄虚

^①《新唐书·杨再思传》。

作假、欺诈瞒骗的暗箱操作方法进行领导。这种人常常把政策藏在袖筒里，何时用、何地用、对何人用，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这种人常常以上级组织、上级领导的指示的名义作出利己不利人的管理抉择，而上级组织、上级领导却根本就没有作过这样的指示。这种人常常许愿承诺，只要按他的要求做了某件事，做事者必然得到表扬表彰或者加官晋爵，其实他压根儿就没有打算这么做；为了给自己台阶下，找出各种原因进行搪塞，或者再许一次愿、再作一次承诺。这种人的如此权术并不高明，有的相当拙劣，但他以权力作后盾，你也一时奈何不了他。

457

制造矛盾。为便于驾驭、始终处在仲裁者的位置上，故意在下级中间制造矛盾，或者放任下级之间本已存在的矛盾，使其互争互斗，如果谁找他解决问题，他要么哼哼哈哈当和事佬，让其矛盾继续存在；要么先火上浇油让矛盾升级，等他出面解决问题时，双方的心理隔阂再也难以消除了。特别是对于协助自己搞管理工作的副手，他们更是让副手之间你奸我毒、矛盾重重，这样他就不担心副手联合起来对他构成威胁，并且双方都要依附于他，借助其力量打压对方。

褒贬无常。按常规，做得好的予以褒奖，做得不好的予以贬斥。但权术者出于统御需要则不按常规办事，对于做得好的，他时而褒奖，时而不褒奖，时而歪找理由说其做得不好而予以批评；对于做得不好的，他时而贬斥，时而不贬斥，时而歪找理由说其做得好而予以表扬。这样一来，部下便无所适从——做好不是，做坏也不是，无所适从的结果就是不能按常规办事，只能按照他的意旨办事，凡按他的意旨办事者，褒奖可能没有，但贬斥是绝对没有的。这里的褒奖包括提拔重用，这里的贬斥包括革职查办。

恩惠笼络。有权授予官爵职位的给忠于自己者授予官爵职位，没权授予官爵职位的则用金钱、名誉、权利、待遇等笼络。他们对所施的恩惠并非一次性给予，而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受赐者更多地品尝其恩惠的滋味。同时，在给予的时机、姿态上做足文章：需要及时的故意拖延给予，需要拖延的偏偏及时给予，目的在

谋 论 诡

于让受惠者感觉到迟给或早给都是施予者经过努力的结果；有的给予时大张旗鼓，让人人知晓他在施恩于某某，有的悄悄进行，让受惠者感觉到这恩惠是不该得而得，从而对施予者感恩戴德。

3. 针对“左右”

在一个系统内，“左右”即指与自己差不多处在一个级别的同僚，或者是本系统外的另外系统特别是敌方系统。很显然，“左右”既可指对方整个系统，也可指对方系统中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一个人。

另外系统特别是敌方系统的“左右”，应对的权术招数更多，三十六计均可作为权术招数来对付对方。有人把三十六计分成六套，每六计为一套，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情况下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情况下所用之计。三十六计中，本身就是诡谋之招的不少，如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笑里藏刀、假道伐虢、偷梁换柱、美人计、反间计、苦肉计等，这些计策被无德之人反复运用，权术者更是将其用于政治，使政治成为了权术者施展黠慧诡智的战场。

对于一个系统内的“左右”，所用权术招数主要有以下几种：

挑拨离间。这是权术者坐收渔利的拿手好戏。在同僚之间拨弄是非、挑起争端，使之相互猜疑而明争暗斗。他们最希望的是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即使不能两败，一败也可以，毕竟少了一个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挑拨离间的方式，有的是有意泄密，即把甲背着乙或者乙背甲所说的对方的坏话互相转告；有的是添油加醋，即把甲或乙不疼不痒地对对方发表的一点议论添油加醋、无限夸张地变成恶毒攻击的坏话让双方分别知道；有的是无中生有，即甲或乙根本就没有说过对方的坏话，但经过一番“合情合理”的虚构变成坏话让双方分别知道；有的是借助已发生的对甲或乙不利的事实，与甲或乙共同“分析”这种不利的事实为什么会发生，从而得出只能是对方所为的结论，借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

诬蔑陷害 如果说挑拨离间是一种坐山观虎斗式的权术招数，

那么诬蔑陷害则是针锋相对式的权术招数。诬蔑陷害就是凭空捏造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实来算计对方。比如捏造对方贪污腐化、徇私舞弊、作风不正、搞阴谋诡计等，并且在捏造这些事实进行散布或者向上打小报告或者匿名举报的时候，能够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情形、人事，做得“合情合理”、“有根有据”，让接受者乍听相信无疑，细琢磨也还是将信将疑。若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很难澄清被诬蔑陷害者是清白无辜的。假如被诬蔑陷害者本身就有不少毛病，那么对于来自经过精心编排的无中生有或者夸大其辞的诬蔑，他的处境则是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诬蔑陷害的杀伤力、有效性比挑拨离间大得多，因为挑拨离间需要被挑拨的双方互相认可，并且在认可的基础上再为此而争斗，而诬蔑陷害不需要被诬蔑者表态。脏水如倾盆大雨般泼去，被诬蔑者若无防备则成落汤鸡，若有所防备，也因脏水泼得太猛烈而弄脏衣服。因此，诬蔑陷害成为权术者惯用的手段。

借刀杀人。借他人之手来损害对手谓之借刀杀人。借刀杀人是一种间接损害“左右”的权术招数。借的方式既可以是暗借，又可以是明借，既可以是恶借，又可以是“善”借。暗借，是所借之人不知道被借，权术者因势利导地让对手进入虎口，朱元璋借元陆军统帅陈野先之手杀死“大舅兄”郭天叙、“叔丈人”张天佑便是这种情形。明借，是所借之人知道被借，被借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心甘情愿地帮助借者完成损害其对手的任务，曹操借孙权之手攻杀关羽就是这方面的实例。恶借，是指先造谣中伤对手而后让第三方力量将其损害。例如，希特勒为除掉最危险的对手苏军元帅屠哈切夫斯基，先伪造屠哈切夫斯基与德国高级将领之间的通信，然后借苏联肃反之机，让斯大林以其通敌罪将其判处死刑。“善”借，是指表面上支持抬举对手，实质上是要把对手送给第三方力量损害。明代戏剧《三祝记·造陷》讲的就是具有此等内容的故事。此出戏写的是范仲淹的政敌以以德报怨、不计前嫌的姿态，极力举荐他担任军队的统帅——环庆路经略招讨使，去平息西夏人赵元昊，实质上，政敌是要借西夏人的刀砍下范仲淹的头。其实，借刀杀人只是

谋 论 诡

一种权术招数的代号，并非用此术者非杀人不可，大都是让对方不能获得更大的权力、职位或者让其已有的权力、职位随之丧失，再就是让对方名声受损等，将对方真的“杀掉”的情形为数不多。

（二）防守蛰伏之招

133

权术者一般都是恶性难改，以用术进攻为能耐，不过他们也深知，用术进攻越多，树敌越多，被攻击则越是在所难免，所以他们会防守蛰伏。防守蛰伏不是被动的退让，而是主动的撤离，等风头一过，力量积蓄到自认为足以进攻的时候再反扑。但也有这样的权术者，他们一开始就以防守蛰伏之姿态来对付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如王莽之流。还有一种权术者，他们使用防守蛰伏之权术，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如蔡锷为避免遭袁世凯毒手而纵情声色犬马。防守蛰伏的最大功能是能够有效保全自己。其常用招数有以下几种：

1. 伪善

表面善良、实质邪恶谓之伪善。伪善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是麻痹政敌、蒙骗世人、有效保护自己、积蓄斗争力量的最佳手段。这样的权术者本来野心勃勃、权欲荡荡，但经过伪装掩饰，显得胸无大志、与世无争；本来仇恨对方、欲置对方于死地，但故意向对方伸出橄榄枝，与对方套近乎，讲友好；本来私欲多多、贪图享乐，但为了博取名望、捞得政治资本，表演性地吃粗淡的饭、穿朴素的衣、住简陋的房，出门以步代车；本来见利忘义、贪得无厌、拿了俸禄不愿干正事，但为了树立自己廉洁勤政、慈悲为怀的形象，凡公众场合，都要把为老百姓谋利益挂在嘴边，都要义愤填膺地痛斥腐败，都要带头捐款捐物，都要慷慨陈词地愿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莽可以说是伪善的最典型代表，他以清廉俭约、尊老孝长的伪善蒙骗朝野上下几十年，非一般伪善者可比。但一般伪善者又多如牛毛。时下，只要你稍微留心观察一下某些领导干部台上台下、人前人后的表现，你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伪善。

2. 自损

自己损害自己谓之自损。一般来讲，人是不愿意自己损害自己

的，但是为了保全实力、保全性命、保全权位不得不用自损权术。所谓不得不用，原因在于用术者经过权衡，认为使用其他权术不足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唯有自损才可化解。权术中的自损与非诡谋自损是有区别的。非诡谋自损有两种情况：一是被逼自损，一是无逼自损。无逼自损是一个人做错事后良心发现而以自我损害来求得心理平衡，如小偷戒偷而自剁手指。权术中的自损不是这种情况，它是被逼性的自损，但与非诡谋中的被逼自损又有区别。非诡谋中的被逼自损是在对方监督之下、不情愿地自我损害，如小偷被抓住，在对方要求剁掉手指才能放人时，自己极不情愿地照办。权术中的自损虽然有被逼的成分，但它是经过权衡利弊之后的自愿的自我损害。也就是说，权术中的自我损害的主动权在自己，而非诡谋性被逼损害的主动权不在自己。

481

自损，既可以是物质的损害，即金钱、财产和身体的损害，又可以是精神的损害，即权利、威信和名誉等的损害。物质损害莫过于以生命为代价，杀害忠良以迁就奸佞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努尔哈赤在创建基业时，为了防止出现更大的骚乱，不得不暂时屈服权势中天的四大贝勒和五位大臣，以他们栽赃诬陷的罪名，忍痛割爱地杀掉了战功卓著的亲生长子褚英。精神损害莫过于自污，让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萧何全心辅佐刘备打天下，仍然避免不了牢狱之灾，原因是他为民请命，建议将皇苑改为民田，刘邦认为这是他收买人心，为个人邀誉。后来萧何听从门客建议，大量以低价收买田地，导致百姓怨声四起，纷纷向朝廷告发他害民。刘邦见此高兴不已，从此不再为难萧何，萧何也由自损之术保全了自己。

3. 隐忍

把不利于自己的事情藏在心底的忍耐谓之隐忍。在官场，韬光养晦是一些权术者用来自保，以便来日一展身手的常用手段。隐忍是韬光养晦手段之一种。这种手段的最大特点是用理智控制情感，把他人的憎恶仇恨藏于内心，不让其表现出来而招致麻烦。隐忍与伪善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隐忍与伪善都需要对情感进行掩饰，而隐忍掩饰是针对对手损害的情感掩饰，伪善掩饰则是针对

谋 诡 论

162

内心恶欲的情感掩饰。因此，伪善必须隐忍，隐忍不必伪善。隐忍的关键是克制，能否克制直接关系到隐忍的成败，隐忍的成败又直接关系到能否保全自己。隐忍是在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与对手抗衡，但又不让对手搞垮自己的防守措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权术者，都在隐忍的过程中把握住了这么三个环节：佯装不知、知而不争、认错愿罚。

明知对手已经对自己采取了损害措施，自己佯装不知，自认倒霉、甘愿吃闷亏地接受损害，这是第一个环节。有些来自对方的损害，佯装不知不现实，只能知之之后在所持态度上不反对、不抗争，更不报复，尽量地退让，能退让到什么程度就退让到什么程度，就像做错了事的小学生对待老师的批评一样，这是第二个环节。如果这样隐忍还没有十足把握保全自己的话，那么就与内心情感完全相反的态度去对待对手的损害，比如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对手承认错误，请求对手谅解或者处罚，这是第三个环节。南宋奸臣贾似道最会玩弄这一手。他飞扬跋扈、蔑视朝纲、作恶多端，引起群臣公愤。每当朝臣弹劾他、皇帝准备对他采取措施时，他便跑到宋理宗那里，讲明原因，主动检讨，并要求皇上罢免他的职务，结果是宋理宗念其态度诚恳、主动认错而不予追究。贾似道在保全自己之后，便变本加厉地迫害弹劾他的大臣。贾似道虽然不是直接向对手认错讨罚，但以间接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其隐忍之功更加高明。

三个环节，如第一个环节可达目的则不进入第二个环节，如在第二个环节可达目的则不进入第三个环节。在此，权术者同样遵循着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利益的原则。

二、权术应用于宫廷

一个王朝一个宫廷，王朝的最高权力浓缩在宫廷里，宫廷是一切政治权力的发祥地。如果说宫廷所在的京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那么中心的中心就是宫廷，而宫廷里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皇权。皇权的运用与争夺使宫廷成为不是战场的战场，权术在这个特

殊战场大行其道，演绎出一幕幕变幻莫测、诡谲怪诞、惊世骇俗的活剧来。

(一) 宫廷对权术的作用

权术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能够新奇、怪异、巧妙，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有宫廷的存在。

163

1. 宫廷是利益分配的决策所，权术因而吃香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 基于这一点，至高无上的皇权可以独断天下，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可以决策海内。独断、决策，归根到底关系到利益的分配。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包括物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利益等，主要是物质利益。利益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不是谁想占有有什么利益就占有有什么利益，想占有多少就占有多少，决定哪个阶级、哪个阶层、哪个集团甚至哪个个人的利益怎样分配、分配多少的权力在宫廷。一个人的贫富、贵贱在有宫廷存在的社会里，不是由其能力大小、对社会的贡献多少决定，而是由宫廷所作出的决定、所制定的政策裁夺。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是人开展活动的动因。如果任这种天性发展，不顾道德地追求利益，采用邪恶的手段便是必然，而邪恶的手段中自然包括权术。无德之人越多的宫廷，权术越是吃香，因为权术所到之处，利益就以权术者的意志为转移。

美国一位国防部长在我国的国防大学演讲时，头一句话讲的就是西方世界所公认的真理：“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② 这话反映在我国古代的宫廷中，仍然具有真理性。为了保住既得利益，或者为了再分一杯羹、再多分一杯羹，玩弄阴谋、以敌为友者绝不是个别，使用诡计、出卖朋友者也并非鲜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靠阴谋诡计将利益保全或者获得利

① 《诗经·北山》。

② 柴宇球编著：《谋略论》，蓝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谋 论 诡

益的做法，通常在形式上“合情”、“合理”、“合法”。原因很简单，他们是决策者，公权私化，整个国家管理决策的过程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实施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过程是不公开的，所以其中再怎么邪恶肮脏外人也是无法知道的。想想看，如此“合法”化了的权术怎不吃香于宫廷？

104

“吾宁斗智，不斗力”的刘邦，熟谙权术，在解决恩仇矛盾上，不以恩仇了断，而从皇家利益出发，采取仇将恩报和恩将仇报的举措，不愧术坛大腕。

一次偶然的机，称帝不久的刘邦发现一些将领说话神秘，有意躲避他，遂招张良进宫问其原因。张良所答让刘邦大吃一惊。原来，刘邦称帝后大封王侯，但所封者都是与其亲近的人，那些与其疏远的有功之臣，不仅得不到封赏，而且有的还遭到屠戮，说话神秘的将领们是在议论该不该谋反。一般情况，君主听到有人意欲谋反，采取的对策就是高压，将意欲谋反者统统杀掉，甚者诛其九族。狡诈的刘邦考虑社稷刚建，稳定人心最重要，他没按常规办事，采纳张良之计，把曾背叛自己投靠项羽、早就想杀掉但因念其有功而暂没杀的雍齿封为什方侯，并大摆宴席庆祝，以此昭示天下，他心胸开阔、处事公道。这一招果然很灵，那些有功有过的将领们见刘邦对自己最痛恨的人都能既往不咎，给予封赏，一个个再没二心，表示坚决效忠朝廷。

与此相反，有恩于刘邦的丁公就没有雍齿的幸运。在彭城一战中，刘邦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丁公和雍齿率部一路追来，丁公追上刘邦后，刘邦自知性命难保，回头对丁公说：“丁公，这次我可逃不了啦，我知道你是条好汉，我也是条好汉，好汉是不为难好汉的，今天你放我一马，我永远记得你。”丁公见时为汉王的刘邦称他是好汉，煞是高兴，于是放走了刘邦。刘邦当上皇帝后，丁公见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季布虽与刘邦有仇，但仍被拜为郎中，心想有仇之人可得封赏，有恩之人更能得到封赏。他满怀信心地来到皇宫的大殿，刘邦见之，想起昔日是其放走自己，自己才有今日，理应好好报答。此种念头刚刚闪过，皇家的根本利益——人臣任何时候

都不能背叛君主的信条迅速在脑海中占了上风：“你丁公受人之托，不忠人之事，身为项羽的大将，项羽待你不薄，可你却在战场上放了项羽的仇人，真是岂有此理！假如我收留了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又干出不忠于我的事来。再说，我的臣子看我收留封赏你这样的人，说不定学你的样儿做，那我的江山还能坐稳吗？”想到这里，刘邦突然变脸，大骂丁公不忠于项羽，使项羽失去天下，于是呼来武士，不由分说地将丁公推出殿外斩首。

485

权术为利益服务，利益需要仇将恩报就仇将恩报，需要恩将仇报就恩将仇报。无论是仇将恩报还是恩将仇报，其理由总能与公理相通，尽管仔细琢磨时，此类理由有时显得冠冕堂皇。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本之所在。有权决定利益分配原则、标准的帝王将相，在作此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整个宫廷、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如果把利益分为过去利益、现在利益和将来利益三种的话，帝王将相特别是帝王一般都是重在眼前利益，其次是将来利益，对过去利益不作考虑，即使考虑也是为了现在利益或将来利益而考虑。刘邦仇将恩报，考虑的绝对是现在利益——稳定人心，而不是“仇人”过去的功劳——帮助他出生入死打江山。如果刘邦考虑的是过去利益，对有功者奖赏，那么丁公功劳最大——放了他刘邦一条生路，但丁公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得到惩罚。原因就在于，丁公现在或将来对于刘邦来讲，已没有任何价值了，非但没有价值，还有可能产生负价值——他人效仿丁公不忠于他刘邦。所以，宫廷里的奖赏与惩罚都是着眼现在利益或者将来利益，而不是过去利益。丁公想不到这一点，对刘邦的狡诈性认识不足，从其政治的幼稚性上讲，他被斩也是活该。

2. 宫廷是政治斗争的决斗场，权术因而阴毒

“作为古代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和行为，权术曾长期在政治舞台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手段和行为，主要用于君主驭臣、臣属弄君、官僚互相攻讦等场合。”^① 君主驭臣、臣属弄君、

^①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1页。

谋 论 诡

官僚互相攻讦，矛盾最激烈、冲突最厉害的地方是宫廷，宫廷成为他们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决斗场。权术在这样的决斗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其他手段所不能替代的。

宫廷的政治斗争无论怎样复杂、尖锐、残酷，始终围绕着两个决定性问题展开，这两个问题就是：由谁来统治和怎样统治。

166

宫廷本来就是由帝王及其大臣构成的统治集团。在有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宫廷始终与社会同在，但是帝王是谁、大臣是谁，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人人都想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但绝对不可以人人都真的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能够成为其中一员的毕竟是极少数。因此，你死我活的斗争首先在意欲成为统治集团一员的人员中展开。如果是一伙人意欲共同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采取的极端方式往往就是战争。在跻身统治集团过程中，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是战争形式还是非战争形式，只要邪欲介入，使用权术则是必然，因为权术能够帮助他或他们以小的代价取得成功。

在统治集团内部，更是存在着统治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问题。按常理，帝王是天子，一切权力归帝王，但事实上，统治权真正掌握在帝王手中的并不多。由于不少帝王自身无能、昏庸或者年幼，后党、阉党、内戚或外戚把持朝政，行使着实际上的统治权，帝王不过是傀儡而已。当然，后党、阉党、内戚或外戚把持朝政，行使实际上的统治权，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样经过了尔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权术照样立下了汗马功劳。臭名昭著的后党吕后、慈禧，阉党赵高、魏忠贤等为把持朝政、行使实际上的统治权，使用了无数的权术，有些成为“政治家”、政治掮客和政治小人效法的经典。

由谁统治，权术发挥的作用不能低估；怎样统治，权术发挥的作用同样不能低估。怎样统治，正人君子有正人君子的主张，奸佞小人有奸佞小人的办法。奸佞小人的办法尽管祸国殃民，但在由他们当道的宫廷里，没有谁能够阻挡其实施。

纵观奸佞小人把持朝政、行使实际上的统治权，要领有三：一是以帝王的名义。无论大事小事、正事歪事、急事缓事、难事易

事、已事他事，打着帝王的招牌去办。其说法就是“这是为皇帝办的事”，“这是皇帝要求办的事”，“办这件事是皇帝的意思”。皇帝至高无上，金口玉言，绝对权威，无论对错，接受者只能照旨执行，谁也不能反对。奸佞小人正是利用这一点达到目的的。但皇帝毕竟存在，随便打皇帝的名义不怕皇帝降罪吗？奸佞小人采取的最佳对策是“仇士良秘诀”^①，即哄着皇帝天天只知道吃喝玩乐，无暇读书，无心朝政，无时接见朝臣，宫中大小事情由他们以皇帝的名义说了算。二是打击排斥一切异己。对于宫廷中的奸佞小人，异己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指斥他们的正直刚义大臣，一类是与他们争夺把持王朝政权的乱臣。两类异己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奸佞小人看来，都是一样的敌人，是不让他们存在下去并快活地活着的敌人。所以打击排斥起来并不分彼此，同样阴狠歹毒，必欲除之而后快，只是方法上有所区别罢了。三是培植网罗亲信死党。奸佞小人明知，个人的奸佞本事再强，控制皇帝再彻底，是不能把持朝政、行使实际上的统治权的，必须有一批亲信死党为己效命。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在宫廷内培植亲信，网罗死党，把亲信死党安排在重要的部门、重要的职位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其他力量难以撼动的势力。

奸佞小人尽管一时能够把持朝政、行使实际上的统治权，但是他们的用心和手段总是不能公之于众，其言行总是被光明、正义、天道所谴责。为了在谴责声中继续把持朝政、行使实际上的统治权，他们在作法上必须阴险，让对方防不胜防、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手段上必须毒辣，打击排斥异己就让异己从肉体上消失，以免其东山再起。有人说政治斗争阴险狡诈、残酷无情，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一个想真正为官者，如果对这一点认识不足，最终

① 仇士良（781—843年），字匡美，唐朝宦官。在职二十余年，侍奉六主，拥立三帝，弄权专政，横暴贪婪，前后共杀三王、一妃、四宰相。唐文宗时更是权倾朝野，连文宗也受其控制，自叹“受制家奴”。唐武宗即位后，以仇有拥立之功，表面尊宠，实抑其权。会昌二年（843年），仇以病辞职。离朝时还嘱咐宦官：须诱使皇帝纵欢极乐，使其无暇读书和接见朝臣，以巩固宦官擅政的局面。

谋 诡 论

吃亏的必然是自己。

3. 宫廷是才智彰显的密集区，权术因而奇巧

宫廷是权力宝塔的顶部是不争的事实，又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史学家、经济学家、行政管理专家等出类拔萃的人才往往也诞生在这个“核心”里。无论此处多么黑暗、肮脏、血腥、诈伪，社会的精英仍然被网罗于此，他们的才智也因此而密集于此。这是专制制度与人性所需相结合的结果。专制制度确立了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次于这种地位的地位在宫廷。地位是权力与荣誉的象征。人都有欲望，人的最高欲望是什么呢？罗素认为：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能够最大限度满足这两种欲望的地方就是宫廷，因为这里有最高的和次高的权力与荣誉。用什么东西来获取权力与荣誉，一般正常情况下，是才能与智慧。

宫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最特殊的交易行。交易的一方手持权力与荣誉，另一方身怀才能与智慧。若公平交易，则是有多大的才能与智慧就能买到多大的权力和荣誉。如此买卖关系，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已明确指出，即“君卖官爵，臣卖智力”。民间对此观点也予以认同，俗语中就有“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之说。但是，地位与才智两者完全公平交易的宫廷是没有的，地位显赫、才智一般者有之，才智显赫、地位一般者有之。出现此等情况，与出卖地位的君主的性格、人品有很大关系，与出卖才智的臣属的性格、人品也有很大关系，还与权术是否介入有很大关系。凡权术介入，交易绝对是不公平的。

在宫廷里，使用权术者有两种人：无才有智者和有才有智者。

所谓无才有智者，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没有我们通常认识的经世治国的才学、才识、才能，而有不一般的黠慧智术。这种人“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①。其典型莫过于太监。他们能进宫廷，贴近君主，靠的不是才能学识，而是阉割器

^① 《说苑·臣术》。

官、丧失性功能。但是，他们呵哄皇上、揣摩圣意、欺骗将相的功夫非一般人可比。如唐朝大太监仇士良、明朝大太监魏忠贤都能把持朝政几十年，均得益于权术的运用和运用权术的娴熟。这种无才有智之人，要在宫廷站稳脚跟，要谋取高位，要把持朝政，凭才，绝对不能与有才者抗衡，只能凭智。但若与有智者比正智，他们也占不了上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邪智，用正人君子不屑一顾的但效果绝佳的由邪智演变而来的权术。



无才有智之人要谋取高位、把持朝政不能不使用权术，有才有智者要非分占有高位、把持朝政同样需要使用权术。在自己的才智与对方旗鼓相当而竞争占不了上风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的才智略逊对方一筹明显处于下风的时候，他们不甘于对方超过自己，便让权术为自己的胜出增加砝码。庞涓与孙臆、李斯与韩非，前一对师从鬼谷子，后一对同为荀子学生。他们都有才有智，只是庞涓比孙臆、李斯比韩非略逊一筹。庞涓怕孙臆、李斯怕韩非超过自己，自己的地位不保，两人虽然不是同一时代人，但采取的措施是一样的——设计暗害。由此孙臆失去双腿，韩非含恨九泉。

面对有才有智的对手，特别是在挑战皇权的时候，权术如果像民间的一些诡谋一样粗制滥造、漏洞百出，失败是绝对的，根本无成功可言。这样的失败，绝不是说声“对不起”就能解决问题的，后果常常严重到用术者被斩、其九族遭诛。所以，在运思、操作权术的时候，无才有智者充分用智，有才有智者充分使用才智，目的只有一个：把权术鼓捣得让对方无法识破。奇巧是权术让对方无法识破的技术性特征。一般来讲，智力越高，运思出来的权术越奇巧；道德越差，操作权术时越无所顾忌。奸佞小人基本上是一些智力高、道德差之徒，所以他们行术大多不被识破，待对方知道是权术时已为时晚矣。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史书上的权术案例比比皆是，且都发生在宫廷，除了宫廷有人专门记载史实之外，关键在于所载权术案例个个经典，而这些经典的权术只能发生在才智彰显的密集区，非才智彰显的密集区既不会比比皆是，也不会个个经典。

谋 诡 论

(二) 君臣权术应对

权术发生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两者若不发生关系，权术永远只是一帖无法验证功效的膏药。在宫廷里，最为重要的一对关系就是君臣关系。这对关系常常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前途，同时也决定着他人以及两者本身的命运和前途。这对关系处理得好，就是君君臣臣；处理得不好，就是你死我活，尽管多数情况下是臣死君活，但也有君死臣活的情况。按理讲，君主是天子，代表上天管理人间，具有绝对的权力，他的话就是圣旨，就是法律，臣属只能服从、只能坚决照办，否则是抗旨、是欺君罔上，所付代价轻则遭贬斥，重则被囚杀，怎么可能出现君死臣活呢？实际上，在君主昏庸无能、年幼无知的时候，臣属便拥权自重，结党营私，作奸犯科，要么让君主依赖于己，要么让君主成为傀儡，要么干脆取而代之。即使在君主贤明的朝代，臣属也常因功高震主、权高压主、才高欺主而让君主寝食难安。所以，君主在驾驭和控制朝臣的过程中不得不用包括权术在内的各种手段，朝臣在事奉和提防君主的过程中也不得不用包括权术在内的各种手段。

1. 驭臣术

《韩非子》是一部大家公认的关于君臣关系的理论著作，前面我们在“权术的基本特征”中，对臣属对付君主的手法——“五术”、“八奸”作了介绍。这里，我们根据《权术论》作者余华青先生对《韩非子》中的驭臣之术的归纳，对其列举介绍如下：其一，诱以利禄，威以刑罚。即君主对臣属用刑、德“二柄”进行利诱和威胁；其二，“深藏不露”，秘不可测。即君主在臣属心目中永远保持一种神秘而不可捉摸的形象。其三，“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①。即君主永远是真理的化身和正确的象征。其四，“挟知而问”，“倒言反事”。即君主不可轻易信赖臣属，可以通过明知故问或者故意说错话和办错事的办法，检查臣属是否真正忠

^①《韩非子·八经》。

第八章 诡谋的政治化——权术(下)

减。其五，“疑诏诡使”。即君主的真实意图不可暴露，要采用间接曲折的方式督察臣属，使臣属在莫名其妙中感到君主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明”，从而不敢有所隐情。其六，“言默皆有责”。即为了督责臣属，君主必须设法将臣属置于动辄获咎的境地。其七，装聋作哑，假装糊涂。即君主善于掩饰自己，必要时应装聋作哑，假装糊涂。其八，防臣、“备内”。即君主必须对臣属时时抱有戒心，保持高度的警惕。其九，“罚莫如重而必”。即君主在惩罚臣属时，从重而不从轻，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其十，行暗杀，“除阴奸”。即君主对于用一般的赏罚手段不易控制的臣属必须尽早除掉，以免留下后患。其十一，容坏用坏。即只要对君主有利，应容忍臣属做坏事，什么坏人都可以使用。其十二，“众端参观”。即君主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而作出正确抉择。其十三，“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即君主使用臣属，须官任其职，以职课功，使臣属既不敢失职误事，又不敢越权行事。

余华清先生本人也对驭臣之术进行了研究总结，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不断发明和发展了形形色色的驭臣手段，其中最重要者，有笼络赏赐之术、防范惩罚之术、权威立尊之术、平衡牵制之术等。

第一，笼络赏赐之术。笼络赏赐是中国古代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手段，主要作用在于诱臣、用臣。统治者在实际运用笼络赏赐之术的过程中，一般遵循如下原则：选择施惠的内容、分割施惠的过程、掌握施惠的时机、注重施惠的姿态。这些原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即最大限度地获得施惠的效果。

第二，防范惩罚之术。防范惩罚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基本的驭臣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防臣、制臣。其基本原则是：“罚重而必”的原则、“刑于将过”的原则、“心理震慑”的原则、“责罚有术”的原则和“法外施恩”的原则。

第三，树威立尊之术。威严是有效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君主只有保持一种威严的形象，才能够服臣和威臣。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势尊严，促使臣属产生尊敬、信赖、崇拜、顺从、畏惧之感，

谋 论 诡

君主们常用这样一些手段：显示才能和政绩，刻意制造“神秘感”，运用权力增加威严和利用法律维护威严。

第四，平衡牵制之术。平衡牵制之术，是中国古代君主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的基本原则是：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形成便于为君主所操纵的权力结构；利用臣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臣制臣”，以便君主处在超然的位置，坐收渔人之利。其具体手法有：抑损相权，以微臣制贵臣，以近臣制权臣，以“酷吏”制重臣，利用臣属之间的矛盾。

2. 弄君术

君主驭臣运用权术，臣属事君也用权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臣属事君运用权术是让君主逼出来的，因为在伴君如伴虎的情况下，某些臣属如果不运用点权术，恐怕有几个脑袋也不管用。虽说君臣双方互用权术，但双方并非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使用权术，君主驭臣处于优势、强势地位，臣属弄君处于劣势弱势地位，正如余华青先生所说：驭臣之术可以公然形之于纸帛，无需担心道德的谴责；弄君之术则面临着“欺君之罪”的威胁，只能战战兢兢地在暗中揣摩。驭臣之术可以借助于制度的力量，有效地施展身手；弄君之术却无此“法宝”，只能依靠诡诈手段本身孤军奋战。

臣属弄君的具体手法在余华清先生看来有如下四种：

其一，抗君之术。古代抗君之途有三：一是自重，就是借用君主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提高自己的身价，增加与君主相抗衡的实力；二是结党，就是拉帮结派，组成一定的政治集团，造成与君主分庭抗礼的形势，逐步迫使君主就范；三是恃理，就是抓住某些有理的名目、利用有利的时机，孤注一掷，犯颜直谏，甚至采用预留遗言、随棺面君等方法，作出一番不成功便成仁的姿态，企图使君主慑于舆论、道德的压力而作出让步。

其二，欺君之术。一是隔绝言路，封锁消息，蒙蔽君主；二是诱使君主脱离实际政务，以便臣属瞒天过海，盗用君主名义行使大权；三是拥立年幼无知或昏懦无能的君主以便完全控制；四是翻动

如簧之舌，或花言巧语，或危言耸听，欺骗愚弄那些庸怯糊涂的君主。

其三，谀君之术。谄媚讨好，阿谀奉承，让君主在昏昏然、飘飘然中更加脱离实际，更加没有自知之明，更加拒绝纳谏，更加恣意妄为，从而达到求官固宠的目的。

其四，避君之术。避君之术有两种情形：一是积极的避君之术，即主动创造条件，首鼠两端、狡兔三窟，保持多种选择的可能，预留随时抽身退走的出路；二是消极的避君之术，即在无奈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君主加害，趁早急流勇退，脱离权力中心，或归隐田园，或遁入空门。

君对臣用术，臣对君用术，两厢热衷用术、竞相用术，用术的结果便是：权术充斥宫廷，宫廷泛滥权术；不会权术不能立足宫廷，会使权术才能站稳脚跟。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宫廷史就是一部权术史。

三、权术应用于办公室

办公室是权力和非权力都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有时是官场，有时俨然一个宫廷；它既是有形具体的——墙壁往往成为它有形空间的界限，又是无形抽象的——大家因工作需要天天接触，心灵上没有墙壁遮拦。因此，二三人活动的一个空间可以称做办公室，几十人共同工作的场所也可称做办公室，用现在的行政编制来判断，一个小组可以称做办公室，一个科可以称做办公室，一个处也可称做办公室，机构再大就不便称为办公室了。把一个地方或场所叫办公室的时候，必须同时满足这样三个条件：其一，吃“皇粮”的工作场所（多指行政单位，也指类似行政单位的事业单位）；其二，同属一个机关、单位或团体；其三，彼此关系是同事关系且相互意识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其中第三点最为重要。比如，有的单位很大，虽然既符合第一个条件也符合第二个条件，但主体相互之间根本意识不到是同事，这样的单位我们不能称之为办公室。

谋 论

权术应用于办公室，可以说是政治权术基层化，办公室里的人都可以成为权术运作的主体，同时也可以成为权术运作的客体。主客体关系因权术而发生，且发生在办公室，因此，政治权术基层化也可叫做办公室权术。

（一）办公室权术的一般特点

办公室是一个特殊的场所，权术应用其间，时间一长，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特点。

1. 权力时隐时现

在官场、宫廷，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权力角逐常常白热化，权术运用主要围绕政治斗争特别是权力展开。而在办公室，虽然有体现权力的官职存在，但这种官职只被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只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虽然这样的大多数人在执行公务中拥有职权，但这种职权是在每个人吃皇粮的那一刻起就各自拥有的。职权大小是与官职对应的，官职越大，职权越大；官职越小，职权越小，但永远不会是零，除非不吃皇粮了。

在办公室，如果权术直接围绕权力展开，那就是直接围绕职权的大小轻重展开。争大，就是要通过权术把个科长、处长什么的官职搞到手；争重，就是要通过权术把某个重要岗位搞到手。这时，权力在权术中处于中心位置。当然，这种权力处于中心位置的权术在办公室并不常见，常见的往往是围绕利和情展开的权术。与经济中的纯为利益的权术（诡谋）和生活中基本为世情的权术（诡谋）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办公室为利益、为世情展开的权术的背后，有权力的影子，最起码的一点，权术主体和客体都是拥有职责权力的人员，而经济、生活中的为利益、为世情权术（诡谋）的主体和客体一般不会都是拥有职权的人员，绝大部分不是吃皇粮的队伍。所以，为利益权术与为世情权术在办公室里尽管不是直接围绕权力的争夺、巩固而展开，但权力在其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通俗一点讲，就是乍看权力没有介入，细究，里面到处都是权力的影子。此等情况便是权力在权术中的“隐”。“隐”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以

一种不显露但其作用仍在的形式存在。能够集中体现权力时隐时现的是工作中的权术。

有这样一则事例：某个科级单位实行目标管理，每人每月必须完成12篇新闻稿件的见报任务，完不成则扣发当月800元的岗位津贴。离月末“结账”还有四天时间，处领导突然布置一项工作量非常大，但必须在四天内完成的其他工作任务，说是要迎接全市宣传工作的检查。领导布置的工作必须完成，否则也要扣发当月岗位津贴。大家全都不再外出采访，坐在办公室里搜集整理过去的宣传报道资料。四天过去，此项工作顺利完成，但稿件见报任务除甲一人外，其他人都没有完成。甲既完成了领导交办的资料整理任务，又完成了发稿任务，理所当然地满领当月岗位津贴，并且因此没有其他人与其相争地得到了随市新闻采访团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这时，大家才明白这是一个权术。处领导与甲关系非同一般，当甲从处领导那里知道有一个外出采访的名额后，知道按正常情况这个名额绝对不会归自己，于是两人合谋了这个看似“公平合理”的权术：甲抓紧时间完成发稿任务后，再由处领导下达特别任务。

75

这个权术是个为利益的权术，但权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没有处领导利用权力布置特别任务，就不能阻止其他人完成发稿任务。这是权力在权术中的“现”。甲达到可以随团外出采访的目的，表面上看完全是“硬”件起了决定作用，即唯一两项任务均完成者，权力并没有干预。这是权力在权术中的“隐”。权力时隐时现体现在工作中的权术，是办公室权术中最多的一种，也是最难对付的一种——你很难发现对方以工作为名用术，即使发现了也抓不到对方的把柄，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途径可曲可直

达到目的，总要通过一定的途径。途径有曲有直，以直的方式可以直接达到目的，以曲的方式可以间接达到目的。前者简便快捷，后者复杂缓慢，因而运用起来人们首先选定前者。但对于权术来说，是用曲途径达到目的好，还是用直途径达到目的好，无法直接回答，这要根据用术时的主客观条件而定。办公室里的权术，由

谋诡论

于办公室的特定环境和在办公室里工作的特定主体，往往是“曲”也用，“直”也用，有时曲直兼用。

所谓用“直”，并不是直接告诉对方“我这是在用权术”，而是指权术的矛头直指对方，手段直白简单。比如，一个人在收发室看到了一封通知同室同事参加中央电视台节目制作的信件，由于嫉妒，便把信件隐匿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待其把信件放回收发室、同事拿到信件时，参与节目制作的时间早已过去。

所谓用“曲”，就是走迂回曲折的间接路线，就像老子所说：“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① 这样的例子在办公室俯拾皆是，比如，张三贪婪成性，无论利益大小，能搞到手的尽量不遗漏。李四有权、有责任，也有能力制约张三，但李四不但不劝说阻止，反而让王五、赵六尽量满足张三的贪欲，其目的就在于让张三因贪而自我毁灭，从而除掉一个处处与己作对的手。

所谓曲直兼用，是指在一个权术特别是连环权术中既迂回曲折又单刀直入，若权术对象是单独个体，对其使用连环权术时，或先用“直”后用“曲”，或先用“曲”后用“直”；若权术对象是多个，则对彼个对象用“直”或用“曲”，对此个对象用“曲”或用“直”。比如，有一个四十多人的单位评职称，人事局给了两个“副高”名额，够条件的至少有十人，即使完全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评定，也有一定的难度，何况其中有一位K女意在必夺其中一个名额。K女知道，若公开评定，她的希望最为小，因为她的硬件和人际关系都比其他人差，但她有一个其他人绝对没有的优势，就是和单位一号领导关系非同一般，她希望得到的，一号领导绝对不让她失望。这次K女想要评上“副高”职称，如何让其如愿以偿而又不被别人说自己徇私呢？一号领导想破脑壳也不得其法。这时，K女来到一号领导办公室，温存一番后献上一计，结果难题迎刃而解。

^① 《道德经·三十五章》。

K女的计谋是这样运作的：由一号领导向大家宣布，人事局只给了一个“副高”名额，由大家公开推选。在公开推选之前，一号领导将最有实力的人选A男，以关心为名派到北京、上海等地去学习考察。不出所料，大家推选的结果A男的票数最高，排在第二位的是K女，排在第三位的是B男。这是怎么回事，K女的票数怎么一下窜到第二位？功劳在B男。是B男串通一些自己根本无希望得到名额的人投了K女和自己的票。B男为什么这样做？是一号领导给B男许了愿：只要B男能让K女的票数上到第二位，他使到人事局给B男争取一个名额。B男抱着不按要求做绝对没有希望、按要求做了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即使希望落空也因帮了领导的忙绝对有好处的心态，心甘情愿地按要求做了。结果他如愿以偿。



公推的结果出来后，一号领导告诉大家，他到人事局又争取到了一个名额，A男由于出差在外，他表态这次不参加评选，因此两个名额按公推的结果给K女和B男。

从技术上讲，这个权术是比较高明的，K女非一般女人可比。仅从用曲直兼用之法上考察，也是恰到好处。派A出差，用的是“直”——直接让他出差外地，给后面权术的展开提供了条件；两个名额藏其一，欲取先予地给B许愿，由B去做“群众”工作，用的是“曲”——让K女和B男“名正言顺”得到职称名额。此等结果，只是让那些以为K女、B男即使得票靠前也因只有一个名额（大家认为这个名额非A男莫属）照样无希望的投其票者，此时有说不出的苦：被人卖了还帮人数过钱。

3. 过程限长不限短

每个权术的完成都有一个过程，长的可以很长，短的可以很短。办公室权术特点则是不可很长，但可以很短。由于办公室人员的稳定性不像宫廷那样可以持续长久，几乎是所有人都会因为升迁和工作调动而离开原有的办公室，所以权术设计过程不能像宫廷权术一样过长，过长就会因为人员的变动而自行流产；实际上也没有必要设计很长，因为现在的办公室并非一个人长待之地，想用权术向上爬者更是如此。

谋 诡 论

长有限制，短有无限制呢？短无限制，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越短越好。在办公室，关乎身家性命的权术很少，而大部分都是一些与小利、与世情相关的权术，设计者自觉不自觉地将“短平快”理念贯穿其中，其立竿见影之效，往往给运用者带来别样的快感。

有一个“短平快”的权术例子，说来还是让人叹息不已的。此例发生在BP机刚刚使用的年代。某办公室的H君花很大代价弄到一部BP机，为此，他收到无数羡慕的眼光。可是没过多久，在一天快下班的时候，他的BP机突然不见了。H君急得到处寻找，蓦然，他想到给BP机发呼叫信号。呼叫的结果让办公室里所有的人傻了眼：BP机的响声从正准备下班离开办公室的A女的坤包中发了出来。“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一定是有人陷害我！”A女边说边从包里往外掏BP机。的确，她是被陷害的，陷害她的不是别人，而是她的“好友”B女。B女为什么要陷害她？原来，A女正面临“提拔”之喜，这使B女十分嫉恨。为了达到“阻挠”A女升迁的目的，B女想到了一个简单易行且易见效的办法——让A女成为偷BP机的小偷，因为大家都知道A女非常喜欢H君的BP机，诬她偷BP机大家不会不相信。于是，这天快下班的时候，她趁大家不注意，将H君的BP机放进了A女的坤包。A女有口难辩，名声大损，提拔之事因此也从此没了下文，B女目的随之达到。B女用大约半个小时的短暂时间便完成了权术全过程，其效果则是立竿见影的。

办公室里的权术，大多是这样一些“短平快”的权术。还有时间更短的，比如截留上级指示不传达，让他人的好事泡汤，或者篡改上级指示以满足自私需要，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再比如，领导问乙甲到哪里去了，乙明知甲是到银行取工资，但故意以猜测的口气回答，甲可能是到证券营业厅去了。这使领导形成乙利用工作时间炒股的不好印象。该权术所用时间不到一分钟，但效果不差。

4. 后果不疼即痒

权术发生，不像和风吹入树林，树枝摇摆几下而已，而像毒雾，只要你吸入，总会产生伤害，只是伤害的程度不同，重则要付

第八章 诡谋的政治化——权术(下)

出生命代价，轻则心灵如虫咬。办公室权术，在当今我国，导致性命不保的极为罕见，但让人心疼一辈子的权术不少，原因很简单，这个地方涉及政治及其权力之争，而凡打上政治烙印的争斗总是免不了残酷无情。比如，一个人刚要提拔，对其检举揭发的信件雪片般飞到纪委，待纪委查清这些信件所检举揭发的“事实”，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是捕风捉影，要么是颠倒黑白，要么是夸大其辞时，机会已经错过，这一错过也许此人再无提拔的机会了。对于如此害人权术，此人能不心疼一辈子？

479

让人心疼一辈子的权术不少，让人心疼一时的权术就更多了，比如，一个人本来作风正派，只是在电影院门前遇到女同事多说了几句话，则马上被人以流言飞语的方式泼脏水；一个人只是私下议论了几句上司，却被人添油加醋地在上司那里打了小报告，随之该人遭冷遇和打击报复；一个人公文写作特棒，领导正考虑给他记功，没料到，关键时刻他草拟的一份存入电脑的重要材料被人悄悄删除了，领导狠狠地批评他，说他根本没有写这份材料，他申辩领导不听，记功的事自然泡汤了……

一般来讲，让人心疼一辈子的权术是后果严重的权术，让人心疼一时的权术是后果不太严重的权术。在办公室里，还有一些权术，导致的结果不是让人疼而是让人痒，这样的权术对客体造成的是轻微伤害。如前举隐匿同事信件，让同事没能到中央电视台做成节目，这个同事固然不致心灵损伤，但却相当难受，如被虫咬一般。当然，痒和疼没有绝然的界限，痒重一点是疼，疼轻一点是痒，到底是痒是疼，常常要根据权术对象的自我感受而定，旁人认为疼的他或则感觉为痒，旁人认为痒的他或则感觉为疼。无论是疼是痒，权术只要运用成功，权术客体不知道则罢，知道了必然感觉到要么不舒服，要么难受，要么异常痛苦，心灵受创是绝对的，当然有时也伴有生理的伤害和钱物的损失。所以，权术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一个好东西。

(二) 办公室小人及其行时原因

本部分写小人，似乎有点突兀，突兀在于小人在官场上、宫廷

谋 诡 论

188

里以及社会上到处都有，为什么要放在“办公室”里写？且小人本身不是权术，干吗花气力来写呢？原因在于，笔者看了很多的资料、听到很多人的议论、观察了不少的地方，发现办公室里的小人还不少，并且在大家愤愤不平声中，仍然吃香喝辣，活得非常滋润；同时发现，办公室里的诡谋多与小人相关，他们是办公室里的不安定因素，是权术的生产能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人就是诡谋人格者。《明史·奸臣传序》中说：“小人世所恒有。”既然是“恒有”，那么，小人在各个领域、各种场合不会不存在，故办公室也不会例外。这是就整体而言的。从个别讲，并非每一个办公室里都有小人，但是，凡有小人的办公室，一定是正气得不到弘扬，正义得不到伸张，正当的行为得不到认可，正直的人得不到重用；一定是拉帮结派，钩心斗角，流言飞语时常闻、相互算计经常见。反之，小人无法生存，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权术现象的发生。

对小人的研究，从古到今都有，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小人”这个词在三代时就出现了。《书·大禹谟》中有：“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陈昉在他所著的《颖川语小》中写道：“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此段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和小人的名称，出自于大禹的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即“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所谓“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其意就是不用仁人君子、智士哲人，而用奸诈邪恶、谄媚阿谀之徒。显然，奸诈邪恶、谄媚阿谀之徒就是小人。王充在他的名著《论衡·奸佞篇》中，对“奸”和“佞”是分开论述的。他认为，所谓“奸”，就是奸诈邪恶、阴谋害人者；所谓“佞”，就是以花言巧语谄媚上司而博取欢心者。无论是“奸”还是“佞”，都是一些卑鄙无耻之徒。现代词典对“小人”的解释就是指人格卑鄙的人。所以“奸”和“佞”同样是小人，只是“奸”是一种身份非常特殊、能量非常大、危害非常严重的小人。

孔子对小人看得非常透彻，总是将其作为君子的对立面来言

说。他认为，小人浅薄固执（“硜硜然小人哉”^①），做起事来不是成人之美而是成人之恶（“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②），原因在于他们只懂得私利（“小人喻于利”^③）。为了贪图私利（“小人怀惠”^④），他们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而不讲团结（“小人比而不周”^⑤），一旦达不到目的，便显示出一副忧愁悲伤模样（“小人常戚戚”^⑥），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因此，最难相处的是小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⑦）。

在当代，研究小人产生重大影响的，恐怕非著名学者余秋雨莫属。余先生在《历史的暗角》一文中，对小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躁，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一一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得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予理会，掉过头去，但这股腐蚀气却又悠悠然地不绝如缕。”^⑧ 这种形象的描绘不足以看清小人的本质，所以余先生给小人开列了八大特征：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见不得权力；小人不怕麻烦；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由此，余先生让我们从理性上对小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有了比较明晰的了解。

① 《论语·子路》。

② 《论语·阳货》。

③ 《论语·里仁》。

④ 《论语·里仁》。

⑤ 《论语·为政》。

⑥ 《论语·述而》。

⑦ 《论语·阳货》。

⑧ 余秋雨著：《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谋 论

1. 办公室小人个性表现

办公室小人有余先生开列小人特征的共性，也有自身的个性，突出表现在：

第一，官虽不大，官气十足。办公室主要是“吏”活动的场所，直接管“吏”的官都是一些级别很低的官，小则针尖大，大则芝麻大，再大一点大概是绿豆大吧，如果有比绿豆还大的官常直接在这儿活动，那就不符合我们对办公室含义的界定了。请不要小瞧了这些官职的低微，小人在还是“吏”的时候，采取包括权术在内的各种手段，要将其一官半职弄到手，一旦弄到手了，马上把大一点官职作为目标。小人对官职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所以他们把所做的一切包括正常的工作全都作为谋官的手段。在平时，他们言必官腔、行必官气，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轻狂自负是他们的说话习惯；不办实事、不做好事，只会发号施令、只知搞花架子是他们的办事作风；根据个人好恶，不断地将人、财、物重新洗牌是他们掌控局面的伎俩。他们出门要求属下众星捧月、前呼后拥，仿佛天子出宫；吃饭要人送到手上，喝茶要人端到嘴边，好像君王饮食。在他们眼里，只有上级与下级，没有年长与年幼，对上，他们以儿子的卑躬事之，哪怕上比他年少许多；对下，他们以老子的倨傲事之，哪怕下比他年长许多。他们像吸毒者依赖毒品一样依赖着官职，为此，他们可以拿灵魂做交易，而把良心打造成向上爬的阶梯。

第二，溜须拍马，不怕人看着肉麻。拍马逢迎、溜须奉承、取悦讨好、奴颜巴结，是所有官场小人惯常做法，办公室小人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办公室小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看到时，浑身会起鸡皮疙瘩，头摇得像拨浪鼓，而行为人却异常坦然、毫无愧色，有时还得意洋洋，意在向你炫耀：我与上司父子般亲热、爷孙般深情，你能得到如此的宠信吗？有这样一幕：有个单位开大会，会还未完，一号领导有事提前离开，起身而走时，桌上留下一工作包。突然，听众席里噌地站起一人，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主席台，不料摔倒了，他迅速爬起来，一个箭步跨到主席台

桌边，拎起工作包就向一号领导奔去。待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会场上立即嘘声一片，随之发出轻蔑的笑声。原来一号领导告诉此人，工作包不是他的。不过，此人还是十分得意地回到了座位上，原因是一号领导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在他看来，这样的拍，是信任、是重托、是晋升的信号，就像爷爷温暖的手拍在聪明伶俐的孙子的后脑勺上，而又有多少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拍呢？在今天他是唯一的人。

第三，看风使舵，有奶便是娘。溜须拍马，并非凡是上司都能享有。办公室小人是头脑的，他们的原则是有用即拍、无用甩在一边。所以，他们拍谁不拍谁、投靠谁不投靠谁、贿赂谁不贿赂谁，都是要经过选择的。选择的最常用手法就是看风使舵。谁能给自己带来利益，谁能决定自己的升迁，就拍谁、投靠谁、贿赂谁。

一旦发现被投靠者于己无用了，马上寻找新的主子。如果新主子要他以出卖旧主子为代价，他会毫不犹豫地向日主子泼去脏水。对于新主子，不管其是好是坏、是能人是庸才、是温和是残暴、是精明还是狡诈，只要于己有用、愿意收留自己便投靠。他们绝对没有公认的是非、真假、善恶、美丑观念，一切以于己有用与否为标准。有奶便是娘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第四，无事生非，让人人不得安宁。在和睦友好、安定有序的办公室里，小人不仅不会产生，而且即使来了个小人也不会有市场。但是，如果一个办公室里出现了小人，那么这个办公室再不会有宁日。小人视安分守己为桎梏囹圄，对无事生非偏爱有加。若不无事生非，和睦安定的环境总是和睦安定，自己最大的擅长——权术用于何处？若不无事生非，人人相敬如宾、君子般地相处，谁愿与己为伍？若不无事生非，大家都按原则办事，非分的利益或好处从何而来？若不无事生非，同事之间不互相猜忌、互相算计、互相攻击，自己能够待得长久、活得滋润？所以，他们挑拨离间、造谣诽谤、栽赃陷害、搬唇递舌，把能够制造纠纷、矛盾、冲突的手段，可用的毫不保留地用上。不过，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他们都会本着一个前提：保全自己。

谋 论 诡

164

第五，百般狡辩，一脸委屈。“明火执仗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是恶人而不是小人，小人没有这份胆气，需要掩饰和躲藏。他们反复向别人解释，自己是天底下受损失最大的人，自己是弱者，弱得不能再弱了，似乎生就是被别人欺侮的料。”¹ 仿佛权术招数具有遗传性，凡小人天然就会装弱示弱。办公室小人毕竟是吃皇粮的公务人员，即使不用小人伎俩，也能应付各种场面，如果遇到涉及自身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他们则会采取各种措施灵活对付，百般狡辩、一脸委屈就是他们灵活对付的重要措施。“你说我溜须拍马，哪一个人不尊重、服从领导，我只不过方式上有所不同。”“你说我巴结投靠，哪一个人不希望被伯乐发现，我只不过主动寻找伯乐罢了。”“你说我行贿受贿，行贿？笑话！我都缺钱花，还有钱送给他？受贿？更是无稽之谈！朋友之间礼尚往来，接受点烟酒也算受贿？”“我这个人性格开朗，喜欢多管闲事，也喜欢打抱不平，谁对谁错总是直截了当地说，这下可好，得罪了许多人，他们联合起来泼我的脏水，说我挑拨离间、造谣诽谤、栽赃陷害、搬唇递舌。我是这种人吗？真是冤枉！”对于这样的小人，你没有真凭实据，还真拿他没办法。而这样的小人，早在出卖人格、损害他人的时候，就多长了个心眼——不留痕迹。这就是小人的过人之处——在大家印象中虽坏，但若对其进行组织处理时却找不到什么证据。我们常说小人难对付，这恐怕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2. 办公室小人行时原因

办公室小人同其他小人一样，本质上是阴坏的。所谓阴坏，是指暗地里使坏，也就是那种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的坏。比如长江里有船翻了，这种人则站在黄鹤楼上庆幸地端起酒杯来；或者有人落入陷阱里，这种人马上搬起石头往下投。小人如此阴坏，办公室为什么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过得那么滋润、潇洒？

原因之一，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有

1 余秋雨著：《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1 页。

善良就有邪恶，有光明正大就有阴谋诡计，有正人君子，就有奸佞小人。办公室不是真空，不是几个志同道合者聚集的沙龙，它遍及全世界，凡有政府管理的地方就有办公室，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地方工作，观念冲突、利益冲突、性格冲突等各种矛盾冲突都会在这个地方发生，因而小人混进来、小人在这个地方滋生，自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法则，就像稻田里长稗草、人吃了五谷要生病一样。当然，办公室必然有小人，不是所有的办公室都有小人，有小人的办公室毕竟是少数。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一个办公室要么没有小人，要么有了往往并非一个，凡是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的场所绝对不只一个小人。一个小人形成不了势，只有多个小人才能形成气候，他们或联合，欺上压下，一手遮天；或互斗，拉帮结派，你死我活，结果是闹得办公室鸡犬不宁。

185

原因之二，有可资利用的价值。照理讲，小人对于办公室有害无益，上级组织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或严厉批评教育，促使其改正；或将其调离原办公室，以告诫不能搞歪门邪道；或清除出办公室，以此警示准小人，赶快悬崖勒马。但是，为什么某些地方不这样做而让小人优哉游哉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上司看上了小人的利用价值，即利用小人制约小人或者达到其他目的。小人都善于巴结投靠，几乎每个小人背后都有靠山，即使是正直的上司，由于种种原因，也不便得罪小人，得罪了有打狗欺主之嫌，但又不能让小人太张狂，怎么办？让小人制约小人，让他们互争互斗以保持相对的平衡，一旦时机成熟，一并处置。有的领导为了弄清某个下级单位的内幕，或让某个不喜欢的人不得安宁，便利用小人喜欢动荡、善于权术的特点，放纵其大肆活动，当目的达到之后，如何处置小人，任凭自己裁夺。

原因之三，在于上级不得已的迁就。如果说利用小人达到目的是对小人有办法的掌控，那么对小人不得已的迁就则是没办法的失控。由于小人一般比较机灵，他在阴坏的时候往往不留把柄，尽管群众呼声很大，但找不到他阴坏的真凭实据，没有合适理由对其处

谋 论 诡

186

理，只好让他继续存在。有的领导本身屁股不干净，怕打狗不成反被狗咬，拔出萝卜带出泥，只好对小人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有的虽然自身没问题，但因怕小人胡搅蛮缠、乱抓乱咬而使自己白白遭受伤害，也对小人不管不问，任其胡作非为，这就是遵从所谓的古训：“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有的小人本身就是主管领导的亲信，在办公室里活得滋润、潇洒的根源就在他那里，你要这样的主管领导来处理这样的小人，岂不是要求他有大义灭亲、壮士断腕的精神，他会如此做么？即使有真凭实据可以采取组织措施，他也会以各种理由替其开脱。如此这般，小人还会不行时？

原因之四，下属迫于淫威的容忍顺从。有的小人在办公室里本身就是领导，他玩弄权术往往是以权力作为后盾和支撑。不论其在安排工作、分配利益、实行奖惩、提拔下属时，是否合理、是否设圈套，你迫于淫威、慑于权势，合理的要服从，不合理的也得服从，不是圈套要往里面钻，是圈套也得往里面钻。不然，他就会以你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而名正言顺地整你。被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你不得不忍气吞声地顺从，有时还得强颜欢笑地迎合。例如，某单位装修会议室，预算3万元，领导将此工作交由大家公认的有责任心且比较正派的甲负责。签订装修协议后，甲与装修公司商定等他出差十天后回来时再动工。谁知等他出差回来时，工程已经完成。甲看了看装修效果，感觉很不对劲，所用材料和装修质量与协议规定有很大距离，于是悄悄请来内行估价。估价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根据所用材料和做工测算，整个造价工程最多1.5万元。甲马上向领导汇报，建议按协议不付最后的一笔款项1万元。领导却说：“我认为装修得还不错，价格也还公道，所有款项业已付清，你就不要计较了。还有，本来应该等你回来开工，可会议室等着急用，所以我叫某某代你行使了职责。”甲有种被愚弄的感觉，很想发火说一句：“恐怕不是会议室等着急用，而是有人想急着从中玩猫腻、得好处。”但话到嘴边忍住了。他知道此话一讲出，自己就会像前次得罪领导一样又要被穿小鞋了。随之从他嘴里溜出来的是这样一句话：“谢谢领导的关心。”一个大家公认的有责任心且比较

正派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说了。甲的作为是迫于淫威、慑于权势的结果，而他这样的作为又助长了淫威、强化了权势。小人十分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他们做小人不愁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原因之五，得益同事明哲保身的避让。小人就像一根搅屎棒，打在你的身上，不仅疼痛，而且又脏又臭。为了避免被这种搅屎棒打着，很多人采取的办法就是离其远远的，即所谓的惹不起躲得起。你争权夺利也好，你朋比为奸也好，你阴险狡诈也好，你官腔官气也好，只要不直接涉及我本人，或者对我不会造成大的伤害，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会惹你，更不会干涉你。这种明哲保身的人，在小人看来，是弱者，既然是弱者，平时可以不屑一顾，有时欺负一下子也无所谓。久而久之，小人更喜欢做小人了，因为有这么多明哲保身的人，还有那么多迫于淫威的顺从者，有如此能让自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办公”环境，何不当小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小人也是周边的人“惯”出来的。因此，要想办公室里无小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在保证自己不做小人的前提下，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让某些人想当小人也失去“群众”基础。

办公室里的权术，多半是小人所为，因为他们有邪恶之智而无道德之心，不靠诡谋难以生存，不用权术难以发展，所以，了解和认识小人的所作所为及其存在原因，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其必要、重要在于它能使我们擦亮眼睛，认清小人嘴脸，在此基础上，谨防小人以避权术之害。

第九章 诡谋的经济化——奸计

无商不奸，无奸不商。此话人所皆知。由此我们联想到了经济，联想到了诡谋。“商”固然不等于经济，但可以代表经济；“奸”固然不等于诡谋，但可以代表诡谋。所以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奸计是诡谋在经济领域里的表现形式，是经济诡谋的代名词。所谓经济，众所周知，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也就是人们创造、获取物质财富的活动总和。凡有活动的地方，诡谋只要想介入就可以介入。对于这种“创造、获取物质财富的活动”，诡谋想介入吗？有人会说，你设立此问都有点不清白，诡谋靠的就是巧取包括物质财富在内的各种利益而获得主子的欢心，若不介入，它岂不愧对主子，枉为诡谋！有意思的是，它一介入经济领域，经济领域再也避免不了喧嚣与肮脏，有时还要发生人们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很强的“地震”。最近笔者到图书馆借书，借到一本同心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金点子》，翻开一看，有《何阳的点子》、《牟其中的点子》……何阳、牟其中，何等的风云人物：前者被誉为“中国点子大王”，后者是中国头号“倒爷”。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的点子受不了道德的约束，恣意牵手邪恶，摇身一变成为奸计，“地震”随之发生。在人们的一片惊呼声中，他们二人都因涉案跌入囹圄。2000年，牟其中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1年，何阳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经济诈骗、偷税骗税都是奸计的产物，牟、何二人的行为再次证明：点子（谋）与奸计（诡谋）之间只隔着一张纸，这张纸就是

道德 谁捅破它，轻则得到满脸的口水，重则玩火者自焚

一、奸计的通常技法

奸计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诡谋谓之奸计。如果说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是生产经营者，那么与之共生的就是消费者、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利益相关者。由此，围绕生产经营者所形成的关系便是四对，即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生产经营者与竞争对手的关系、生产经营者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生产经营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这四对关系之中，奸计可以介入任何一对，并且，任何一对的双方都可以成为奸计的主体，甚至四对关系之外的其他人也可以施以奸计，即成为奸计的主体，但是基本的、占绝对优势的奸计主体只能是生产经营者，因为它是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生产经营者成为基本的、占绝对优势的奸计主体时，与其相对应的基本的奸计对象自然是消费者、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利益相关者了。

大家知道，一个奸计的产生，绝对是主体与对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如何相互作用，关键在于主体，主体会根据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作用方式。假如一种作用方式使用时产生了良好效果，那么这种作用方式必然会被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第四次使用……直至成为主体使用该种作用方式的习惯。一旦这样的习惯形成，该种作用方式即奸计技法理所当然地成为通常技法了。所谓奸计的通常技法，是一些常见的、基本的、为大家所熟识的且用之效果不差的诡谋技法。当然，通常技法不等于通用技法，通用技法是就适用范围来讲的，比如一种奸计普适于奸计中的所有对象；通常技法是就使用频率来讲的，比如一种奸计经常对奸计中的某类对象使用。下面我们所要探讨的不是普适于奸计中的所有对象的通用技法，也不是生产经营者之外的奸计主体所使用的各种奸计手段，而是生产经营者之中的诡谋者针对不同对象展开的通常的奸计技法。奸计技法不能等同于奸计，根据诡谋结构要求，奸计必须是主体、对象、

谋 论 诡

目的、技法、场和德性六个要素齐备，而奸计技法只是六个要素中的一种，尽管它有时能够代表奸计。我们专门探讨奸计技法，看重的就是它的“代表”性，因为人们一谈到某种技法如偷工减料和短斤少两，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奸商与奸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生产经营者不是专指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合法身份的生产经营者，而是泛指凡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除了登记注册的生产经营者外，还包括那些开个黑作坊便生产伪劣产品、在路边摆个地摊就推销大路货的人，同时也包括以生产经营者身份开展合法与非法经济活动的人，这样的人不需要经过什么部门批准，想生产什么、想买卖什么、想开展什么经济活动，只要行动了就是生产经营者。因此，各种各样的生产经营者以其黠慧打造的各种各样的奸计更显色彩斑斓，而由此孕育的通常技法更具代表性和广泛性。

（一）以消费者为客体的通常技法

人人都可以成为消费者，但不一定人人都可以成为生产经营者，也就是说，要想成为我们特指的奸计的主体，还得取得生产经营者的资格。当然，即使取得了生产经营者的资格也不能必然地成为奸计的主体，要想成为奸计的主体，还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施用诡谋。生产是为消费，经营也是为消费，生产经营者为了获得不应得的利润，在与消费者我卖你买的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暗中取巧，骗你无商量，此时的生产经营者便有了另一重身份——奸计者。奸计者在对付消费者的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技法主要为两种：冒充与利诱。

1. 冒充

冒充可分为物的冒充、人的冒充和机构的冒充。物的冒充主要表现为以假充真、以劣充优、以少充多、以粗充精、以无充有等；人的冒充一般有非生产经营者假充生产经营者、乙生产经营者假充甲生产经营者、小老板假充大老板、一般营销员假充总经理、外行假充内行、庸人假充能人等；机构的冒充常常是以知名

企业、上市公司、正规厂家、境外公司或是虚构企业等组织形式出现。冒充的本质是假的充当真的，即本来是李鬼，示人却是李逵。

(1) 仿造

仿造就是按照真的标准，从里到外即从内容到形式整个造出一个“真”来。比如吃的，从原料、加工到包装，全部按照名牌畅销食品的样式制作出“康师傅”、“统一”等名牌食品；比如穿的戴的，选用相似布料、采取相同制作方式，加工出与金利来、皮尔·卡丹等名牌样式完全相同的服装服饰；比如用的，以基本相同的纸张、工艺、流程，制造出近乎乱真的美元、欧元、英镑、人民币等。仿造既可以是完全相同的材料、工艺，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材料、工艺，还可以是部分同部分不同的材料、工艺。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仿造出来的东西从外表看去一定像是真的，消费者想仅凭肉眼辨别出真假一般很困难。以仿造而冒充，在冒充的各种招数里难度最大、代价最大，非一般奸计者可为。但为者仍然很多，其原因并非是他们像现在的年轻人参加电视台的模仿秀一样为的是显示自己的模仿技能，而是他们的乱真仿造能够蒙蔽更多的消费者，所赚取的利润比其他招数更多。

(2) 削减

奸计者使用削减招数，大致从两个方面着手：偷工减料和缺斤少两。偷工减料是削减必要的工序和成分，为了节约成本而省时、省力、省物，把本该有的十种八种工序和十种八种成分削减一二，比如制造机器、生产玩具、缝制衣被、粉刷房子等，把其中保证质量的某道必要工序减免掉；再比如在生产医药、化妆品、洗涤用品、农药、化肥等时，减掉其中某种值钱的原料。并且，行为人这样做之后是绝不告诉给消费者的，否则，就不是奸计。缺斤少两玩的是削减数量的把戏，即把应有的尺寸、容积、重量、数目减少，而计价时仍以足数计算。最常见的是商品的缺斤少两，问题发生最多的地方就是菜场。当然，卖沙石的、卖砖瓦的、卖布料的等，也都会奸诈地削减所卖之物的数量以赚取昧心钱。

谋 诡 论

(3) 换标签

192

换标签是奸计者最省事而利润却不菲的招数。这种招数只发生在营销中而不发生在生产中。行为入只需把相同或相似的两种商品在标签上做手脚：低价的改换成高价的，滞销的改换成畅销的，无牌的改换成有牌的，无名的改换成有名的，过时的改换成适时的，甲地的改换成乙地的。其直接目的就是让消费者受骗上当。比如地下加工厂拼凑的电脑上柜时烙上IBM、联想、三星的商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加工的火腿肠，商家出卖时所贴的标签则是双汇、雨润、王中王；撕掉药品、食品、化妆品过期的商标，换上有效期还很长的商标后再出售。我们这里所说的标签除了笔写的、机印的、烙刻的有形标签外，还包括嘴说的无形的标签，如把武汉产的葡萄说成是新疆产的葡萄，把中国产的苹果说成是美国产的苹果，把牛筋说成是虎鞭，把清代铜钱说成是汉代铜钱。在他们说的时侯，其嘴巴就是商标的物质承担者，其语言就是商标上的文字。对这样的商标进行更换，要多容易就有多容易，只是上下嘴唇动动而已。

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人的身份标签，这种标签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形的是他们的名片、行头、出行方式等，无形的是他们的所说。奸计者更换标签，就是改变他的名片、行头、出行方式及嘴上所说。比如，一个无业游民冒充某厂厂长，他会印一盒该厂长的名片，打扮成该厂长的样子，租一辆与该厂长身份相符的轿车；出现在奸计对象面前时，则是完全改变自己真实身份的与其所冒厂长身份相符的自我介绍，从而骗得对象毫不怀疑他就是某厂的厂长而拱手奉送自己的利益。

机构的冒充所用招数之一也可以是换标签，比如，故意取一个与知名企业或正规厂家相似的名字，私下活动则打着该企业或厂家的招牌，借以牟取非分利益。再比如，根本没有得到境外公司的授权就在国内成立某境外公司中国分公司，开展非法业务活动。

(4) 吹嘘

吹嘘是奸计者惯用的手法，如果说仿造、削减两种冒充招数是

在产品本身上做文章，那么，吹嘘则是在产品之外做文章，它是通过媒体刊播、街头招贴、口头宣传等形式，夸大或者无中生有地将某种产品的使用价值、观赏价值或收藏价值等吹得神乎其神。这种冒充是一种依靠语言装扮，让无益变成有益、小益变成大益、无用变成有用、小用变成大用、无效变成有效、低效变成高效的冒充。如说某种药品能够包治百病，特别是对疑难杂症，可做到药到病除；如说某种化妆品除皱嫩肤效果奇佳，58岁的老妇今年用后，明年就是28岁的妇女；如说某个新发现的景点特美，美得上天堂、下苏杭与之相比也自愧不如；如说人民币的某种分币含有特种元素，外国收藏爱好者愿以千元美元购一枚……这样的吹嘘有人信吗？有！因为吹嘘者在吹嘘他的产品的时候，打的是祖传秘方、技术发明、最新发现、科学定论的旗号，信者在此旗号面前犯迷糊、失主见，听到科学、技术、秘方、发明的字眼就不再怀疑吹嘘者所吹嘘的是哄死人不抵命的鬼话，鬼使神差地做了吹嘘者的俘虏。

（5）调包

用此物偷偷换下彼物谓之调包。消费者购得某物后，奸计者为留下该物，采取障眼法以同类低廉之物、赝品或者是无用之物进行调换。此种手法，正规商家一般不用，因为用了对方找上门来脱不了干系。此法多半发生在路边店、地摊或私下交易中。比如买卖古董、邮票、钱币等用赝品调包；买卖服装、首饰、用品以低廉之物调包；买卖电脑、电视机、电冰箱则把无用之物塞进包装箱里面调包。调包的一大特点是消费者发现所购之物不是自己当时所选之物时难以置信。特别是那些亲自把所选之物装进包装盒（箱）的消费者，始终弄不明白盒（箱）里的东西怎么变了样？实际上，你所购买的东西不只是里面的东西变了，外面的包装盒（箱）也变了，只是你未能识别而已。奸计者早已准备好了调包所用之物（箱盒），待你选定所购之物后他热情替你包装，在包装过程中或者之后，趁你不注意，将两只盒（箱）互换，你拿走的自然是假物（箱盒）。有的物品虽然不包装，但用赝品予以调换时其手法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你被算计，是被算计在奸计者魔术般的手法之中。

2. 利诱

利诱，顾名思义，就是利益诱惑。利益虽然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之分，但奸计者算计消费者时，一般都是诱以物质利益。人无利益谁肯早起？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免不了对利益的追逐，虽然我们不能说他们在追逐利益时会见利忘义，但我们敢说他们往往会见利忘奸。奸计者对消费者施以奸计，所利用的就是这种见利忘奸。利诱的招数主要是两个：虚假打折和赠奖误导。

(1) 虚假打折

一个便宜三个爱，两个便宜十个爱，越便宜越有人爱。消费者追逐便宜，归根到底追逐的是利，这是每个人的自利天性使然。谁不愿以最少的钱购买最多的物？生产经营者十分清楚消费者的此种心理（换个视角，生产经营者也是消费者），因而为吸引更多的人购买商品，在出售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动起让利销售的脑筋，打折是让利销售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如果按正常的公平交易原则让利销售，我们无可厚非，比如将即将过期的食品打折销售，关键是他们违反这一原则及商业道德，故意虚抬商品价格之后再进行所谓的打折，骗得消费者误以为商家真的打折让利了，这就是商家的奸诈。也许是如此的虚假打折实在是太让经营者能够更多更快地牟取利益，所以，无论大小商贩、有证无证商贩都将其当做法宝使用。因此，你只要上街，随时都可以看到商家门前挂着这样利诱消费者的牌子：“清仓价”、“甩卖价”、“跳楼价”、“最低价”、“优惠价”等。2008年1月4日的《长江日报》就以《大商场虚假打折何其多》为题，报道了武汉市的一些大型商场和超市欺骗消费者虚假打折的情况。家住江夏纸坊的杨先生到某大商场选购夹克衫，其价格标的是原价880元，现价440元，经过讨价还价，以356元成交。待他买回再次试穿时，里面的吊牌标价仅为380元。更为邪乎的是，中南路一大型商场开展打折促销活动，其宣称原价698元的绵羊绒内衣，特价为99元，据老顾客讲，这种内衣在做活动之前一直是卖99元，从未卖过698元。所谓打折，实际上玩的是数字游戏，吃亏的只能是消费者而不是商家。

(2) 赠奖误导

赠奖就是赠送和奖励。赠送和奖励都是商家在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额外给予的物质利益。所谓赠送，是指只要购买了有赠送的商品或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数额达到一定的标准就给予购买者某种物质利益。比如“买一送一”，即买一件商品赠送一件相同的商品（有的是买一件贵重的商品送一件同类或不同类的便宜商品）；“满百送十”，即购买商品的价款达到100元时送10元的购物券。最邪门的是买多少送多少，比如蛇口天大商业城就做过这种事，它广而告之地声称，凡在商城里购买商品无论多少，只要满三年，花出的钱可以捞回，这下吸引了无数的消费者，结果是没有人不上当，因为三年未到之前，赚足了的商业城老板神秘消失。所谓奖励，则是指在购买了有奖励的商品或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数额达到一定的标准时购买者便取得被奖励的资格，至于购买者能否得到奖励和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则由购买者的运气决定。比如有奖销售，奖券随商品售出，谁购得商品谁就有资格打开奖券，中奖与否、中了什么样的奖就看奖券上的告知；再比如摸奖销售，奖券在摸奖箱里，购得了能够摸奖的商品或者购物的价款达到了规定的数量的购买者便有资格参与摸奖，能否摸到奖、摸到什么样的奖全凭运气。

赠奖是典型的利诱，其目的就是误导消费者购买其商品。正常情况下，购买同样或类似的商品，一个有赠物或奖品一个没有，谁都会冲着有赠奖的商品而去。商家发明此等方法，依据的就是这一点，在把握了这一点之后，奸计秉承商家的旨意在其中大显身手。且不说赠奖的利益实际上是购买者自身利益的转换，单说在操作的过程中商家的奸诈就让你知道赠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买一送一”，真正说来是让消费者“一次买二”，他把你要买的“一”加了一倍的价，所送的“一”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如买一袋奶粉只要15元，他在开展“买一送一”活动时将其价提高到30元（有时略低一点，更具欺骗性），你购买了，以为捡了一个便宜，殊不知是在多出一倍钱的情况下捡到的“便宜”。再比如摸奖销售，摸奖箱里要么就没有可中之奖的奖券；要么是一些末等的小奖奖券，根本

没有宣传中的大、中奖奖券；要么为让消费者相信摸奖箱里有大、中奖的奖券，则派内部人员假扮消费者，将大奖或中奖的奖券捏在手中去摸奖，真正的消费者谁也别想摸着大、中奖，因为摸奖箱里根本就没有大、中奖的奖券。消费者如果只是冲着赠品或奖品去购物，那么绝对是正中奸商的下怀。

138

虚假打折与赠奖误导，都是以利诱骗消费者，不同在于前者用的是减法，后者用的是加法。减法是让消费者表面看来奸商自减利益，加法是让消费者表面看来自认为自己增加了额外利益。奸商们精于计算，这一减一加，不知使多少消费者进入圈套，以付出额外的金钱养肥了他们。

（二）以竞争对手为客体的通常技法

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竞争是其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的、普遍的表现，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因而在市场的买卖关系中，竞争既可以发生在买者之间，即买方之间的竞争；又可以发生在卖者之间，即卖方之间的竞争；还可以发生在买者与卖者之间，即买卖双方之间的竞争。我们这里要说的竞争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中者，亦即发生在卖者之间的竞争，因此，本部分要探讨的问题——以竞争对手为客体的通常技法中的“竞争对手”则专指生产经营中的竞争对手。对付竞争对手，光明正大的做法是努力增强自己的实力，阴谋诡计的做法是尽力搞垮对方。奸计者玩的就是阴谋诡计，在搞垮对方上可以说是花样百出，不过通常的技法大致有这么几种：

1. 败坏名声

败坏名声是对付竞争对手用得最多的手法，包括败坏管理者个人的名声、败坏企业组织的名声、败坏产品质量的名声。败坏名声的基本招数主要有两种：一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比如，谎称对方主要管理者因吸毒、嫖娼、贪污受贿被警方抓走；捏造对方公司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即将被查处；造谣对方产品内含致癌物质。二是暗中捣鬼、栽赃陷害。比如，制造见死不救场面，嫁祸于对方主

要管理者；发现对方厂家一点问题，买通记者大肆做文章；买来对方产品人为破坏后再由商家卖出，造成该产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的虚假事实。如某市有A、B两家啤酒厂，A厂啤酒畅销，B厂啤酒滞销，为改变这种状况，B厂负责人不是在啤酒的质量上想办法，而是动起歪脑筋，设法让对方的啤酒卖不出去，这样，消费者只能买自己的产品。于是，他派人买了50箱A厂生产的啤酒后，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再送到锅炉房烘烤，如此折腾一段时间，然后通过关系分别将这50箱变质啤酒送到A厂啤酒的销售网点销售。买到变质啤酒的消费者纷纷要求退货，B厂趁机散布A厂偷工减料导致啤酒变质的谣言。一时间，A厂啤酒的销量一落千丈，不得不停产整顿找原因。B厂的啤酒随之销量大增。败坏名声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对方，唯我独存。此例中，B厂虽如愿以偿，但其目的手段的卑鄙性为世人所不齿。

2. 密取情报

密取情报是间术在经济活动中的运用。为了做到知彼，一举将竞争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奸计者时常要在情报的密取上下功夫。密取情报不同于收集情报，收集情报是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了解、把握、搜索、探听、解析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是君子之所为；密取情报则是采取阴谋诡计的手段把自己所需要的对方的信息搞到手，是小人之所为。之所以这样界定密取情报是小人的行为，目的在于区别“上德不德”即为了正义而密取情报的行为，前者目的恶、手段也恶，是纯粹的诡谋；后者目的善、手段恶，虽然属于诡谋范畴，但所要承担的道德责任极小直至接近于无，因而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密取情报一般不是实现目的的直接手段，而是间接手段，即手段的手段，是为采取其他对付竞争对手的手段服务的。比如，窃得竞争对手竞拍某个工程标的价的信息之后，马上修改自己的竞拍方案，并研究一举击败对手的措施。这里，击败对手的措施是达到目的的直接手段，将对方标的价信息的窃取则是达到目的的间接手段。窃取情报的方式很多，基本的方式有：金钱购买、秘密窃取、打入获取。

谋 论 诡

198

金钱购买情报，是密取情报招数中最常用的招数。之所以最常用，在于它简便易行、效果好。只要知道，谁掌握了对方的生产经营、人事变动等秘密，而已方又必需，便可私下联络，开价购买，当然，前提必须是掌握情报者是一个见利忘义的愿意出售情报之人。19世纪40年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所开的阜康钱庄之所以能够蛇吞象，吃掉大钱庄元昌盛，关键在于他买通了元昌盛钱庄的伙计赵德贵，得到了元昌盛钱庄的核心情报——存银与空头银票倒挂的数量，随之采取提现的手法整垮了元昌盛钱庄老板卢俊辉，从而得到了元昌盛钱庄。

秘密窃取情报，是密取情报招数中经常使用的手段。凡秘密都要存放在一定的地方，即使是非物质性的秘密也大多通过一定的载体放在某处，秘密窃取情报就是采用偷盗的方式将存放在一定的地方或某处的秘密弄到手。秘密窃取情报既有传统的方式，即派人潜入藏有秘密的地方将其窃取；也有现代的方式，即通过网络，打入竞争对手的计算机系统，破译其软件密码，从而窃得秘密。

打入获取情报，与前两种基本方式比较起来，难度较大，难就难在打入对方内部的合适人选难以找到，这样的人选不仅能力要强，而且要忠诚。没有前者，打入对方内部困难，即使勉强打入也完不成密取情报的任务；没有后者，要么白给对方送去一个人才，要么打入者成了对方的反间，反过来害自己。不过，这种招数一旦运用成功，效果比前两种更佳，因其获取的情报可靠性更大、时效性更强、数量更多。

3. 倾销垄断

在市场上，为了击败竞争对手，夺取市场，不惜采取低于市场价格、有时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大量抛售商品，当市场被掌控和独占之后，则按垄断价格出售，获取高额利润。倾销垄断招数是一种以实力作后盾、靠气势压垮竞争对手的手法，此种手法既用于国际市场，也用于国内市场，不用则已，一用影响重大而广泛。它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政府所不容、市场所不容，因而只要它一发生

就会被查处。我国“从1995年到2005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行业垄断案件5642件，涉及供水、供电、供气、铁路、保险、电信、邮政、银行、烟草、石油、盐业等垄断性行业企业；共制止和查处地区封锁、地方保护等行政性垄断案件519件，有力地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秩序”¹。查处归查处，奸计者并非因此而不用，只要利益足以让他们不顾一切，他们宁可被罚得倾家荡产也要冒险而为。这就是奸商的本性，无人能够改变。

（三）以合作伙伴为客体的通常技法

在经济活动中，一个生产经营者没有合作伙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合作过程中，每个生产经营者全都遵守法律道德、完全按君子协议办事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之中必然有奸计者，奸计者必然施以奸计欺诈合作伙伴，就像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必然要欺诈消费者和竞争对手一样。研究发现，奸计者之中虽然有真正的生产经营者，但更多的则是一些只是注册了的空壳公司企业、居心不良的冒牌货或者随意杜撰出来的所谓生产经营者。当然，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奸计者，其所欺诈的对象都是生产经营中的共存者。所谓共存者，是指那些为了谋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以一定的财物作为资本和条件参与生产经营，结果上当受骗的人。奸计者使用奸计，大多始于合作之初，即以合作为幌子，把对象诓骗进来，让其自愿拿出自己的财物，心甘情愿地参与所谓的合作。少量的奸计始于合作之中，比如合作生产经营到资不抵债的时候，采用奸计把债务推给合作者；或者合作生产经营赚到一定的钱之后，想独吞这笔钱而用奸计剥夺合作者得到这笔钱的权利。本部分要探讨的针对合作伙伴采取的通常的奸计技法，主要是奸计始于合作之初方面的。奸计始于合作之中的技法，由于是在进行之中，各自的情况千差万别，能够形成“通常”情况的不多，故不将其纳入探讨的范围。

¹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平交易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学研究中心编著：《反垄断典型案例及中国反垄断执法调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谋 论

2003

1. 假联营

联合起来生产经营谓之联营，假联营是以联合生产经营为幌子，骗取参与者的钱财。此种招数的基本操作程序是：第一步，诱人的宣传。比如在联合办厂、共同发展的广告宣传中，承诺实行“五包”（包技术、包质量、包产值、包销售、包利润），甚至提供一定的活动资金。第二步，邀请实地考察。这里的“实地”实际上是奸计者精心布置的既能显示实力又能让考察者感到备受尊重、特别开心的地方。第三步，签订合同。合同表面上看没有对上钩者不利的地方，实际上合同给奸计者预留了自由裁决、规避法律的空间。第四步，提供设备。这些设备是一些厂家淘汰了的当废品买的东西，要么不能正常运行，要么生产不出正品，他们请人装饰一番冒充先进设备。第五步，按合同规定向对方索要办厂保证金或设备费等。这是最为实质性的一步。第六步，钱到手即开溜。这种“联营办厂”奸计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祸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受害最深的是那些经济不发达、信息闭塞的“老、少、边、穷”地区。其最大祸源来自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日报》、《瞭望》杂志均发表长篇通讯，对此种奸计予以了揭露。目前，假联营的奸计并没有绝迹，它时不时地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某些地方。与假联营相类似的假投资（即虚构雄厚资本以投资某地创办企业或投资某厂扩大再生产为名骗取钱财）、假支援（即以无偿提供设备、技术帮助某企业发展为名行骗）在时下也成为以合作伙伴为对象的通常技法。

2. 高价回收

做什么事能赚钱？做出来的东西卖给谁才能赚到钱？这是一般想做点生意赚钱的人考虑得最多的两个问题。如果有人说他能帮你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包你稳赚不赔，你还会患得患失、不立即行动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行动要比行动好，行动快要比行动慢坏，谁要是立即行动，谁就首先落入圈套。在报刊上，这种圈套的表现形式是广告。比如，2003年初，在全国各地报刊上都登载了这样一则广告：免费供种、合作种植、高价回收，寻找引种中药材的合作伙伴。半年时间，无数的人看到这则广告，500多人

立即行动，每人汇款190元给武汉“中科美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买广告中所说的中药材种子，结果购回的种子要么不能存活，要么存活种植出来后被公司以其达不到标准而拒收。所有汇款人的血汗钱就这样全部打了水漂。这就是高价回收式奸计的基本样态。它的主要特点为：一是打着“高科技”旗号，如“蜘蛛提毒”，“蝎子制药”，“鸡蛋提酶”，快速培植灵芝、天麻、人头参，从动物肝、肺、肠中提取肝素钠、软骨素。二是谎称得到权威部门、知名企业（有的是编造的权威部门或知名企业）认可支持，如上述“中科美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向合作伙伴宣称它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农科院”、协办单位是“华中农业大学生物开发中心”、赞助商是“日本东亚集团医药贸易局”。三是诱饵特别诱人，如上述“免费供种、合作种植、高价回收”就是特别诱人的诱饵，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四是见好就收，因是奸计，时间长了必然被揭穿、揭穿之后必然被相关部门查处，所以奸计者常常是等所骗得的钱财差不多时马上关门走人，另起炉灶再开张，又去骗另一些“合作者”的钱。

204

3. 低卖高买

低卖高买即先以低价卖出某种货物后再以高价买回该货物。乍看这不是亏本的买卖吗？世上哪有如此做生意的？其实，这里的低卖高买只是圈套里的首个环节，因其特别，我们便将此作为此种奸计的名称。这种奸计的基本做法就是：多人合谋成立两个假公司，一个卖货假公司，一个买货假公司，先由卖货假公司向经过了一番物色的真公司或商店低价推销某种产品（相对后来虚假高价买回该产品是低价，而相对该产品的真实价格则是绝对的高价，不然骗子骗不到钱），或者是放一部分该产品让其试销；再由买货假公司向这样的公司或商店大量高价购买该产品。被算计的公司或商店见有大利可图，立马向卖货假公司大量、低价购进该产品，等购进之后转手卖出准备赚大钱时，再也找不到要货的买主了，花几万元或几十万元买进的产品成了无人问津的废品。此种奸计谁发明的难以考证，但现今用得最多、最有影响的则是湖北仙桃、汉川人。从20

谋 诡

202

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们用此奸计行骗于全国各地，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宁夏、甘肃等地区，使受骗者深受其害。为此，1995年6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专门对此奸计进行了揭露，提醒各地相关人员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十多年过去了，该奸计并没有绝迹，又以新的方式出现在全国各地，行骗者仍然多半是仙桃、汉川人。过去行骗所用的产品叫“箩底布”（原始叫法，即过滤竹器——箩筛底面的专用材料，价格极为低廉，每米几毛钱，但卖给对方时则是每米20元左右，而虚假购回价则在30元左右），现在布料未变，但名称则越来越“科技”——“防化布”、“珍珠膜”、“玛钢硅布”、“高分子材料”、“纳米布”等；原来买卖为口头协议，现在煞有介事地签订合同，更具欺骗性；原来接触都是面对面，现在一般用电话，更绝的是奸计者还把成立的虚假公司的名称和所安装的电话号码在当地的“114”查询台备案，让怀疑者查询后不再怀疑，放心大胆地进行交易。

4. 传销

传销被称为经济邪教。1990年底，传销在我国出现，之后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由发展、限制发展和全面禁止。它似乎特别适应中国的土壤，一粒种子下地，迅速发芽、生根、疯长、蔓延，其发展之迅猛、参与人数之众多、危害之重大，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据公安部门统计，仅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传销犯罪案件2848起，涉案金额42.1亿元，打掉传销团伙3800多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分子20500余人，教育劝返受骗群众336590余人。对此，国务院在1998年4月曾发出《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仍不能遏制的情况下，又于2005年8月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以专门法规的形式予以坚决的打击。该条例明确指出：“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这就告诉我们，经营者与被发展的人员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牟

取的非法利益是由被发展的人员提供的。传销的基本技法是通过参加人员培训洗脑，宣扬所谓的迅速发财致富等传销理论，使人沉溺于“发财梦”中不能自拔，诱使参加者不择手段大肆从事欺骗活动，所欺骗的对象大多是亲戚、朋友和熟人。传销组织等级森严，一般分为会员、主管、主任、部长和经理五个等级。根据每个人的业绩，由低到高逐级晋升，发展一名下线就可成为会员，按入门费的15%提取报酬；发展3~9人的可成为主管，按入门费的20%提成；发展10~64人的可成为主任，按入门费的30%提成；发展65~391人的为部长，按入门费的42%提成；发展392人以上的为经理，提成入门费的比例为52%。有的晋升则是按每发展下一级人员5名就可晋升一级，级别越高提成的比例越大，这与前情一样，只是比例各有不同。为什么传销屡禁不止，其诱惑力恐怕就在这里。然而能够达到主任一级以上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一旦进入便血本无归。

5. 欺诈融资

在生产经营中，合作伙伴之间的经济关系最直接的反映是金钱关系，围绕着金钱而发生的借贷、租赁、集资等融资行为给奸计者提供了用奸的无限空间，各种暗算合作伙伴的招数技法也因用奸空间的无限而层出不穷，有的创造出来因不合适宜而自生自灭，有的屡试不爽成为经典。归纳起来，基本的招数有这么一些：

一是伪造票证。即运用描绘、复制、印刷、影印等方法仿制信用卡、银行票据、供货单据、印鉴及其他文书证明材料，采取提现、抵押等形式诈骗资金的行为。

二是变造票证。即运用涂改、剪贴、挖补等方法非法变更票据、信用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书材料上的记载内容诈骗资金的行为。

三是签发空单。即签发空头定期存单、空头支票、空头汇票诈骗财物或者自己无力偿还仍使用信用卡透支的行为。

四是骗取票证。即用编造虚假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等方法，使受害方基于错误认识而为其发放金融票据、信用证、信用卡、资信凭证等。这种手段与前三种不同的是，骗取票证（卡）不是行骗

人行骗的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利用骗取的票证（卡）进行诈骗。^①

五是非法集资。即以超出银行几倍、几十倍的利息为诱饵诱使众人参与所谓集资，最后卷走钱款的行为。其手法是“拆东墙补西墙”，即用超高利息吸引人们投资入股，对先投资入股者承诺兑现，所兑现的超高利息来自于后投资入股者，后投资入股者要以等比数列的数额出现才能满足先投资入股者需要。这样的投资入股状态仿佛是一座金字塔，如果后投资入股者不继，此金字塔则马上坍塌。非法集资在江浙一带叫“抬会”、“合会”或“标会”，有的地方叫“老鼠会”，有的地方叫“高回报投资”，有的地方则叫“高息揽储”。“非法集资”之名出自1997年《刑法》，《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明确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集资诈骗罪，因此，“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术语。在美国，此种奸计叫“潘其方式”，来历是1920年代，一个叫查尔斯·潘其的美国人首次用此奸计布局，卷走500万美元，其影响轰动全国。此种招数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危害严重，是其他欺诈融资技法所难以企及的。前举浙江乐清县的“抬会”案例，是典型的非法集资，其参与人员20多万，涉案款项发生总额超过10亿元，这座金字塔刹那间坍塌之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毁物在大小会主家发生，25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江苏无锡邓斌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涉案金额高达32亿元，受到党纪政纪处理的涉案党员、干部多达123人，对金融秩序的破坏和给出资企业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6. 下套合伙人

下套合伙人就是预设陷阱让合作伙伴落入之后再辅以其他手段使合伙人遭受损失。前面介绍的假联营、高价回收、低卖高买、传销、欺诈融资都有对合作伙伴下套的意思，我们这里单列出来，是

① 缪卫华、方喻坤：《厦门市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思考》，载《公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想把除此五种技法之外的其他典型下套手段纳入“下套合伙人”之中，让大家能更清晰地看到奸计的形形色色和“奸商”的阴险狡诈。

2004年3月16日的《天津政法报》刊登过这样一个案例：

205

王保财与张某某是一对好朋友，都住在河北唐山市，2003年5月之后，王便吃住在张家。张妻见王只吃饭不做事，成天游手好闲，心有不满足。王认为张妻对自己怠慢是瞧不起他，遂生报复之心，要用计“整整”张家大妇。当年7月中旬，王保财对张某某称，他有一笔建筑模板的生意能够赚大钱，但需要投资15万多元，问张是否愿意合伙做这笔生意，并说自己出资8.5万元，张只出7万元，生意做成后利润对半分。张某某想了想，答应了。王保财马上采取下步措施，他找到在唐山打工的黑龙江人孙宝国，直接问孙：“张某某夫妻对我不义，我想教训一下他，你愿不愿意帮忙？”孙问怎样教训，王说：“我假装和张某某外出做一笔生意，我出4万元，他出3万元，我们的钱放在一起，到时候你把装钱的包偷了，我的钱你还我，他的钱归你。”孙见这事既能帮朋友的忙又能搞到钱，即刻同意。但孙马上又为难起来，因为他认识张某某，怕不好下手。王建议孙再找人下手。孙找到朋友小宝、小侯。四人一番密谋后开始行动。

7月30日早晨，王保财按照与张某某的约定来到张家，收拾行囊准备出行，王趁张不注意，将事先用瓜子糖果伪装好的冒充8.5万元的手提包和张某某的7万元现金一起装进张某某的旅行包内。

二人乘车到达唐山火车站，准备外出做这笔生意。

到达唐山火车站后，二人排队买票。王见孙宝国等三人已到现场，小侯拎着与张某某一样的旅行包（事先准备好的）朝自己这边走来，便拿出50元钱给张某某买票，张某某顺手将手中的旅行包递给王保财保管。王将旅行包放在地上，故意不紧不慢地从衣兜里掏出香烟、打火机来点火抽烟。这当儿，小侯将地上的旅行包换走。过了一会儿，王假装惊慌地对张某某说：“我们的包被人换了。”二人立即追出售票厅寻找。无果之后，王保财假假惺惺地号啕

谋 论 诡

大哭起来。后来张某某到派出所报案。案破后，张某某怎么也不相信，害他的竟是自己的好朋友王保财！

客观地说，上述案例中的圈套还是设计得比较高明的，假如不是警方破案弄清真相，张某某绝不会怀疑王保财会害他。正是：人心隔肚皮，合作成陷阱。

206

布设陷阱，对于不法生产经营者来讲，真可谓家常便饭，即使使用合同的形式来约束合作的双方，也有人在合同里“挖”出一个陷阱来，让合作的对方掉进去。

商业陷阱随处可见，下套合作伙伴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是商业巨子也不乏使用如此卑劣手段的。1873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对梅里特兄弟的密沙比铁矿垂涎三尺，为了搞到手，他买通牧师劳埃德，乘梅里特兄弟资金短缺之危，开始下套。劳埃德以天使的名义来梅里特兄弟公司，愿为其排忧解难，借贷一笔巨款。梅里特兄弟非常高兴，以比银行利率低2厘的利息借到所需款项。借条是这样写的：“梅里特兄弟向劳埃德牧师借到考尔贷款42万美元，月利3厘。”兄弟俩在上面签了字。贷款到手，他们立即将钱投到铁矿的开发之中。四个月之后，他们的喜悦心情还未消散之时，劳埃德牧师却来催还贷款的本息，说是借款者等钱急用。梅里特兄弟哪里有现钱可还，争执不下时，上了法庭。官司自然是梅里特兄弟输了。因为，考尔贷款的含义就是借款人随时可以索回所贷款项，故其利息低于一般定期贷款利率。刚从德国移民美国发展的梅里特兄弟哪里知道这些。现在，根据美国法律，梅里特兄弟只有两条路可走：即刻还清贷款本息；如果不能即刻还清，就当场宣布公司破产。落入陷阱的梅里特兄弟已是无法自救，只好宣告破产，以密沙比铁矿抵偿债务，作价52元美元。几年之后，洛克菲勒转手将铁矿卖掉，价格是1941万美元。商人的奸诈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难怪马克思说，作为商品的财富，是“商人阴谋诡计设法弄到的”^①。

^① 《资本论》第3卷，郭大力、王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0页。

7. 串通涨价

串通涨价，也叫联盟涨价，是指经营者之间互相串通或者通过行业协会、中介组织以协会决议、会议纪要、协调、口头约定等方式合谋涨价。串通涨价的目的是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串通涨价的要害在于违反价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暗中串连，联合行动，共同提高商品的价格；串通涨价的危害概括起来讲有三点：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破坏了市场价格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如果说前面介绍的假联营、高价回收、低卖高买、传销、欺诈融资、下套合伙人等六种技法都是利用合作、暗算合作方，合作是假、损害合作方利益以肥私是真，那么，串通涨价则是合作各方利用合作，共同对付消费者和非合作方，其合作是真，真就真在大家联合起来赚取一笔不义之财。

207

2007年下半年以来，串通涨价的现象在我国不断发生。如2007年8月2日，湖北省荆州市豆制品经营户集体串通，决定统一提高豆制品价格，并贴出公告称：“因今年以来黄豆价格持续上涨，经豆制品商会讨论通过，从2007年8月2日起，上调豆制品价格。”并决定提高香干子、豆腐等四种豆制品的市场销售价格，平均涨幅20%左右。再如吉林市豆制品协会于2007年8月8日召集十余家豆制品企业开会，串通提高全市干豆腐价格，统一将干豆腐制品批发价由每公斤4元涨到4.6元。同时，还以书面形式向零售商发出通知，建议把干豆腐制品零售价格由每公斤4.6元涨到6元。

串通涨价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凡有商品买卖的地方就有串通涨价的现象发生，这是由商品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四）以利益相关者为客体的通常技法

消费者、竞争对手、合作伙伴还不是奸计者施以奸计的所有客体，奸计客体中还包括一个重要方面——利益相关者。对于奸计者来讲，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公安、检察、

谋 诡

论

208

法院、司法、公证、工商、税务、海关、卫生、环保等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这些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奸计者看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掌握着一定的公权，即对整个社会管理有相应的决策权、组织权和控制权，而这种公权与其生产经营中的利益有无与大小密切相关，所以，这样的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被称之为利益相关者。当然，利益相关者还包括虽然没有公权但有话语权，能左右舆论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比如政府出台有关房地产政策，这对房地产商来讲至关重要，几千万元或上亿元的利益的有无往往就在一项政策出台与否或出台时间的早晚；特别是股市，对政府的政策更为敏感，有的即使早知道一分钟，就有可能获得亿万元的利益或者避免亿万元的利益损失。再比如海关，海关是查处走私的机关，走私是违法的暴利经营行为，当这种行为发生之后，海关查与不查，对走私者来讲，不仅关系到他利益的有无，而且关系到他人身的自由甚至生命的有无。所以，为了自身的不当利益，奸计者无不施奸计于利益相关者。归纳起来，这样的通常技法最常见的有两种：

1. 收买

收买是对付利益相关者最常用的招数。表面上看，收买所收买到的都是某个具体的人，实质上所收买的是公共权力。一个人如果没有掌握一定的公权，奸计者是不会将钱财用到此人身上的；一个人所掌握的公权对奸计者越是重要，奸计者越是愿意用高价收买。用金钱收买，是收买中最普遍、最现实的收买形式；次之是美色收买，也就是通过性贿赂达到收买目的。从经济学视角看问题，前者是权钱交易，后者是权色交易。奸计者本来从事的就是买卖活动，深知交易之规则，以什么样的方式、花多大的价钱去购买必须购买的权力商品，自然办法多多。就付费方式讲，他们或直接送以金钱、送以别墅、送以轿车、送以宝石、送以古董，或以合伙的名义送以干股、以考察的名义送其出国旅游、以赌博的名义让其只赢不输、以高薪雇用其情妇……

在几乎无人不知的厦门赖昌星特大走私案中，仅上过三年小学

的赖昌星能够在几年的时间里，走私成品油、香烟、汽车等案值达530亿元，偷逃税300亿元，首功在于他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收买技法。当地党委、政府、海关、公安等部门以及中央机关的大小官员364人成为了他的俘虏。他用500多万元人民币攻破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打私领导小组副组长李纪周的防线，使其成为他的“大哥”；他花1400多万人民币为时任厦门海关关长的杨前线养情人，致使海关的关口为他走私而洞开；对于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这个暴发户而与他保持一定距离的时任厦门海关主管查私的副关长接培勇，他收买的办法就是根据接培勇喜好书画的特点，花重金购买了国内几名知名画家联合创作的牡丹图奉送，并且让其为自创的远华牌香烟（赖昌星创办的公司名叫远华集团有限公司）题写烟名，自此之后，接培勇对赖昌星的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赖昌星曾夸下海口：世上还没有他收买不了的官员。由此看来，收买厉害无比。

2. 忽悠

忽悠即欺骗，欺骗的核心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此来看，忽悠可被任何诡谋者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单是奸计者对付利益相关者独有的招数。不过，在对付利益相关者上，奸计者的忽悠技能的确别具特色，且档次高、欺骗性大。比如，为了抬高企业的声誉，向媒体展示企业负责人与中央领导人的合影（实际上是电脑合成），或编造中央、国家机关给企业发来的成立贺电或授予的荣誉称号；比如，为了让企业上市，向国家发改委、证券交易所呈送虚构盈利、隐瞒亏损的假账；比如，为了掩盖排污不达标的问题，铺设明暗两套排污系统，借以欺骗环保部门或新闻记者；比如，本没有向境外出口任何货物，却与相关企业勾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欺骗税务部门，骗取出口退税；比如，伪造身份、虚构注册资本、假报办公地点，从工商部门骗取营业执照；比如，监守自盗或自我纵火烧毁公司财物之后报假案，让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从而骗取保险赔付；比如，掩盖或改变客观事实，捏造出法律事实，让法院作出有利于己但却是颠倒是非的判决……

谋 诡 论

210

据2005年11月2日《法制日报》报道，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一名主审法官无意间在法院的楼梯拐角处看到令他难以相信的一幕：十分钟前还在法庭上破口对骂的原被告双方，此时的关系亲密得非同一般。只见被告（债务人）给原告（债权人）递上一支烟，原告还亲昵地拍了拍被告的肩膀，两人在吞云吐雾中谈笑风生。这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案子进入执行阶段这位法官才发现问题的所在。原来，在这笔案款为80万元的合同欠款纠纷中，原、被告两家公司根本就没有真正发生纠纷，他们“闹”上法庭的真实目的是：本着“互惠互利”、“利益分成”的原则，获取法院的判决书以此“安全”地避过税收。税收是根据发票上的数据征收的，经济交往中的常规是“谁收钱由谁提供发票”，但是法院划走被执行人案款时，依据司法执行规定，不必向被执行人出具发票；申请人从法院账户上领走案款时，依据司法执行规定，同样不必向法院出具发票。结果是，这两个“不出具”便为漏税行为搭建了一条“安全通道”。双方利用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应付税务局查账，一般都可以顺利过关。据测算，这笔80万元的案款按最低税率3%计算，仅国税和地税两项就该缴纳3万余元，而其执行费只需交纳800元。如此划算的官司怎能不叫唯利是图的生产经营者“愿意”官司缠身！好一个钻法律空子、忽悠法院的奸计，非一般生产经营者难有如此的黠慧诡智！

忽悠与收买最大的不同在于：忽悠是让利益相关者在不知中服务自己、成全自己；收买则是让利益相关者在知中服务自己、成全自己。从相互关系讲，在正常情况下，双方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当奸计介入的时候，忽悠中的双方关系是敌对关系，一方欺骗一方反欺骗；而收买中的双方关系则是朋友关系，你支持我、我支持你，为实现各自的目的而满足对方的需要。从成本上讲，前者小甚至无，如用几句话将坏事掩盖；后者大甚至非常大，如花几千万元贿赂对方。从风险性讲，前者大甚至很大，如随时担心被揭穿而坐牢甚至被枪毙；后者小甚至无，只要所收买的利益相关者不倒，牟取不当利益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从优劣上

讲，两者不分伯仲，有时采用忽悠技法效果好，有时采用收买技法效果好。一般情况下，一锤子的买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适宜采用忽悠技法，长期经营、为牟取更多的不义之财的措施适宜采用收买技法。当然，两者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佳。比如监守自盗报假案，忽悠警方立案侦查得到保险赔付之后，再收买侦查人员不再侦查，以免真相败露。

211

二、奸计的类型

奸计，是人的奸计，具体说来是从事经济活动者的奸计，从事经济活动者创造了形形色色、无以计数的奸计。若把这些奸计分类摆放时，不难发现，它们之中有圆的、有方的，有大的、有小的，有黑的、有白的，有软的、有硬的……一类面孔就是一个类型的奸计。奸计的类型可归纳为以下三组六种：

（一）被迫型奸计和自愿型奸计

根据人的主观意愿情况，可以将奸计分为被迫型奸计和自愿型奸计。

1. 被迫型奸计

所谓被迫型奸计，是指本来不愿意，但又抵制不了，为了获得或保持利润或好处，不得已改变自己的意志，加入到奸计的经济活动之中。被迫型奸计又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组织强迫。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只要你是组织中的一员，为了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组织要求你施用奸计你必须施用奸计，否则，你要获得的利润或好处无法获得，你要保持的利润或好处无法保持，严重者还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为了摧垮美国的经济，曾强迫造币厂大批量地生产美国货币，致使美元在瞬息之间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独裁者希特勒为称霸世界，破坏他国的金融经济，也曾强迫造币厂伪造了十多个国家的纸币。造币厂制造假币，

谋 论 诡

是典型的奸计行为，但掌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你这样做，你不能不这样做。

212 二是恶力胁迫 任何消费者都希望所购商品货真价实，对诚实生产的厂家、诚实经营的店家投以信任，只要消费，必然到诚实经营的店家购买诚实生产的厂家生产的商品。这对奸计生产经营的厂家店家无疑是个打击。奸计生产经营的厂家店家在竞争不过的情况下，时常采取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迫使对方加入到奸计行列之中。多数厂家店家对待胁迫选择的是屈服，因为屈服利润不会没有，不屈服生产经营难以维持无法获得利润。厂家店家生产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利润，为了利润而作出违心的选择，在经济领域是常见的事情。流氓、地痞、帮派、黑社会等往往是恶势力的代表。旧上海滩上的黑社会组织，其开设的赌场、妓院、烟馆、典当行等无一不用奸计自不必说，他们时常对那些本分经营的粮铺、酒店、旅馆、客栈等采取软硬措施迫使其按照他们的旨意，在米里掺沙，在酒里掺水，在旅馆、客栈设骗局，以达到这些店家与他们同流合污的目的。谁要是不从，必然被“修理”或清除。

2. 自愿型奸计

见有利可图，自然而然地采取奸诈的手段从事经济活动，这就是自愿型奸计。自愿型奸计于经济活动，有的是一开始就使用奸计手段，有的是在中途或因诚信生产经营不下去了，或因无法抗拒奸计生产经营的高额利润诱惑而使用奸计手段。自愿型奸计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群仿性，即只要有一人通过奸计轻而易举地获得利润或好处，其他人马上效仿，形成群体性奸诈。时下出现的“造假村”、“诈骗乡”、“‘抬会’县”等都是这种群体性奸诈的结果。

1989年1月31日的《人民公安报》刊登过这样一个案例：

辽宁省抚顺县海浪乡上海浪村农民迟仁业根据报纸上的广告，以每公斤25元的价格从河北省邯郸市某单位买了几斤韭葱籽。回家后，他抚摸着刚从邮局取回的韭葱籽，不禁突发奇想：假如我虚设一个种籽公司，把这韭葱籽进行包装，取个好听的名字，再在报纸上登个广告，以几倍或者几十倍的价格买出去，岂不是赚钱如在

塘里舀水——容易得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既然自己想到了，就应该立即付诸实施。

于是，他准备一番后，从乡政府开出介绍信，先后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的大小报刊上刊登了如下一则广告：“本种籽公司有少量的“海蒜种”，本品种系以产蒜苔为主的多年生蔬菜，露地越冬，每年可抽苔五六次，并割而复生。一次种植，多年受益，每亩年收入万元以上……本种籽公司负责提供种植科技资料，并包产包销。如有愿尽快富起来者，可从速前来订购或经邮局函购。”

218

广告刊出后，“前来订购”和“邮局函购”的农民不少。短短二个月时间，迟仁业的腰包中额外增加了3万多元。这一下，迟仁业成了“致富模范”，村民们纷纷效仿，不到半年，全村147户人家，竟有108户成立了自己的“种籽公司”。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数以万计的农民为此落入陷阱。上海浪村成了名副其实的“骗子村”。

自愿型奸计的群仿性好似经济活动里的瘟疫，传播快、感染多、危害大、影响深，使人们一谈经济活动就想到奸计，一想到奸计就神经紧张，因而对生意人没有好感，对无商不奸的认识更加坚信不移。要想改变这种印象和认识，除非商品生产经营者从此不再施用奸计。

（二）偶尔型奸计和经常型奸计

根据使用次数的多少，可以将奸计分为偶尔型奸计和经常型奸计。

从职业道德上谈生产经营，其方式有两种：诚信的生产经营和不诚信的生产经营。前者，为了更好地诚信的生产经营，常常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针对不诚信的生产经营者，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使用奸计手段。比如低价买断原材料再高价卖给不诚信的生产经营者。此等奸计手段只能是偶尔使用，不可能经常使用，因为他针对的是不诚信的生产经营者，而不是消费者。不诚信的生产经营者使

诡 谋 论

214

用奸计手段，除了针对诚信的生产经营者外，更多、更广泛的是针对消费者。他们为了自己，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不更多、更广泛地针对消费者不能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奸计手段的使用还必须经常为之，因为不经常为之，利益的最大化无法实现，而偶一为之的收效比起经常为之来要小得多。当然，诚信的生产经营者也有偶尔针对消费者的奸计，但当他们为此付出沉重的诚信代价之后，立即悬崖勒马不令其向经常演变。过去的徽商、晋商中，这样的例子相当多。

（三）重创型奸计和轻害型奸计

根据危害程度的大小，可以将奸计分为重创型奸计和轻害型奸计。

凡奸计都有危害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则如毒蛇咬人，让人有性命之忧；小则如蚊子叮人，虽无性命之虑，但也让人疼痒难耐。前者于国家，让国家经济瘫痪；于企业，让企业破产倒闭；于个人，让个人家破人亡。这就是重创型奸计。凡对经济比较关注的人，一定不会忘记20世纪末亚洲的金融危机，引发这场危机的是被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称之为“亚洲金融危机纵火犯”的乔治·索罗斯。1997年6月，索罗斯采取奸计的手段，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起大量的资金，选择泡沫经济比较严重的泰国，开始向泰铢发起猛烈的进攻，大量抛售泰铢，使泰铢一下贬值许多，其股票指数由1200余点狂跌至550多点。泰国全国上下顿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紧接着，索罗斯的矛头直接对准东南亚的最大国家——印度尼西亚。刹那间，印尼货币出现大幅狂泄，民众疯抢美元。泰铢、印尼盾的城池被攻破之后，荷包鼓起来了的索罗斯并未善罢干休，进攻的铁蹄又践踏到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东南亚的经济由此遭到重创。这是一个人对付多国的经济战争，胜者却是一个人。这个人取胜的手段正是奸计，足见奸计能量之巨大，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战争年代，为了战胜对方，在采取军事打击的同时，用奸计破坏对方经济是常用手段，比如伪造对方的货币。日寇侵华期间，为

了配合军事行动，他们大量伪造中国货币，借以破坏中国的经济。1938 年底，日军少佐山本宪藏受命制定实施伪造中国钞票的方案。1940 年，山本在国内印制了大量的中国 10 元面额钞后，用最新发明的“污损器”将新钞变旧钞，秘密运到中国后再与真钞混在一起使用。至 1946 年，日寇共伪造了 30 亿元的中国货币，极大地破坏了中国金融市场，使并不景气的中国战时经济雪上加霜。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大罪行。

与重创型奸计相对的是轻害型奸计。轻害型奸计对被奸计者所造成的危害是轻微的，但数量上远远大于重创型奸计，具有普遍性，似乎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比如商品的掺杂使假、缺斤少两，这是奸计者的惯用手法，只要你购买商品，都有可能被奸计暗算。

湖北英山一位名叫冯树民的老人给当代奸商编了一段顺口溜：“奸商真可恨，不认友和亲；一尺扣一寸，九两当一斤；价格明优惠，把假当成真；人家上了当，他就称了心；虽然很富足，死后留骂名。”这是对轻害型奸计商人的真实而精细的概括。不过，对于奸商，仅以道德谴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时常地“法律伺候”，只有如此，作用才会明显。

三、奸计的根源

奸计产生的原因从本末上考察，有根本原因和非根本原因。这里，我们从根本上、源头上寻找奸计产生的原因，把探讨的重点放在两个方面。

（一）商品经济蕴含着奸计

在这里，我们谈奸计，完全是以经济为前提的。谈经济特别是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的市场经济，最不能回避的一个字就是“利”。商品的生产经营以营利为目的，“贵利轻义”是商品经济的本性。王海明先生认为，“一切市场经济行为目的，便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如果一个人从事市场经济，目的

谋 诡 论

216

是为了利他，他便应把商品无偿送给对方，那样，他所从事的便不是买卖行为，不是市场经济行为了。任何一个真正从事市场经济的人，任何一个真正的买方或卖方，他都不但不会把自己的商品无偿送给对方，而且还要和对方争夺利益。这种利益的竞争表现在：每一位卖者都争取贵卖，把自己有限的商品换成尽可能多的货币；反之，每一位买者尽可能贱买，把自己有限的货币换取尽可能多的商品……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依靠卖者与买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争夺来配置资源的。”^①

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王海明先生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所以，他认为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不论是公有制的主体，还是私有制的主体；不论是国家，还是集体抑或个人，都是完全平等的，而决不存在谁高于谁、谁服从谁的关系。他们都要服从等价交换的原则，相互之间的关系是讨价还价、你争我夺、谁也不肯吃亏、谁也不肯自我牺牲的等价交换关系。因此，反映在行为手段上，要么为己利他，要么损人利己，绝不存在无私利他，若存在无私利他，那么这样的行为便不是市场经济行为。

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也就是说，不发达的或者说是低级形态的商品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低级形态的商品经济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当它发展成为社会化即高级形态的商品经济时，市场经济才由此产生。所以，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存在条件，商品经济具有的等价交换的本质特征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经济规律同样也是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由此反推，市场经济为己争利的行为目的和要么为己利他、要么损人利己的行为手段，同样是商品经济的行为目的和行为手段。

诚然，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要存在和发展，从量上看，为己利他手段的行为必须多于损人利己手段的行为，否则，其存在和

^①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1~272页。

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商品经济手段之一的损人利己，却始终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存在而存在、发展而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谁也无法改变。正因为如此，包括奸计在内的损人利己行为，无论对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危害，对道德的规范有多大的破坏，并因此遭受人们怎样的不耻、痛斥和打击，它照样像烧不尽的野草，春风吹又生，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节律、不同的行为主体表现而已。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奸计源于商品经济、成于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奸计的酵母、温床和土壤。那么，奸计为什么能在商品经济的王国里一展身手呢？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正当与不正当难以区别，使奸计得以浑水摸鱼。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等价交换，商品交换要求价格和价值相一致，但由于竞争和供求的关系，商品的价格总是以价值为中心而上下波动。当供大于求时，商品价格会低于它的价值；当求大于供时，商品价格则会高于它的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商品价格高于它的价值时高到什么程度为正当合理，低于它的价值时低到什么程度为正当合理？尽管从长期看，价格高于和低于价值的部分，会相互抵消；从全社会看，商品的价格总额与商品的价值总额是一致的，不存在正当合理问题。但是就短期而言，就个别而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会根据商品的价值把其价格控制在正当合理的范围内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他们希望价格越高越好；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他们凭借实力，不惜血本，让商品的价格远远低于价值。商品购买者对商品价格是否正当合理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也只是凭感觉，到底高多少低多少仍然胸中无数。这种“胸中无数”自然给商品生产经营者留下不正当作为的广阔空间。囤积居奇是投机商人常用的奸计手段。他们把商品积存起来，让价格大大高于价值时再出卖，借以牟取暴利。商品购买者也知道这是不正当的经营行为，但究竟不正当在什么地方却说不清楚。而投机商人则心安理得地把不正当的经营行为进行到底。他们心安理得的理由就是物以稀为贵，现在此种商品短缺，

谋 论 诡

213

贵卖是正当的、合理的，卖得再贵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嫌贵你不买就是了！就这样，在商品购买者对囤积居奇者经营行为的正当与不正当的困惑之中，囤积居奇者昧着良心赚了大钱。所以说，商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奸计等不正当的生产经营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①，作为商品的财富，是“商人阴谋诡计设法弄到的”^②。

第二，利润的诱惑，使奸计为利而冲锋陷阵，利润是商品生产经营者目的之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总是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因而在行动上呼应以“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并且所干得到的所利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拟的，是及时的而不是迟缓的。正因为如此，商品生产经营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并且见利越大忘义越深、为富越切不仁越显。一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注文中引述的19世纪中叶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一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二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③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逐高利润的情况，而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社会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在追逐利益时的心态。此等心态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给予了描述。描述此等心态的人是我国春秋时的大政治家管仲。他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④用现在通俗的话讲，就是只要有一定的利益，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利益有如此大的诱惑，唯利是图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怎能抵挡得住？将其获取，何惧采取奸计的手段！目前，各种掺杂使假商品充斥市场，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1页。

②《资本论》第3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0页。

③《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39页。

④《管子·禁藏》。

论政府采取怎样的手段进行打击遏制，也未能改变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利润的诱惑对商品生产经营者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第三，改变劣势状态，奸计功不可没。处于优势地位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不能保证他们为保持优势而不使用奸计，但就整体看，他们使用奸计的数量绝对比处于劣势地位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少。为什么处于劣势地位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要多用奸计？从根本上讲，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们之所以处于劣势，与他们的素质、能力、资金、技术、环境、机遇、背景等不如处于优势地位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有关。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商品经济领域。处于劣势地位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不被淘汰，会竭尽全力改变劣势。改变劣势的办法有正邪两种，正办法就是通过法律、道德许可的手段提高自身的生存、发展实力，邪办法就是通过违反法律、道德的方式增强自身的生存、发展实力。奸计是邪办法之一种。非法集资办所谓企业就是最典型的奸计手段。他们以高息为诱饵，大肆骗取他人资金，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或者干脆将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卷款而逃，办企业完全成为他们聚敛钱财的幌子。就这样，他们通过奸计得到无本万利的回报，很快改变了自身的劣势状态。假如他们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那么他们是最大的成功者。

第四，简便易行有效，更令奸计得以畅行。奸计是奸计者的法宝。所谓简便易行，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能够非常容易地实施奸计，并且效果立马显现。在商品生产中，弄虚作假再容易不过了，特别是生产一些紧俏商品，生产多少也不愁销路，这时，只要将良心赶到一边，就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不费吹灰之力地减少某种原料，或者用其他便宜物代替某种原料，而销售效果一时半会不会改变，但利润却可因奸计的作用而成倍增加。在商品交换中，采取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暴利出售的奸计手段同样是轻而易举的事，所获利润同样非常丰厚。所以，经济学家王亚南说：“商人只懂得一种哲学，即欺骗哲学。”^① 欺骗是奸计的典型特征，凡奸计必然存在

① 王亚南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页。

欺骗。商品生产经营者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不教而会奸计，无师而自通“欺骗哲学”，因而他们弄虚作假于商品生产经营中时，比起其他弄虚作假行为更为简单、更为方便、更为易行、更为有效。正因为如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才说“凡商业都是罪恶的”。

（二）博弈心理助长奸计

220

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固有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相互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①。离开竞争，商品经济便不存在。所以，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得不在市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利益争夺，为了取得胜利，非法非德的奸计手段常常被他们当做法宝使用。竞争也是一场博弈，奸计是博弈中的特殊方式。所有商品生产经营者天然地存在着博弈心理，奸计是他们重要的筹码。

博弈心理本来是心理学家研究的范畴，数学家、经济学家却对博弈非常感兴趣，将博弈研究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博弈论。被公认为博弈论奠基人的冯·纽曼就是近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因对博弈论作出奠基性贡献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纳什、哈萨尼、泽尔滕三位教授，除前者是数学家外，后两位都是经济学家。博弈论运用于经济领域，对于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了解博弈论，莫过于从“囚徒困境”这样一个经典例子入手。

“囚徒困境”的博弈矩阵是普林斯顿大学塔克教授首先提出来的。这个矩阵不但揭示了博弈问题的根本特征和性质，而且也是解释许多经济现象、研究经济效率问题的基本理论模型。矩阵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警察抓获了两名放火犯罪嫌疑人，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放火就是他们两人所为。于是警察将他们隔离囚禁后，要求两人坦白交待。如果两人都承认放火，每人各判刑三年；如果两人都认罪，每人会因证据不足而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中只有一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4页。

坦白认罪，那么坦白认罪者将被立即释放，而抵赖者则被重判五年。判刑无论多少年，总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举例人用 -1 、 -3 、 -5 分别表示囚徒被判刑 1 年、3 年、5 年的“得益”（即在博弈中所获得的利益）。“得益”矩阵图如图 9.1

		乙	
		坦白	抵赖
甲	坦白	<div>-3 3</div>	<div>5 0</div>
	抵赖	<div>0 5</div>	<div>-1 1</div>

图 9.1 囚徒困境

矩阵图中有四个方格，每个方格中左下角的数字是囚徒甲的“得益”，右上角的数字是囚徒乙的“得益”。如果两个囚徒都是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所谓“理性主体人”，对策可能的结果会怎样呢？如果乙抵赖，甲坦白，则甲“得益”为 0，即可得到宽大释放；但是甲若抵赖，“得益”为 -1 ，即判刑 1 年。如果乙坦白，甲也坦白，甲的“得益”是 -3 ，即判刑 3 年；但是甲若抵赖，则“得益”为 -5 ，即判刑 5 年。由此看来，不管乙采取什么策略，坦白也好，抵赖也好，甲的最佳选择是坦白，坦白对他最为有利。

囚徒乙的情况与囚徒甲的情况完全相同，坦白也是他的最佳选择。两个囚徒都选择坦白，各人的“得益”都是 -3 ，即都被判刑 3 年。这是他们博弈的必然结果。

这样的结果对社会来讲是有利的，但对囚徒来讲并非是最好的结果，他们最好的结果同时是 -1 ，即各判刑 1 年。同时各判刑 1 年绝对要比同时各判刑 3 年要好得多。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两人不

谋 论

能互相串通，并且各人只从各自的最大“得益”出发丝毫不考虑同伙的利益，因而出现并不是最好的结果是必然的。这样的“必然”对于囚徒来讲，是无法摆脱的，所以此等状况被称为“囚徒的困境”。

222

“囚徒困境”博弈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不管他人利益情况下为己谋求最大“得益”。商品经济是一心为己争利的经济，与“囚徒困境”博弈理论特点类似，所以我们试用博弈理论来探讨奸计之根源。

在商品生产经营中，竞争的必然性使一个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竞争对手，要么是确定的、具体的，比如自己经营电子产品，另一家也经营同样的电子产品，这个“另一家”就是确定的、显形的竞争对手；要么是不确定的、不具体的竞争对手，比如经营电子产品的商家很多，自己只是备感竞争的压力，但究竟谁是竞争对手，却又说不上来，也许是全部商家，也许是某几家或某一家。

在双方竞争中，假设市场需求量是一个常数，生产经营商品的总利润是10，甲、乙两家共同生产经营赚取这10的利润。

首先设想甲、乙两家生产经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旗鼓相当，经过博弈所得利润便是：同时诚信生产经营，各得利润5；同时奸计生产经营，也是各得利润5；如果一方诚信、一方奸计，那么奸计方所得利润为6，诚信方所得利润为4。（见图9.2）所以，对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来讲，采取奸计是必然的，因为只要采取了奸计，要么对方坚持诚信而自己可以多得利，要么对方同样采取奸计而自己利益也丝毫无损。

其次设想甲、乙两家生产经营的能力、技术、规模等条件相当悬殊，经过博弈所得利益便是：同时诚信生产经营，甲得利润3，乙得利润7；同时奸计生产经营，也是甲得利润3，乙得利润7；如果甲方诚信、乙方奸计，那么甲得利润2，乙得利润8；如果甲方奸计、乙方诚信，那么甲得利润4，乙得利润6。（见图9.3）这种实力悬殊的生产经营，同样是奸计讨好吃亏。所以，奸计生产经营是生产经营者的必然选择。正如北京大学教授于鸿君先生所说，

		乙	
		诚信	奸计
甲	诚信	5	4
	奸计	6	5

图 9.2

在经济学视角下，生产经营者都陷入“囚徒困境”，其现实想法就是：“我若算计别人，别人不算计我，我就赚了；我若算计别人，别人也算计我，至少我没亏；我若不算计别人，而别人算计了我，我就亏大了。”^①

		乙	
		诚信	奸计
甲	诚信	3	2
	奸计	4	3

图 9.3

^① 于鸿君著：《经济学视角下的思维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7 页

谋 论 诡

224

如此看来，整个社会里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不是没有一个诚信生产经营的了？的确，若是在一个无序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会诚信生产经营。但是，无序的社会毕竟是个别的、短暂的，有序社会总是多数、长时的。在有序社会里，政府利用商品经济的规律，将法律、道德规范引入其间，不断加大管理的力度，打击和制约奸计，让商品生产经营在诚信的环境中进行，使诚信成为商品生产经营的主导。一个社会，法制越是健全，道德越是崇高，管理越是到位，诚信生产经营商品者越多；反之，奸计生产经营商品者越多。从图9.2和图9.3中可以看出，双方都诚信和双方都奸计，所得利润是完全相等的。当社会安定有序时，他们选择诚信；当社会动乱无序时，他们选择奸计；当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各种矛盾十分突出时，他们之中，有的选择诚信，有的选择奸计。这是就社会秩序与商品生产经营者关系而言的。若就商品生产经营者自身的道德品质而言，毫无疑问，道德品质高尚者，一般选择诚信；道德品质低下者，一般选择奸计。无商不奸，这话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就整体来讲、从某个角度来看，商人的道德品质特别是诚信度似乎要比士、农、工等阶层差。这与他们长期处于为己争利、整日思虑博弈的心理状态相关。所以，谁要是寄希望商品经济里没有奸计，就等于寄希望人吃五谷不生病一样。

第十章 诡谋的生活化—— 鬼点子

225

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各种必要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就是生活。生活有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类型，本章所说的生活，指的是以与衣食住行、人情世故相关的日常生活，反映的是恋爱、婚姻、家庭和邻里、朋友、亲戚、老乡、同学、熟人等方面的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生发出的家长里短、爱恨情仇。一个人一生可能没有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或文化生活，但他必然有日常生活，只要过人的日子，哪怕这种日子过得再简单、再无趣、再痛苦，也是日常生活的全部。世上没有人没有日常生活，哪怕他贵为天子——吃、喝、拉、撒、睡这些日常生活的必然内容，一样也少不了，只不过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多了许多平常人所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我们谈诡谋的生活化，是以平常人（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基础，论述诡谋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鬼点子。之所以定位于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是因为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是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部，不以其作为基础，似乎有舍本求末之嫌，在此谈论诡谋的生活化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一、鬼点子释义

《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对鬼点子的解释完全一样：坏主意。但金城出版社出版的《老猎人鬼点子》一书则反其道而行

谋 诡 论

226

之，认为：“本册《老猎人鬼点子》告诉你的并非坏主意和阴谋诡计，更不是心狠手黑脸皮厚式的‘空手道’，而是一些为人处世的绝妙主意和机灵鬼点子。这些点子带点歪劲带点怪味，带着一种别人看不见的机敏和聪慧。之所以说它鬼，是因为想常人所不能想，悟常人所不能悟；有时出人意料，反其道而行之；有时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¹ 并肯切地告诉读者：“鬼点子不是阴谋诡计，而是一种无上的为人术、交际术、成功术。”² 这就是说，一个人做人处事的态度、与他人的往来接触、意欲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好的无可比拟的办法就是鬼点子。且不说无论怎样辩白，鬼点子的阴谋诡计实质无法改变，即使如其所说鬼点子是“带点歪劲带点怪味”的“绝妙主意”，也不能作为“无上的为人术、交际术、成功术”。何谓“无上”？最高、最好、没有超过者谓之“无上”。依此解释，难道为人、交际、成功的最高、最好、没有超过者的办法就是鬼点子？果真如此，这世界岂不是“带点歪劲带点怪味”的鬼点子的天下？！我们的社会是如此吗？显然不是；我们的社会能够如此吗？显然不能！鬼点子绝不是为人、交际、成功的最高、最好、没有超过者的办法，只能是其中的办法之一，而且为正直人士所不屑、不齿。

对于鬼点子的理解，我们的立场是坚持词典的立场：鬼点子就是坏主意。主意之意是办法，点子之意也是办法，坏主意就是坏办法，鬼点子也就是鬼办法。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坏办法、鬼办法、坏主意、鬼点子，四者的意思一样，无区别。作此理解不会错，但不能把握鬼点子的本质。鬼点子的关键在于鬼。鬼除了恶劣、糟糕即坏的意思之外，还有不光明、狡黠、不可告人的打算和计谋等意。如果将鬼只作坏讲，那么鬼点子之意便是从道德善恶上对办法作出的否定性评价，即鬼点子是坏的办法。这样的解释只是揭示了鬼点子的社会本质，而对鬼点子的技术本质未作揭示。我们在本章

1 赵修琴著：《老猎人鬼点子》，金城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页。

2 赵修琴著：《老猎人鬼点子》，金城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

中所要论述的鬼点子恰恰是从技术层面上着手的。这就要求我们解释鬼点子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其社会性，更重要的是考虑其技术性。

由此，我们对鬼点子作出这样的解释：鬼点子指的是暗算之法。所谓暗算之法就是暗算的办法。暗算即暗中图谋伤害或陷害。暗中图谋伤害或陷害，既有社会意义，又有技术含量。从社会意义上讲，暗中图谋伤害或陷害是不道德的、坏的；从技术含量上讲，暗中图谋伤害或陷害中的图谋在于谋划、算计。所谓技术含量，是指一种手段或者一个行为中所包含的智谋因素，“图谋”用的是智谋而不是武力，因而图谋具有技术含量。比如，邻里因口角纠纷而采取报复行为，既可以用智谋达到目的——以对方的小名、昵称为自家宠物的名字并当众招呼呵斥借以羞辱对方；又可以用武力达到目的——直接用污言秽语辱骂对方甚或拳脚相加。前者的伤害有技术含量，后者的伤害就没有技术含量。所以，用暗算之法定义鬼点子也完全符合本书主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伤害或陷害”在程度与后果上是有轻重之别的，比如，有的诡谋给人的伤害较轻，有的甚至说起来无伤大雅，有些则伤天害理夺人性命，即有“皮毛伤”、“轻伤”、“重伤害”、“严重伤害”等不同层次。也因此，有观点认为，照通常的理解，应把生活诡谋——鬼点子对人的伤害划定在“皮毛伤”与“轻伤”的程度之内，并以此来例举、论述鬼点子。但笔者对此不以为然。首先，标准难以确定。是按精神伤害、物质伤害抑或是身体伤害划分？实难确定。其次，具体程度难以测定，因为现实中人们对伤害程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或身体上的伤害。尤需强调的是，本章所说的“鬼点子”，只是生活诡谋的代名词而已，即生活诡谋不完全等同于“鬼点子”一词的语词内容。因此，笔者坚持对生活诡谋——鬼点子作粗放和开放的界定，凡在日常生活中用邪智暗中图谋并伤害或陷害他人，借以达到一己目的的做法（行为），我们把它统称为生活诡谋——鬼点子，并以此进行论述。

诡 谋 论

228

民间对鬼点子的理解，往往也是不分好坏的，只要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够体现出机敏和智慧，无论其主体的动机是善是恶，特别是在主体是弱者而暗算对象是强者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认可甚至赞扬，结果鬼点在人们的模糊认识中，携带着恶的病毒，四处传播。究其原因，是人们崇尚智谋的结果：一个办法或一个点子里所含智谋成分越多，这个办法或点子越是被认可，至于其中所蕴含的邪恶往往不再被关注。而本书研究的是诡谋是不道德的计谋，如果对一个办法或一个点子里所蕴含的邪恶不予关注，那就不是在研究诡谋而是从纯技术上研究谋了。所以，凡是没有邪恶贯穿其中的点子，哪怕它再“鬼”，再怎么“想常人所不能想，悟常人所不能悟；有时出人意料，反其道而行之；有时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也不是本书研究的对象。比如下举的一例，虽然按《老猎人鬼点子》作者的说法是个“带点歪劲带点怪味”的“绝妙主意”，有让人意想不到的“鬼”，但因其中没有贯穿邪恶，故不能成为本书所要探讨的鬼点子。

该例出自美国《笑料百科》一书，书中讲，有一位陆军下士到新团部报到，呈上一张由原连队上尉写的便条：“如果你能令他戒赌，此人倒可以造就。”

团部长官盯着下士喝道：“你平时赌些什么？”

“我无所不赌。”下士回答道，“我愿以 500 元作赌注，赌你右腋下有一颗黑痣。”

“把钱放下！”长官边说边脱衣服，证明他腋下没有黑痣。

收起钱后，长官打电话给下士原连队的上尉，兴高采烈地说：“你那位下士受了我刚才的教训后，再也不会轻易打赌了。”

“别那么肯定！”上尉说，“他刚才还跟我赌 2000 元，赌你在他报到五分钟后你自愿地脱下自己的衬衣。”

“！？”

多么好的一个笑料！笑人的本性难移。下士的本性是赌，他的赌性也的确厉害：无时不赌，无处不赌，无什么不赌。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计谋，下士只动了一下小小的脑筋，就让团部长官

脱下了自己的衬衣，其目的轻而易举地达到。但是，他的谋赌中却没有邪恶（请不要把这里的赌看成我国法律意义上的赌）——目的不恶，手段也不恶。因而它不是诡谋性的鬼点子。现实中这样的智谋性笑料很多，但都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本书要研究的鬼点子，一定是邪恶之身——即使不是一个江洋大盗也应是一个偷鸡摸狗的小盗贼。

229

二、鬼点子发生的原因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自己的原因，鬼点子也不例外，并且原因很多，概括地说，大致有这么三个方面：玩笑的原因、恨人的原因、好处的原因。玩笑的原因是鬼点子发生的特殊原因，这一原因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是很难想象的，但在生活领域却比较常见。恨人的原因和好处的原因是鬼点子发生的一般原因，由于是“一般”，两者也会成为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诡谋发生的原因。当然，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恨人和好处的内容不同，生活诡谋中的恨人和好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特点。

（一）因玩笑而发生

以开玩笑的名义而暗中损人才是鬼点子，只开玩笑而不暗中损人则不成其为鬼点子。对于鬼点子来讲，玩笑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损人也同样，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有些时候，是以玩笑之手段达到损人之目的；有些时候，是以损人之手段达到玩笑之目的。

我们先说个郎中哄骗守财奴喝“黄龙汤”的笑话，看看鬼点子主体是怎样以玩笑之手段达到损人之目的的。

很早以前，有个守财奴得了温病找郎中医治，但又舍不得花钱，于是心生一计，对郎中说：“别人都说你医术高明，我跟你订个口头协议，你治好了我的病我给你钱，你治不好我的病我不给你钱，怎么样？”郎中知道守财奴是个把钱看得比命还重的人，于是

谋 论 诡

230

同意了他的意见。守财奴马上接口道：“但有一条，我的病治没治好，由我说了算，我说治好了就治好了，我说没有治好就没有治好。因为病是我自己的，治没治好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样行吗？”郎中从其话中听出来，守财奴是既想治好病又不愿给钱，病治没治好由他说了算，即使你百分之百地治好了他的病，他也说没有治好，这样就可以以病没治好为由不给钱。郎中不由得暗骂了一句：“像你这样的人不配吃饭，只配吃屎。”暗骂完之后，郎中突然有了捉弄守财奴、让其长点记性的冲动。他略加思考后，回答守财奴：“你说的行，并且我会让你更满意。即使你说你的病是我治好的，我也不收你的钱。但有一条，你必须按我的要求吃药。我最近发明了一种新药，只要你当众服下，绝对有效果。”守财奴一听，马上同意，因为他脑海里只记住了这样一句话：治好了病也不收钱。

第二天上午，郎中招来乡亲，守财奴拜天、拜地、拜乡亲之后，捧起陶钵，咕噜咕噜地连喝三钵，尽管他觉得钵中的液体极其难闻、极难下咽。就在他一钵一钵地喝“药”的时候，围观的乡亲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笑岔了气地坐在了地上。原来，守财奴所喝的“药”是乡亲们根据郎中的意识，从茅坑里舀来的粪汁。

等守财奴喝完“药”之后，一乡亲问他：“知道刚才喝的什么‘药’吗？这可是大家给你特制的‘黄龙汤’。”守财奴一听，马上恶吐起来。

奇怪的是，守财奴自从喝了“黄龙汤”之后，温病居然好了。郎中本来是为了损一损守财奴而跟他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谁知歪打正着治好了守财奴的病。郎中自然没有要守财奴的钱，但“黄龙汤”却成了郎中给人治病的一门“新药”。

此故事只是传说，但医学家陶弘景将“黄龙汤”治病记于自己的药书却是事实。历史上有人谄媚，为大奸臣和土开代尝“黄龙汤”，已成为千百年来经典笑谈。

再说以损人之手段达到玩笑之目的的问题。《红楼梦》里的凤姐与鸳鸯合谋捉弄刘姥姥而让贾母等太太、小姐、公子们快乐之例，是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如果说该例的损人还带有几分文气，那

么下举一例就显得十分粗野。此故事说的是，有一辈分很低的瞎子在村里经常被人捉弄，这一天，瞎子遇到一小孩，小孩机灵狡黠，马上想到用鬼点子戏谑瞎子。瞎子问他姓名，他自称叫“都来看”。“都来看”对瞎子表示友好，邀请瞎子一起到小河里游泳。待瞎子脱光衣服进入水中后，“都来看”抱着瞎子的衣服躲了起来。瞎子半天不见“都来看”的动静，叫喊起来，仍不见动静，上岸摸索自己的衣服，衣服也不见了。无奈之下，只好大声呼喊“都来看”。这一喊不得了，田里劳作的男女老少都围了过来，一看赤身裸体的瞎子猴急得不停地叫喊，知道他被人捉弄，于是一个个笑翻了天。显然，该鬼点子的手段是阴损瞎子，目的是快乐捉弄者。

损人，无论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都是对鬼点子对象的一种轻微伤害。之所以说是轻微伤害，是因为基于这两点：一是相对于后面要讲到的“因恨人而发生”中的伤害和“因好处而发生”中的伤害而言，“借玩笑而损人”的伤害是轻微的，而后面的两种伤害要比此种伤害严重；二是此处损人仅仅与玩笑相关，而玩笑只是一种快乐有趣、使人愉悦的饱含娱乐性的活动或行为，这种活动或行为不涉及人的根本利益问题，其冲突不至于引起鬼点子双方的深仇大恨，因而鬼点子主体在选用伤害手段时，总是把伤害的程度控制在对对象人格的轻微贬损上、对对象利益的轻微侵害上。损人超过轻微程度，引起对象恼怒或仇恨，就背离了玩笑的性质，是玩笑之大忌。生活中，这种犯忌的玩笑时有发生，甚者有的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客观地讲，这并非是鬼点子所希望的，因为鬼点子虽然是暗算之法，但它既然与玩笑联姻，就只能依玩笑规则而行动。否则，就是另外的鬼点子了。

日常生活里的玩笑很多，但并非所有的玩笑都是鬼点子造就，很多玩笑并不需要暗算之法，或者并不需要损人，不需要损人、不需要暗算之法的玩笑与鬼点子无关，凡是鬼点子造就的玩笑，必定有暗算、必定损人，二者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不是鬼点子型的玩笑。所以，凡鬼点子型的玩笑往往是恶作剧，恶作剧体现鬼点子型玩笑的特点。

（二）因恨人而发生

“每个人，不管多么善良，都或多或少会从他人那里受到痛苦和伤害，从而必然或多或少有恨人之心；而恨人之心这种对于成为自己痛苦之因的他人之心理反应，显然便会驱使自己相应地为了使他人痛苦而活动：恨人之心会导致目的害人的行为。”^①

恨人之心表现在两个方面：嫉妒心和复仇心。

嫉妒或嫉妒心“是一种卑劣下贱的情欲，是一种属于恶魔的素质”^②，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是一种恨”^③。嫉妒现象比较普遍地存在，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人之所以产生嫉妒之心，在于他有恨。恨谁？恨他人。为什么恨他人？王海明先生认为：“源于他人对自己的伤害和给自己造成的痛苦，不过，这种伤害和痛苦却不是他人有意造成的，而是自己与他人相比较的结果：一方面是与他人的优势相比而使自己居于劣势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与他人的劣势的改善相比而使自己优势减弱的结果。他人无意伤害我，但是，他人的优势却不能不使我居于劣势；他人的劣势的改善也不能不威胁我的优势。他人的优势使我居于劣势和他人劣势的改善而威胁我的优势，不能不使我对他人产生怨恨之心，不能不使我与他人发生相反感受：这就是所谓的嫉妒心。”^④日本心理学家陀摩武俊对嫉妒的理解有所不同，他说：“所谓嫉妒，就是自己以外的人，占了比自己优越的地位，或者是自己所宝贵的东西被别人夺取或被夺取的时候所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极欲排除别人优越的地位，或想破坏别人优越的状态，含有憎恨的一种激烈的感情。”^⑤《现代汉语词典》对嫉妒的定义简洁、明了、具体：“对才能、名誉、地

① 王海明著：《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页。

② [英] 弗兰西斯·培根著：《人生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③ [荷兰] 斯宾诺莎著：《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9页。

④ 王海明著：《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72页。

⑤ [日] 陀摩武俊著：《嫉妒心理学——人际关系的隐秘因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位或境遇等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

归纳上述观点，我们可以从中明白嫉妒或者说是嫉妒心至少包含这么几层含义：其一，嫉妒是一种怨恨他人的心理现象，这种心理现象是“卑劣下贱”的；其二，怨恨产生的原因是受到他人的伤害而使自己痛苦不堪，若是受到他人的伤害而不痛苦，则不会产生嫉妒之心；其三，他人的伤害既不是他人故意造成的，也不是他人过失造成的，完全是自己的“情欲”、“素质”、“心理”所导致，说得理性一点，是自己精神上自残的结果，说得难听一点，是自己吃饱了撑出来的毛病；其四，精神上自残是在相互比较中产生的，没有自己与他人的比较，不可能自我感觉受到了他人的伤害；其五，相互比较的结果是他人比自己优、比自己强、比自己顺，假如刚好相反，何来嫉妒之心？嫉妒之心是以自己比别人劣、比别人弱、比别人逆为温床的。

理解了嫉妒的含义，再来看陀摩武俊给嫉妒所下的定义，其中把嫉妒说成是“自己所宝贵的东西被别人夺取或被夺取的时候所产生的感情”就不太准确。因为“自己所宝贵的东西被别人夺取”是别人故意的行为，假如不是故意，“自己所宝贵的东西”怎么会被“夺取”？“夺取”只能是故意的行为，过失不会产生。既然“夺取”是故意所为，那么被“夺取”者的心理反应不是嫉妒之恨而是复仇之恨，即采取报复行动把被“夺取”的“宝贵的东西”夺回来。所以，陀摩武俊的嫉妒定义是一个不准确、只对了一半的定义，本书不予采纳。

复仇或复仇心“是对有意伤害自己的人所产生的也有意给他以伤害的心理”^①，“是我们被相互的恨所激动而欲伤害那基于同样的情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的欲望”^②。复仇是一种古老而又常见的现象，只要他人有意地给予自己以痛苦和损害，如暴力打击、诬陷迫害，复仇之心便会产生。复仇有同态复仇和非同态复仇两种类

① 王海明著：《人性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3页。

② [荷]斯宾诺莎著：《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9页。

谋 诡

论

234

型 非同态复仇是现今社会一种常见现象，给予对方的痛苦和损害，要么重于对方给予自己的痛苦和损害，要么轻于对方给予自己的痛苦和损害，只要能使自己得到心理平衡就行。同态复仇被认为是最公正的复仇，社会越古老越主张如此。《圣经》对同态复仇推崇备至，它说：“若有伤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①

在剥削阶级社会，复仇是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通过法律，有效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公正地保护每个人的权益，反对任何复仇行为。即使对于罪犯，也不允许使用复仇手段。个人复仇实质上是对法律和道德职能的侵犯。”^②反对、禁止是一回事，人的心理偏要产生复仇之心是另外一回事，就像法律规定不能杀人放火，但杀人放火的事却总有发生，并且不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一样。我们今日所生活的社会，复仇仍然是一种常见现象，发生频繁并且当即兑现的地方莫过于公共场合。甲一句话得罪乙，乙立马恶骂过来；丙不小心踩了丁的脚，丁不管三七二十一抬腿踢向丁。乙和丁的想法就是：你只要惹我亦即给我以伤害，且不管伤害之轻重大小，我都要报复，至于法律的约束、道德的警醒，那是君子的事，我不是君子，受到伤害立马报复有什么值得说三道四的？君子复仇不同，表现得斯文含蓄，常常以暗算的方式呈现，有的忍耐性极强，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说法就是明证。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旧社会”“曲线复仇”的故事^③：

有个年轻姑娘，父母给恶霸做仆人，后被恶霸百般折磨而死。恶霸见姑娘貌美，便纳为妾。

这姑娘十分聪慧，心灵手巧，她负责掌管的诸类家务，均井井有条，凡是能使恶霸高兴的事，她都尽力去做，极受恶霸宠爱。人们背地里议论说，这个女子恬不知耻，竟然给仇人赔笑卖身，忘了

① 《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0页。

② 《伦理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③ 见陈慧娟编选：《宋代世相》，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自己的爹妈是怎么死的了。恶霸也将这姑娘视为贴心人，在这姑娘的倡导下，恶霸一家开始花钱如流水，生活极其铺张奢华，很快就入不敷出，终于破产了。接着，姑娘又在恶霸的父子亲眷之间播弄是非，使恶霸家窝里斗，骨肉相残，分崩离析。她还不失时机地对恶霸的家人讲述《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故事，诱导他们跟强盗联络交往。恶霸真就这么干了，后触犯了刑法，以杀人罪被判死刑。

恶霸处斩之日，姑娘并没有哭送，而是暗地里独自一人携带酒食来到父母的坟前祭典说：“爹娘常托梦于女儿，骂女儿不能为爹娘复仇，反而侍奉仇人。女儿终于盼来了今天，女儿的一番苦心爹娘知道了吧！”

原来，这姑娘从一开始便立志复仇，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终于“断送”了仇人的一家，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复仇的使命。

让我们再来看看被称为大明奇才、主诗纂修《永乐大典》的解缙年少时捣鬼报复戏财主的故事¹：

一年春天，解缙为了早点赶到先生家上课，就穿小路从一个财主家的油菜田埂上走去。财主看见后当即叫家丁把解缙拉住，质问道：“你为什么要从我的油菜田埂上过？”解缙说：“这里不是有路吗？”“有路也不准你走，那是我家的！”“你又没写牌子，我怎么知道呢？”财主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抬手打了解缙一巴掌。打得解缙脸火辣辣地疼，但他没哭，咬咬牙走了。

一个雷雨天，解缙用锅底灰把脸糊得黑黑的，活像个黑夜叉，然后偷偷走进财主的油菜田中，跪在那里。

不一会儿，一个过路人看见了，好奇地问：“你这小孩，怎么跪在油菜田里？”解缙摇摇头，没有回答。那人走近一看，见解缙满脸漆黑，双眼发直，吃惊地问：“你这孩子怎么了？”解缙抬眼望了望过路人，好半天才慢吞吞地说：“我……我被……雷……雷打了，起……起不……来。”

1 见田耕编著：《斗智大观》（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7页。

诡谋论

过路人见这孩子呆头呆脑的，就把消息传开了，人们听说有个孩子被雷打了，跪在田里起不来，纷纷跑到油菜田里看稀奇。不一会儿，就来了百八十人，他们在财主的油菜田里挤进拥出，把三亩田的油菜踩成了泥浆。

财主见了心疼得要死，气得捶胸顿足，明知是解缙有意捣鬼报复，可又不好开口，真是哑子慢尝黄连味，难将苦口对人言。

因复仇心而生的诡谋实例古今中外都有，神话传说等文学作品当中更是不乏这样的故事。比如《圣经》中“割礼巧计”的故事就可称之为经典的复仇诡谋。

割礼，指割去男子阴茎上的包皮的做法（活动），是犹太教对初生男婴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伊斯兰教、基督教少数派别也有类似活动）。作为神和人类缔约的象征，也是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一种习俗。

《圣经》记载：当年，犹太人的祖先雅各（以色列）在迦南（巴勒斯坦及其毗邻腓尼基一带地区的古称）居住时，其美丽动人的女儿底拿被示剑城主哈抹的儿子示剑看上了，并劫回家强奸了，还死乞白赖地要娶她为妻。底拿的两个哥哥表示：“我们的妹妹不能嫁给未受割礼的人，除非你们接受割礼，而且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接受割礼，否则免谈通婚之事！”示剑大概真心喜欢底拿，迫不及待地答应了。示剑城的人们一向尊重哈抹父子，全都盲目听从了，全都受了割礼。在他们接受割礼后的第三天，忍着疼痛准备愈后前往雅各家说亲时，底拿的两个哥哥手持利剑，带人闯入城中，将哈抹父子及全城男丁统统杀掉，救出底拿，并将示剑城洗劫一空。众男丁因刚刚受了割礼，刀口疼痛难忍，根本无法抵抗，只能坐以待毙。

犹太人通过“割礼巧计”不仅救出了底拿，重重地报复了哈抹父子，但也给无辜的示剑城造成了灭顶之灾，也因此埋下了深仇大恨的种子。如果从后果看，仅从后果看，“割礼巧计”显然已属“重伤害”，按前述一些人的观点，或许不宜作为生活诡谋——鬼点子来看待，但此计本身尤其是过程本身无疑符合鬼点子的本质、特

点，应该说是非常典型的因复仇心而生的生活诡谋——鬼点子。

复仇心和嫉妒心都是因恨而产生，恨来自于他人的伤害而使自己痛苦。但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最大的区别是导致复仇心的伤害是对方有意给予的，导致嫉妒心的伤害是对方无意给予的。

因嫉妒而害人、因复仇而害人，嫉妒和复仇都是一种心理现象，害人则是攻击行为。假如前者不转化成后者，伤害和痛苦的是恨者本人——自我心理折磨所导致的伤害和痛苦；若前者转化成后者，伤害的是所恨对象——给予对方精神上或物质上的损害使其痛苦。

在现实生活中，因嫉妒害人并生发诡谋的例子几乎比比皆是，有因嫉才而施诡谋害人的，有因妒貌而出鬼点子伤人的，也有因为他人的幸福生活而妒火中烧做出伤天害理事情的。

欧洲旧时曾流行决斗的风俗，贵族、绅士在处理男女之情的矛盾时尤其喜欢选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决斗本身是斗力量斗技术而非斗智慧，但它也会被诡谋者利用，作为诡谋的手段。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普希金就是为此遭暗算走上决斗之路而丢掉性命的。有研究者指出，普希金与法国男爵丹特斯的决斗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及其党羽精心策划的诡谋，因为尼古拉一世一直对普希金美艳的妻子垂涎三尺，对普希金恨（嫉恨）之入骨，因而导演了一出诡谋话剧，让丹特斯在公开场合公开勾引普希金的妻子，借以点燃普希金的妒火，进而使普希金掉入预设的陷阱，与丹特斯进行决斗。结果，普希金中弹不治身亡，38岁的“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就这样殒落了！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也应该肯定地说，普希金是因嫉妒而生的生活诡谋的牺牲者。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普希金之死还有更深的政治隐情，普希金实际上是被政治诡谋杀死的。

给予所恨对象精神上或物质上的损害使其痛苦，是恨者嫉妒、复仇的目的所在。为实现这一目的，恨者所采取的手段既可以是智谋型的，也可以是力量型的。巧的是，作者正在写本部分内容时，看到2006年第11期《人民公安》上面的两篇文章，写的都是因为嫉妒而害人的事情，不同的是，一个是智谋型的，一个是力量型的。

前者的标题是《大四女生之母雇凶伤害女儿同学》。此文说的

谋诡论

238

是安徽阜阳市某高校体育系四年级女大学生刘萍与同班女生章娟本是一对好友，但随着刘萍的各方面优秀而使章娟油然而生嫉妒之心，两人感情逐渐有了裂痕。毕业前夕，阜阳市某学校举行一场公开招聘一名体育教师的考试，刘萍、章娟等同学参加了应聘，结果刘萍的笔试、面试成绩均第一。此时的章娟嫉妒得更为厉害。眼看唯一的一个名额归刘萍所有，章娟之母任霞极不服气，便与女儿商量，设法让刘萍当不了教师，而让成绩位居其次的章娟“取而代之”。经过一番密谋，任霞决定雇凶手砍断刘萍双腿。她们雇了三名凶手，于2006年4月25日晚实施计划，刘萍的双腿被砍断。只是因为警方的介入，她们的诡计没有得逞——章娟不但不能“取而代之”，相反，同母亲和其他三名凶手一起被关进了班房。

后者的标题是《北大学子缘何横刀相向》。此文讲的是发生在北京大学的一起血案，北大医学部预防医学2002级学生安然向同班同学崔一平砍下八十余刀，杀死了崔一平。安然为什么对崔一平如此仇恨，要砍崔一平八十余刀？原因就是嫉妒。学习成绩，安然不如崔一平；人缘关系，崔一平特棒，安然无人理睬；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接触一段时间，女朋友离他而去，与崔一平如漆似胶……“我怎么样样不如他，老天爷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平？”感叹之下的安然把全部的仇恨聚集到了崔一平的身上。2005年6月25日，被妒火烧得无法自控的安然拿起尖刀和菜刀扑向崔一平，血案随之发生。

从以上两例不难看出，虽然都是因嫉妒害人，但前者之例有暗算的技术含量，后者之例没有。

因嫉妒而害人如此，同样，因复仇而害人也有智谋型和力量型之分。前面提到的乙和丁的行为就是力量型的复仇行为。力量型的复仇行为是比较常见的复仇行为，智谋型的复仇行为从数量上讲虽然没有力量型的复仇行为多（这是因为力量型的复仇行为来得简单、干脆，力者可为，智者也可；智谋型的复仇行为则只能智者为之，力者即使想为也因乏智而不能为），但它是弱者对付强者、智者对付力者的常用手段。比如丙不小心踩了丁的脚，丁一看丙的

块头，自知斗力不是其对手，立马采取智斗。刚好身边的一少女接完电话后，随意地把手机放在了没有拉链的坤包里。丁迅疾地将手机拿出来，悄悄地放进丙的衣兜里，然后装着不经意的样子碰撞少女的坤包。少女感觉坤包在动，马上察看里面的手机，一看不在，喊了起来：“车上有贼，我的手机被偷了！”听她这么一喊，大家都警觉起来，立马察看自己的手机、钱包什么的。有人叫少女报自己的手机号，替她拨打，看其手机的声音从谁的身上发出。结果丙的衣兜里发出了手机的响声，丙虽即刻申辩自己不是贼，但他仍被送到了公安局。丁窃喜暗笑，庆贺自己暗算成功。

239

从上述的事例和分析中，我们足以知道，不管动因是嫉妒还是复仇，只要使用智谋型的手段，就是运用了鬼点子。也就是说，这里的智谋型手段就是鬼点子，鬼点子就是智谋型手段，二者内涵、外延完全相同。

（三）因好处而发生

如果说“因恨人而发生”中的害人是因为自己从他人那里遭受了痛苦和损害，从而采取鬼点子的形式给予对方以痛苦和损害，那么，“因好处而发生”中的害人则是因为自己要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从而采取鬼点子的形式给予对方以痛苦和损害。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前者的直接目的是害他，后者的直接目的是利己。

对人有利的因素、使人得而遂意的事物便是好处。受求乐避苦、求利避害的心理驱使，每个人都愿意得到好处而避免坏处。得到好处是积极的利己，避免坏处是消极的利己。无论是积极的利己还是消极的利己，只要采取的手段不违背道德、法律，任何人无可厚非。但是，让人谴责的置道德与法律于不顾的损人利己行为却大量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鬼点子就是这种损人利己行为的推波助澜者。

由于避免坏处的消极利己需要运用鬼点子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少见，因而我们不予讨论，我们要着重讨论的是鬼点在积极利己中的状态。积极利己是为了得到好处，得到好处若不损害他

诡 谋 论

人，则不是鬼点子的积极利己。那么，得到好处而损害了他人，就是鬼点子的积极利己吗？仍不是。鬼点子的积极利己除了“得到好处”和“损害他人”这两个必要条件之外，还必须加进一个必要条件：暗算手段。也就是说，使用暗算手段损害他人从而得到好处就是鬼点子的积极利己。试举一例进行说明：

240

宋代著名书画家米芾，字写得很好，画画得很好，但人品却不怎么样。人品不怎么样在于他常常使用积极利己的鬼点子。他喜欢收藏和临摹名人字画，只要听说谁有名人字画，必然千方百计地“借”来，说是欣赏，其实是临摹。临摹也罢，但他为了将真迹占为己有，则把自己的临摹品还给人家。由于他的临摹品可以乱真，借出者常常是辨别不了真伪而将临摹品当原件收回。后来，有人识破了他的伎俩，他再以借的方式行骗不灵验了，于是开始耍赖地“夺”。有次，他在船上遇到同样喜好字画的蔡攸，蔡攸拿出一幅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让他欣赏，他一看就想占有，提出用一幅画与之交换，蔡攸不同意。他便苦苦哀求，好话说了一大箩筐，蔡攸还是不同意。这时，米芾抹了把鼻涕眼泪，冲出船舱，对蔡攸说：“如果你再不同意，我就投水而死。”蔡攸无奈，只得同意交换。当时的人称米芾这种占有他人字画的伎俩叫做“巧取豪夺”。据说，巧取豪夺的成语由此而来。米芾的“巧取”与“豪夺”都是鬼点子吗？前者是，后者不是。理由很简单：“巧取”的目的是将他人的书画占为己有，具有积极利己的性质；其手段是以借的名义将原作弄到手后通过临摹还以赝品，具有暗害的性质。所以“巧取”是鬼点子。“豪夺”虽然目的与“巧取”的一样，但手段完全不同，没有暗害的性质。所以“豪夺”不是鬼点子。

年长一些的读者一定会记得当年进行“阶级教育”的典型教材——半夜鸡叫的故事：地主周扒皮为了剥削农民，让长工们起早贪黑地为他劳动，借以谋取更多的利益，竟然半夜里亲自溜到鸡窝前学公鸡打鸣，以引起公鸡打鸣，然后迫使长工们半夜起来下地为他干活。如果抛开其他问题不谈，仅从诡谋研究的立场、角度来分析，“半夜鸡叫”的故事正是一个典型的因好处而生发的生活诡谋。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称得上是一个经济诡谋)。

鬼点子的基本技法有四个:坑、蒙、拐、骗。

坑、蒙、拐、骗有着共同的本质:虚假。正是因为这一点,坑、蒙、拐、骗被某些人解释得意义相近。为了以示区别,我们根据题旨需要,对坑、蒙、拐、骗进行比较分析。

所谓坑,是指狡诈阴险地设计害人。《现代汉语词典》对“坑”的解释是坑害,坑害的意思就是用狡诈、狠毒的手段使人受到损害。《汉语大字典》对“坑”的解释是陷害,而陷害的意思是设计害人。我们给“坑”所下的定义是综合了两者对“坑”所作解释的结果。这样的定义是没有违背“坑”的原意的,因为《汉语大辞典》在解释“坑人”一词时就是如此,其意为“坑害人,陷害人”。

241

狡诈阴险地设计害人谓之坑,作为鬼点子的一种基本技法,似乎放在上述“因恨人而害人”部分更为恰当。我们之所以将其放在这里,是因为把坑作为手段时,目的是利己而不是害人,如果目的是害人,则可放在上述部分。

坑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为了继承父亲的全部遗产,伪造证据、买通证人证明其弟不是父亲的儿子;为了占有他人之妻,雇凶伪造车祸将他人撞死;为了摆脱服侍卧床不起的老母之苦,故意制造煤气泄漏事故让老母中毒而亡;为了成为“英雄”,放火于集体仓库,然后奋力救火;为了能够长期欣赏借来的名贵书画,重金买通医生给书画的主人服用丧失记忆的药;等等。选择什么方式坑人,取决于坑的内容。由于坑人者的自身条件不同、被坑者的情况不同、坑人时的周围环境不同,给坑的内容安排形式的时候必然各异。但无论怎样“异”,只要是为了获得好处而害人,在害人上进行谋划、算计,在谋划、算计上体现狡诈、阴险、狠毒,就是坑,不会是其他。

所谓蒙,是指隐瞒真相地欺骗。隐瞒真相不一定是为了鬼点子,但是鬼点子必须要隐瞒真相,世上还没有不隐瞒真相的鬼点子。隐瞒真相就是把影响鬼点子实施的真实情况掩盖起来,如真实的身份地位、真实的背景关系、真实的人格品质、真实的意志情

诡 谋 论

242

感、真实的动机目的等，该全部隐瞒的全部隐瞒，该部分隐瞒的部分隐瞒。但无论部分到什么程度，真实的动机目的是绝对要隐瞒的，如果这一点不隐瞒，蒙不谓之蒙；蒙不谓之蒙，鬼点子也就不成其为鬼点子。隐瞒的对立面是公开，鬼点子的主客体的互动过程是公开的，这种公开是以隐瞒为前提的公开。如果该隐瞒的公开了，鬼点子可能进行不下去；如果不该隐瞒的不公开，鬼点子也可能进行不下去。所以，什么东西隐瞒，什么东西不隐瞒，隐瞒的时间长短、程度深浅、范围大小，都是蒙的技巧问题，都直接关系到鬼点子的成功与否。前举守财奴被骗喝“黄龙汤”之例中，假如郎中不隐瞒守财奴所喝的“药”是粪汁，守财奴是断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喝的。守财奴不喝，郎中的鬼点子也就前功尽弃。这是该隐瞒的隐瞒了。此例中不该隐瞒的也没有隐瞒，如郎中把钵子里装的是粪汁而不是药的信息统统地告诉了乡亲。假如郎中不告诉，也将其隐瞒，就不会有众人嘲笑守财奴的效果。由此看来，蒙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门艺术。

所谓拐，是指将人骗走。辞典一般在解释拐的时候，除了将人骗走之意之外，还包括将财物骗走之意，我们这里只限于将人骗走，意在与坑、蒙、骗区别开来，人是拐的对象，拐的对象一般是妇女和儿童，当然也包括壮年男子在内的其他类别的人。将人骗走的目的是什么呢？总的说来是为了得到好处，若将好处具体化，就是：将妇女骗走卖给别人做老婆而获取金钱；将婴儿骗走抚养成人后以便养老送终；将少女骗走关押起来以供泄欲；将壮年男子骗走强迫其干特别繁重的挖煤、烧窑、开金矿等体力活；等等。将人骗走的方式很多，常见的有：以介绍工作为名骗走妇女或壮男；以帮忙看管或喜爱逗乐为名骗走婴儿；以做特别游戏或老师家访为名骗走儿童；以物色演员或试穿新衣为名骗走少女；等等。拐，总是跟骗联系在一起，所以拐骗一词常见。但拐中之“骗”与我们下面要讲的“骗”是不能等同的，尽管其本质一样。这里的骗，首先，其面要比下面要讲的骗面窄——仅仅用在设计将人弄走这一点上，而下面要讲的骗可用在鬼点子所涉及的所有对象上。其次，这里的骗

在进行之中、之后，往往伴有暴力，因为欺骗穿帮的时候，骗人者与被骗者常常仍然在一起，被骗者发觉受骗时则要离去或者揭发，骗人者自然不同意，对付的办法就是用暴力迫使被骗者就范；下面要讲的骗，往往不伴暴力，因为欺骗穿帮的时候，骗人者与被骗者常常不在一起，不在一起也就不需借助暴力。两者还有不同，待看完下面要讲的骗之后就会领悟。

所谓骗，是指虚构并不存在的事实诱惑对方上当。隐瞒真相、虚构事实是骗的实质内容的两个方面，为了区别于蒙，我们进行人为的分配，将隐瞒真相分配给蒙，将虚构事实分配给骗。也就是说，讲蒙时侧重讲隐瞒真相，讲骗时侧重讲虚构事实。事实并不存在，但为了诱惑对方上当，最简单、最容易、最快捷、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虚构。由于是虚构，所以让鬼点子所涉及的对象看到的“事实”，往往比想象的还要真实、生动、完美。这样的事实，形式上是真，内容上是假；现象上是真，本质上是假；在对象那里是真，在自己这里是假。虚构表现在人物上，不是军人警察冒充军人警察，不是达官贵人冒充达官贵人，不是学者教授冒充学者教授，不是郎中大夫冒充郎中大夫，不是老乡亲戚冒充老乡亲戚；表现在事物上，本是魔术技艺却被说成是特异功能，本是捕风捉影却被说成是证据确凿，本是孩子他妈却被说成是闺中待嫁，本是从未谋面却被说成是旧时相识，本是仇深似海却被说成是铁杆哥们。总之，鬼点子需要什么事实，就虚构什么事实，无论是大的小的、新的旧的、实的虚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司空见惯的天方夜谭的，统统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捏造出来，并且恰到好处地让对方接受。

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比较起来，如果说隐瞒真相是抑制，虚构事实则是张扬；隐瞒真相是防守，虚构事实则是进攻；隐瞒真相是对真的收藏，虚构事实则是对假的贩卖。所以，大凡诡谋者为实施鬼点子方便，常常是在隐瞒真相的同时虚构事实。往深处讲，虚构的本身就是隐瞒，隐瞒的便是虚构本身，因为诡谋者在实施鬼点子时，绝对不会把虚构的事实告诉给所涉对象，这种“不告诉”就是

谋 诡 论

隐瞒 正因如此，蒙与骗总是被连用，蒙骗二字成为固定的词语出现在辞典里。

2004年10月30日《人民公安报》刊载的一则消息，能够较好地诠释蒙与骗。

244

2004年10月21日晚11时，江西省靖安县的五名混混兽性大发，要找一女孩淫乐。名叫晏森的混混自告奋勇地把认识的某中学17岁的女生杨某，以到奉新县城玩的名义，骗上了晏维开的一辆白色面包车。途经香田路段，面包车拐进了一片茂密的柑橘林中。车停后，混混潜伟开门见山地要杨某陪他们“玩玩”（指发生性关系），其他三名混混陈龙、晏维、于瓜立即淫邪地起哄响应。杨某坚决不从。晏森虚情假意地护着杨某说：“别这样，她还是一名学生。”话音刚落，他就被陈龙等三人拉下车推进了柑橘林，随即传来晏森阵阵的惨叫声。杨某同情地高喊：“不要打了！”晏森被带到车前，显露出一副被打的可怜相。陈龙恶狠狠地对杨某说：“你害得朋友挨打，今晚你不答应我们就要他去死。”杨某未敢吭声。晏森又被拖到林中，发出的惨叫声比前次更大更惨。吓傻了的杨某再不愿听到这种惨叫声，只得点头同意。陈龙等四名混混饿狼般地扑向了她的，晏森也在最后被四个混混“逼”着将她糟蹋。至此，她还对晏森心存感激，可她哪里知道，这是五名混混早就预谋好的“苦肉戏”，晏森根本就没有被打。

本例中，五名混混所隐瞒的真相是要奸淫她，不是带她到奉新县城去玩；虚构的事实是晏森被打，从而利用她的同情心。蒙骗结合让混混们达到了淫乐的目的（后来混混们在法庭上辩解时认为自己的性行为不是强奸，原因是他们行淫得到了杨某的同意）。可见，蒙骗是一对朋比为奸的狼狈。

三、鬼点子的特点

鬼点子的特点是相对权术、奸计讲的，权术是诡谋的政治化，奸计是诡谋的经济化，鬼点子是诡谋的生活化，在不同的领域、社

会，诡谋表现出不同的“个性”，鬼点子是诡谋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个性”表现。

（一）主体上的不限性

相对权术、奸计的主体，鬼点子的主体是不受限制的，而权术、奸计的主体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来讲，权术的主体是政治中人，奸计的主体是经济中人，也就是说，不是政治中人一般不会成为权术的主体，不是经济中人一般不会成为奸计的主体。依此，鬼点子的主体是生活中人，不是生活中人不能成为鬼点子的主体。试想，谁不是生活中人呢？这就是说，世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鬼点子的主体，但不一定能够成为权术或奸计的主体，反过来，权术或奸计的主体随时都能够成为鬼点子的主体，

245

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鬼点子的主体，自然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地域、不分种族……只要想暗算人，成为鬼点子的主体自然而然。

有个叫励守谦的人，在朝中任太史公，由于清廉，常常手头拮据，虽好客却请不起朋友。无奈之下，他动起了歪脑筋。时届寒冬腊月，一天，他邀请朋友到家赴宴。一番推杯换盏、猜拳行令之后，个个醉眼朦胧地起身准备离去，待他们各自去取来时脱下的貂皮大衣时，仆人给他们每人的却是一件羔皮大衣。这是怎么回事？正当客人们大惑不解时，主人励守谦笑盈盈地道出了真相——原来他把来宾的貂皮大衣全部典押给了当铺，所得银两除了支付当天的酒宴费外，余钱便给每人买了一件羔皮大衣。客人们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打着哈哈地拿着各人的当票离去。作为朝中大臣，他完全可以成为权术的主体，但在这里，他却是鬼点子的主体。所以，鬼点子的主体谁都可当，没有限制。

（二）对象上的广泛性

生活中的人是众多的，生活中的事物是数不清的，众多的人、数不清的事物给鬼点子主体在选择对象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只要

谋 论 诡

246

需要，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鬼点子的对象，即使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一个不知自己是谁的傻子，一个乞丐用来要饭的破碗、一个盲人用来探路的竹竿都有可能成为鬼点子的对象。这种对象上的广泛性是权术、奸计所不具备的。权术总是围绕着政治及其权力展开，涉及的对象一定要与政治及其权力相关；奸计总是围绕着经济及其金钱展开，涉及的对象一定要与经济及其金钱相关。在日常生活中，与政治及其权力直接相关的人和事物总是少数，这就决定了权术的对象必定有限，必定不可能像鬼点子的对象这样普遍而广泛。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与经济及其金钱直接相关的人和事物要比政治及其权力直接相关的人和事物多得多，其奸计的对象也随之要比权术的对象多得多，但是无论怎样多，也多不过鬼点子的对象，因为为鬼点子提供对象的日常生活有取之不尽的对象资源——将世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聚集到了自己的旗下。

（三）目的上的多样性

我们从上述“鬼点子的表现形式”中看到，鬼点子的主要目的有三种，即以玩笑而损人中的玩笑、因恨人而害人中的恨人、为好处而伤人中的好处。第三种目的“好处”比较笼统，若将其具体化，具体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衣食住行就可以分别成为鬼点子的目的；若将衣食住行再具体化，鬼点子的目的会更多。种类繁多的鬼点子目的让权术、奸计相形见绌。权术、奸计的目的分别是政治、经济，尽管政治、经济可以具体化，但无论具体化到什么程度，其目的也是有限的，也不会像鬼点子的目的具有多样性。这是因为生活的内容要比政治、经济的内容要丰富多彩得多。特别是玩笑，这种以取乐为宗旨的目的，在权术、奸计中是绝对不会有的，因为围绕着权力斗争的你死我活，围绕着经济利益的你争我夺，最终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一个玩笑。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就不同了，玩笑能够使参与者或多或少地得到快乐，尽管鬼点子的玩笑对其中一方有轻微的损害，但遭受轻微损害的一方也会对这种轻微损害作出自我牺牲，一笑了之。从这个意义上讲，鬼点子的目的不仅有多

样性，而且还有多彩性。比如，刘姥姥被凤姐与鸳鸯合谋捉弄，刘姥姥人格上遭受了轻微损害，但在她看来，这种人格上的轻微损害不值得一提，于是，除了心甘情愿地接受外，还积极主动地配合凤姐与鸳鸯出色地完成她们的鬼点子。再比如，有人想得到一幅于右任老先生的字，便接二连三地在他门前撒尿，于先生实在忍不住了，遂写了一幅“不可随处小便”的字条贴在了门前，哪知贴出去第二天就不见了，从此也再没人在门前撒尿了。原来他的这幅字被故意撒尿者揭去做了家中的中堂：小处不可随便！对于这种别样的目的手段，于先生除了一笑了之还能说什么呢？为什么一些鬼点子有时还逗人喜爱，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247

（四）运用上的灵便性

鬼点子仿佛是日常生活中的指甲钳，轻巧美观，使用起来特别方便，有的人放在家里，供全家人使用；有的人放在办公室，一旦需要就用；有的人带在身上，随时随地使用。它不像权术、奸计那样，受时空的约束，只要必要，想在什么时间用就可以在什么时间用，想在什么空间用就可以在什么空间用，想对谁用就可以对谁用。原因在于，玩笑可以随时随地对任何人开，只要其中带点暗算就行。比如在纸上画一个“王八”或者写一句“我是贼”悄悄地贴在他人的背后，是随时随地对谁都可以做的，只要某个人愿做、敢做。此等玩笑符合鬼点子的要求，它既有暗算性质，又损害他人人格。还有不是玩笑的鬼点子也可以随时随地地对付任何人。比如造谣惑众一类的鬼点子可以做到这样。造谣惑众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针对谁可以自由选择，只要内容捏造得能够让人相信就行。权术一般要围绕权力展开，奸计一般要围绕金钱展开，由于权术不能随心所欲地用于政治领域，奸计不能随心所欲地用于经济领域，所以运用起来就没有鬼点子灵便。鬼点子可以随心所欲地用于日常生活，这是由生活丰富多彩的性质所决定的。

四、鬼点子与处世哲学

243

没有谁不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崇尚谋略而使谋文化相当发达的民族。表现在处世哲学上，则“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是在谋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普通老百姓日用智慧的集中体现”¹。倒过来说，普通老百姓将自己的智慧不断地、广泛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以对付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己的以谋智为核心的处世哲学。由于这种处世哲学是世代相传、且含有深厚的智谋，所以对其既可以称为传统处世哲学，又可以称为智谋处世哲学。

从词义上讲，处世哲学指的是“处世的态度、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生观”²。从“理论上说，处世哲学是这样一种智慧形态：一方面，它是一种能力，一种应世的机能和智能结构；另一方面，它是一种人生观，一种人处世应世的价值取舍和基本精神态度。进而言之，在外，它是普泛化、带恒久性特征的社会文化氛围，一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行为规则；对内，它又是一种容纳社会阅历、人生体验和生活哲理于一体的文化认同”³。概要地讲，这段话告诉我们：处世哲学是一种价值取舍，一种处世应世能力，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社会认同，一种行为规则，一种人生观。

作为一种价值取舍的处世哲学，其价值取舍就是在社会价值、人生价值中选择算计、自保、防范、心理面具。

算计。“算计是谋略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传统谋略文化中，彼此间的做作、虚伪、假真诚、假道德、假忠心、假慈悲，见风使

1.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 年版，第 349 页。

2.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 年版，第 354 页。

3.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 年版，第 350 页。

舵，圆滑狡诈，等等，骨子里都是以算计为出发点。算计是传统文化中道德、真诚、情感等被谋略化的心理根源。”^①这就是说，人们对于世情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首先想到的是算计，因而“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②。

自保。“面对他人的算计，被算计的痛楚与寒心逼使人们不得不以同样的自私之心算计他人。因此，出于同样的自私原则，在痛楚与寒心之后，在需要人挺身而出、勇于承担之际的基本选择就是舍公义而自救、舍他人而自保……‘活命哲学’、‘舍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为人且学乌龟法，当缩头来且缩头’等的另一面是毫无是非之心，无原则感和正义意识，摈绝任何承担的勇气。为全身保命或一己小利而牺牲责任、道义、公正、勇气以及做人的尊严，是自保心态的实质。”^③

249

防范。“防范出于算计中的自保。惯常以算计之心应世，所以防范成为自保的手段。‘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防范的目标在于防祸，因此有防口、防忽、防微、防得意、防坦诚、防听人秘密、防功高震主、防聪明外露、防与人交心、防结怨伤人等。”^④

心理面具。“防范的结果是将自己封闭起来，在种种与人打交道的场合不表态、不露心、不露情、不倾诉，决不以真心本心待人，用‘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方式处世应世。因此，在防范心态之下，吾人有极为厚重的心理面具。正常的人格面具是一种人际间理性化、间距化和规范化的调节机制，而谋略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面具则是一种趋利避祸的谋智心机。我们看到，在官场上、事务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362页。

② 吴稼祥著：《神奇的加与减》，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③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363页。

④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363页。

谋 诡 论

往来和日常生活中，含而不露、‘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一类的面具色彩都极为浓重。”^①

作为一种处世应世能力的处世哲学，其处世应世的能力就是在谋略文化背景下左右逢源、随机应变地对付他人和社会的本领。台湾学者曾仕强先生认为，中国人有一项最擅长处世应世的本领就是：“把二看成三，明明只有两种选择，却有办法凭空生出第三种来，比西方人硬是多一种选择，更富于弹性空间，增加权宜应变的机会。”^②

比如，“阴阳是二，中国人却有本事把二看成三，在阴和阳中间多看出阴阳相混的灰色地带，称为中性地带。”^③ 还有，“我们把互相矛盾的两句话，当做品管的上下限，譬如把‘事无不可对人言’看做上限，将‘逢人只说三分话’当成下限。在上下限之间，我们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表现出‘稍有保留’、‘说八分’、‘说七分’、‘说六分’、‘说五分’、‘避重就轻’、‘含含糊糊’等不一样的因应方式。同样一件事，对张三、李四、王五，分别说不相同的话，看起来真的十分凌乱，实际上却始终紧扣着‘逢人只说三分话，事无不可对人言’兼顾并重的不二原则。应用得宜，表现得合理，便是合乎秩序。”^④ 如此这般，处世应世的本领可以说是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作为一种文化氛围的处世哲学，其文化氛围就是在生活的空间里弥漫着谋略文化的因子。谋略文化一旦“化为老百姓一般的人生处世智慧，它同时就变成了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即使在并不谋划的状态中依然流荡的精神氛围。人们爱说在历史积淀中理性变成感性，谋略文化传统散播为普泛化的人生哲学才是真正的理性变成了感性，作为一种人生观，它是同吾人的基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363~364页。

② 曾仕强著：《中国智慧》，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③ 曾仕强著：《中国智慧》，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96~97页。

④ 曾仕强著：《中国智慧》，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本生存方式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生命形态。在这样的时候，谋文化的内存的谋算精神是可以以生命体的方式代代遗传的。即使把所有的谋略经典统统烧掉，谋文化的基本精神仍然活着。一个人即使不读任何谋略方面的书，在谋略文化的氛围熏染中仍可以本能似的学会若干‘谋略’”^①。可见，谋略文化氛围对人们处世应世的影响是多么的重大和深远！

作为一种社会认同的处世哲学，其社会认同就是人人认可和主张处世应世就应该智慧和计谋。“一种主张、一种智慧一旦上升为普遍的处世哲学，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并不是因为它原本就是哲理，而是因为它在普遍的认同、对付中具有处世交接的绝对有效性才成其为哲理。因此，……社会认同始终是传统谋智对付方式获得普遍性的依据，而这种认同的基本前提又在于它最合于‘人情’。”^② 社会认同的东西要么合乎人情，要么合乎道理，智谋处世哲学既合乎人情又合乎道理，所以它非常容易被社会认同。著名作家贾平凹少年时的一个鬼点子，能够被他少时朋友刘高兴带着欣赏的情调写出来，并刊发在2007年第43期的《文化周刊》上，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南沟有一人名字叫虎，我叫大大（叔叔），虽说是自家人，但因相距较远，平日里很少来往，我长得啥模样他不知道。有一次，平凹去偷着砍我虎大大的树，结果正好被虎大大发现：‘谁砍树！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笼镰刀留下！’跑已经来不及了，平凹脑子一转，对我虎大大说：‘大大，我是书征。’书征是我原来的名字，我是40岁后才改名叫刘高兴的。虎大大愣了一下：‘噢，原来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饭再回去。’平凹赶快说：‘不吃了，我妈等着我砍的柴烧火做饭呢。’虎大大说：‘好，那你赶快回去吧，多装点柴。’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社会认同智谋，往往不辨正邪地全部接收，所以少年贾平凹的鬼点子被欣赏是

①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版，第358页。

②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361页。

谋 论 诡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作为一种行为规则的处世哲学，其行为规则就是按照大家普遍认同的处世应世规则作出圆通机巧的对付。“一种主张、一种智慧一旦上升为普遍认同，它就同时上升为规则。既是普遍认同，人们就普遍以这种方式来彼此对付。在这种情形下，大部分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避祸消灾。因此，一种共同的规则、一种为流俗的处世哲学所凝聚并普遍认同的在世处世方式是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的。”^①个人力量无法改变的“在世处世方式”，最圆通的做法就是适应和认同，别人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如此一来，出现的情形便是：“在了知人情冷暖的世态炎凉之后，它所产生的对策是以同样的冷暖之心、炎凉之态对付人情；在洞明祸福来去的规律之后，它所强调的是对这种规律的适应；在明白‘枪打出头鸟’的规则之下，它所发明的对付方式是‘在材与不材之间’；在看清世情圆滑、世道险恶之后，它所提倡的机趣是圆活灵巧。”^②世上为什么有数不清的混世、随世、与世沉浮之人，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处世哲学就是如此。

作为一种人生观的处世哲学，其人生观就是为了自己生存得称心如意而不断地算计、谋求和对付。“作为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价值的基本评价和取舍，传统处世哲学所凸现的生存维度是固持拘囿于世俗的祸福对付之间的，拘囿于人际对付中的人生观惯常以对世俗利害的对付得法、得当为人生的乐趣。……所以归根到底，传统处世哲学的逻辑出发点是在不触动世道现状规则的前提下能动地算计、谋求和对付。所以表面上的‘忍让’、‘通达’背后基本的价值取向乃是赤裸裸的自保、自私。”^③概括地说，处世哲学一

1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362页。

2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356页。

3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357~358页。

且上升为人的的人生观，这样的人的人生观便是把人生看做是自私、自保、机巧、算计的人生。

当我们在价值取舍、应世能力、文化氛围、社会认同、行为规则和人生观等方面认识了处世哲学之后，不难发现，处世哲学蕴含着丰富的鬼点子，鬼点子是处世哲学不可或缺的成分。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没有鬼点子，处世哲学将不会存在。具体说来，两者的关系是：

253

首先，鬼点子由处世哲学锻造。处世哲学本身是一种智慧形态，这种智慧形态好比是一座熔炉，能够锻造出各种处世应世的方法和手段，鬼点子只是其中的一种。为什么鬼点子能由处世哲学锻造？原因很简单，鬼点子形成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处世哲学都能提供。鬼点子需要自私这种道德上的恶，作为一种人生观的处世哲学早把自私作为其人生观的根本，固然鬼点子不都是自私人生观指导的产物，但自私人生观造就鬼点子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鬼点子需要算计这种技术上的支撑，作为一种价值取舍的处世哲学早把算计作为其价值取舍的首要选项，没有算计不是智谋型的处世哲学，没有算计鬼点子不成其为鬼点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鬼点子脱胎于处世哲学；鬼点子需要到处弥漫着智谋因子的环境，作为一种文化氛围的处世哲学早把到处弥漫着智谋因子作为其文化氛围的标志，到处弥漫着智谋因子的环境，鬼点子之所以需要，就在于它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用它，用它时其“资源”（诡谋黠慧）取之不尽。

其次，处世哲学因鬼点子葳蕤。处世哲学锻造出各种处世应世的方法和手段，鬼点子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其旺盛的生命力、危害社会的杀伤力，是其他方法和手段无法企及的。人们在自私、自保人生观的作用下，既要进攻而满足自私，又要防守而实现自保。根据价值取舍原则和应世能力要求，进攻而不被察觉是最高明的进攻，防守而不露痕迹是最出色的防守。为了做到这一点，鬼点子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在让他人看不清自己真面目的情况下，以售其奸。比如，人们认可并提倡随机应变，鄙视并反对投机取巧，而且把两者作为区分为公为私、君子小人的标准。“一般而言，为公而

谋 诡 论

254

变大多被视为随机应变，而因私而变则常被视为投机取巧。”¹“君子与小人，其实不过是随机应变和投机取巧的差异而已。”²但是，到底什么是随机应变、什么是投机取巧，很难分辨和把握。“由于两者实在不容易区分，以致中国人把自己的应变看做随机应变，而把别人的应变视为投机取巧。”³显然，这是从道德上考虑的。这种道德上的考虑明确地告诉我们，随机应变是阳谋或智慧的结果，而投机取巧则属于阴谋或鬼点子的范畴。

我们试举一例，看看此等行为到底是随机应变还是投机取巧。

仁凶手持凶器到一院落找李四索讨赌债，李四不在，张三被误认为是李四。张三自然不承认，但招致的是拳脚棍棒。恰在这时，从院外进来一标致妇女。张三心生一计，对仁凶手说此妇女是他老婆，可将其扣为人质，让他去借钱还债。仁凶手表示同意，马上将摸头不知脑的妇女扣押起来，让张三离去。张三离去后，仁凶手见此长得漂亮，顿起淫心，将其拖进屋内强暴。

试问，张三的行为是随机应变还是投机取巧呢？说他是随机应变，他却为自己脱身而害了那位无辜的妇女；说他是投机取巧，他只是设计自保，并非要害那无辜妇女。我们作这样的设想：假如无辜妇女不被强暴，甚至没受皮肉之苦，大家是不是要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张三，认为他头脑灵活，能随机应变？只是妇女的结果正好相反，才使大家对张三的计谋行为不再是赞赏而是贬斥，认为他诡计多端，是投机取巧的典型。以结果看动机的善恶是人们的一种常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看待张三，张三的行为自然是不端。

但笔者认为，即使后来那位无辜的妇女不被强暴，甚至没受皮肉之苦，张三的计谋也是投机取巧的鬼点子。因为其计谋的目的是为己，手段是害他，而为己害他是鬼点子的社会本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张三被误认为是李四之后，辩白之中受到了皮肉之苦，由此推论，他让仁凶手把无辜妇女当做李四之妇，无辜妇女必然辩白，

1) 曾仕强著：《中国智慧》，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5 页。

2) 曾仕强著：《中国智慧》，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5 页。

3) 曾仕强著：《中国智慧》，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4 ~ 235 页。

辩白之中必然遭受皮肉之苦。这是张三可以预知的。张三可以预知无辜妇女会遭受损害，而仍然设计将其置于遭受损害的环境，他的目的无疑是邪恶的。由邪恶目的导致的行为，尽管从技术层面上值得肯定，但从道德层面上、从社会价值导向上必须予以谴责，否则不利于人心的纯化、社会的进步。这是衡量一种应变行为是值得推崇的随机应变、还是应该谴责的投机取巧的根本标准。据此，张三的计谋行为即使不发生后来的妇女被强暴也不是随机应变，而是投机取巧。

鬼点子由处世哲学锻造，处世哲学因鬼点子葳蕤，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使得各自随着对方的繁盛而繁盛、枯萎而枯萎。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消灭鬼点子，必须彻底改变现行的处世哲学，不然，鬼点子仍然会像幽灵一样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第十一章 诡谋的危害

由于不像杀人、放火、绑架、强奸等违法犯罪，赤裸裸地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诡谋所受到的待遇往往不是人人共诛之、个个共讨之，而是在大多数人口诛笔伐的同时，一些人悄悄地来到它的身边，一边劝其“擦干泪，不要哭”，一边安慰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为什么诡谋会受到如此的怜惜呵护，从深层次的原因讲，与这些人崇拜智慧相关。对于智慧的果实，好多人的态度是见之就采，采得越多越高兴，不管有毒无毒、能食与否。诡谋就是他们不加辨别而采摘的毒果。从浅层次的原因讲，是这些人看问题的偏颇。前述让我们知道，诡谋有社会和技术两种本质，这些人只从技术本质上看到它四两拨千斤的可取之处，而不从社会本质上看到它反道德性的不可取之处。特别是对目的善、技法恶的诡谋，很多人往往是持支持、提倡、想用则用的态度，从而大大助长了诡谋行为的发生。

认识的不统一，导致态度迥异，态度的迥异，导致行动的不一致，行动的不一致无疑给诡谋留出了活动的空间。因此，我们有责任说明，诡谋就像有才无德的小人，尽管有可用之处，但对他人和社会的危害就是赵高、秦桧、魏忠贤之流。

一、杀人不见血

杀人本来是要见血的，如战场上的杀人，常用“尸横遍野，血

流成河”来形容。显然，“血流成河”是因为太多的人被杀时流了太多的血的结果。杀人见血是正常现象，由此是否证明杀人不见血是反常现象呢？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反常现象？因为杀人时用了相应的技术手段让该流的血没有流出来。据说现在发明的最厉害的武器中子弹，杀人不仅不会让人流血，而且还会让人保持死前的模样，栩栩如生。显然，中子弹的技术含量无与伦比。不过，这种技术含量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精神上的杀人不见血，最高明的手段恐怕非诡谋莫属。它厉害起来，也许中子弹也要自愧弗如。譬如被鲁迅称为“杀人不见血的把戏”的谣言，仅仅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凭借没有骨头的舌头巧妙地向世人转动了几下，所产生的能量之大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小则可以让一个人为此自我结束性命，大则它能引起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动荡不安。请看它的影响力：

屈原是一个智慧非凡、才能非凡、正气非凡的人，但在谣言面前，仍然显得无能为力，不得不在吟罢“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之后，纵身汨罗江，让滔滔江水洗刷诡谋者泼在自己身上的污垢，以示清白。然而，江水依旧东流，苍天只落下几把同情的泪，谣言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照样又刺向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26岁的默片巨星阮玲玉就是其中被刺中的一个，她在遗言中，留下四个至今仍然震撼着人心的大字：“人言可畏！”

单个的个人抵挡不住谣言的进攻，多人在一起就能叫谣言望风而逃吗？不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谣言，几乎都是所向无敌的。

两百多年前的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的谣言历经半年的时间，流传于全国十二个省份，谣言所到之处，那里的人们立即恐慌起来，正常的生活无法进行。谣言的内容是：术士们作法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可以偷取到此人的灵魂精气，为术士们服务。此谣言影响深远，被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记于他的著作《叫魂》之中。

1953年，发生在我国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的“毛人水怪”谣言，其内容更为离奇，影响更坏。谣言说：政府放出毛

谋 诡 论

258

人，专要人的眼睛、心肝、奶头、卵蛋等器官，送到苏联造原子弹。此谣言流传了一年多时间，它流传到哪儿，哪儿人心惶惶，特别是农村，情况更为严重，天还未黑大家便闭门不出，甚者大白天也不敢下地干活，致使田地荒芜无数，有的地方还因双方互指是“毛人水怪”而大打出手，或者为驱赶“毛人水怪”而集体械斗。仅据江苏省15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由互殴互斗造成的伤亡达849人，其中死亡39人。

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恐怕是2003年的有关非典的谣言，这年的4月中旬至5月中旬，仅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造谣惑众案件900余起。有一个“婴儿初生就说话，放鞭炮驱非典”的谣言，出笼于湖北的一个乡村后，像长了翅膀一样，仅四天时间就飞传到14个省市，影响极坏。

谣言只是诡谋技法之一种，它能做到杀人不见血，其他诡谋技法是否也能做到呢？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诡谋技法都可以做到杀人不见血。我们这里所说的杀人不见血，并不是专指以诡谋之手段剥夺他人性命这一点，而是指诡谋在危害社会和他人之时，能够做到奇巧地、隐秘地、省时省力地达到利己或害人的目的。“杀人”实际上是运用某种手段；“不见血”实际上是不显山、不露水；二者合一就是完成某个手段可以做到出神入化、自然而然。譬如说，你被人所害，总想知道害己的人是谁，但高明的诡谋者能够做到你被其所害，却至死也弄不清谁是害己之人。例如，卻宛被楚昭王派兵包围府邸而杀死，但至死他也不知道暗害他的是嫉妒他的同朝官员费无极。再譬如说，你是一个学识水平很高的人，自认为谁要想骗你很难，恰恰诡谋者能够略施小计就让你掉进陷阱，为什么？读读孟子所讲的“欺以其方”¹的故事便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还譬如说，你对关心你的人心存感激，把其当朋友地袒露心迹，结果被利用，自己该得的利益没有得到，却仍然感谢这个“关心你的人”，

1 对君子，可以用合乎常情的方式来欺骗他，却不可能用违背常理的办法欺骗他。见《孟子·万章上》：“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编者注。

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就是那个想回京城却最终回不了京城的老臣严挺之，而“关心你的人”就是明里关心支持、暗地却极力阻止的唐朝奸相李林甫。

被害不知被谁所害，落入陷阱还以为进了安乐窝，把仇人当恩人感谢，等等，除了诡谋似乎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做到，其不动声色的危害比起吸髓噬骨的毒品来，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259

二、侵犯生活公理错位应世

彼此按照生活的公理处世应世，人际关系才可以正常维持，社会才可以健康发展，但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挑战生活公理而活动，总有那么一些事侵犯生活公理而发生。诡谋运用者就是挑战生活公理的人，诡谋行为就是侵犯生活公理的事。行为由意识支配，对生活公理的挑战和侵犯是挑战、侵犯者意识支配的结果，而这种意识显然是反常规、错位了意识。

（一）用虚假代替真实

我们所处的社会有真实也有虚假，真实是社会的本质和主流，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础。虚假伴随着真实而产生，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真实的对立面，注定一生一世与真实为敌。所以，“虚假的直接社会效果是产生卑劣和野蛮、虚伪和贪婪。邪气上升，世风日下，国之将倾，这就是虚假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威胁；背信弃义，好浊恶清，忠奸颠倒，尔虞我诈，这就是虚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腐蚀造成的严重恶果；科学之旗折断，理性之剑钝化，真理之花凋零，荒谬之论横行，这就是虚假盛行时对人类认识所造成的灾难性‘轰炸’；善恶不辨，真假不明，诚伪不分，敌友不清，自我不知，这就是虚假给人生造成的恶劣影响。虚假是历史前进车轮下的巨石，是人类进步的敌人。”^①

^① 高帆著：《虚假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诡 论

200

诡谋运用者不是不知道真实与虚假对社会孰益孰害、有用无用，而是因为他们看待事物的好坏是以自我为标准的，于己有益有用的东西就是好，于己有害无用的东西就是坏。真实对于诡谋运用者来讲，不能随心所欲地为我所用，因而往往弃之不用，即使要用，也是因虚假需要而用；虚假正好相反，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就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并且一用就灵。世间的每一个诡谋都是虚假的产物，都为诡谋运用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功用的效应使得一些人青睐虚假而拒绝真实，将虚假当做法宝来处世应世，借以满足利己或害人之需。在他们的意识世界里，真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虚假。虚假从他们的意识世界里跳出来，进入人间社会，人间社会里才有了人们恨之又恨的卑鄙、肮脏、欺瞒、奸诈、阴险、狠毒等丑恶现象。若要清除这些丑恶现象，前提便是消灭虚假。

（二）用伪善代替诚信

众所周知，每一个诡谋里都有主、客体双方，一个诡谋是否能够实施成功，关键要看双方的“合作”状态：“合作”得好，成功；“合作”得不好，不成功。一般来说，双方合作得好与坏，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诚信。所以，诚信是双方合作并保证其成功的道德条件。诡谋主体都是聪明之人，深知诚信对“合作”之重要。但是，诡谋却又天然地排斥诚信，两者对立尖锐：要诡谋不能要诚信，要“合作”又必然要诚信。怎么办？天下事也许能够难倒阳谋者，却难不倒阴谋者。诡谋主体马上想到了用替代品代替诚信，就像用赝品代替正品一样。这个替代品就是伪善，伪善因之成为诚信的赝品。矛盾解决了，诡谋随之成功；诡谋成功，伪善作用随之凸显；伪善作用凸显，社会效应随之发生。社会效应发生的结果就是：人们在运思利己或害他的办法之时，如果非要诚信不行，那么就用伪善替代。久而久之，伪善成为了“形而上”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前面第八章中将伪善作为一种具体的权术招数即“形而下”的东西了。

作为“形而下”的东西，伪善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是麻痹政敌、蒙骗世人、有效保护自己、积蓄斗争力量的最佳手段。作为“形而上”的东西，伪善是一种必定能够伪装好自己、绝不会让原形暴露的信念，一种必然能够迷惑对方从而取信对方的信心。据此信念和信心制定诡谋方案，诡谋方案就会完善许多。诡谋方案越是完善，成功率越高；成功率越高，对社会和他人的危害越重。伪善的物化就是伪君子。“伪君子最可怕，也最可恨。和小人比较起来，伪君子看起来高明得多，却完全没有做人的价值。”^①这是台湾学者曾仕强先生在他的《中国智慧》一书中把人分成圣人、真君子、君子、真小人、小人、伪君子六种等级后说的这番话。依此看来，伪善也是最可怕、最可恨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以诚信、善良的面目出现，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了最大的伤害。因此，凡用伪善代替诚信处世应世者，任何人都不能小觑。

（三）用淫巧代替规则

有人说：“不遵守规则是谋略的精髓。”^②若从创新的角度理解，此说是对的，对就对在谋略以创新为生命，它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以最大利益、最小代价为原则地去出奇制胜；若按常规计谋策划，计谋策划出来的恐怕不是谋略，而是一般的方法手段了。诡谋是谋略的背面，完全可以与谋略一样，为创新需要而不遵守规则。同时，诡谋在不遵守规则上比谋略更自由，因为谋略是正人君子的筹谋策划，他们在筹谋策划时，不能不遵守道德、法律等规则，诡谋就不一样了，它本来就是被道德、法律排斥在外的智狐，完全可以视道德、法律等规则为无物，凭着自己的野性、灵性想算计谁就算计谁，不论是天上的飞鸟（如算计乌鸦夺其嘴中之肉），还是地上的走兽（如算计老虎假其威），或是水中的游鱼（如算计海鱼保己命），都可以作为算计的对象。

① 曾仕强著：《中国智慧》，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 吴稼祥著：《神奇的加与减》，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9页。

谋诡论

262

诡谋不遵守规则，是因为规则是羁绊，所以只立标准，总的标准就是淫巧。所谓淫巧，是指所设计的计谋具有出神入化、能够迷惑对方、且带有几分邪恶的神妙。我们这里所说的淫巧是与常言奇技淫巧中的“淫巧”不同的，后者指的是浮华不实的技巧。前者中的“巧”虽有技巧之意，但我们主要取其巧字中的神妙之意；前者中的“淫”不是浮华不实的意思，而是取其淫字中的邪恶和迷惑之意。若按我们对淫巧的解释，淫巧也只是一个属于评价性质的词，似乎与标准挂不上钩。但只要颠倒性地思考一番，就不难将淫巧理解成标准，因为对计谋的优劣进行评价之后所得出的淫巧结论，反过来就成为一种标准了。比如看一个诡谋设计得是优是劣，用淫巧去衡量就心中有数了：淫巧为优，不淫巧为劣。

用淫巧代替规则，实际上是用标准代替规则，这种代替也可以说是一种只看效果不管动机的结果论做法。这种做法被人们用来处世应世，只会给社会增添麻烦、给人间制造混乱。试想，一个不要规则，即使有规则也无人遵守的社会将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能是烧杀抢掠、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自我走向毁灭。如果用淫巧代替规则，人间充盈的只能是欺骗、奸诈、狡狴、诡谲、虚伪、阴险、厚黑……小人主宰天下，诚信只是奢望，安宁成为梦想。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

三、拉大旗做虎皮连累谋略

谋略与诡谋本来就是一个家族里的成员，面目相似，体形相同，唯一的品质有别，谋略以善为出发点，诡谋以恶为基本点。由于两者的相似性，很多情况下，无法辨别谁是谁。人们在贬斥、攻击诡谋的同时，也把谋略捎带了进去，以致无害于社会的谋略常为诡谋背黑锅。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因主体判断是非。当一个人既用谋略又用诡谋时，人们往往不是根据两者的社会本质判断哪是谋略哪是诡谋，而是根据用谋者是好人还是坏人作出统一的判断：是好人，他即使有时用的是诡

谋也认为他用的是谋略；是坏人，他即使有时用的是谋略也认为他用的是诡谋。《奸佞·诈伪·诡道》的作者就是这样的判断：“有些谋略与诡道实际上是同一种手段，只是使用的人不同。”^①因主体而异的判断，使得谋略常常蒙受不白之冤。曹操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他在一生中用了无数的谋略，也用了无数的诡谋。肯定曹操者，认为他所用之谋都是谋略；否定曹操者，认为其所用之谋都是诡谋。自有曹操以来，对曹操予以否定性评价的占多数，因而谋略也因其受到连累。比如他持刀欲行刺董卓被发现，马上灵机一动说是“献刀”，随之将所谓的宝刀递了过去，从而度过了危机。这是一个很好的谋略，但却被否定曹操者认为这是曹操一贯奸诈的自然表现。既然是一贯奸诈的自然表现，此计谋毫无疑问就是诡谋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根据主体判断一个谋是否诡谋是怎么回事了。丁谓是北宋的大奸臣，由于人品太差，人们对他的智谋也是彻底否定。比如有一件事本是一个很好的谋略，但却被一些人不屑一顾：这一年，皇宫发大火，宫殿焚毁，丁谓主持重建。由于取土太远，浪费工力，他便命令役工直接在一条交通要道上取土，土方工程完成时，交通要道变成一条巨大的深沟。这时，他便下令掘堤引进汴水，深沟变成了运河。外来的建筑材料都通过这条人工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地。待宫殿建成之后，他让人把所有的建筑垃圾填进深沟，重新修成了一条交通要道。此做“一举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②。好一个谋事经典，只可惜事出奸佞小人，不然，不知要被多少人赞美。好端端一个谋略就这样因主体的原因而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是因对象判断是非。凡用谋都有用谋的对象，谋略也好，诡谋也好，概莫能外。对象也跟用谋主体一样，也有好坏之分，凡对好对象用谋都是诡谋，凡对坏对象用谋都是谋略。司徒王允献美女貂蝉，离间董卓、吕布父子，从而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此谋是

① 沈黎、沈厚编著：《奸佞·诈伪·诡道》，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② 冯梦龙：《智囊·卷八·经务·丁晋公》。

谋 诡 论

264

地道的诡谋，但因为用谋的对象董卓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所以很多人认为此谋是谋略，并为之叫好。卢多逊奉宋太祖之命到南唐做文化使者，以重修天下地图画册为名，轻而易举地从李煜那里弄到了江南十九个州的地理形势及军队驻守、兵力布置、人口分布等重要情报。这本是谋略之举，只因南唐的李煜是弱者、文人，值得同情，故此等谋略也被人认为是阴谋诡计。以上两例足以说明，因对象判断是非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习惯，要想改变这种现象恐怕比走蜀道还难。

三是因用途判断是非。用谋为真理、正义、民族、百姓的时候，所用之谋皆是谋略，哪怕其中有的明显是诡谋；用谋为虚伪、丑陋、权势、腐恶、私欲的时候，所用之谋皆是诡谋，哪怕其中有的明显是谋略。清朝道光年间，有一次，中国商人用谋对付洋稽查，将货船里堆满洋垃圾，表面盖上一块布匹棉纱，故意让洋稽查稽查，并送上绸缎若干贿赂及认罚银子100两，同意其将货船暂扣一天，以便上岸筹集罚银。洋稽查只是在货物的表面翻了翻就开出了暂扣单。第二天中国商人来到海关交完罚款，然后上船检查暂扣的货物，“发现”问题，硬说是洋稽查夜间调包要到法院控告。洋稽查明知是中国商人搞的鬼，但有苦难言，怕把事情闹大，只好退还罚银，并赔偿“损失”1000两，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诡谋，但它让中国商人出了一口恶气，老百姓拍手称快，认为这是为正义、为民族而用的最好谋略。后周有个节度使慕容彦超，喜欢聚敛钱财，便在镇上设仓库让人质钱质物。有人用假银为质，过了很久才被发现。谁是假银质存者？慕容彦超苦思冥想得一计谋，于是暗中命令吏卒乘夜挖开钱库墙壁，将里面的钱物全部转移他处，然后以仓库被盗公告百姓，让质钱质物者前来官府言说所质何物以及物品数量、样式、颜色等，以便按照原样赔偿。公告一出，质者争相前来言明所质之物，由此，质假银者被发现抓获。如果就此打住，慕容彦超的计谋称之为谋略不会有异议。遗憾的是，慕容彦超在审讯质假银者得知其制造假银的方法后，邪念顿生，不仅不对其治罪，反而让其当师傅，招来十余人跟其学习制假，所得假银全部存

于府库，以供特用（后用于战争中的犒赏，军士们知道其银是假银，拒绝为其卖力杀敌，无奈之下，慕容彦超刎颈自杀）。这一下，有人对他上述用谋重新评价，认为他用谋的目的在于徇私枉法，因而此谋不是谋略而是诡谋。根据用途判断是非，虽然爱憎分明，但不客观，这种做法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利于人们正确区分谋略和诡谋，因而不可取。

说到诡谋，不得不说说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的修建。当年，韩国派年轻的郑国先生到相邻的秦国游说兴修水利，原本打算以此来消耗秦国的国力，从而阻止和延缓其对韩等国的兼并战争，是实足的自保与“疲秦”之计。虽然在此工程的进行中，秦国察觉到了韩国的意图，但还是为了“万世之利”，使工程得以继续。郑国渠建成后，“关中成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①结果是“疲秦”未成反“强秦”。修建郑国渠，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巨大的诡谋，但后人、今人往往忽视、忽略了这一点，或许是因为这个诡谋的对象“强秦无道”，名声、形象欠佳，抑或是渠成之后造福了百姓，功效显著，积极作用太大，所以很少有人再去苛责、非议当初郑国先生的阴谋诡计了。现在来看，说诡谋也好，说谋略也罢，也真亏了韩国能想出这种“缓不济急”的奇招儿来！

本来，自古以来就有人反对用谋，认为谋略是“小夫蛇鼠之智”（明代宋濂语），“权谋立而（国家）亡”（战国荀子语），而诡谋又混杂其间，这使谋略雪上加霜，因而谋略成了一柄双刃剑。在当今世上，“最为活跃，最见人之才情，最引人注目，最见功利得失，最为正人君子所谴责、所诅咒，又为更多的人所津津乐道的，最见人创造历史活力的也常常就是韬略或者说谋略。它造就了无以数计的英雄豪杰，同时也造就众多奸佞欺诈之徒。”^②于是有人感叹：“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很多炒古的书，标榜的是智慧，其实

① 《史记·河渠书》。

② 张建明著：《清代韬略》，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谋 论 诡

宣扬的大多是谋略。有人甚至把慈禧、袁世凯、汪精卫、林彪等奉为成功的典范。这些人忘记了当谋略成为人生的主要手段的时候，这个社会必然是跛行的，最终是要摔倒的。”^①不难看出，此等感叹中，是把诡谋当谋略了，如慈禧、袁世凯、汪精卫、林彪等这些历史的罪人，在他们一生的用谋中，尽管用了不少谋略，但更多、更典型的还是用了诡谋。诡谋连累谋略，由此可见一斑。

266

综上，我们知道，杀人不见血，是诡谋能够不动声色、出神入化地利己或害人，其危害社会的效果好比迷信的人听说有鬼来而不寒而栗；错位对付，是诡谋按照自己的一套处世应世方式，用虚假、伪善、淫巧代替对安定社会起基本作用的真实、诚信、规则，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潜在的、根本性的，犹如用包装了的朽木替换大厦的石柱；连累谋略，是诡谋拉大旗做虎皮，打着谋略的旗号干谋私、害人的勾当，使光大人类智慧的谋略不能为社会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社会也因之受损而不能全面发展。对诡谋的上述危害，我们是从整体上讲的，若从个别上讲，特别是目的善、技法恶的诡谋，其危害就没有上述的大，有的小得接近于无，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诡谋对社会和他人没有重大危害性，目的恶、手段恶的诡谋与目的恶、手段善的诡谋对社会和他人造成的危害之大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谁若否定，就不是实事求是之人。

① 徐怀谦：《谋略催人老》，载《啄木鸟》2004年第8期。

第十二章 对付诡谋

207

研究诡谋，一个现实意义，就是对付诡谋。对付诡谋，仅用通常的方法和措施难以解决问题，必须辅以特别的办法和手段。本章将要探讨的就是对付诡谋及其制造者一些特别的办法和手段。

一、辩证思维，变废为宝

诡谋是社会之害，当大家形成共识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其消灭掉。但是，将其消灭掉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你认为有多难就有多难，只要其本质的东西——邪恶不从这地球上消失，它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难道现时的我们只能看水流舟、任其发展？不，我们大有作为！虽然不能根除，但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抑制其发展，或者将其减少到最低程度。变废为宝就是其中措施之一。

（一）让诡谋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时常放一些警示教育片，内容是一些党内腐败分子陨落的过程、特点、原因和下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警示作用的确很大，其教育作用的确不小。这样的警示教育片是作为反面教材组织党员收看的，由于不便公开，只好在内部进行。诡谋则不同，它既存在于党内，更存在于党外，而且还存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中。为了让现时的人和将来的人受到警示教育，将其作为反面教材，自然益处多多。不过，

诡谋论

反面教材毕竟不是正面教材，用之要慎。慎的办法很多，坚持相关原则最为重要。

1. 谴责原则

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坚持谴责原则不能有半点的含糊。假如我们的舆论对待诡谋不是谴责而是赞赏，不是以“毒草”而是以“鲜花”对待之，其效果绝对是有害无益，并且这种害比其本身之害更大，因为一个诡谋实施成功，危害的是其所涉及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而以“鲜花”对待之，危害的是整个社会：首先是导向错误，其次是教唆作恶。但是，现时社会中，情况并不乐观。有三种倾向非常值得重视：一是心口不一，即嘴上谴责，内心赞赏。这样的人觉得诡谋就如臭豆腐，闻起来臭臭的，吃起来却是香香的，他们对诡谋理论上批判，但实际上却是诡谋的拥趸者。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虽然没有行为上的跟随，但心理上的认可则给诡谋提供通行的“后门”，其害是显而易见的。二是言行不一，即口头上谴责，行动上运用。这样的人是典型的伪君子。就像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之流，谴责起阴谋诡计来振振有词，而干起阴谋诡计来比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是情理不一，即理智上反对，感情上称道。这样的人非常清楚诡谋是社会之害，应当予以谴责，但是对于某些诡谋特别是好人对付坏人和为民族、正义而用的诡谋、技巧性特别强的诡谋，往往是情不自禁地予以赞赏。如前述中国商人对付洋稽查的诡谋，所有记载这个故事的书籍和口头传播，无一例外的是赞赏口吻，原因就在于此诡谋是好人为了民族和正义用来对付坏人的。再如陆谦设计将林冲诱进白虎堂，其诡谋之高超，引得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不由得赞叹地评道：“若以才情论之，真堪引而与之痛饮。”（详情见本书第四章）对此，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而应理性对待，凡诡谋就应谴责，即使是好人对付坏人的诡谋同样予以谴责。当然，这种谴责的对象是诡谋本身，而不是使用诡谋的主体，这与其他情况下诡谋和诡谋主体两者一并谴责有所不同。

2. 适度原则

就整个社会来讲，诡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并且发生在政治、

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于这种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有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是“一概捂着盖着，不让一例曝光”；二是放任自流，全部曝光。前者错误在于想当然和粉饰太平。想当然的人以为不曝光大家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就不会有人学以致用，无人学以致用，时间一长，诡谋便会自然消亡。殊不知，诡谋产生的途径既可学以致用，又可自我发明。自我发明的诡谋往往比学以致用用的诡谋更具诱杀力。捂着盖着的结果是大家都不知道诱骗人的诡谋是怎么回事，纷纷落入陷阱之中。这样一来，诡谋不但不会自行消亡，反而会更多。粉饰太平的人害怕诡谋曝光之后，为当地社会治安抹黑，能捂则捂，捂得越严越好，也不管会捂出什么病来，只要表面上看去一派“莺歌燕舞”就行，而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后者错误在于自然主义态度。持此种错误观点的人认为，既然诡谋存在于社会，存在就是合理的，你要曝光，就曝光吧，哪怕一起不漏，均悉听君便，只要人们愿意听闻，至于过度曝光会导致人们认为自己生活在诡谋等邪恶的笼罩之中，从而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影响身心健康，那只能怪这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差，并非是过度曝光之罪。这是一种对社会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一概捂着盖着不行，但放任自流也不行。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就是适度曝光。适度曝光就是根据形势需要和人们的承受能力，有所选择地曝光一些诡谋案例，目的在于发挥其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们认识诡谋、辨别诡谋，以防误入圈套被其所害。比如社会上一度频繁出现的“丢包”诡谋、“中奖”诡谋、“认熟”诡谋、“消灾”诡谋、“金字塔”诡谋、“传销”诡谋、“仙人跳”诡谋、“打虎放鹰”诡谋、“智窃”诡谋等，通过媒体适度地曝光揭露之后，人们得以认清它们的本来面目，从而不再上当受骗被其所害。此等类型的诡谋者也会因此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纷纷收摊歇业。假如一概捂着盖着或者放任自流，恐怕难以收到如此效果。

3. 剖析原则

作为反面教材的诡谋，除了旗帜鲜明地谴责和不捂不纵地适度

诡谋论

270

曝光之外，对其剖析也非常重要，剖析是为了更好地谴责和曝光。诡谋为什么“诡”，为什么千奇百怪长盛不衰，它为什么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身手不凡，为什么奸佞小人用它、正人君子也用它，为什么很多人对它既恨又爱，为什么面对诡谋有人清醒、有人犯糊涂，为什么有人一而再地落入诡谋陷阱？等等，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只有分析研究透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诡谋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而使人们认清它、辨识它，以便更好地防范它、打击它、消除它。

剖析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整体剖析。这是把所有的诡谋当成一种独特现象、一个有机整体来分析研究。此类分析研究是宏观上的，分析研究的是诡谋的方方面面，以及关乎诡谋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战略上解决诡谋现象问题。本书所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二是分类剖析。这是只就诡谋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进行的分析研究。此类分析研究是从中观上把握，比如只分析研究诡谋的特点、或诡谋的表现形式、或诡谋的现时原因、或诡谋的危害、或诡谋的对付方法，这样的剖析为的是能够适时地认识某类诡谋现象，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方法。行政机关的简报、大学的学报、社会上的理论刊物等，若有涉及诡谋的文稿，基本上是从分类剖析入手的。

三是个案剖析。这是就某个具体的诡谋案例进行的分析研究，大量的、常见于媒体的就是这种从微观上着手的分析研究，一般是一案一析。所谓“案”，大多是指当时当地比较典型的单个诡谋案例；所谓“析”，是针对这种单个诡谋案例进行的简单的分析，常见的形式有点评、时评、编者按、编后、以案说法等。这样的剖析虽然简单，有的只有一两句话，但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非常及时地提醒受众识别此种诡谋，从而提高警惕，以防被其所害。

整体剖析、分类剖析、个案剖析，是由广到狭、由大到小、由

深到浅的剖析，这是利用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就像焚烧垃圾发电一样，绝然少不了让其发电的工序，否则垃圾只能是危害人体健康的垃圾。

（二）有条件地使用诡谋

诡谋对于社会，本来是负价值的，当我们遵照“谴责”、“适度”和“剖析”的原则，让其成为货真价实的反面教材之后，其价值一下由负变正了。人的改造之功真可谓神奇。在此基础上，人还可以创造更多的神奇——有条件地使用诡谋。大家公认，诡谋是智慧的毒品。毒品是害，无人不知，但毒品可以成为治病的药物（如止痛药），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反对诡谋、禁止诡谋，而诡谋如毒品般于社会有益的一点用处，还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只是使用时必须严格地控制，否则，它不是有害而是有益之物了。要做好控制工作，下列三项原则必须严格遵守：

1. 不对好人原则

如果我们把世上的人绝对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那么，有条件地使用诡谋的首要原则就是诡谋不针对任何好人。所谓好人，是指无害于他人的人；与此相对的所谓坏人，即指有害于他人的人。不对好人原则告诉我们，凡是大家认为是无害于他人的人即好人，哪怕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也不能采取诡谋手段对付。从相反的方面说，诡谋即使要用，也只能针对有害于他人的人即坏人。违反这一原则而用诡谋，这时的使用者则是有害于他人的人。这里必须明确，判断对方是不是好人，是以大家公认为准，不是自己说了算，如果自己说了算，结果会是大家认为的好人被当成坏人，大家认为的坏人被当成好人。如此一来，使用诡谋就会乱套，他就会根据自己的好恶，在同志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亲戚之间、陌生人之间任意使用诡谋，这是绝对错误的。再一点就是，凡是对方身份不明的时候，一律以好人对待，即使这其中坏人，也不能使用诡谋。这是原则要求，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否则，违背不对好人使用诡谋的原则。

谋 论 诡

当然，不使用诡谋不等于不使用谋略。谋略既可在敌我之间展开，也可在友我之间展开，特别是在双方竞争之中，互用谋略完全不受道德阻碍。但如果使用诡谋，则属于不正当竞争，不正当竞争为道德所不容，严重者还要负法律责任。

让我们先来看史书记载的“田忌赛马”的故事：

272

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正处在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当时，赛马是最受齐国贵族欢迎的娱乐项目，国王、大臣常常以赛马取乐，并以重金赌输赢。比赛的规则是：将赛马按奔跑的速度分为上、中、下三等，等次不同则马鞍的装饰不同，各家的马依等次比赛，比赛为三赛二胜制。

大将军田忌多次与国王及其他大臣赌输赢，屡赌屡输。一天，他赛马又输了，有些闷闷不乐。好友孙臧安慰他说：“下次有机会带我到赛马场看看，也许我能帮你赢。”

当又一次赛马时，孙臧随田忌来到赛马场。孙臧观察后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相差并不远，只是策略运用不当，以致失败。他告诉田忌：“大将军，请放心，我有办法让你获胜。你就下大赌注吧！”田忌听后非常高兴，随即以千金作赌注请国王齐威王与他赛马。齐威王在赛马中从没输过，所以欣然答应与田忌PK一把。

比赛前，田忌按照孙臧的主意，用上等马鞍将下等马装饰起来，冒充上等马，与齐威王的上等马比赛。比赛开始，只见齐威王的好马飞快地冲在前面，而田忌的马远远落在后面，齐威王得意地开怀大笑。第二场比赛，还是按照孙臧的安排，田忌用自己的上等马与国王的中等马比赛。在一片喝彩中，只见田忌的马竟然冲到齐威王的马前面，赢了第二场。关键的第三场，田忌的中等马和齐威王的下等马比赛，田忌的马又一次冲到了前面。比赛结果二比一，田忌赢了齐威王。

面对这一结果，从未输过比赛的齐威王有些目瞪口呆，他不知道田忌从哪里得到了这么好的赛马。这时，田忌告诉齐威王，他的胜利并不是因为找到了更好的马，而是用了孙臧的计策。齐威王听

后恍然大悟，立刻把孙臆召入王宫。孙臆告诉齐王，在双方条件相当时，对策得当可以战胜对方；在双方条件相差很大时，对策得当也可将损失减到最低程度。

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臆为军师，挥指全国的军队。从此，孙臆协助田忌，改善齐军的作战方法，齐军在与别国军队的战争中因此屡屡取胜。

278

在“田忌赛马”的故事中，争斗的双方是君臣，由于孙臆出谋划策，实力不如齐威王的田忌却赢得了比赛。这是谋略在上下级之间运用的典型，没有谁说不应该，倒是赞赏声延续了几千年。假如田忌用的不是谋略而是诡谋（如买通内线让齐威王的马吃下泄药而无力比赛），他不但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让齐威王知道了恐怕连性命都不保。

下面我们举一个针对坏人使用诡谋而叫人拍手称快的例子：隋朝的时候，泉县有个叫冯弧的人，他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即使一丁点小事，也要取人性命。有一次，他与人下棋耍懒，对方不依，他捡起地上的砖块便狠狠地砸向对方的头部，直到将对方砸死为止。泉县知县魏复很有正义感，顶着压力办案，依法将冯弧判处死刑，但送到吏部后得到的批复是“此案不实，重议”。魏复又认真真审议了一遍，觉得此案事实清楚，证据齐全，适用法律得当，再次将案卷呈了上去。结果与前次一样，案卷被退了回来。毫无疑问，这是在吏部担任侍郎的冯弧的姐夫从中作梗。这时，不少人跟魏复打招呼，要他大事化小，随便处理一下就算了，免得自讨苦吃。魏复不信邪，非要让冯弧伏法不可。于是他想了一个歪招，根据平时送上去的案卷上面都不认真阅卷就画圈同意的特点，将此案卷上的“冯弧”二字改成“马瓜”二字。这样做后，他第三次将案卷呈送到京城。不久，案子批了回来，打开一看，魏复高兴极了，吏部同意处斩。他立即拿起笔来，在“马”的左边加了两点，在“瓜”的左边添了个“弓”字。“马瓜”刹那变成“冯弧”，冯弧被斩。如此办案，让人痛快之时感觉如儿戏一般，但在那种特殊的时代，儿戏就儿戏，只要能办成事就行。这种儿戏显然是诡谋，

谋 论

但针对的是坏人而不是好人，所以可以一用

2. 穷尽手段原则

办事，都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方法或手段，以求成功。无论是谁，都希望将事情办好的措施、方法或手段最省时、省力、省物，即所花代价最小。诡谋无疑是除了谋略之外的最省时省力省物的措施、方法或手段。但对于正人君子来讲，这样的“措施、方法或手段”，他们要么不屑一顾，要么使用时特别谨慎，除了如上所说不会用于好人外，即便对付坏人，也不是随随便便地想用就用。因为他们深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使用诡谋都是要承担道义责任的，只是针对不同的对象所承担的道义责任的大小有所不同，越是对不该使用诡谋的人使用诡谋，所承担的道义责任越大，大到有性命之忧；越是对可以使用诡谋的人使用诡谋，所承担的道义责任越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诡谋绝对不可滥用，即使对待坏人，也要慎之又慎，能够用其他方法或手段达到目的的，不要选择诡谋。选择诡谋只能是在想尽其他方法或手段特别是谋略方法（即穷尽手段），仍觉不能解决问题的前提下进行。这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应有的操守。前文提到的孙中山用美人计对付朱庆澜便属于这种情况，他是在紧迫的情况下找不到比此更好的手段时才为之的。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他本不想为，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又不得不为。所以，在他的一生中，用此下三烂诡谋手段对付坏人，仅此一例而已。尽管要付一定的道义责任，但这种道义责任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3. 以毒攻毒原则

诡谋只准用于坏人，只准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手段的情况下使用，以毒攻毒原则是建立在这样两个要点的基础上的特殊原则。首先，以毒攻毒不是主动的出击，而是被迫的还击，没有彼方的主动攻击，就没有此方的被迫还击。被迫还击是以毒攻毒原则的最大特点，用台湾作家刘墉先生的话说就是“以诈止诈”。若不是被迫还击，而是主动攻击，就不能称之为以毒攻毒，孙中山用美人计对付朱庆澜是主动出击，所以不能说孙中山是在以毒攻毒。再者，被攻

之“毒”与攻之“毒”必须都是诡谋，若有一方不是，也不能称之为以毒攻毒，这就是要求双方所使用的手段必须相同。比如甲用硫酸毁乙容，而乙设骗局骗甲钱财；或者是甲设骗局骗乙钱财，乙则用硫酸毁甲容，都是不能认定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以毒攻毒的。假如甲用硫酸毁乙容，而乙还以硫酸毁甲容，这种以牙还牙的同等复仇是否能够认定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以毒攻毒呢？同样不能，因为虽然两者的手段相同，但两者都不是诡谋。

怎样才算我们所说的以毒攻毒的呢？让我们通过“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来理解体会一下：

先要说说与故事中的核心事件“河伯娶妇”相关的一个问题——祭祀。所谓祭祀，就是按照一定的仪式，向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请它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祭祀从本质上说，是对神灵的讨好与收买，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人作为祭品的另一现象是为男神提供美女。为了满足想象中的神灵贪恋女色的欲望，产生了以美女为祭品的习俗。不论杀死、活埋、淹死，都是以美色娱神的表现。名义上是让她们的灵魂去做神灵的妻妾，实际上是供神灵玩弄。古籍记载，秦灵公时曾经用公主妻河，而战国时魏国邺地“河伯娶妇”的闹剧也根源于此。

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县令。他到任后，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到，邺县的三老、廷掾每年都要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搜刮钱财，并用其中的一部分为河伯娶媳妇，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百姓更苦于给河伯娶妇。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女巫行巡查看到小户人家的漂亮女子，便说这女子合适作河伯的媳妇。随后马上下聘礼娶去，还给她洗澡洗头，给她做新的丝绸花衣，让她独自居住并沐浴斋戒，并为此在河边上给她做好供闲居斋戒用的房子，张挂起赤黄色和大红色的绸帐，这个女子就住在那里。这样经过十几天，大家又一起装饰点缀好那个像嫁女儿一样的床铺枕席，让这个女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它浮到河中。起初在水面上漂浮着，漂了几十里便沉没了。那些有漂亮女子的人家，担心大巫祝替河伯娶她们

谋诡论

276

去，因此大多带着自己的女儿远远地逃跑。百姓中流传着“假如不给河伯娶媳妇，就会大水泛滥，把那些老百姓都淹死”的说法。西门豹说：“那到了给河伯娶媳妇的时候，我也要去送送这个女子。”

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西门豹真的到了河边。三老、官员、有钱有势的人以及大批看热闹的老百姓都会集在此。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媳妇过来，我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人们马上扶着这个女子出了帷帐，走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看了看这个女子，回头对三老、巫祝等人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大巫婆为我到河里去禀报河伯，需要重新找一个漂亮的女子，迟几天再送去。”随即叫差役们一齐抱起大巫婆，把她抛到河中。过了一会儿，说：“巫婆为什么去这么久？叫她弟子去催催！”于是又把大巫婆的一个弟子抛到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说：“这个弟子为什么也这么久？再派一个人去催催！”便又抛了一个弟子到河中。前后抛了三个弟子后，西门豹又说：“巫婆及其弟子们都是女人，不能把事情说清楚。请三老替我去说明情况。”于是又把三老抛到河中。西门豹恭恭敬敬，面对着河站着等了很久。长老、廷掾等在旁边看着，心里都很惊慌害怕。西门豹又问道：“巫婆、三老都不回来，怎么办？”想再派一个廷掾或者豪长到河里去催他们。这些人吓得直在地上叩头，而且把头都叩破了，脸色像死灰一样。西门豹见此说道：“好了，暂且留下来再等他们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又说话了：“廷掾可以起来了，看样子河伯留客要留很久，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从此以后，再没人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

这是一个以毒攻毒的典型例子。邺县三老、巫祝合谋为河伯娶媳妇用的是诡谋技法，西门豹顺势而为还以诡谋手段，但他使用诡谋手段不是主动出击，而是被动还击，且用诡谋手段针对的不是好人，也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非常智慧的。所以，西门豹对诡谋手段的使用完全符合“有条件地使用诡谋”的各项原则，用而无妨。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以毒攻毒原则，我们再举一例：

很早以前，有个贪婪毒辣的喇嘛，经常让人给他干活而不付报

酬。有一次，他要当地一个最有名的木匠替他无偿地造一栋房子，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总想寻机报复。不久，他终于想到一个非常恶毒的鬼点子。

为让鬼点子变成现实，喇嘛来到皇宫，对国王说：“国王啊！昨天夜里我到天宫去了一趟，见到故去多年的老国王，他叫我把这封信交给您。”国王接过信一看，原来是老国王要在天宫盖一座庙，叫他派一个当地最有名的木匠去建造。国王立即派人把那个当地最有名的木匠召来，说明召他之意。木匠觉得此事不妙，马上问：“我怎么上天呢？”喇嘛接过话头说：“老国王说了，只要把你关在你家的板棚里，点火一烧，你便可乘着烟龙上天了。”木匠顿时明白怎么回事，想了想说：“我非常乐意去为老国王盖庙，但必须让我作好准备，三天之后送我上天吧？”国王答应了他的要求。

277

三天后的中午，国王领着侍从、喇嘛来到木匠的家，把木匠关进离其家不远的板棚，喇嘛马上令人抱来干草，堆在板棚周围，放火烧了起来，板棚顷刻间化为灰烬。国王认为木匠已经上天，喇嘛认定木匠已被烧死后，大家散去。

谁也没有想到，三个月后，木匠又出现在国王面前，向惊讶不已的国王报告：“我已在天宫把庙盖好，老国王叫我回到人间，并让我捎一封信给您。”国王接过信，看后便按信上所说，给了盖庙有功的木匠很多奖励，然后叫来喇嘛：“木匠盖完庙回来了，老国王要你到新盖的庙里去念经，明天中午就启程，去天宫的办法跟木匠的一样。”喇嘛刚进来时看见木匠就已吓得半死，现在又听到国王叫他去天宫念经，整个魂儿则不在身上了。

第二天中午，国王领着侍从、木匠来到喇嘛家，把喇嘛关进离其家不远的板棚，责令木匠围堆干草和点火，送喇嘛上天宫。在国王面前，喇嘛不敢不从，只好乖乖地呆在板棚里，结果被活活烧死。

喇嘛出鬼点子欲借国王之手害死木匠，结果被木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木匠所用诡谋是地地道道的以毒攻毒。有人会问，木匠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很简单，木匠回家之后，与妻子日夜奋

诡 谋 论

战，在三天的时间里挖通了一条住处与板棚之间的地道，他被关进板棚后，从地道里潜回了家。救己除害有方，木匠的确聪明，反击诡谋就是需要这样的聪明劲！

二、练就慧眼，择机反击

273

就普通人来讲，谁都希望像孙悟空一样，有一双火眼金睛，能识妖辨魔，而不愿像唐僧，是妖不识，是魔难辨，结果总被妖魔所擒，成为待宰的羔羊。然而，精灵古怪的生活不会由我们的希望使唤，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做了我们百般不愿做的唐僧，被妖魔般的诡谋诱进魔洞，由于没有后悔药前来相救，导致身心俱损而遗憾终身。因此，有一双识妖辨魔的慧眼于我们仿佛是黑夜里的指路灯。我们研究对付诡谋，就是要打造这样的指路灯，为人们练就一双慧眼提供平台。具体说来，对付诡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纯洁心灵，明亮双眼

思想因庸俗沉沦而霉变，情感因阴险奸诈而变态，内心世界因没有信仰而沙化。由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组合而成的心灵只要沙尘弥漫、阴霾笼罩，便不会有明亮的双眼，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内龌龊肮脏，“窗户”还能洁净得起来吗？眼睛不洁净，看事物便模糊，模糊了的双眼怎能辨识极善乔装打扮的诡谋？所以，纯洁心灵是明亮双眼的前提。怎样纯洁心灵，办法有四：

1. 去见钱生贪之欲

由于钱的魔力超常，人们对钱顶礼膜拜，见钱丧失理智而不辨东西南北以致成为诡谋俘虏的现象比比皆是。经济诡谋里的受骗上当者大多是因贪图金钱而落入陷阱的，“拾会”、传销中的受害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们有的是看到钱财而生贪欲，有的是只听到钱的响声就生贪欲，结果是或得小利而失大利，或未得利而失利。实践证明，凡见钱生贪欲者容易落入圈套，凡见钱不生贪欲者可以避免落入圈套。比如说看到地上的钱包而不生占有之欲，只是将其捡

起来准备还给丢失钱包者，丢包骗子再狡猾也不可能从捡钱包者身上套得钱财。因为这时的捡钱包者由于不贪，便可以头脑清醒地对付对方，从而辨识对方到底是真丢钱包者还是实施丢包诡谋的骗子。

我们这里所说的“钱”是一切物质利益的代名词，去见钱生贪之欲就是对所有物质利益不生非分占有之心。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认识就是：“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就是任何意外之财都不要轻易地意图占有，意图占有的意外之财极大可能就是诡谋者施放的诱饵，谁意图占有谁就会成为吞饵之鱼，最终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2. 无权迷心窍之思

操控他人几乎是所有人都有的欲望，只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权力最能满足人的操控欲。操控欲越强，对权力的渴望越切，有人甚至对此达到痴迷的程度，当可以获得权力的信息飘然而至的时候，眼前只有仙女般的权力，断然看不清“仙女”背后的阴谋，于是倾情去拥抱，结果抱着的不是仙女而是被耍弄了的悔恨。我们在前面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教训深刻。为了不成为诡谋捕捉的对象，有一双能够识别利用权力进行算计的眼睛、纯洁心灵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走旁门左道去求取权力。时下，虽然通过旁门左道获得权力的例子不少，但它毕竟是私下勾当，不被社会认可，要背负道德债务。何况通过旁门左道操作时，随时都可能跌入陷阱，使自己身败名裂。凡君子不屑此为。

3. 断拈花惹草之念

人的自然属性使人自然而然地具有占有异性之性，如果这样的欲望不加控制，人的世界便会成为动物世界。所以，控制占有异性之欲望程度的高低，显示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低。因为道德是动物所没有的，道德可以控制欲望。拈花惹草之徒是自我控制力低下之人，他们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往往放纵自己，把道德踢得远远的，以获取更多的性事为快乐。

在诡谋世界，有一种人深深懂得这种以获取更多的性事为快乐

的人需要什么，为了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根据其需要，大做色情文章，让一个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儿倒在了石榴裙下，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原因很简单，女色的最大功效是让那些拈花惹草之人成为“色盲”。在这些人的色彩天地里，往往除了女色之外再没有别的颜色，虽然他们有一双正常人的眼睛，但因女色导致的“色盲”而使得他们无法辨别加害于己的诡谋了，即使是在他人看来一眼就能识破的诡谋也是如此。斩断拈花惹草之念头的办法有多种，但最根本的办法只有一个：加强道德修养。也就是以道德之能量控制占有异性之性的欲望，不该占有的绝对不去占有。

4. 绝沽名钓誉之心

每个人都在乎自己的名誉。名誉好，受人尊重，让人赞赏，被人羡慕，由此使人不仅体验到精神的快乐，而且有时还能给人带来物质利益的附加值。名誉坏，受人轻视，让人贬斥，被人鄙弃，由此使人心灵痛苦、神情懊丧。因此，人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名誉而不是坏名誉。但是，好名誉不像坏名誉那样可以刹那间得到，它需要艰苦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有人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却又企求得到只有好名誉才能给人带来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无奈之中只好违背良心地去沽名钓誉。沽名钓誉的最大特点就是使用一定手段获取通过正常途径难以得到的名声。在使用手段取得名声的过程中，由于动机不纯，不敢明目张胆，只能悄然进行，结果遭遇诡谋的暗算。比如想弄个“大师”、“专家”、“学者”的头衔，想通过媒体炒红自己，想让作品获得金奖从而一鸣惊人，想攀龙附凤抬高身价……正是这种梦想成真的希望，招来了嗅觉灵敏的诡谋。

诡谋想梦想者之所想，急梦想者之所急，热心快肠地介绍了操作方案之后，拍着胸脯表态一定能够让梦想者心想事成，但有个小小的条件需要梦想者提供：用一定的钱财铺平道路，用躯体的敏感部位（假如梦想者是一个有点姿色的女人）打通关节。也许是梦想者的虚荣心太重，对名誉的追求太迫切，竟然两眼昏花不辨真假地按要求做了。他们得到的回报自然可想而知：捉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为世上又多添一个笑柄。如此这般，自然是沽名钓誉惹的祸。

因此，绝沽名钓誉之心无疑是防做诡谋俘虏的又一重要条件。防做诡谋俘虏，去掉沽名钓誉之心，有一个道理必须懂得，这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沽名钓誉是人心之缝，若要不被诡谋者利用，不留此缝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去见钱生贪之欲，无权迷心窍之思，断拈花惹草之念，绝沽名钓誉之心，是纯洁心灵、明亮双眼的常规做法。其实，人的私心杂念是多种多样的，绝非我们上述列举的四种。固然有私心杂念不一定成为诡谋者的俘虏，无私心杂念不一定不成为诡谋者的俘虏，但诡谋者的俘虏中，大都是有私心杂念之人。从这点上讲，还是无私心杂念比有私心杂念好，少一点私心杂念比多一点私心杂念好，即使不是为了防暗算诡诈，以此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没什么不好。在对付上述四种主要的私心杂念中，我们对每种都提供了一个重要认识或方法。实际上，每一种认识或方法不仅仅对对付那种私心杂念管用，对对付其他种类的私心杂念同样管用。比如，加强道德修养对克服各种私心杂念都管用。再比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种道理确实明白之后，对于除去沽名钓誉之心能够起到作用，对于除去见钱生贪、权迷心窍、拈花惹草等私心杂念同样能够起到作用。将道理弄明白，将认识提高，将方法运用正确，既是实际生活之需要，也是我们研究诡谋的意义之所在。

（二）看穿人心，识破机关

纯洁心灵、明亮双眼是固本之举，但只有这种固本之举还是不够的，因为很多人无法做到没有私心、贪欲和邪念，何况即使做到了没有私心、贪欲和邪念，也不能保证不掉进诡谋的陷阱，原因就在于心灵纯洁之人由于好心被利用也同样成为诡谋的对象。所以，辨识诡谋显得尤为重要。

大家知道，任何诡谋都有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没有无过程的诡谋，只是因其自身的内容不同，表现出有的复杂、有的简单，有的神秘、有的平常，有的惊天动地、有的悄无声息，有的漫长得似乎结束不了，有的奇短得昙花一现。但无论怎样表现，都有被辨识

诡 谋 论

202

的可能，关键在于你是否用心去辨识，是否有辨识的能力。凡能看穿他人险恶之用心、识破诡谋运作之机关者，都是有辨识能力且肯动脑子辨识之人。辨识诡谋，方法多种多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能力、个性以及所处环境等条件找到适当的辨识方法。综合起来讲，最一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观察、分析和验证。从整体上讲，观察、分析、验证是一般方法的三个环节，从个别上讲，观察、分析、验证都可以成为独立的特殊方法。下面要介绍的三种情况，是从整体上把握，并兼顾个别。

1. 观察

观察，是辨识诡谋的首要环节。有人认为，“观察是一个知觉、思维、语言相结合的智力活动过程。”^①对于辨识诡谋中的观察，其智力性要求更高，因为诡谋本身就是一种智力活动。对诡谋进行辨识，实质上是一场智力与智力的较量。观察在辨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高智力性无法实现观察之目的。观察的主要方式有长期观察和定期观察、直接观察和间接观察、全面观察和重点观察等，这些观察方式都可运用于辨识诡谋之中，而我们要谈的观察重点是围绕诡谋者展开。观察诡谋者，途经有三：

一是辨其说。以最小代价博取最大利益是诡谋追求的最高境界。什么样的代价最小？语言的代价最小，它既不需要物力，也不需要体力，只需舌头动弹一下。纵横家能够纵横捭阖，凭的就是一条舌头，难怪创造了不少诡谋经典的张仪刚出道时，在楚国被打得昏死过去，醒来之后问妻子的第一句话就是看他的舌头还在不在，当得知舌头还在时，放心地笑了。他深信，只要有舌头在，不愁受尽凌辱的仇报不了，不愁谁都梦想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说”不来。能说会道是诡谋者的基本功，大多诡谋主要依赖于语言完成，不用语言完成的诡谋虽然有，但比较少见。因此，辨识诡谋最重要的是观察对方的说辞，也就是从对方的说辞中辨别出是诡谋之说还是非诡谋之说。这就需要认真听清对方所说，即听清对方开始怎么

① 宋书文主编：《心理学名词解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说，中间怎么说，最后怎么说；对张三怎么说，对李四怎么说，对王五又怎么说；在A场合怎么说，在B场合怎么说，在C场合又怎么说；如果是一伙人，更要听清甲怎么说，乙怎么说，丙怎么说。虚假是诡谋的本质属性，如果对方是诡谋者，他再怎么能说会道，也不可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虚的说成实的。因而他的前后所说，对不同的对象所说，在不同的场合所说，各个诡谋者所说，必然不一致，所暴露出的矛盾无疑给听者提供了破译诡谋的条件。

283

二是察其颜。这里的“颜”指的是人的肢体语言，即一个人的眼神、表情、姿态、动作等。诡谋者在实施诡谋的过程中，在用符号语言说话的时候，可以信口雌黄，完全不用考虑所言是否与内心一致，所言是否与客观事实一致，但其肢体发散出的非符号语言却以无声信号表露出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意图，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揭穿自我言谈中的虚情假意。比如一个诡谋者，他自称是某大学的教授，著书立说多少，带出了多少博士研究生，在全国有多么著名，但其举手投足不是经纶满腹、儒雅洒脱，而是浅薄粗鲁、低眉猥琐。很显然，他以自己的肢体语言戳穿了他的符号语言的虚假。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有高明的诡谋者能够像演员一样让肢体语言与符号语言保持一致性，但由于做贼心虚的心理规律使然，这样的诡谋者往往表演过头，反而弄巧成拙，给我们在察言观色中辨识出他的庐山真面目提供条件。

三是观其行。如果在辨其说、察其颜这两个环节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的话，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行”等待我们去观察辨识。在诡谋类型中，固然有只说不行的诡谋，如抽签算命式诡谋；也有只行不说的诡谋，如化缘式诡谋；而更多、更常见的诡谋还是有说有行式的。观其行，不仅要观察只行不说的行为是否是诡谋，而且要观察有说有行的行为是否是诡谋。对于有说有行的行为，辨识的时候，其观察并非孤零地展开，而是三者同时进行，既辨其说，又察其颜，也观其行。很明显，这里的行，指的是行为，是不包括符号语言和肢体语言在内的所作所为。对于这样的所作所为，同辨其说一样，要对其前后、对

诡 论

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场合、各个行为者之间的表现，进行细致的观察，看其逻辑上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有，留给下一个重大环节——“分析”处理。

284

观察，相对于分析来讲，是一个搜集信息的过程，观察到的东西越多越细，对分析越有作用。假如观察能够直接发现问题，那么观察就成为一种独立的辨识诡谋的方法了。世上有这种状况发生吗？有，并且很多。比如一个曾被丢包诡谋所害的人，当他再次看到前面的人“失落”的钱包时，不用分析就知道这是丢包诡谋，骗子就在周围，不可随意捡起钱包据为己有。这是根据直接经验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直接作出的判断。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根据间接经验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直接作出判断。如一个曾在报纸上看到丢包诡谋的人，当他遇到与那个曾被丢包诡谋所害的人同样的情况时，也会直接作出同样的判断，不进诡谋的圈套。还有一种人，当他观察到一种现象时，这种现象对于他来讲，既没有直接经历过，也没有间接看到过，但他凭借直觉判断此现象是诡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的人感觉特别好，这与他的知识积累和思维敏捷、逻辑分析有很大的关系。对敌斗争中的特工、生活中的智者都有如此本领。

2. 分析

分析，是人们辨识诡谋的核心环节。观察固然重要，但观察到的东西毕竟是感性的信息材料，没有理性的分析，难以发现其中的本质即我们所需要的可疑点，何况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观察者观察到的东西到底是整体还是局部，是真实还是虚假，需要通过分析予以甄别。比如魔术，明知是假的，但有几人能看出其中的假来？假如有人像被某些人誉为“当代济公”的大骗子侯希贵一样，把魔术说成是特异功能，以欺骗世人，那么一个对特异功能不太了解的人观察到这一现象时，会认为这是假的吗？若没有懂得其中奥妙的人告诉他，这种所谓的特异功能其实就是魔术，并且将其中的奥妙分析给他听，他恐怕永远都认为自己这次观察到的东西绝对是真的。因此，分析在辨识诡谋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极其重要、不

可或缺。分析的方式我们主要介绍以下三种：

一是比较分析。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事物）与货（事物）相比，即使认为自己不识货的人，只要认真观察、仔细琢磨，也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异同、高下、真假或优劣来。这就是比较的结果。两者之间的异同、高下、真假或优劣被看出之后，再进行必要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便是我们辨识诡谋的基础。比如，对于诡谋者的言谈举止，既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即分析诡谋者在彼个场合的言行与在此个场合的言行是否一致；又可以进行纵向比较，即分析诡谋者先前的言行与现在的言行是否一致，不一致的地方就是问题和矛盾。又比如，对于诡谋主客双方的利益分配进行得失比较分析。诡谋中，诡谋主客双方的“结合”往往是围绕着一一定的利益或好处进行，当事人在不知是诡谋的时候，可以从得失上比较：谁得谁失，谁得多失少，谁得少失多，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其中的失衡，而失衡就是我们要发现的问题和矛盾。再比如，对于诡谋者所用诱饵和技法等进行同类比较和异类比较分析。同类比较是把对方用来引诱自己的物品（如电脑、电视机、手机等）同与其同类的物品进行比较，从中发现相异点，如质量、价格相差程度如何；异类比较是把诡谋施行中的多种技法进行比较，从中发现相同点。如婚恋诡谋，诡谋者使用的技法有“英雄救美”、“一见钟情”、“穷追不舍”等，但共同的特点是其情意比在正常状况下浓酹十倍、百倍，此等反常现象，其中必有名堂，这种名堂就是我们识别诡谋的突破口。

二是因果分析。任何事物的出现、任何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原因、诡谋者实施诡谋总要以一定的现象、一定的事物表现。分析这些表现诡谋的事物、现象，找出其产生、出现的原因，对于辨识诡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虚假的东西往往藏匿在原因里。比如，一个自称是大老板的人为什么不断地变着花样向当事人要钱；一个年轻小伙为什么频频向人老珠黄可当他妈的寡妇示爱；一个到期的合同为什么一拖再拖总不能履行；一个在报刊上连名字都见不着的人怎么突然间成了伟大的诗人。对于诡谋，多问几个为什么，疑点自然

诡 论

286

会出现，有了疑点，诡谋的败露就是迟早的事了。

三是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既可以经过比较分析、因果分析之后进行，也可以在不经上述环节的情况下单独进行。所谓定性分析，是指确定值得怀疑的事物是不是诡谋、值得怀疑的对象是不是诡谋者的分析。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能不与外界接触，不可能不与他人发生联系，联系的对象不可能都是诡谋者，接触的事物不可能都是诡谋，即使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也不能断然下结论。定性分析就是通过其各方面的内在联系，把握其本质，甄别其真假。这种方法固然可以适用所有诡谋的辨识，但有些诡谋的辨识由于其时空的特殊，适用起来不太现实，比如急就式诡谋，因为它是急就章，持续时间短，来不及进行定性分析，当事人就要当即决断是否配合对方行动。所以，定性分析帮不了这种当事人多少忙，要想辨识此种诡谋，只能运用其他分析方法。渐进式诡谋就不一样，持续时间长，“情节”慢慢展开，疑点可以发现了再发现，直到认定是不是诡谋。定性分析最大好处是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不因该事物的某一点或某个环节有虚假成分而否定全盘的真实，也不因该事物某一点或某个环节的特别真实而肯定全盘的虚假。

观察与分析，联系非常紧密，观察里有分析，分析里有观察，对付诡谋，两者结合起来运用，效果会更加明显。

3. 核查

核查，是当事人辨识诡谋的“终审”环节。有些诡谋，可以通过观察直接识破，也可通过分析直接识破，但有些诡谋，通过观察、分析发现问题和疑点后，还不能贸然下结论，必须经过最后一关——核查。当然，核查也可以直接进行，并不需要通过观察、分析发现疑点的程序。比如对方自称是某政府官员，当事人即刻通过有关方面查询，是与不是结论立现，若不是，对方就是骗子，他所要干的事情就是诡谋。核查，是经过调查、检查、审核之后确定其对象、其事物是真是假的过程。骗子特别是假冒身份的骗子最怕这一招；虚假的东西特别是物品的虚假最终逃脱不了这一招。

核查的方法很多，直接核查是其一，即对对方所说的情况，以

及诱饵和道具，自己直接调查核实；间接核实是其二，即委托他人或有关部门对对方所说的情况，以及诱饵和道具进行调查核实；全面核实是其三，即对对方方方面面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此方法一般用于重大事项，如重大项目的投资、承建等；个别核实是其四，即对对方的一个方面进行调查核实，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对识破什么样的诡谋都适用；现场核实是其五，即当场就某些问题对对方进行调查核实，此法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但也容易被对方的自圆其说所蒙蔽；跟踪核实是其六，即暗暗跟随对方，对其行踪进行的调查核实，此法所花气力大，但收效特别明显。

核查是破译诡谋的高招，但很多人遇事时却没有使用，以致上当受骗之后特别自责为什么当时不去核查一下，有时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识破的事情却偏偏没有打这么个电话。当然，遇事进行核查的当事人也是很多的，是他们有心进行的核查让诡谋者现了原形，让诡谋彻底败露。

2003年3月16日《楚天都市报》报道了一个诡谋里两种受骗者的两种态度的案例，读来很有启发意义，我们不妨介绍如下：

42岁的曹某，本是个无业游民，2002年初，他终于在武汉市某房地产公司找了份推销房产的工作。干了不几天，曹某就动起了歪脑筋，将一套砖混结构住宅当做错层住宅卖给了82岁的邹先生。此事败露后，他被公司除名。当年8月，曹再次找到吃过亏的邹先生，拿出一份盖有“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武汉城市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公章的伪造文件，称公司因违规售房已被有关部门查处，邹可因此索赔12万元。邹先生听后不仅想都没想去核查一下这个蒙骗过自己的人此时说的是真是假，反而一听就信，不计前嫌地百般感激曹某。于是曹某拿出一份假任命书，声称自己现为某房地产公司执行总经理，可尽力帮其打官司。在完全取得邹先生的信任后，曹先是以帮忙请律师为由“拿”去7000元，后又借口妹妹出了车祸急需钱用，“借”去1万元。就这样，一个多月里，曹以种种理由共骗取邹先生2.82万元。

轻易得手，曹某非常欣赏自己的聪慧，随之又考虑了一个布局

诡谋论

238

的新花样。同年9月，已婚的他在某报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本人留学法国，重情专一，潇洒倜傥，有远大抱负……”妙龄女子娟娟（化名）欣然应征。一见面，曹使出自己的铁嘴功夫，很快将娟娟的芳心俘获。不多日的一天，曹对娟娟说要接待日本客户，碰巧缺现金，想挪借一点，心地善良的娟娟没有多想，大方地借给曹某7000元。不久，曹某表示要出资60万元，与娟娟及其朋友合开一家装饰公司。开公司要活动经费，他“不好意思”地又开口向娟娟“借”款1万元。此时的娟娟开始怀疑，堂堂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总，为什么总是张口借钱？此人会不会是……她开始核查，于是按照曹给的名片上的电话号码，连拨两个，其中一个曹某原供职单位，接线员称，曹某早已被公司开除；另一个电话则干脆回答查无此人。心中已有数的娟娟拿起电话，按下了“110”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很快还原了曹某的本来面目。

两个当事人，一个被骗7000元后，没有去核查，结果又被骗去2万多元；一个被骗7000元后心存疑虑，马上核查，从而阻止了诡谋发展，挽救了自己，尽管核查晚了一些，若她一开始就核查，恐怕诡谋早被识破，7000元现金就不会被曹某“借”去挥霍一空。这也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核查需要，早比晚好。

（三）把握时机，奋起反击

辨识诡谋是为反击诡谋作准备，反击诡谋是辨识诡谋的直接目的。这里所说的反击诡谋，既指针对诡谋手段本身的反击，也包括针对诡谋制造者的反击。在某些情况下，反击诡谋制造者比反击诡谋更重要。比如像赵高、李林甫、丁谓这样的诡谋人格者，他们经常制造诡谋，如果仅仅针对他们所施展的诡谋及手段进行反击，实在是反不胜反，甚而有时他们还会或必然借助权势，不但让你反击失效，而且会让你承受可能的灭顶之灾。因此，要做到反击有效，最好的办法是剥夺他的权势地位，让他身陷囹圄，甚至是把他送交阎王去管理。所以，历史上的反击诡谋，很多都是直指诡谋制造者。因此，我们反击诡谋，除了反击其本身之外，还要反击诡谋制

造者。

反击诡谋及其制造者，需要全社会的统一行动。但是，现实生活并没有让我们看到，所有人都站在积极反击的行列。在对待诡谋的态度上，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表情。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对付诡谋的态度不等于对待诡谋的态度。对待诡谋的态度是从总体上评价诡谋，既包括对诡谋的根本看法，即诡谋是好是坏、是善是恶的整体性评价（本书第十一章已作了阐述）；也包括对诡谋的具体看法，即遭遇诡谋之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之。对付诡谋的态度只是属于对待诡谋的态度中的后者，我们将其归纳如下：

1289

一是有意回避。明知是诡谋，对付的态度则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种人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进局谁进局的与我无干的心态处置。生活中，这样的当事人最多，面对铺天盖地的虚假广告，明知对方是在布局，绝大多数人是不理不睬、听之任之；市面上乞讨诡谋随处可见，绝大多数人是既不掏一分钱进局，也不发一言揭露其技法而破局；传销骗子相中很多人，很多人都是以我不参与拒绝之后，再不闻不问。对于这样的当事人，我们不能指责他们在此问题上没有社会责任感，只能说其社会责任感不强烈，因为他们不就范的本身，就是对诡谋的一种否定，为社会减轻承载恶行的压力作出了贡献。如果所有人都不就范，诡谋者再怎么吆喝，其技法也只能是自生自灭。但是，有一类回避则不能等闲视之。譬如国家因诡谋即将陷于灾难（如郑国牛贩子弦高遭遇的秦国军队偷袭郑国的诡谋）、他人因诡谋而有生命之虞（如项伯背主赶到汉营提醒故交张良千万不要参加有性命之忧的鸿门宴的诡谋），本可以以一己之力救之却熟视无睹而不救，这种在大事大非问题上的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于情、于理、于法不容，必须谴责。

二是主动上钩。面对诡谋，既不回避，也不揭露，而是零距离接触，将计就计地主动上钩，在与诡谋者的周旋中捞上一把。这样的当事人，有与虎谋皮的气量，非胆大且智慧者不可为。生活中，尽管这样的当事人是极少数，但演绎出的故事往往精彩纷呈。三国

谋 论

290

时期周瑜将计就计让曹操杀掉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的故事盛传千年而不衰便是明证。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刘家设置圈套让孙家钻入，孙家一眼看破，将计就计以子代女嫁到刘家，结果反赚得刘家女儿归。故事曲折生动，让人百读不厌。时下，明知是诡谋，但为捞好处而佯装进局的大有人在。非法集资诡谋中，不少“明白人”知道是诡谋，也明白将其维持下去依赖于后面的受骗者，所以他们首先进局，从中得到高利息回报后马上出局。这样的“受骗者”，虽然以其聪明得到实惠，但取之乏“道”，不可称道，更不可倡导。

三是自认倒霉。这是被诡谋所害之后的一种心理趋向。生活中，这样的当事人为数不少。他们为什么哑巴吃黄连——无声地将苦往肚里咽呢？原因很明显：他们之中，有的认为损失不大，再去过问也没什么意思；有的认为中计上当是愚蠢的表现，过问反觉羞耻（特别是一些因中计上当而失去贞操的女性）；有的知道自己的屁股不干净，怕过问了适得其反——拔起萝卜带出泥；有的觉得自己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过问；等等。如此态度的当事人皆以蚀财免灾的心态对付诡谋，所以，要想把积极主动地反击诡谋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无异于寄希望于君子勇当禁毒尖兵。

四是揭露举报。凡厌恶诡谋、憎恨诡谋者和崇尚正义、不容邪恶的当事人，在遭遇诡谋时，都会奋起反击：胆大力强者，不惧邪恶，当场揭穿诡谋者的鬼把戏，让诡谋者在人们的声讨中原形毕露、无地自容，或者将其扭送到有权处置诡谋者的地方，让其接受惩处；胆小力弱者，巧妙周旋，一方面提醒相关人员某某在实施诡谋，切莫进入圈套，一方面向有关部门举报，由这些部门处置。这样的当事人，虽然为数不是很多，却是反对诡谋的斗士，惩恶扬善的尖兵。当今世界上这方面的出名者莫过于美国著名魔术师、反伪科学家詹姆斯·兰迪。他时常运用高超的魔术技巧和充满批判精神的智慧，解剖和揭露各种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当场撕下一个又一个诡谋者的画皮，成为名副其实的此类诡谋者的“天敌”。我国目前出现的四大反伪斗士——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一次又

一次地破译、揭示特异功能“大师”们的诡谋，冲锋陷阵于反伪科学的战场，无不为人敬重和推崇。

如上所述，对付诡谋有四种态度，只有第四种揭露举报最可取，最值得称道。反击就是要揭露举报，就是要对诡谋者还以颜色，就是要让诡谋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直至无空间生存。但是，反击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诡谋本身就是黠慧的产物，诡谋者就是黠慧之人。就像猎人捕狐一样，狐狸是狡猾的，猎人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才能将狐狸捕捉到。我们对付诡谋，要想有必胜的把握，不具备比诡谋者更大的智慧是难以如愿以偿的。

291

把握时机，是反击取胜的关键。经研究发现，瞅准时机进行反击尤为重要，它是衡量我们智慧大小、有无的一个标志。时机把握不好，要么打蛇没能打在七寸上让其溜了，要么捉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要么狗没打着反被狗咬。因此，要奋起反击，必须瞅准时机。

1. 以屈求伸，等待时机

凡受到诡谋伤害的人，或者虽然没受诡谋伤害但正义感特别强的人，都希望及时有效地予以反击，让诡谋者丢人现眼、一败涂地、身心俱损。但是，由于自己的力量还没有积蓄到能够与诡谋者抗衡的地步，或者诡谋者还没有出现可被我利用的条件，或者客观环境暂时于我不利而于诡谋者有利，或者虽然我能够战胜诡谋者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等等，一句话，反击的时机尚不成熟，必须等待。等待，不是心灰意冷、一筹莫展、怨天尤人、无所作为的等待，而是避免侵害、保存实力、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的等待。等待，是表面上的被动，实际上的主动；表面上的无为，实际上的有为；表面上的自弃，实际上的自励。等待，最大的消耗是时间，短则也应有个十天半月（再短，恐怕就不叫等待了），长则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是告诉我们，为了反击成功，耗费十年八年时间也应在所不惜。等待，最受考验的是心灵，由于等待就是一个压抑自己的自控过程，其时机一天不成熟，这个过程就一天不能结束，有人承受不了这种自我压抑的等待，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就进行反击，结果事与愿违，前功尽弃；有人承受

谋 论 诡

292

不了这种自我压抑的等待，便放松自己，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志消磨无儿，反击成了锈迹斑斑、机关失灵的武器。坚持下来者，都是那些意志坚定、心理承受能力极强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人。这些人往往等待到了最佳时机从而一举反击成功。由于等待不是无所作为、被动挨打的等待，而是积极主动、使招用术的等待，所以

下列招数——装疯、装傻、装坏、示弱、示好可用于等待之中

(1) 装疯

不疯而装疯，为的是避免杀身之祸，有效保全自己和等待日后伺机反击，当然反击的是诡谋者。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心灵上的自我作践、肉体上的自我摧残的措施，非一般人愿为、敢为、能为，所以历史上为之者并不多见。史籍记载的名人中，大概有箕子、孙臆、朱棣、唐寅等人曾为之。首先，他们要有勇气排斥只有人才有的羞耻感，还原成无道德意识的动物。比如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身裸体，唐寅就是这样。他在宸濠手下为官时，知晓了宸濠谋反的阴谋，这时，他既不能参与，又不能离去（离去则会被宸濠猜疑而遭杀身之祸），想来想去，保全自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装疯。唐寅突然变疯，宸濠怀疑，便派人送以食物以观真假。侍者到了唐寅住处，只见唐寅赤裸着身子，两足张开，两手摆弄着阳物，并冲着侍者骂道：“你想要吗？想要就拿回家去！”随之把侍者手中的食物夺过来甩在地上，然后尿上尿再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一个正常人，谁会这样不知羞耻呢？宸濠信了，放过唐寅，他后因事败被杀，其党徒无一幸免。只有唐寅装疯躲过了一劫。其次是要忍受肉体上的自我摧残。孙臆被庞涓陷害，为日后有机会报仇，不得不装疯保全自己，所受之罪非常人能够忍受。他睡猪圈，吃猪食，任人殴打而不逃避，仅一月时间就被自我折磨得不成人形。终于等到了机会，他被禽滑救出魏国，后让庞涓死于己手。

(2) 装傻

现在我们形容某人极端愚蠢，往往说他“愚不可及”，但典出孔老夫子的这个成语原本是个褒义词，指人为了应付不利局面假装愚痴，以免祸患，为常人所不及。当年孔子在评价宁武子时说，他

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就聪明，在国家政治混乱的时候就装傻；他的聪明一般人做得到，而他的装傻则是别人做不到的。^①显然，孔子对宁武子的处世态度、处世方式、处世智慧是非常赞赏的。

本身是傻不谓装，本身不傻而要扮傻才谓之装。所谓不傻，就是明白诡谋者的所作所为就是针对自己或他人的诡谋。若不知道则不谓之不傻。如诡谋者设圈套、做笼子让自己去钻，自己浑然不觉地钻了进去，事后才知中计上当，此等情况不能叫不傻，只能叫傻——是一种缺乏辨别能力的傻。我们这里所说的傻，不是完全智障意义上的傻，而是以智障之傻作为参考，把与身份地位很不匹配的认识判断、理智情感、言谈举止称之为傻。傻是如此，那么装傻呢？装傻就是要让这种不匹配的现象在自己身上出现。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匹配的现象在自己身上出现？原因很简单，就是当诡谋者运用诡谋时，自己虽然已经知晓，但由于自己暂时没有力量进行反击或者认为反击便能取得成功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装一装，有时为表明傻到了家，还“积极主动”地配合诡谋者。比如，装成智力低下，即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不知对错，甚至有时连东南西北也搞不清，完全以诡谋者的判断为判断，以诡谋者的评价为评价，即使诡谋者指鹿为马也予以认同；装成口齿拙笨，即说半截子话，说矛盾的话，说与现场氛围极不协调的话，说与自己身份地位极不相称的话，或者是想把话说清楚可又说不清楚，或者是装聋作哑地不知说什么好，或者是笨嘴笨舌地说不出话来；装成行为愚钝，即干什么事都干不好，一干就把事干砸，或者别人都认为不该干、不会干、谁干谁就是笨蛋的事，自己偏偏去干了，或者要靠诡谋者的点拨才能干点事，不点拨就不知道怎样干了，结果傻名声众人皆知。

一般来讲，装傻特别是在不经常接触的诡谋者面前装傻，只要装得是那么回事，即使是精明的诡谋者也会被蒙蔽。众所周知，拿破仑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但最终却败在了被他称之为“傻瓜”

^① 《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谋 诡 论

294

的俄罗斯亚历山大一世手里。亚历山大一世靠施展骗术、宫廷政变、弑父夺权于1801年坐上了沙皇的交椅。1805年和1807年俄军与法军分别交战两次，两次都中拿破仑诡计而以惨败告终，元气大伤的俄罗斯再无力与法国抗衡。眼看俄国面临亡国之险，亚历山大一世一改过去的强硬与孤傲，装成傻瓜以对付拿破仑，他一方面阿谀奉迎地吹捧拿破仑，一方面像蠢人对待聪明人一样地由拿破仑摆布，最典型的是1808年秋天在埃尔富特与拿破仑的第二次会晤。这次拿破仑要见亚历山大一世，名义上是要显示法俄两国皇帝的“伟大友谊”，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西线作战，同时威慑奥地利，使他能腾出手来尽快平息西班牙叛乱。拿破仑的用意非常明显，俄国宫廷一片反对声，包括皇太后在内。她认为这次会晤是拿破仑设下的圈套，旨在侮辱俄国，因此写信给儿子说：“亚历山大，切切不可前往，您在断送帝国和家庭，悬崖勒马，为时未晚。切莫拒绝听取您的母亲出于荣誉对您的恳求。”亚历山大表现出特别的倔强和笨傻，不听任何人的劝阻，毅然前往，并对前来迎接他的法军元帅拉纳“诚挚”地表示：“我非常喜欢拿破仑皇帝，一定利用一切机会向他表明心迹。”在与拿破仑的会晤中，其“心迹”表露最为充分的就​​是套用伏尔泰《奥狄普斯》剧中的一句台词：“和大人物结交，真是上帝恩赐的幸福。”被谰语的迷魂汤灌得晕乎乎的拿破仑，认为亚历山大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傻瓜”。让拿破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小傻瓜”，慢慢地积聚起雄厚的军事力量并有把握战胜法军之后，于1812年诱使拿破仑大举进攻俄罗斯，而被俄军打得一败涂地，再难有翻身的机会。对此，亚历山大在给妹妹叶卡琳娜·保罗芙娜的信中写道：“拿破仑不过认为我是个傻瓜。可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一目了然。”亚历山大不愧为装傻成功的典范。

（3）装坏

常言道：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这就是说学坏比学要好容易千倍。学坏容易，装坏可就不容易了。学坏是主观愿意变坏，主观愿意变坏，行为听随主观意识有坏的表现就行了。在这一

过程中，其学坏者获得的是心理上的愉悦、精神上的满足。装坏就不同，装坏是主观上不愿变坏，但为了某种目的，不得不让行为表现出与主观意愿完全相反的坏的状况来。这样做，不仅得不到心理愉悦、精神满足，而且必须承受人们给予的鄙视、愤恨、声讨等道德压力，同时还要在坏的内容、手段选择及其程度的把握上费尽心机。尽管如此，但为了保全自己、等待反击诡谋的时机到来，反击者还得选择装坏这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

民国时期，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为了掌控蔡锷将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以组阁为名，将身在云南手握军权的蔡锷召入北京。蔡锷明白，目前袁世凯的真面目还没有让人看清，与其硬抗于革命无益。同时他也深知，自己一旦进入北京，再想脱身困难重重。但是，为了等待机会有效地反击袁世凯，他毅然听召北上。在北京，他正中袁世凯下怀地采取放弃主义态度，在其位不谋其事。当袁世凯意欲称帝时，信仰共和的他却积极上表劝进，并晓谕自己的部下拥戴帝制。此外，他还一改过去君子风范，故意放纵自己，醉心于歌台舞榭、娼馆妓院，与名妓小凤仙打得火热，直至发展到与感情甚笃的妻子离婚。这一切终于迷惑了袁世凯，使其放松警惕。后蔡锷趁到天津治病的机会，转道日本、香港、越南而回到云南，举起反袁的大旗。

在北京期间，蔡锷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政治上同流合污，生活上腐化堕落。此等印象的形成足以证明蔡锷的装坏非常成功。不过，他的装坏仍然没有违背装坏的一个基本原则：坏自己而不坏他人。也就是他做到了是以糟蹋、污损自己而不是糟蹋、污损他人来达到装坏目的。他上表劝进、沉湎酒色，败坏的只是自己的名节声望，与他人无多大干系。假如他装坏是以杀人放火、栽赃诬陷为内容、手段，那么他就违反了坏自己而不坏他人的装坏原则，即使他装坏的初衷不是为己，也难以让人原谅，更不会让人敬重，因为他对他人、社会的损害太大，超出了必要的度。所以，装坏必须遵守坏自己而不坏他人的基本原则，必须在内容、手段上作必要的选择。

谋 论

(4) 示弱

人们总是同情弱者，这是一种心理定势，诡谋者也不例外，同样存在着这种心理定势。利用这种心理定势向对方示弱，是对付诡谋之人在等待时机反击上的又一招数。当然，他们的示弱不仅仅是要得到诡谋者的同情，更重要的是麻痹对方，使对方认为弱小的自己病猫一只、不足为患，从而疏于防范。常规的做法有这样一些：隐藏长处，暴露短处；掩盖优势，凸显劣势；内心斗志旺盛，外表萎靡不振；暗里奋发有为，明里碌碌无为；无病装成有病，小病扮成大病；用惊慌失措代替沉着冷静，以胆小怕事代替勇敢顽强；实力虽有而显得不堪一击，能力虽强而显得平庸无知。

明朝著名清官况钟装了一次糊涂虫，却除掉了一批奸吏。宣德五年（1430年），况钟上任苏州知府，第一次升堂办事，一营私舞弊、欺压百姓的府中官吏欺负况钟新来乍到，故意抱来一大堆公文让他处理。心知肚明的况钟故意装着什么都不懂，唯唯诺诺地一一按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了处理。官吏们阵阵窃笑，笑新任知府是个糊涂虫，他们略施小计就被试出，看来今后仍可胡作非为。殊不知过了几天，“糊涂虫”不再“糊涂”，异常清醒地把他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上任之前就知道你们专干坏事，不干好事，我来了，你们仍不收敛，教我批的公文都是欺上瞒下，坑害老百姓的，你们这些人该死！”说完，让人揪出几个为首者当场捶杀，将其余作恶者全部赶出衙门。此举在苏州引起震动，老百姓拍手称快。

北宋奸臣丁谓可谓玩弄阴谋诡计的高手，为了不致恶行让皇帝知晓，他不准任何大臣单独向皇帝奏事。王曾是个例外。例外就在于王曾在丁谓面前显得十分胆小怕事，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字，这使丁谓对他很放心。有一次，王曾对丁谓说自己没有儿子，想以弟弟的儿子为子，要请皇上恩准，但又不敢单独向皇帝奏请。丁谓说你与别人不同，可以直接跟皇上讲。王曾终于有了单独接近皇帝的机会，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奏章呈给了皇上，奏章上所写的全是丁谓的罪行。丁谓由此被罢相流放。此故事载于《智囊》，冯梦龙点评时称赞王曾的行为是“君子之苦心”。

的确，示弱必须费尽心思，辛苦自我，否则难达目的。

(5) 示好

以其言行向诡谋者表示友好态度，让诡谋者视己为老实人、识时务者、无害之人、可用之人或者是知己。示好的方式可以依诡谋者性格而定，对方喜好金钱就送以金钱，对方喜好女色就为其物色小姐，对方喜好字画就为其找来“舒同”、“齐白石”，对方喜好旅游就付费让其到欧美，对方喜好名声就对其溜须拍马、歌功颂德，总之，对方喜好什么就投其所好地给予什么。如果对方没什么特别的喜好，即使有自己也没有能力和条件办到，那么，就采取攀亲戚、结婚亲、挡非议、当护卫、卖苦力等办法。示好，不能只对诡谋者本人，对他的亲朋好友尤其是情人、亲信也要表示友好，否则自己的努力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样做，有可能被人视为小人作为，但为了等待时机反击，只能“他议论他的，我做我的”。如此我行我素，又恰好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我对诡谋者的“友好”，让诡谋者又增加了一层对我的好感，而我也随之增加了一层保护色。用此法虽然有点“卑鄙”，但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最起码能在不过度压抑自己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所以，小人物常用此法对付害己者，大人物对此法也不拒绝使用。

297

明朝嘉靖年间，严嵩与徐阶都是内阁大学士，只是严嵩的大学士之前加了首辅（就如我们现在所说的首席），且因受嘉靖皇帝的宠信而权倾朝野。两人共事多年，但不是同路人，严嵩多次设计陷害徐阶。徐阶无力抗衡，只能等待时机反击，所用办法就是向严嵩表示友好。他见到严嵩父子都是以礼相待，尽管其子严世蕃经常有意挑衅。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父子被告发，皇帝朱厚熜下诏逮捕了严世蕃，令严嵩退养。徐阶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亲自到严家慰问。此举竟让严嵩感动得叩头致谢。徐阶之子徐璠对此不理解，责怪父亲太宽容，太丢徐家的面子了。徐阶即刻责骂道：“没有严家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严家有难，我若落井下石，会让别人耻笑的。”此话被严嵩的爪牙打听到，严嵩知道后更是感激。随后，徐阶多次写信给严嵩表示慰问。这使一向仇视徐阶的严世蕃

谋 诡

论

238

也感叹不已地说：“看来徐阶对我们严家没有坏心。”让严嵩父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没有坏心”的徐阶耐心地等到了时机：严世蕃谋反的事暴露。他马上起草奏章，告发严嵩父子里通倭寇谋反想当皇帝。谋反想当皇帝这可不是一个小罪名，朱厚熜只好忍痛割爱，痛下决心除掉了严嵩父子。事后有人问徐阶：“当时严世蕃已成阶下囚，严嵩也被削职回家，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向严家示好？”徐阶笑而不答，他心里明白，当时严嵩虽然下野，但皇帝朱厚熜一直还眷恋着严嵩，随时都有可能将其起用，且严嵩的爪牙大肆活动，搜集情报为严嵩叫屈。若过早地与其翻脸，弄不好真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徐阶老谋深算，示好的功夫炉火纯青。

值得注意的是，示好也要有度，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让自己伤筋动骨，特别是不能以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来向对方示好，如果确实需要这样做，应该征得第三方的同意，或者事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否则，为道德所不容。

2. 选准时机，击而则灵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谁都知晓的道理，因而抓住时机显得尤为重要。时机抓住了，成功便有了希望，特别是在对抗关系之中，谁抓住了时机谁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但是，时机对于需要者来讲，并非像超市里的商品一样十分清楚地标明了“时机”二字，谁需要看字取货就行。时机总是客观地存在着，以需要者的主观判断而认定。这就是说，需要者认定是时机的就是时机，需要者认定不是时机的就不是时机。如此一来，需要者的主观认定就有可能与客观事实之间发生矛盾，即主观上认定的时机客观上并不是，客观上是时机的主观上并不认定。因此，在抓住时机之前有一个对时机怎样认定的问题。认定了时机再牢牢地抓住，是不是就可以展开行动了呢？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在与诡谋这种黠慧的较量上更应如此，有的可以马上开展行动，有的马上开展行动达不到最佳效果而只能暂时放弃，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

(1) 认定时机

时机是有利于实现主体目的的最佳客观条件。有利于实现主体目的的客观条件很多，只有称得上最佳的才是时机，所以用千载难逢形容时机难得是有道理的。时机与主体目的密切相关，没有主体目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时机的出现，时机只能出现在主体目的实现的过程中，但出不出现、什么时间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是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目的不同，对时机的认定不同，比如战争，对于一个迫切施展军事才能的人来讲，是个极好时机，而对于一个希望和平发展的人来讲，不但不是时机，反而是破坏和平发展的灾难。还有，实现目的的特定要素不同，时机出现的时间和方式也会不同。比如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制度，其中改革是手段，促进社会发展是目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是促进社会发展目的的特定要素，而这些特定要素出现的“有利于改革”的时机是不一样的。照理讲，三种制度同步改革对实现改革目的更为有利，但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早于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改革，原因在于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改革的时机在当时还没有成熟，若强行同步进行，只能事与愿违。这些无疑给准确认定时机增加了难度。反击诡谋，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难度，但我们不因存在着这样的难度而放弃认定工作，胡乱地把某个条件的出现当做时机，或者时机根本没有出现而权当出现。

由于诡谋的种类繁多，提供给我们反击的时机不会一样，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个诡谋的反击时机进行认定，只能提供原则性的意见。当出现以下状况时，可认为是反击诡谋的时机：

第一，掌握了诡谋者的诡谋证据，反击时能够一剑封喉。这是从反击的有效性上讲的。有人会认为，掌握了证据就可以反击，何必要加一句“反击时能够一剑封喉”？这种认为是没有效率观念的认为。掌握了证据固然就可以反击，但不能确保反击的有效性，确保反击的有效性必须是在利用证据可致诡谋者于死地之时。因为诡谋者是狡猾的，如果只有证据而没有客观环境对这种证据的认可，诡谋者就可以凭借狡辩否定你的证据是证据，让你的反击功亏一

谋 论

399

策 比如，诡谋者是皇帝的宠爱，你拿其诡谋的证据在皇帝面前去揭露其搞阴谋诡计，其会辩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皇帝着想，诬称你的证据是伪造的。这时候，皇帝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败北的无疑是你而不是他。但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皇帝正为什么事恼怒他，而你将其搞阴谋诡计的证据呈给皇帝，胜利的将会是你。这种状况就是最佳时机。所以，光有证据而没有能够一剑封喉的客观环境是不能保证反击成功的。

第二，既能撕下诡谋者的画皮，又能保全自己。这是从安全性上讲的。在反击诡谋者的道路上，不乏不顾一切包括性命在内的勇士，他们怒发冲冠，有的是为国家或者他人利益，有的是为个人利益。前者让人钦佩，后者让人尊重。说实在的，面对狡猾的诡谋者，有时的确需要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迎头痛击，以显示正气尚存。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自己已陷入绝境，再不勇敢地站出来迎头痛击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成功与否就看天意，对此我们也持赞成的态度。但只要不是陷入绝境，那种既可坚持自己的信念又可保全自己的希望尚存，最好不这样做，因为在反击诡谋的过程中是有一举成功的机会的，到时真的没有了再硬碰硬也不迟。所以，我们认为，反击诡谋的时机应该是等待既能撕下诡谋者的画皮、又能保全自己的有利条件出现。固然，能够撕下诡谋者的画皮就需要相应的时机，在能够撕下诡谋者画皮的同时还要保全自己，这样的境遇太难得了。正是难得，反击诡谋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在撕下诡谋者画皮而不能保全自己的时候出击，所得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其付出的代价更大。此等状况则不是我们所要认定的时机。我们所要认定的时机是有利于反击者的最佳客观条件，得不偿失的境遇显然对反击者不利。比如，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一个弱女子揭露诡谋者是骗子，向其讨还自己的损失。此弱女子反击是反击了，但她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吗？倘若骗子还有人性，他会再次骗她以摆脱困境；倘若骗子人性陡失，将其杀害也有可能。如此境况，显然不是反击的时机。

第三，诡谋者的诡谋意图已见端倪，反击可使自己的人身免遭

伤害或财产免受损失。这是从止损性上讲的。在反击诡谋的事例中，不乏为了反击有力，故意让自己的人身或财产受损之后再瞅准时机反击的，但这是极少数情况，只有大智慧、大作为者敢为。比如，秦昭王使计骗和氏璧，蔺相如明知是诡谋仍然送璧于强大的秦国，昭王得璧之后无意划给许诺的十五城，蔺相如即刻用计将璧赚取送回赵国，留下了“完璧归赵”的典故。蔺相如的智慧和勇气可谓空前绝后，非一般人可比。一般人只能是反击在人身或财产受损之前。他们只要见到诡谋端倪之后便反击。原因在于他们不愿白白的让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受损，也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智慧和勇气去与诡谋者周旋。一般来讲，人身和财产受损之前反击的时机要比受损之后的时机多，这是因为，受损之前，诡谋者的目的没有达到，没有达到目的他就不会不与你联系，在保持联系中进行反击，其机会自然随时都可能出现。而受损之后诡谋者的目的已经达到，达到之后他便不再与你联系，不与你联系，你想反击常常是连反击的对象都没有，何来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已见诡谋端倪之时，正是反击的良好时机。

（2）选定时机

有人会说，时机本来就难得，有的稍纵即逝，在一个单位时间里同时出现多个时机的现象更是罕见，所以有了时机就要抓住，抓住了就要展开行动。我们认为，时机是可以选择的，也有选择的必要。假如我们把反击诡谋分成事前反击、事中反击、事后反击的话，不期而遇的时机一般在每个阶段都会出现，有的还可能在一个阶段出现多个反击时机，这就为我们选择时机提供了条件。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哪一个阶段的时机以及哪一个阶段里的哪一个时机。这样的选择与一般的选择不同，一般的选择是在有多个被选择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一个。从难度上讲，前者比后者难度大，前者的难度大在不能同时将多个时机一起进行比较，完全凭选择者个人的能力，根据想象中的效果揣摩哪一个阶段的时机和哪一个阶段里的哪一个时机更好。这样的选择其风险性很大，在他将前面的时机放弃而等待后一个他认为更好的时机出现的时候，而这

谋 诡

个更好的时机偏偏没有出现或者出现了但比前面的更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选择的必要。大家知道，风险与效益成正比，风险越大效益越大。正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有很大的风险，但一旦成功，绝对是最佳的时机。

302

从前面的探讨中我们知道，诡谋有各种特点、各种性质、各种类型，对于那些简单的、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涉及面很小的、急就式的诡谋，反击时没有必要作时机的选择，反击它的时机常常只有一个，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反击这样的诡谋是一有时机就要抓住不放。下述故事中的反击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很久以前，有一对财主夫妇，家里非常有钱，但就是没有孩子，无奈之下只好抱养了一个。也许是抱养的小男孩带来的好运，妻子马上怀孕了。十个月之后，她生下一个儿子。有了自己的儿子就对抱养的开始疏远。两个孩子慢慢地长大，财主夫妇对他们的态度却越来越不同，对养子，虽然其聪明伶俐，但经常给予的是呵斥打骂；对亲子，虽然其愚钝顽皮，但却是百般呵护宠爱。为了不使亲子将来被养子欺负，这对狠心的夫妇决定除掉养子。机灵的养子虽然只有十一二岁，但已觉察到自己生存的危险，因而非常小心地应对。一天，夫妇俩非常温和地把养子叫到身边，拿出一封封得严严实实的信对他说：“这信里是账单，你把它送到前村的铁匠那里去，向他要回欠我们家的钱，钱要回来后有一半归你。”养子接过信，疑窦丛生：今天养父母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信里只是账单，为什么要封得严严实实？铁匠从来没有欠过我们家的钱，哪来的账单？疑虑使他感觉到送信这事儿是凶多吉少，可他又不能不去，不去养父母不仅会采取残酷的手段责罚他，还可能采取更加阴险的手段对付他。怎么办？为难之际，他看到弟弟即养父母的亲生儿子正在同别的儿童弹胡桃玩，输了很多，于是心生一计：他对弟弟说：“你输得太多了，我替你玩，帮你赢回来，你替我将这封信送到前村的铁匠那里去。”弟弟乐意地接受，拿过信就跑去了。铁匠接过信打开一看，二话没说，就把送信的小孩投进火炉烧死了。随之他拿着信来找财主要钱，因为信中说送信的小孩是个灾星，只要将其

投进火炉烧死，他就可以从财主这里得到一大笔钱。财主非常高兴地如数付款。而让他意想不到的，铁匠刚走，养子却捧着满手的胡桃回来了。财主夫妇大惊失色，急切地问：“你不是送信去了吗？”“是弟弟代我送去的，我替弟弟弹胡桃玩，帮他赢了这么多。”养子边回答边把满手的胡桃递给养父母看。财主夫妇天塌般地瘫软在地上，很久说不出话来。

333

养子虽小，但很有头脑，他从养父母的举动中，看出了送信中隐藏着阴谋，为了不致自己进入圈套，遂抓住时机予以反击，让养父母的亲生儿子代替自己去送信，结果救了自己一命。反击方式虽然非常简单，但却异常高明，而且紧紧抓住了一个唯一的反击的机会。这样的反击极具借鉴价值。

但是，对于那些复杂多变的、关乎前途命运的、涉及面相当大的、蓄谋已久的诡谋，特别是对付阴险狡诈的诡谋制造者，必须对时机进行选择，过早可能打草惊蛇、适得其反，过迟可能力所难及、贻害无穷。如何能让选定的时机恰到好处，这要从双方力量（包括智力）的对比上进行考虑，当自己的力量弱于对方时，反击时机可选定在事前阶段，也就是在对方准备加害于己的时候曝光其诡谋，使其畏惧社会力量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事前反击于己不利的话，那么就忍辱负重地等待己方力量强大之后再寻找时机反击。当自己的力量与对方的力量不相上下时，可以把反击的时机选定在事中阶段，在这个阶段反击，既能抓到对方一定的把柄反击起来有力量，又能避免自己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当自己的力量强于对方时，反击的时机可以选定在事后阶段，这个时候反击，既能证明自己掌控力强，视诡谋者于不屑，又能避免以强欺弱、小题大做之嫌。当然，这种反击时机的选定并非金科玉律，最好的时机选定，是不管哪个阶段出现的时机，只要自己认为这个时机于自己最为有益、有用、有效，就牢牢抓住，大力反击。

（3）珍视时机

经过认定、选定，反击诡谋的时机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如何

谋 诡 论

对待，有三种态度：优柔寡断，盲目行动，理性而为。

考虑马上行动，但又瞻前顾后，怕这怕那，最怕的是失败，怕失败之后使自己遭受更大的伤害；考虑不马上行动，可好不容易等到的时机将会白白浪费，这岂不是想报的仇报不了，想挽回的损失挽回不了。行动不是，不行动也不是，这就是优柔寡断。

364

反击诡谋的机会终于有了，在无思想准备、无计划方案、无办法措施的情况下，不管有无成功把握，仅凭一种直觉、一腔热血地展开行动，把成功希望寄托在运气上，这就是盲目行动。

如果说优柔寡断有可能坐失良机，那么盲目行动则有可能断送时机，两者皆不可取。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理性而为。理性而为就是合乎公理而为，是根据时机的规律特点，手握斗争的主动权，按照人们共有认识，遵循一定的程序，展开的有准备的行动。尽管有的行动是在时机出现的刹那间展开，看起来似乎没有准备，实际上准备工作做在了时机出现之前，如怎样反击诡谋的方式方法早已酝酿在脑海。理性而为是对时机的珍视，这是一种事实珍视，即既不坐失它，也不断送它，而是把它当做火烧赤壁之战里的东风予以珍惜重视，孙吴联盟正是对它无比地珍惜重视才有了决定性的胜利，若不是如此，也许三国的历史要改写。事实珍视无比重要，而在时机出现之前的准备工作也一样重要。反击诡谋，就是要从思想上、人力上、物力上作好充分的准备，若不这样做，即使时机如愿到来，我们也不知如何抓住它来为自己服务，出现的状况会是：要么束手无策，让时机白白流失；要么盲目利用，结果一败涂地。睿哲们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说的就是从思想上做好准备工作，随时恭候时机大驾光临。准备工作做得越好越是对时机的珍视。凡不做准备工作而迎接时机者都是对时机的轻蔑和亵渎，都是对自身的不负责任。所以，珍视时机必须作好准备，作好准备就是珍视时机，我们管这样的珍视叫意识珍视，即从思想意识上高度重视。意识珍视和事实珍视合二为一，反击诡谋一定会取得成功。

需要说明的是，反击诡谋不能有理解上的误区，以为对诡谋的反击就是要以谋对谋，不能采取非谋的方式。应该说，反击诡谋采

取以谋对谋的方式是最好的，但不能是唯一的。如果是唯一的，就会有不少诡谋不被反击，因为反击诡谋最重要的是瞅准时机、立即行动，否则就会坐失良机，然而不少受诡谋之害者不会用谋或者来不及用谋，再一种情况就是诡谋者特别狡诈，使得你对其“计谋不能诱，利害不能惑”^①。怎么办？可以采取非谋的方式：如报警、如当众揭露、如擒拿、如捕杀（如前举况钟捶杀为首诡谋者）但不能违法。这就是说，反击诡谋采取什么方式都行，只要不违反这样一个原则：合法有效。

① 明·刘基：《百战奇略·正战》。

主要参考书目

张超编著：《办公室政治：写字楼里的潜规则》，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3 年版。

韩唐著：《博弈生存》，哈尔滨出版社 2005 年版。

白波著：《博弈智慧》，哈尔滨出版社 2006 年版。

金马著：《创新智慧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谭希培、高帆著：《超越现存——制度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美] 罗伊·F. 鲍迈斯特尔著：《恶：在人类暴力与残酷之中》，崔洪建等译，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刘德胜编著：《办公室防人成功学》，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陈东著：《方法为王》，学林出版社 2006 年版。

林在勇著：《怪异：神乎其神的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伍柏麟、尹伯成编著：《经济学基础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意] 马基雅维里著：《君王论》，惠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张晓芒著：《诡辩：思维的陷阱》，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6 年版。

于鸿君著：《经济学视角下的思维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沈黎、沈厚编著：《奸佞·诈伪·诡道》，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马俊英著：《开发你的创新能力——创新思维 125 篇》，长安出版社 2003 年版。

田运著：《开发智慧的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年版。

汪丁丁、叶航著：《理性的追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孙奎贞编著：《领导者的智商与情商》，华文出版社 1999 年版。

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刘永富著：《论真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赵修琴著：《老猎人鬼点子》，金城出版社 1999 年版。

龚是非著：《历史文化中的智慧》，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6 年版。

柴宇球编著：《谋略论》，蓝天出版社 1996 年版。

许国民、陈阳平著：《谋略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谢燮正、谢及著：《谋略思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邓建华编著：《谋略经纬》，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董书城编著：《谋略中的借术》，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年版。

吴兴明著：《谋智、圣智、知智——谋略与中国观念文化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 年版。

张建明著：《清代韬略》，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日] 村山孚著：《权谋术》，王子今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余华清著：《权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贺更行著：《荣辱论》，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年版。

丁立平著：《人格与社会》，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2 年版。

陈仲庚、张雨新编著：《人格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王海明著：《人性论》，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谋 诡 论

308

崔文良著：《人生智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8 年版。

李炳义、李恒川编著：《市场经济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6 年版。

娅娅著：《实力论》，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年版。

吴稼祥著：《神奇的加与减》，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苏富忠著：《思维科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诸葛山人著：《说谎与反谎术》，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7 年版。

谢平仄等著：《社会结构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司马云杰著：《盛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倪愫襄著：《善恶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守庸、彭敦文著：《特权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王则柯著：《新编博弈论平话》，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海明著：《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高帆著：《虚假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车明正、薛佩玉著：《用计与防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2 年版。

学武著：《智慧生存黑皮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王有德著：《智慧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年版。

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萧斌著：《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孟驰北著：《占有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张大可、何乃光主编：《中华文化与智慧谋略》，华文出版社 1996 年版。

冷成金著：《中国权智》，团结出版社 2002 年版。

李大根等主编：《中国谋略事典》，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曾仕强著：《中国智慧》，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年版。

修平编著：《中庸的智慧》，地震出版社 2006 年版。

后 记

人的一生总会有幸运的事情，遇上群众出版社，无疑是我的幸运，它使我的追求两次得以实现。

五年前，拙著《骗局论》定稿并交付群众出版社出版之后，我仍感意犹未尽。恍惚中，我看到：当我将骗局一丝不挂地游街示众的时候，它的难兄难弟——阴谋、淫巧、权术、奸计、鬼点子——在拍手称快的人群中，皮笑肉不笑地掏出了暗器，而它身边就站着正义、善良、美好与光明。不知是职责意识的驱使，还是大家都有的社会责任感使然，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我没有考虑有无战胜它们的能力，仅凭要当一名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的勇气，便毅然地冲了上去……于是有了《诡谋论》初稿。承蒙群众出版社再次不弃与支持，在对书稿进行了两次修改之后，《诡谋论》一书终于就要出版面世了——尽管其中还有许多的不足。

为了让我们的天空中再少一些乌云和阴霾、再多一些阳光和白云，生活里再少几股袭人的寒流、再多几缕和煦的春风，也为了答谢众多友人、同事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与帮助，我愿意在探讨社会负面文化上及过程中，继续当一名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当然，在这条探索的路上，仍然少不了广大热情读者的鼓励与声援。

让我们擦亮眼睛，携起手来，用我们的智慧与勇气，合力识破骗局、戳穿诡谋，愿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这也是我编著《骗局论》和《诡谋论》的初衷与目的。

刘水清

2008年12月